
金 日 成
回 忆 录
与世纪同行
6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6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 · 平 壤
1 9 9 5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6）

민족의 운명이 생사기로에 놓여있던 암담한 시기 항일의 용사들이 조국땅에서 울린 총소리는 멍들었던 겨레의 넋을 되살리고 항일혁명의 앞길에 승리의 서광이 비끼게 하였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在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的黑暗时期，抗日的勇士们在祖国土地上发出的枪声，震醒了同胞昏厥的灵魂，给抗日革命的前进道路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金日成



和崔贤在一起

祖国光复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



咸兴一条街

清津港一瞥



汉城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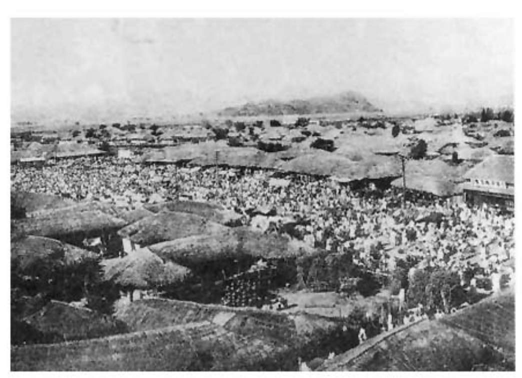


海州的濯热亭



平壤一角

新义州街头



大邱的市场



木浦港



釜山港

警卫连的战友们



和警卫队员们在一起

这是1937年秋于临江县五道沟密营的合影。当时我常戴眼镜。



李达京

朝鲜人民革命军警卫连连长



李乙雪



全文燮

远 征 抚 松


海拔两千多米的崇山峻岭、零下40度的严寒、难以忍受的饥饿、敌“讨伐队”的穷追和围堵，这的确是一次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行军。
红头山
漫江后山
杨木顶子
小汤河
东岗

受难的祖国



北部地区火田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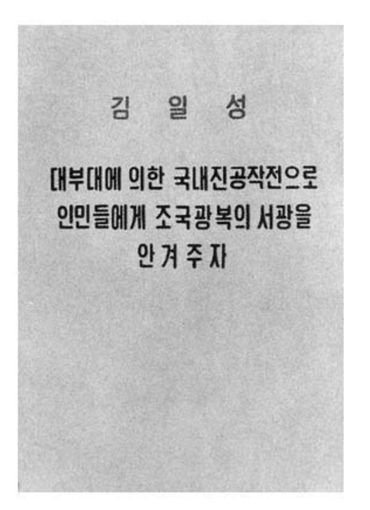
失业工人彷徨街头

揭露日寇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漫画



揭露日寇暴力统治的报纸资料

大部队挺进国内作战



这是我在西岗会议上的讲话

西岗会议遗址（抚松县杨木顶子）

红岩战斗时的战场



土兵團越境襲來

住民十五名拉去、物貨掠奪

十六日茂山紅岩洞서

朝鮮人이多數끼인

精銳의共産部隊

隊中에는十二名의女性介在

襲來한土兵團正體

急報받고

討伐隊急派

鮎川課長指揮로

"무명산"殺人犯

犯行自白

《朝鲜日报》登载的
有关红岩战斗的消息
（1937.5.20）

普 天 堡 战 斗



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一部分雕像

普天堡战斗前夕，日寇在朝鲜北部地区部署的警戒网



日军在豆满江冰面上进行特殊训练

边境搜查

边境警察家属进行射击训练



当年的普天堡

普天堡战斗时我军的指挥地点

普天堡战斗前夕，部队宿营过的坤长德台地

朝鲜还活着！



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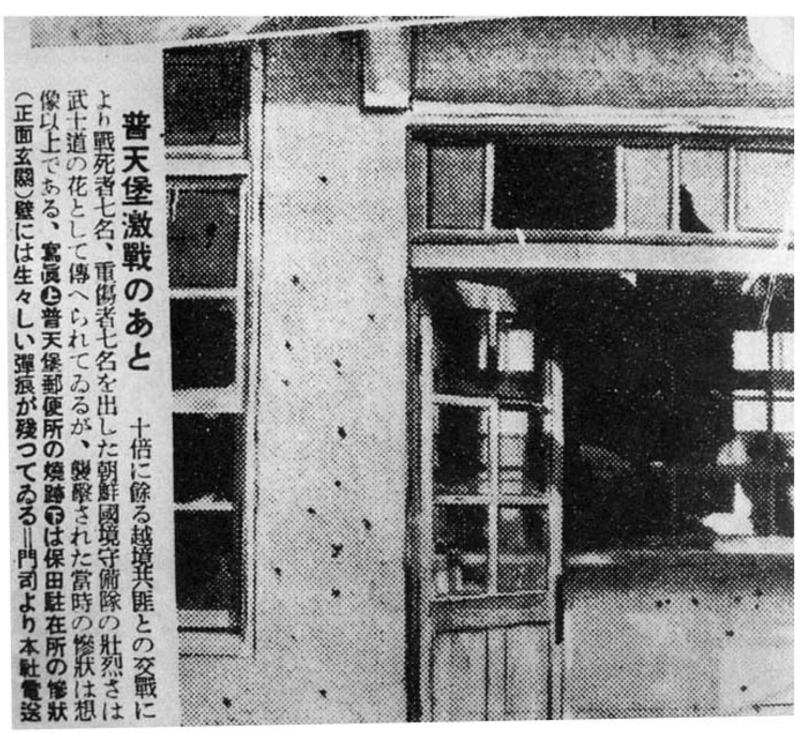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

朝鮮人民革命軍

司令官 金日成

普天堡战斗时我军贴出的布告

普天堡日寇统治机构的建筑物在燃烧



普天堡激戰のあと

十倍に餘る越境共匪との交戰により戰死者七名、重傷者七名を出した朝鮮國境守備隊の壯烈さは武士道の花として傳へられてゐるが、襲擊された當時の慘狀は想像以上である、**寫眞㊤普天堡郵便所の燒跡㊦は保田駐在所の慘狀（正面玄關）壁には生々しい彈痕が殘つてゐる＝門司より本社電送**

当时受到我军袭击的普天堡警察驻在所

（墙上留有机枪弹痕）



普天堡警察驻在所的炮楼

外国报纸报道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国内攻打日寇的消息



機關銃가진二百餘名越境

普天堡市街를襲擊衝火

駐在所、郵便所、〇〇面所에放火

電線切斷 詳細한被害未判

越境匪之殘暴

普天堡全滅

軍警協力討伐

滿洲報

普天堡襲擊事件

金日成一黨中에는

女黨員도七餘名

共軍大部隊越境襲來

駐在所等官公署에衝火

四日午後甲山普天堡에

保田事件に對する感想

ПРАВДА

Ор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 МК ВКП(б).

Партизаны на корейско-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АНТИЯПО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ОРЕ

金は廿七歳の青年

地理に通じて神出鬼沒

賊襲を被った

普天堡といふ所

國境警備の第一線

口隅水山战斗和间三峰战斗



口隅水山战斗时的战场



驻罗南的日军第十九师团司令部

口隅水山战斗时出动的惠山警察署特设警备队

间三峰战斗时的战场

中日战争爆发

日军过` 沟桥

日军在天津站附近开炮

日军从广安门进入北京城

第二次国共合作

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于上海）

宋庆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进攻芦沟桥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奠定了正式合作的基础，以代替西安事变后所获得的停战。

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

……E，中国目前已……

……前提，必须举国……

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宣言和宋庆龄的声明


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

每日申報

周共產軍代表
三項目提案
蔣介石과會見하고

报纸报道 1937 年 7 月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庐山会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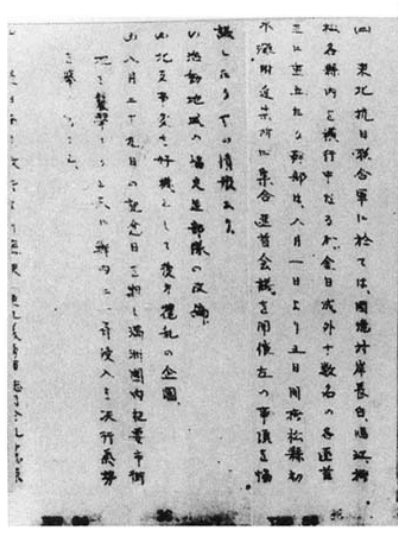


中国士兵抗击日军



这幅当年的漫画，预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可能扩大成日苏战争

敌后搅扰战



(四) 東北抗日聯合軍ニ於テハ、国境対岸長白、臨江、撫松各縣内ニ横行中ナル金日成外十数名ノ各匪首ニ対シ至急ニ集結スベク司令部ハ八月一日ヨリ五日間撫松縣初水灘附近某所ニ集合匪首会議ヲ開催左ノ事項ヲ協議シタリトノ情報アリ

(1) 活動地域ノ協定並部隊ノ改編

(2) 北支事変ヲ好機トシテ後方攪乱ノ企図

(3) 八月二十九日ノ記念日ヲ期シ満洲国内枢要市街地ヲ襲撃スルト共ニ鮮内ニ一斉侵入ヲ決行スル等

昭和十二年九月

支那事変ニ伴フ不逞鮮人ノ策動状況

警保局保安課

有关初水滩会议的日寇秘密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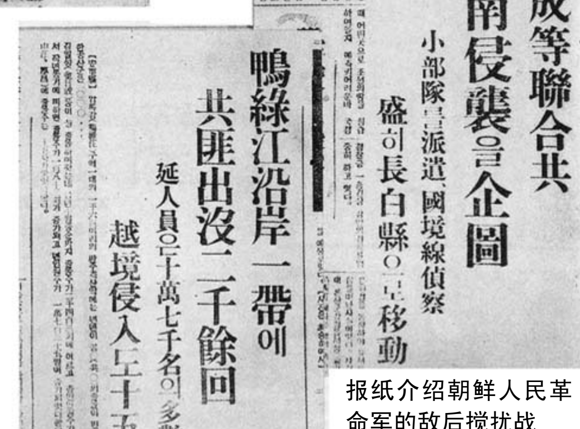
朴长春



李斗赞



金万益



金日成等聯合共
咸南侵襲을企圖
小部隊를派遣, 國境線偵察
盛히長白縣으로移動

鴨綠江沿岸一帶에
共匪出沒二千餘回
延人員은十萬七千名의多數
越境侵入도十五次

报纸介绍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敌后搅扰战



日军在豆满江冰面上昼夜不停地加强警戒

少年连队



全 姬



带枪的少年连战士



吴日男



金益显



金铁万

九 月 号 召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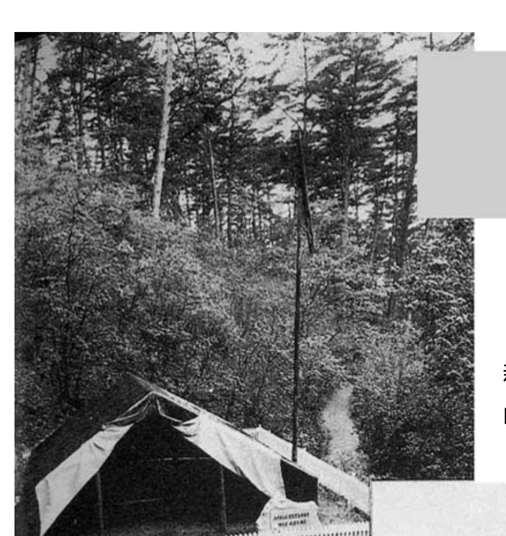
김 일 성

전체 조선동포들에게 보내는
호 소 문

（1937년 9월 17일）

这是1937年9月，我致全体朝鲜同胞的号召书

开往新兴地区



新兴地区东奥洞密营里的司令部旧址

1937 年 9 月下旬，我曾在新兴地区参圃山的这所房子住过



新兴煤矿——矿井入口

加强国内的反日斗争

在祖国光复会的旗帜下


李周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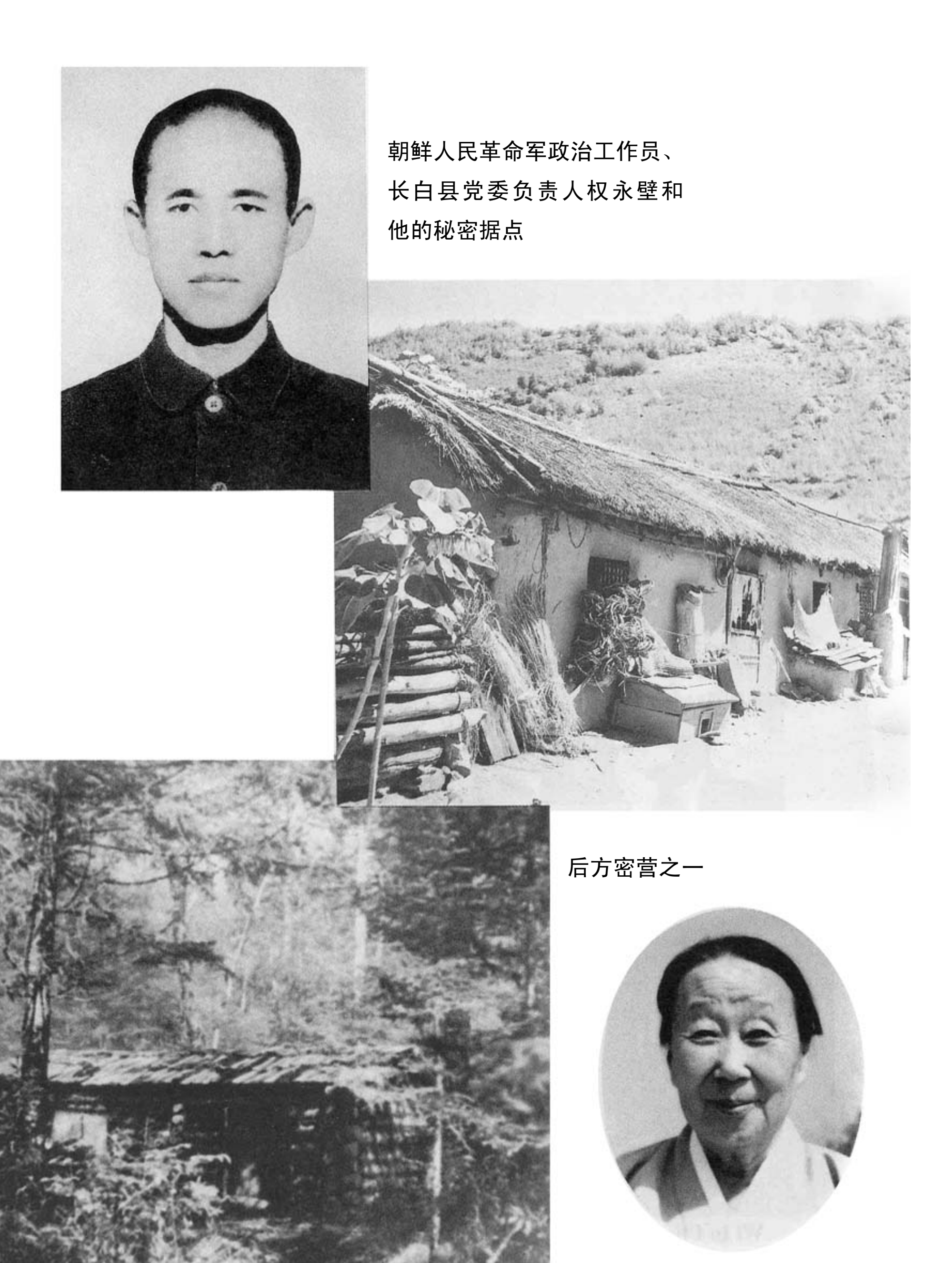

李 镛


朴于贤


崔元凤


魏仁灿


李仁模与在黄水院大坝工地劳动的青年在一起
（前排右二为李仁模）



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
长白县党委负责人权永壁和
他的秘密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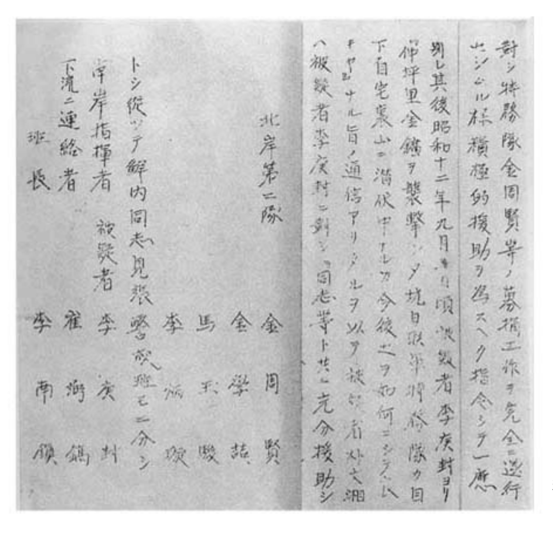
后方密营之一

张哲九
（炊事队员）

白头山密营的一部

金周贤

朝鲜人民革命军团长



對シ特務隊金周賢等ノ募捐工作ヲ完全ニ遂行セシムル様積極的援助ヲ為スヘク指令シテ一應別レ其後昭和十二年九月十日頃被疑者李庚封ヨリ仲坪里金鑛ヲ襲撃シタ抗日聯軍将校隊カ目下自宅裏山ニ潜伏中ナルカ今後之ヲ如何ニシタラヨイカヤニナル旨ノ通信アリタルヲ以テ被疑者朴大湘ハ被疑者李庚封ニ對シ同志等トシテ充分援助シ

北岸第二隊　金周賢

金學喆

馬天暾

李炳璇

トシ従ッテ鮮内同志兒報警戒班ヲ二分シ

岸岸指揮者　被疑者　李庚封

下流ニ連絡者　崔炳鶴

班長　李南願

日寇有关金周贤小分队袭击仲坪矿的文件

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1）



林春秋



柳京守



金京锡



金云信



李桂笋



池炳学



金成国



黄顺姬

太炳烈



朴正淑



金慈麟

目　　录

第十六章

转战在鸭绿江两岸

时期：1937.3~1937.5

一　远征抚松

在桃泉里和鲤明水给疯狂进行“冬季大讨伐”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我决定率主力再次翻过长白山岭北上，远征抚松。

当我宣布远征抚松的方案时，大家都惊愕地表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这似乎是说：我们以为马上就要挺进国内狠揍敌人了，因此，都激动兴奋地专等着一声命令，可突然叫我们北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丢下好不容易开辟的西间岛和白头山，朝北远征？真是莫名其妙！他们认为，在样样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远征抚松的。他们这样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时，正是我们的军民斗志昂扬，气势磅礴的时候。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屡战屡胜；尽管敌人的“讨伐”攻势极其猖狂，政治、经济、军事封锁十分严密，我们的游击队还是不断壮大，前来参军的人络绎不绝，武器装备也大有改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沿岸一带变成了我们的天下，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地下组织稠密地分布在西间岛全区。我们从南湖头开拔时确定的第一个目标算是胜利达到了。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挺进国内作战。只有把武装斗争早日扩大到国内去，才能在国内掀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热潮，才能更积极地

深入开展建立新型政党的斗争。挺进祖国，惩罚敌人，这不仅是我们大家最大的愿望，而且也是国内人民如饥似渴地企盼已久的最大愿望。

当时国内人民盼望我们挺进祖国的心情，可从这样一个事例中看得很清楚。

地阳溪有个名字很古怪的村子，叫南德，也叫那哈德。这个村子的区长叫刘浩，是祖国光复会的特殊会员，支援游击队的工作做得很好。有一次，他领着村里的老乡，带着支军物资来到了我们的密营。其中有三个从甲山来的农民。这三个甲山人，渡过敌人警戒森严的鸭绿江，给我们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小米、用燕麦做的炒面和麻鞋。三个人带着这么多的东西来，固然是令人吃惊的，但更感人肺腑的是，他们在白头山原始森林中迷了路，辗转了好久，也饿了好几顿，可一粒也没动支军的口粮。

麻鞋的来历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他们带来的麻鞋少说也有二百多双，做鞋帮的麻辫全是用细麻绳打的，鞋底是用麻绳和榆树皮搓起来编的，打得既精致又结实。

当金山虎对甲山人的劳苦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都显出羞愧的表情，不知如何是好。其中一位年纪最大、像道士一样留着长胡须的老人，握住金山虎的手，说道：

“我们做百姓的只能给白头山的将士们送这点麻鞋，实在是不忠不义呀，请多多原谅吧。对我们不足挂齿的劳苦还表示感谢，真叫我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啊。这虽是不屑一顾的麻鞋，如果你们把它当军鞋穿上，到我们甲山地方来消灭那些岛国蛮子，我们就死

无遗恨了。我们一心盼着革命军来呀。”

苦盼朝鲜人民革命军进军国内的人不仅仅是甲山的农民。曾经扛着支军物资来过我们密营的庆尚道老人李秉元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将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日本鬼子赶出我们朝鲜呀？我生前能见到这一天吗？”

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深切思念和热诚的爱护，时时刻刻都在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领到了甲山农民送来的麻鞋的每个同志，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恨不得立即进军国内。我的心情当然也是一样的。

然而，我却给战友们下达了与进军国内的方向完全相反的向北进军的命令，并对不知就里的战友们说：不要把北上当撤退看，我们今天北上，这实际上是向祖国进军的南下；要进军祖国，不能不走这条路；大家要知道，我们暂时开往抚松方面，归根结底，是为挺进祖国做准备。

我们远征抚松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用以整化零的灵活战术使敌人陷入混乱，最大限度地分散集结在长白地区的敌“讨伐”兵力，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障这一地区正积极开展的地下组织建设工作的安全，同时为大部队挺进祖国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敌人尽管在 1936 年进行的“冬季大讨伐”遭到了失败，但丝毫也没有放弃要孤立和扼杀革命军的企图，继续向我军活动区域投入了驻朝日军和国境守备队以及伪满军和警察队等庞大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牢牢地掌握住主动权，按照我们的构思和决心把革命斗争继续推向高潮，就必须把活动舞台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只有这样，才能置敌人于被动的地位，为西间岛和国境一带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分散麇集在长白地区的敌“讨伐”兵力，保护鸭绿江沿岸的革命组织，这也就等于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祖国创造良好条件。人民革命军要想打入国内进行大部队活动，首先就不能让敌人把大量的兵力向我们的后方和出征基地——西间岛集中。

正如“图们会谈”[1]所表明的，敌人把武力向西间岛一带集中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人民革命军赶到长白地区的深山沟里加以消灭，进而阻止我军挺进祖国。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即将向国内挺进，这是敌人也早已预料到的。实际上，大部队挺进国内，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惧怕的。如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开进国内进行军事政治活动，那必将发生几乎无异于攻打日本本土的巨大效果。

敌人很清楚，我们的大部队开进国内哪怕只发出几声枪响，也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因此，自从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占据白头山地区的那年冬天起，敌人就强迫居民天天夜里到鸭绿江上去破冰，以防止人民革命军集体地或个别地潜入国内。他们乞灵于如此幼稚可笑的防备措施，足见他们多么害怕我们向国内进军。

日本天皇派自己的侍从武官视察朝满边境三个星期，这已在前面简单讲过了。总之，日本政界和军部的头子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我国北部国境一带。当时，侍从武官向国境警备人员转达了天皇要他们铜墙铁壁般地守卫朝满边境的谕旨和天皇夫妇赐予他们的礼品。我们的队员听到敌人为此举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传达仪式，都掩饰不住心中的甜美感，说日本天皇被我们人民革命军要开赴国内，吓得心惊胆战，面如土色。

要实现大部队挺进祖国，就必须在敌人号称“铜墙铁壁”的国境警备线上打开几个突破口。要打开突破口，就需要首先最大限度地分散麇集在长白地区山野上的敌“讨伐队”。要分散敌人，就需要我们装出一副要离开长白地区的样子来。只要我们率部转移，敌人就势必要跟踪我们，国境上的警备自然就放松了。

我们准备在远征抚松的路上同抚松、临江、蒙江三县交界地区的崔贤部队和第一军第二师同志们会师，同他们讨论制定胜利挺进国内协同作战的计划。

我们通过远征抚松要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对新入伍的队员进行充分的军事政治教育和训练，以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完成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使命。

在白头山地区建立了新型根据地后，我们吸收好几百名志愿报名参军的青年，补充和扩大了队伍。西间岛一带的青年，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及其成果所鼓舞，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国内，也有很多爱国青年络绎不绝地来找我们，要求参加武装斗争。

在部队有很大扩充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集中力量从提高素质上加强部队的建设。

加强部队的战斗力，最根本的就是提高指战员的水平。不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军事业务水平，就不可能把部队建设成为百战百胜的队伍。我们的几百名新队员，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都很高，但都没有作战经验，没有学好游击战术，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也不高。他

们入伍以前都是翻土坷垃的农民或是打短工苦撑苦熬的淳朴的乡巴佬，翻耕除草、铡草喂牲口，一个个都很拿手，但在军事方面，却都是门外汉。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文盲，别说社会发展的原理等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就连朝鲜文字的字母也不认识。他们虽然都是饱经风霜，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的青年，但还不善于克服游击队生活中的困难，有些人还有思想上发生动摇，讲怪话发牢骚的现象。有的嘀咕说睡眠不够，行军太苦；有的青年鞋子和衣服破了也不想自己动手缝补，却去麻烦老队员，增加老队员的负担。他们都不懂制式动作，不知道夜间行军的要求和判定方位的方法，枪出了故障也不会修，只知求老队员帮助修理，自己却站在旁边发呆。带着这样的新手，是不能挺进祖国的。

吸收新队员后，虽然让老队员抽空用速成的方法对新队员进行了训练，教了一些片断的常识，为提高他们的素质作了努力，但只靠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新队员迅速培养成为符合游击战要求的全面发展的战士的。最好的办法是到敌人不大注意的深山密林里去，用一定的时间对新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不经过这种正规的教育过程，就不可能把他们培养成为铮铮作响的优秀军人。然而长白山一带没有适于进行新兵教育的地方。无论是平地还是深山幽谷，都有敌人进行“篦梳”式的搜索。因此，作为适于进行新兵训练的地点，选择了革命军的后方密营集中的抚松。

总之，远征抚松，是在敌人的庞大兵力不断袭扰的情况下，仍能牢牢地掌握主动权的积极的措施，是进一步加强部队战斗力、为革命军挺进祖国创造有利条件的灵活的战术性措施。这个远征，是巩固和

扩大我们在进驻白头山地区后半年来取得的成就的途径。

1937 年 3 月的一天，我们踏上了远征抚松的征途。除了有基本战斗员的队伍以外，包括缝纫队、炊事队、修械所在内的后勤部门的人也都参加了远征。

魏拯民、全光、曹亚范也跟我们同行。

头一天的行军目标是翻越多谷岭。由于一路上积雪很深，天气严寒，走了一天也未能翻过岭，只好在半山腰上过了一夜。

这年冬天，长白山岭雪下得特别大，甚至把一些几丈深的峡谷都填平了。遇到这种地方，就要用身体推着积雪，一步步地往前挤。

为了帮助新一代的人明白长白山脉一带的雪究竟有多大，有必要谈谈当时参加过这次远征的抗日战士们的回忆：当我们结束了远征，解冻后返回白头山方面的时候，路上看到了一只挂在一棵落叶松树梢上的麻鞋。这正是在长白县入伍的新队员远征抚松时在积雪中脱落的那只麻鞋。

三月初，在祖国的平原地区是积雪溶化的时候，而在白头山一带，却仍然是冬将军大施淫威的季节。

狂风大作时，帐篷也搭不好，即使搭上了，也抵不住狂风吹打。这种时候，我们就挖一个可容一个班人员的雪洞，铺上狍子皮或树皮，倚着背囊，坐着睡觉。雪洞的入口，挂上白布挡风。我们在这样的远征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明白了爱斯基摩人能够在雪洞冰窟里生活的秘诀。

当时，我们都穿着高过膝盖的长筒棉袜和甲山人送来的麻鞋。在

白头山一带，没有这样的装束，冬天根本不可能到外头去活动。露宿的时候，也穿着麻鞋，围着篝火睡。

第二天，我们越过了多谷岭。这次远征，的确不同凡响。一提起“艰难的行军”，我国人民自然都想起 1938 年冬朝鲜人民革命军从南牌子到北大顶子的行军。那次行军的确十分艰苦，可以称为“艰难的行军”。但是，就艰苦性而言，远征抚松的行军也不亚于那次行军。行军的距离，只有一百公里左右，行军所花的时间，我记得有二十五天左右。跟“艰难的行军’当时的一百多天相比，可以说是不足挂齿的。但是，这次远征，实际上也是异常艰苦的。

砭人肌骨的严寒、难以忍受的饥饿、驱赶不掉的困倦……种种痛苦时刻折磨着我们。加上多次的战斗，我们流了很多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远征抚松，对老队员来说，也是一场非咬紧牙关坚持就不能过关的极严峻的考验。可见，那些入伍才不几个月的新队员，该受了多大的苦，是不言而喻的。

我让老队员每人负责帮助一个新队员，我自己也做了三四名孱弱新队员的保护人。老队员都为新队员尽了老大哥的义务。行军时，老队员替新队员背背囊或枪；休息时，给新队员生上篝火让他们取暖；宿营时，给新队员准备睡觉的地方，替他们缝补挂破的衣服或鞋帽。

在珠家洞入伍的一个新队员，鞋子破得露出了两个大脚指头，可是他不想自己补鞋，一听到休息口令，就倒在篝火旁打起呼噜来。老队员在离开长白时穿的甲山麻鞋还没破，可这个新队员连备用的胶底

劳动鞋都已穿破了。我把我的备用鞋子给了他，还用大针缝补了他穿破的胶底劳动鞋，装在我的背囊里，后来送给了另一个新队员。每当我把新队员穿破的鞋子要过来缝补时，怕本人难为情，就避开人们，找个僻静地方悄悄地缝补。后来有一次，不小心叫本人发现了，那个新队员流着眼泪，硬把我手里的针线和鞋子抢走了。那天，我对新队员们讲了这样的话：

“你们在家里穿的是父亲给打的草鞋和母亲给缝的衣裳，可能都没做过缝缝补补的事。可是今天都当上了游击队员，应该学会自己动手缝补衣裳和鞋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嘛。今天，就跟我一起，学学缝补鞋子吧。

他们都十分不安地说，给司令官同志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

鞋子和衣服最容易磨破的是走覆盖着一层薄冰的雪地的时候。因此，我把走这种雪地时应当怎样挪动脚步的要领告诉了他们。

远征抚松，也是一次战胜饥饿的斗争过程。当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横着重重叠叠的困难，其中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粮食困难。因为行军速度比预料的慢得多，在离开长白时带来的不多的粮食，刚越过多谷岭就吃光了。在那茫茫雪原上，连可食的草根都寻不到，哪里去弄到吃的呢！唯一的办法是夺取敌军的粮食，可我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因为当时难以忍受的饥饿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所以后来我同一个同志交谈时，甚至说过那次远征实际上是一次“饥饿远征”。一整天吃不到一颗玉米粒，只用清水和雪团充饥，还要行军几十里路，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怎能忘记啊！

在远征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东岗附近一片密林里行军时发现了一栋中国人的房子。我们这些已经两天没见过一粒粮食的人，一发现这里有人家，就产生了一线的希望，以为可以从这一人家弄到一点粮食。隐蔽在山里种鸦片烟的人，一般都储存着一些粮食。

我们向这家主人求情说，部队已经几天没见到粮食了，要是你家有粮食，就请卖给我们一点。主人却一口回绝说，家里的粮食都叫山林队抢光了，一粒也没有。我们看到碾盘下边堆着很多玉米糠，知道这家碾出了许多玉米粥或玉米面。可是不管怎么求情，主人就是不肯。我们只好委屈地讨了点丢在碾盘下边的玉米糠，拿它来垫垫肚子。玉米糠跟谷糠、稗子糠不同，把它炒了吃，就粘在喉咙里，咽不下去。把它再磨细了，也不好咽下去，只好把它和在水里硬吞下去。就是这样也不抗饿。

我想了半天，把传令兵白鹤林叫来，对他说：

“从这儿翻过几个山岗，就能找到吴义成的部队。吴司令虽不在，但他的部下还有一部分留在那里继续抗战。你到他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来了，要求他们给补充一点粮食。只要他们有粮食，就会想到我们的友情，不会回避的。”

白鹤林立即去了吴义成部队，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空手回来了。

随后，吴义成部队的一个指挥官，扛着一麻袋玉米糠，前来向我道歉，求我原谅。他说：

“金司令特意派人找我们，我们怎能回避呢。我们愿意竭力帮忙，可是我们自己也断了粮，饿着肚子，不得不带这点儿东西来见您，请不要误会。”

那天，我们的队员在房子内外东张西望时，忽然发现放在当院的棺材里装满了玉米粥。当时，满洲地方有这样一种习俗，人还健在，就把棺材预先做好，存放在院子里，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有这种风俗，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在满洲地方就产生了许多同棺材有关的故事。

这家主人把粮食藏在棺材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却激怒了我们的队员，尤其新队员更是怒不可遏。一个在珠家洞入伍的新队员跑到我面前气呼呼地说：

“将军，这家主人心眼太坏了。人嘛，就是别人家的牛或马进到自家院子里来，也拿些吃的东西喂，这是人的道德，是应有的礼节。可是这家主人太坏了，简直不像个人，该狠狠地整他一下，粮食也都没收。”

我对那个新队员说：

“没收？那可不行。他们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动，宁可我们饿着。”

那个新队员没再说什么，咂着嘴走了。

我们没有让主人觉察到我们已经发现了棺材里的粮食，我们仍用玉米糠充饥，同时继续耐心地进行了教育。尽管这样，当我们同他告别的时候，他仍然没说出棺材里有粮食。那个曾主张没收粮食的新队员走到我跟前说：“您看，这号人，不管怎样教育，都不行啊！”

我回答说：“不对。他们虽然没给粮食，但他们已经开始明白我们是好军队了。”

通过这件事，新队员都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有各种类型的人，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方式；不论什么事，只有人们心甘情愿才能办得成。因此，不管处境多么困难，革命军队绝对

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财产，绝对不能强迫人民表示好意、给予支援。

那个时候，假如我们抑制不住愤怒，借口主人欺骗了我们，给他以惩罚，没收了他的粮食，那么，新队员们也许把“游击队离不开人民”这一座右铭置之脑后，堕落成为在人民群众面前动辄发号施令，处处要求特殊待遇的官僚或马贼一类的人。

当我们沿着漫江朝下游走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远远地跟着我们，看样子像是打短工的人。后来知道，他们是断头山木材所的工人。因为他们行迹可疑，我们便问他们为什么老跟着我们。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坦白说，是敌人叫他们来刺探我们的去向的。他们说，如果刺探到游击队的去向，鬼子就根据情报的价值发给他们巨额的工钱，如果不提供情报，就要把他们划为“通匪分子”，严加惩处。

通过这两个工人，我们了解到断头山木材所有很多工人，还有山林警察队。我决定攻打山林警察队，即使很吃力，也一定要缴获到粮食。

我调第七团和第八团打了这一仗。两个团攻打木材所，打开了仓库，可是连一袋米也没得到。原来，木材所的老板害怕游击队的袭击，不把粮食放在仓库里，而是存在别的地方，当天吃的当天运。

出乎意料，木材所的村里驻有七八百名敌人，是根据我军主力向抚松移动的情报来增援“讨伐”的，他们倾巢出动，负隅顽抗。

我七团和八团从木材所牵出二十来头牛，回到了司令部。吴仲洽带领的阻击队截击尾追的敌人。吴仲洽从各排里选拔出决死队，同敌人打了十多次仗，顽强地牵制了敌人。天亮以后发现，敌人竟来到了距我军只有五十米远的地方。

当阻击队阻止敌人前进的时候，主力占领了东边的两座山峰，我就派传令兵命吴仲洽的阻击队把敌人引诱到这两座山峰之间的草地上去。敌“讨伐队”中计，被诱到了开阔的草地，结果丢下许多尸体，仓皇逃窜。

在主力投入战斗以前，一些队员在一个小山岗的后面宰了牛。他们边宰边把牛肉放在篝火上烤。那股烤牛肉的香味直扑鼻而来，简直要把人的肚肠都搅翻了。来不及烤的，就切成大块，装在背囊里带走。从此，我们就吃着这些生牛肉，继续行军。可是过了两三天，连这些牛肉也吃光了。

这时，全光看敌人的追击愈加猖狂，就离队去了东漫江的密营。他到密营后，给我们送来了几斗麦子。

我们的队员看了他送来的麦子，都讥讽全光说，身为政治主任，气度才这么点儿啊？块头大，心眼却小得可怜。有的队员甚至骂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人情味。对全光这个人，队员们当时就有怀疑，因为全光在攻打抚松县城的战斗时，抛弃了作为辅助性战斗的万良河袭击战，给整个战斗造成了困难。全光爱摆干部架子，但是一遇到艰苦危险的关头，就缩脖子回避，因此，我们部队的指战员多半都看不起他。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全光后来果然叛变，给我们的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我们的部队拖着敌人，沿着漫江继续朝着抚松行军。全光送来的几斗麦子很快就吃光了，我们又继续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后来，我们设法甩掉了尾追的敌人，开到叫头道岭的地方停留了几天。因为不解决口粮就无法继续行军。这时，姜泰玉等来自漫江的新队员主动提出

要去弄些粮食来。他们是前一年在漫江看了话剧《血海》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深受感动，当即志愿入伍的。

部队快到漫江的时候，他们簇拥着金泽环，来到我面前说：

“将军，让我们去弄点粮食来吧。漫江就在跟前，还叫游击队挨饿，这像话吗？漫江虽然粮米紧缺，土豆却很多。从前，为了支援游击队，曾收集了不少土豆，我们知道藏土豆的地方。”

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也轻松一些了。

这样，由十来名队员组成的粮食工作队就去了漫江。然而事与愿违，成果不大。原来，作为军粮储存的土豆，都叫野猪吃掉了，粮食工作队只带来了野猪吃剩的不多一点土豆。但是，就是这些，对完全断了粮的我们来说，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不过，为了粮食，又出了一个问题。粮食工作队在回来的路上，饿得实在受不住了，便在离部队宿营地不远的地方生了火烧土豆吃。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在黎明时分生了火，暴露了他们自己和整个部队的位置，而且，他们发现了来偷袭的敌人之后，也不打任何信号，就不顾一切地奔回了宿营地，致使正在酣睡的部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了战斗。

自由主义常常招致这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常常告诫新队员说，在游击队里，自由主义是绝对要不得的；纪律是军队的生命。守纪律，虽然不容易，但不能把它看做是一种负担。宿营时不要脱鞋睡觉；不管到哪儿去，都不要留下脚印；除了上级指定的地点以外，不要随便找地方生火；被敌人追击的时候，要把

敌人引到与密营或宿营地相反的地方去；不认识的草，不要随便吃；等等。对新队员，我一再强调要严守游击队的纪律和行动准则。

尽管这样，去漫江的粮食工作队还是犯了错误，使我们在同敌人的战斗中失去了几个宝贵的战友。

当时，我没有批评他们。如果批评能使牺牲的战友起死回生，那该多好啊！战友的牺牲，已经成倍地代替了批评，它比批评或处分更严峻。

传令兵崔金山就是在那次牺牲的。那天，敌人发现了火光，就隐秘地跟踪我们的粮食工作队，包围了我们的宿营地，然后突然开了火。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崔金山勇做一枚盾牌，挡住冲向司令部来的敌人，舍生忘死地进行了战斗。他看到我在队伍的最后边撤退，便同李凤禄一起奔到我的身旁，用身体掩护着我，朝敌人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如果当时没有他们奋不顾身的保护，说不定我也遭到了什么不幸。崔金山身中好几发子弹，负了致命伤，但他没有停止掩护射击，直到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他的军装完全被鲜血染红湿透了。

李凤禄从雪地上拉起崔金山背起来就跑，我跟在他的后面用匣枪掩护，当他筋疲力尽的时候，就由我来背着崔金山走。

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李凤禄把崔金山放在地上一看，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崔金山，长相并不出众，气质上也没有什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特点，但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像爱护亲弟弟一样爱护他。

他是个富有理想，充满着幻想的小青年。他的诸多希望中，有一

个是希望能坐上火车尽情漫游。他曾说过，祖国独立后，他要驾着火车驰骋全国。

“真是太可惜了！他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呢。”把崔金山放到篝火旁时，我身后的一个同志说道。他这一说，把整个部队都说哭了。

在安葬崔金山的时候，翻看了他的背囊，里面只有一双甲山人送来的麻鞋和一小纸袋炒面。

这个生在异国、喝着异国的水长大的流浪民的儿子崔金山，他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踏上祖国的大地。他当了传令兵，从遥远的北满南湖头朝白头山行军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提出种种问题问我。如：再走多远才能看到祖国呀？到了西间岛，能吃到朝鲜苹果吗？听说东海岸风景美得迷人，将军您去过吗？再过几年才能打到平壤、汉城和釜山呀？他把甲山农民送来的麻鞋一直存着没穿，为的是挺进祖国的那一天穿着它打仗。

他是长期在司令部当传令兵，一直跟我同盖一条毛毯睡的可爱的小鬼，小战友。在跟他永别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悲伤，失声痛哭，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头道岭的地皮，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用斧头、刺刀，都刨不出一小块土来。我们不得不把崔金山的遗体掩埋在积雪里，为了将来重新好好安葬他，在那里作了一个标记。

解冻以后，我们总结了抚松远征，踏上了重返白头山的征途。这时，我带部队回到了埋着崔金山的地方。我们拿出在东岗密营准备的一套崭新的军装，给崔金山换上，然后在向阳地上挖好墓穴，郑重地

安葬了他，还在墓前栽了几株金达莱，好让他在九泉之下也能从这金达莱花上闻到祖国的芳香。虽是异国的金达莱，但它的芳香还能有什么不同吗？金达莱是崔金山最喜爱的花呀。

“金山呀，安息吧！我们又要回到白头山去了。到了夏天，我们就按着你生前的宿愿，一定要带着队伍打到国内去。到了祖国，一定以千百倍的仇恨替你报仇雪恨!”

我这样默默地想着，永别了崔金山。直到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感到很沉痛。如果他还活着，他的年纪该和白鹤林差不多。

1937 年春远征抚松时，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战友。正如“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痕”这句歌词一样，当时我们在所到之处都洒下了宝贵的鲜血，用鲜血开辟了每一寸前进的道路。

我不能在这篇回忆中详细生动地描绘出我的战友们建树的光辉业绩和他们付出的劳苦，感到很遗憾。但是，尽管文笔再拙劣，难道连我虔诚的心意都不能祭奠给他们吗？我怀着为这些在抚松的崇山峻岭、深沟幽谷牺牲时托付我们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而后离开了我们的亲爱的战友，为这些临终时仍微笑着嘱咐我保重、要我继续战斗争取胜利的亲爱的战友镌刻碑文的心情，书写着这篇文字。

二　日行千里战术

在漫江附近经过了多次激战以后，我们悄悄地率部隐蔽到杨木顶子密营去了。

杨木顶子位于西南岔和老岭之间的半山腰。据说，杨木顶子是因杨柳多而得的名。爬岭的盘山路两边各有一个密营，一边的叫东杨木顶子密营，另一边的叫西杨木顶子密营。我们先到了驻有俞参谋部队的西杨木顶子密营。从东杨木顶子密营往南翻过一个岭走不远就有高力堡子密营。以老岭为中心呈三角形的这三个密营，统称为杨木顶子密营。

这个密营建成后利用了好多年，1940 年 3 月，遭到林水山“讨伐队”的大肆烧杀，很多人牺牲，密营也被烧毁了。

杨木顶子，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的战友和可靠的进言人李东伯就牺牲在这里；警卫连的连长李达京受重伤被抬到这里后停止了呼吸。我在报刊《曙光》上刊载的论文《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是在这个杨木顶子密营写成的。在这个密营，我们还同魏拯民等军部的干部多次会晤，一起讨论过有关联合作战的各种问题。

在杨木顶子密营，我酝酿了 1937 年夏挺进祖国的作战方案，并加紧进行了进军准备。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是筹措后勤物资。

在杨木顶子，我把以吴仲洽为负责人的小分队派到了金周贤在等着他们的长白。这支小分队里还包括着缝纫队的女队员、受冻伤的和病弱的人。让他们到长白去筹措后勤物资，比参加一天吃不到一碗玉米粥的雪地行军，要轻松得多。

在派出这支小分队的同时，还派出一些政治工作员到西间岛一带和国内去开展工作。

之后，我们的远征部队为了分散敌人，并解决口粮问题，离开杨木顶子开赴小汤河林海中的第四师后方密营。这个后方密营里不光有粮食，甚至储藏有酒、桔子和苹果，四师的战友自豪地说这都是打了靖安军缴获的战利品。其中还有三挺机枪。

四师战友们送了我们够吃两天的玉米。离开四师密营时，我们的几个人撺掇毕老咯哒扛来了一桶酒。我一发现，就下了禁酒令。我们本来就不提倡喝酒、抽烟，因为这两样东西对军事活动都有害无益。

不记得是哪一年，有一次在行军途中闹出了一场乱子。休息时一查人数，发现有两个人失踪了。于是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那两个队员在行军时悄悄溜出队伍，跑到小饭馆去喝了酒。当然，他们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这天，一看到酒桶，几个“老油子”队员就撺掇李东学连长，说天这么冷，喝一口暖暖身子吧。连长拗不过这些粘粘糊糊地缠着他央求的战友，便从酒桶里倒出酒来，给每个队员斟了一杯，说：“背着司令官同志，大家都喝一口吧。就一口嘛，不会出事儿的。”

这样，警卫连的全体队员都喝了酒。别的连队学警卫连的样子，也都悄

悄喝了。就因为这种荒唐的平均分配，我们在小汤河战斗中险些吃了大亏。

我想，如果说李东学的历史中有过什么错误，那么可以说那天的错误是他最严重的错误。人们在极度虚弱的时候喝酒，自然要醉得使不上劲的。加上，哨兵也没有按条例行动。那天早上站岗的是八团的队员。他站岗时，有好几百名伪满军偷偷地包围了我们。哨兵听到什么响动，便喊了一声“谁？”而被哨兵发现的伪满军却装模作样地回答说：“我们是四师，你们是金司令的部队吧？”我们的哨兵一时胡涂了，真以为是四师，便说:“对，你们从哪儿来？”这时，伪满军“讨伐队”乘机缩小了包围圈。那个伪满军对我们的哨兵说，如果真的是金司令的部队，那么快派个代表来接洽。本来，人民革命军没有同友邻部队会晤时派代表的规定。可是这个八团的哨兵却擅自派了一个代表。已占领了山脊的敌人把我们的代表扣下，解除了武装，接着开始了进攻。这样，我们一时陷入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化险为夷，是很困难的。敌人已经接近了司令部后面的山脊。我立即命令抢占制高点。可是李东学给队员喝酒的后果这时现出了它的危害——尽管已下了命令，山脚下仍有几个队员磨蹭着不能往高地上爬。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不会喝酒的，却跟着猛喝了几口，警卫连的机枪手姜渭龙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我连连喊他们快抢占高地，可是姜渭龙他们仍在下边磨蹭。过后姜渭龙坦率地说，那天因为喝了酒，两眼模糊，两腿老打晃，怎么也抬不起脚来。机枪手醉成这样，我也不由得有些发慌。

在高地上，敌我相距很近，发生了混战。李东学的背囊被敌人的

子弹打穿了好几个口子，一个队员被打掉了一只耳轮。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金泽环的七团二连还未冲出包围。

那天，警卫连的机枪手们还是发挥了威力。他们频频移动着位置，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八团乘机冲出了包围，金泽环的连队在混战中虽然损失了一个班，却也被救了出来。

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傍晚。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杀伤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斗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留下了痛苦的伤痕。我们的损失也不小。金山虎为抢救战友身上多处挂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命令白刃格斗的能手金学律快去打开冲锋道路。

金学律是在新昌洞跟韩泰龙一起入伍的大力士。他力大如牛，性情耿直，作战勇敢。每当攻打城镇时，他都站在最前列开辟冲锋道路，打完仗，部队打开粮库或军需库时，他总是最先扛起沉重的货物走。有一次他一下就扛出了各有一百公斤重的两袋子米，让人们都大吃一惊。在积雪下给队伍打雪洞开路时，也总是他打头。

金学律听到命令，就冲入敌群展开了肉搏战。他挥起枪刺刺倒了十多个敌人，而自己也负了八处伤，真是一个不死的火凤凰。他无力用枪刺作战了，就甩出手榴弹杀伤敌人。后来手榴弹都甩光了，就攥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滚进了敌群。接着，是一声震撼山谷的轰响，金学律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友们咬紧嘴唇，悲痛地同他永别了。

那一天的最大损失是失去了八团政委金山虎。金山虎是在五家子时就跟我一起长期同甘共苦的战友。

每当谈到一个普通人怎样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的问题时，我就把金山虎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讲。从此以后，“从长工到团政委”这话，就变成了一个说明革命斗争多么有力地推动普通人的进步，工农出身的劳动青年在革命的激流中，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技术上、文化与道德上能够迅速成长的省略语。

为金山虎的牺牲，那天晚上我怎么也吃不下饭。队员们生上篝火连声要我去烤火，我也没有去。一想到全身冻僵，躺在雪堆里的金山虎，就觉得只看一眼火光也像犯罪似的。

八团团长钱永林，那天晚上也没有吃饭。金山虎是朝鲜人，钱永林是中国人，但不同的国籍从没有妨碍过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钱永林一向尊重金山虎的意见，金山虎始终诚心诚意地从旁辅助和推动钱永林做好工作。

正因为这样，钱永林为金山虎的牺牲悲痛欲绝，他的全体队员也都难过得饭也不想吃了。那些被金山虎和金学律救出来的队员，思念着为了救他们而牺牲的救命恩人和战友，谁也没有吃饭。

战斗结束了，敌人却没有撤走。显然是企图补充兵力，把我们赶到小汤河的峡谷里包围起来加以全歼。我们如果走错一步棋，就会再次陷入敌人的包围，全军覆没。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牢牢地掌握主动权，设法把敌人置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游击战的原则。

为了迷惑敌人，我假装着把部队撤到密林深处，然后又隐秘地回到原来的战场，就地过了一夜。这样在原地兜圈子，迷惑敌人，是我们独特的战术。

在我们这样蒙蔽敌人的时候，敌人为了同我们决一雌雄，继续增强了兵力。看来他们决心要在这里挽回他们在今年“冬季大讨伐”中遭到惨败的面子，一股股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小汤河的峡谷，好像全满洲的武力都集结到这里来了。天黑以后从山岗上往下一看，只见小汤河几十里方圆的峡谷突然变成了篝火的海洋，犹如大城市的夜景。层层叠叠的篝火团团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大略地数了一下篝火的数量，再按每堆篝火可能拥有的人数估算了一下，发现敌人有好几千人，这是令人吃惊的庞大兵力。

队员们望着篝火的海洋，表情都凝住了。显然是在以悲壮的心情准备着在这个小汤河的山岗上以身殉国了。

“司令官同志，好像没有突围的希望了，是不是该准备决一死战？”七团团长孙长祥靠近我身边，悲愤地说。别的指挥员，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孙长祥说的“决一死战”，不知为什么，听起来觉得很空虚。我们的力量还不到五百人，却要同多达几千名的敌人决一死战，老实说，这不是勇敢，而是一种自暴自弃，是蛮干。

诚然，同敌人决一死战，即令我们全部战死，只要能换取革命的胜利，难道还有人不愿意吗！但是，现在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想办法活下来，把已经开始的革命斗争引向最后的胜利。

于是我对大家说：

“同志们，要活下来，这比死还要难。我们不能死，必须全都活下来继续干革命。我们的面前摆着打到国内去作战的重大任务。这是

时代和历史要我们去完成的神圣而光荣的任务。眼前放着这样重大的事业，我们怎么能选择死路呢！我们都要活下来，一定要打回渴望人民革命军的祖国去。因此，大家都要想办法，扭转这个困难局面。”

“司令官同志,办法也是有限的,处在这样的陷阱里怎样冲出去呀？”

孙长祥仍以为这个危险局面是无法扭转的。

整个部队都在注视着我，等待着我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司令官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和艰巨。我俯瞰着遍地都是篝火的谷底，心中想着突围的妙计。关键在于从哪个方向怎样冲出包围圈，远远地甩掉敌人。我心想，敌人往这里集中了数达几千人的“讨伐队”，那么敌人的后方肯定是空虚的；如果我们冲出了包围，敌人一定会以为我们朝更偏僻的深山老林里躲避；如果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近敌人防范较松的大路，伺机隐秘地溜出包围圈，然后沿着大路来个日行千里，甩掉敌人。

想到这，我立即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不怕牺牲，虽是好事，但谁也不应牺牲。我们有活路。

现在，我们要放弃这个森林，要开到居民区去，然后沿着大路向东岗方面转移。这就是我的决心。”

指挥员们一听到要走大路，都惊疑地抬起了头。部队移动时保证隐秘，是游击队活动的铁的原则，而我却在敌人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命令部队开到居民区去沿着大路转移，不能不使指挥员们感到惊疑。

孙长祥靠到我身边不安地问我这是不是太大的冒险。他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方案确实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冒险。

因为，大路上也许有敌人把守，敌后也许有一定的兵力在防守。

我是从抗日武装斗争初期起就反对军事冒险主义的。我们只打有胜算的仗，没有把握的仗干脆不打，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冒险。但我们的冒险，无一不是以成功为前提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冒险。

一百个冒险一百个成功。这样的冒险，是只有满怀天塌地陷也能活下来的坚定信心和斗志以及大无畏的勇气才能做的。

我在小汤河的台地上决定率部进入居民区，再沿着大路转移，这是确有把握的冒险。我之所以认为这是确有把握的，是因为这次冒险里有我们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的独特的积极的进攻精神，有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弱点的科学的估计。

打仗，归根结底是智慧与智慧、信念与信念、意志与意志、勇气与勇气之间的对抗。

敌人在小汤河一带集结了好几千人的兵力，其目的无疑是要凭数量上的优势，以人海战术围歼我军。这是敌人“讨伐”革命军时常用的老一套的打法。他们这次也妄图用这种早已为革命军所彻底识破的陈腐而公式化的战术来消灭我军。敌人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而这正是他们在战术上的弱点和局限性。

敌人在方圆几十里的小汤河峡谷筑起由无数篝火组成的大火廊，自行暴露了自己的兵力和战术。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大错误，等于被我们夺取了他们的作战文件。由于这个错误，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主动权，我们已夺取了主动权。

我产生了能够率部向安全地方转移的信心，于是把手搭在孙长祥的肩头上，对他笑了一笑，然后对指挥员们说：

“敌人往这个地方集中了数达几千人的兵力。这说明他们不仅调来了小汤河附近的兵力，而且连抚松一带所有居民区的军警甚至自卫团的武力也都调来了。这就是说，这附近守卫村庄和公路的敌人可能都调空了。此刻，敌人只注意这一片密林，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沿着大路溜出去。这就是敌人的漏洞。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漏洞，迅速转移到东岗密营去。”

当时我说话作手势大概都是很从容镇定的。指挥员们的脸上都现出了喜色。他们都兴高采烈地下达了出发命令。八团打头，先下到了谷底，接着是警卫连，七团断后。我们的行军纵队避开篝火，静悄悄地朝公路移动。

当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情况危急，决定部队存亡的关键时刻，指挥员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对整个队伍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指挥员泰然自若，战士们也会泰然；指挥员发慌，战士们也会跟着发慌。

我们来到大路上一看，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寂无一人，几乎连一只蚂蚁都看不见。一些村庄的入口，只有一些烧过篝火的灰堆。我们的队伍就像一列奔驰在双轨上的特快列车一样，顺着大路，畅行无阻地经过好些村庄，径直走向了东岗。

我们不放一枪就安全地通过了敌区。一路上，我们只在发现八团的队伍分成两批分别行动的时候放了一枪。这两个队伍一前一后，中间隔着五百多米的距离。这说明，我们的队员顺着大路经过好些村庄

都安然无事，精神上的紧张就开始松弛了。八团的队员中甚至还有打着瞌睡走的人。于是我叫负责后卫的指挥员放了一枪。听了枪声，队伍的行军速度就大大加快了，也没有人打瞌睡了。

在小汤河的这一大路行军战术，后来在国内从枕峰向茂山地区行军的时候也用过。这个战术，就叫日行千里战术。

日后，我们看了杂志《铁心》才了解到，在小汤河战斗时，敌人还请来了由日本、满洲国、德国这三国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记者随军采访，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而这次把远在几千几万里外的纳粹德国的记者也请到满洲的战场上来，可见日本的"讨伐"专家们对这次抚松地区的作战是特别重视的，而且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据载于《铁心》的《东边道讨匪行》一文，这个采访团是由日本的大报纸《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报知新闻》的记者团、满洲国的新京电台人员和外交部官吏、纳粹德国的国家通讯社记者约翰涅渥组成的。的确是一个由日、德、满三国新闻言论界加外交官组成的威风凛凛的参观团。不难想象，敌人断定抚松地区"讨伐"作战是可以向全世界夸耀的示范性的战斗，急不可耐地要向天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赫赫战果"。和这个采访团一道，敌人还出动了满洲国军部的军事调查部核心干部鹭崎、事务官长岛、安东特务机关头目田中。他们都狂妄地认为，这年春天在抚松的崇山峻岭中，日军将完全消灭人民革命军，永远除掉"东洋和平的癌症"。鹭崎是对满洲地方共产主义运动颇有研究，对制定扑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起主要作用的举足轻重的谋士。他又是《满洲共匪研究》这一秘密图书的专职执笔人，是个不容轻视的文人。

祖国解放战争(1950～1953 年)后期，李承晚曾把大批外国记者请来，让他们观看在一个叫做 T 形高地的小块地方进行的战斗。我听了，不由得想起了远征抚松时的往事。李承晚的轻狂行径和日本“讨伐”头目的虚张声势，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在过低估计对方，对自己则过高估计方面，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李承晚，都是一丘之貉。

日军“讨伐”司令官趾高气扬地对采访团说，他的部队在深山同纯粹的金日成共军相遇，金日成现年不满三十，曾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受训，现带领五百名兵力，是东边道最大的势力，而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采访团立时报以鼓掌欢呼。据说，这个司令官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不经翻译，直接用德语对纳粹德国记者作了说明。当时，日本报界曾大加渲染，说我是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的。

然而，我们的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包围圈远远地甩掉了敌人。

那个“讨伐”司令官只好对采访团说共军只有三百人左右，现已逃窜不知去向。他接着十分难堪地推出一个“俘虏”，叫采访团向他采访。而那个“俘虏”却笑嘻嘻地说，他原在通化的伪满军当兵，不久前才投到革命军，对共产主义什么都不懂。说实在的，在那以前，我们还从未去过通化一带。

演戏也该有个分寸。不难想象，对这个“俘虏”和这次采访，当时那个采访团的人们该是何等的惊讶！

敌人在小汤河升起一片篝火形成的海洋，不仅启迪我们创造了大路行军的战术，而且使我们确信我们要把集结在国境一带的敌人引诱到抚松方面来的远征目的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敌人接到人民革命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好几千人的包围，消逝得无影无踪的情报，都大为震惊，因无法探悉革命军的去向而不知所措。敌军中开始流传着种种奇闻：“游击队的战术真是神乎其神哪”、“朝鲜游击队有赛过诸葛亮的道士”、“听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几年之内就要攻打汉城和东京”。这些奇闻流传到民间，成了农村老年人聚在一起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这次行军以来，有关我们部队的奇闻传说就更加丰富起来了。我们从头道岭到东岗的路上，又一次经受了难以形容的饥饿。

我们日行千里来到东岗附近的密林，为了在这里停留一个月左右，开始了筹措粮食的工作。要筹措好几百人吃一个月的粮食，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出乎意外地出现了能够解决粮食问题的门路。夜里在了望哨执勤的队员们在哨所附近发现了玉米地，是一片去年种下后没有收割的玉米，过了冬的玉米穗仍完好无损。白头山周边的深山里有不少这样的庄稼地。

多日未见过一粒粮食，只用水和玉米糠熬过来的哨兵，想着挨饿的战友们，回来时带了一些玉米穗。但是，他们没有征得主人的许可，因为不知道主人住在哪里，加上换岗的时间也到了，无暇去找玉米地的主人。

他们受到我严厉批评后，花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终于找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国老人。

我代表部队向这位老人道了歉，并拿出三十元钱请他收下。

那位老人霍地站起来说：“那点玉米算什么，队长用不着向我这个

老朽道歉啊！土匪吃了我心疼，革命军吃了我不心疼。为了一点玉米，拿革命军的钱，太不像话了。要是我们村的人知道了，该怎么骂我呀！钱、玉米，我都不能要！”

我对老人说，玉米是从您老人家地里摘来的，应当还给您；钱是我们赔偿您受的损失，您应当收下。

因为我毫不退让，坚持要他收下，老人无可奈何，终于收下了钱。

在回去的路上，老人向送他的队员说，刚才跟他说话的队长是谁。我们的队员如实地告诉他说那位就是金日成将军。

老人立时就说，今天我犯了一辈子也洗不掉的大罪。他沉浸在深深的冥想中回到了村里。他一回到家，就发动全家人和亲戚，把我们的哨兵摘过玉米的那块地里的玉米全部收下来，装在雪橇上运到我们部队来找我，说道：

“今天我见到金队长，十分佩服。像我这样的老百姓，您还这样器重，我这老朽实在惶恐啊。请不要推让，把那雪橇上的玉米收下吧，理当以德报德嘛。”

这一回，反而由我不得不领受老人的诚意了。

我们托这位老人的福，靠他送来的玉米，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一关。这位老人还给我们指点了筹粮的办法。他说，沿着漫江朝下游走二十里左右，就有一个养参圃，跟养参圃的主人好好说说，自会有办法。据他说，那些养参圃的地上都种了大豆和玉米，而那些主人也跟他一样，不收秋，都想在地里把庄稼卖掉。老人说，只要是金将军的队伍想要，他愿意亲自出马，替我们办交涉。

我便派一个传令兵陪老人去了。不久，传令兵回来说，大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从警卫连和七团中抽出几个身强力壮的队员派到养参圃去了。几天后，去筹粮的队员们背着大豆饼回来了。大豆饼是养参圃的主人们送的。我们就拿它当粮食，有时就那么生吃，有时蒸了吃，有时也烤了吃。据带回大豆饼的队员们说，那些养参圃的主人听到革命军因断了粮挨饿受苦，都深表同情。养参圃的地上种的大豆和玉米都没有收，足够我们部队吃一个多月。我们的队员求那些主人把地上的庄稼卖给我们，那些主人说，这是帮助金日成将军部队的事儿，怎么能要钱呢，我们没有它也能活，快来都收去吧。

我们的队员还是把钱硬塞在他们手里，把庄稼都买下来了。

我们吃过晚饭，以快速行军奔到养参圃，把地上的大豆和玉米都收下来，玉米连穗储存起来，大豆就连根拔来铺在地上打场。因为没有连枷，有的用棍子抽打，有的用脚踩。大豆和玉米合起来，总共有好几十石。

我去找养参圃主人，向他们道了谢。

那些善良的养参圃主人，还把够用一个多月的食盐扛来送给我们，鼓舞我们多消灭敌人。

粮食问题解决了，我们就率部转移到东岗密营。这里是我们从离开长白地区时就已定为组织军政学习的地点。

在前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曾听许洛汝老人说，东岗密林里有个从前叫高丽堡子或高力堡子的村庄遗址，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曾练兵习武的堡垒的基石。许洛汝老人说，当他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家

刚搬到漫江桦砬子村的时候，高丽堡子附近还有好多个全是朝鲜人住的村子，那一带土地肥沃，庄稼长得很好。后来，中日战争、俄日战争这两次大浩劫的余波一直蔓延到白头山麓，日本军队来到高丽堡子大肆烧杀，洗劫了全村。当时，村里的青壮年义愤填膺，拿起弓箭和石头抗击倭寇，终于赶走了敌人。当洪范图[2]的队伍把高丽堡子作为练兵场在这里练兵的时候，这一带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他的队伍。

庚申年(1920 年)“大讨伐”，把高丽堡子夷为废墟。村庄全被烧毁，堡垒被炸，居民几乎全被屠杀。几个虎口余生的人躲到更偏僻的深山沟里勉强度日，前几年连他们也都各自奔活路走散了。从此，高丽堡子就成了没有人烟的地方。

听了许老人介绍的这些情况之后，我打开地图一看，果然有高丽堡子这个地名。以白头山为中心百里方圆之内，叫高丽堡子这个地名的村子不止一两个，临江、长白都有。安图县还有叫高丽崴子的地方，这是因为此地有高丽人的堡垒而得的名。白头山的东部和南部一带有很多名为腰窝堡、普天堡、罗暖堡、神武城、仓坪、仓洞、惠山镇、新坡等的地方，正如这些地名所表明的，古时候这里有过堡垒、城墙、军需仓库和有兵把守的渡口。这说明，高丽[3]时期和高句丽[4]时期自不用说，从更早的古朝鲜[5]时期起，就有我们的祖先在白头山附近许多地方筑起城堡努力加强了国防。

我听了许老人的介绍，就在心灵深处刻下了爱国先烈们筑起堡垒、历经沧桑的东岗密林中的这些地名。

我们来到高丽堡子的遗址，发现了种参人用过的两座空房子。抚

松地方有不少到深山里去种参的人。他们一到严冬，就回到城市附近的本村去过冬，人夏再进山做工。我们发现的两座空房子位于两座山的脚下，这两座山都叫果松山。果松山，因果松多而得名。叶五针一束，所以叫它做五叶松，抚松人叫它做果松。一东一西并立犹如亲密兄弟的两座果松山，名实相符，满山都是果松，给巍峨庄严的高山增添了豪放挺拔的气势。

我们把两座空房子修好，又在东边果松山脚下的空地上修好练兵场，开始了军政学习。

起初，准备好够用一个多月的口粮，在密林里定下了营房的时候，不少队员高兴地以为部队要在这里来一段“长期休息”了。他们这样想，其实也不为过分。因为长期的强行军和激烈的战斗，队员们都已精疲力竭，早就盼着歇一口气了。然而我们是没有时间休息的。

我们立即在这个东岗密营召开了政治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参加的会议，总结了远征抚松的工作。在会议上，广泛介绍了远征过程中表现的拥干爱兵的美好事例，强调了在今后的活动中必须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的作风。

紧接着举行了又一个会议，这就是抗日革命斗争史上成为一个转折点的西岗会议。会议在西杨木顶子密营举行了三天。二师和四师的干部以及魏拯民、全光等军部的干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讨论了挺进国内作战的方针。我就这个方针发表了讲话。对我提出的方案，与会者都表示赞同。会议还对有关国内作战的各部队的任务、活动方向、活动区域，都作了决定。

会后，在东岗密营进行了军政训练，这是从头到尾完全为进军国内做好政治、军事准备的。

政治课，主要是讲解朝鲜革命的路线、战略与策略以及国内外的形势。《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讲解，对大家理解我们关于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有很大的帮助。听了这个讲解，新队员都进一步巩固并丰富了他们在白头山密营学到的知识。

我们在那时候就反对念经式的学习，积极提倡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和问答式的学习方法。

司令部成员和军政干部以及警卫连的学习，由我直接辅导。我给他们上课，讲解革命路线，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也介绍了世界闻名的革命家和英雄豪杰以及典型的法西斯分子。在国际形势的讲解中，我们关心的焦点是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战争，西班牙人民阵线军队的战果以及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化。

当时，敌人的一份杂志上登了一张希特勒视察某一地方军的图片。我把这张图片给大家看，并对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敲响了警钟。

我还介绍了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之一方志敏烈士的事迹。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生涯，给所有听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岗军政训练中被评为模范的队员中，我至今还记得的有马东熙。他学习很积极，课堂讨论也很出色。通过东岗军政训练，他进步很快，成了优秀的政工干部。

在高丽堡子这个有我们的祖先构筑的城堡遗迹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翻土坷垃的庄稼汉和打短工过日子的穷人，被造就成了将承担

起光复祖国主攻战线的可靠的生力军。

后来，民间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们在白头山某一深山幽谷培养出了众多的武将。这个说法越传越奇，说我们在白头山某个很深的岩洞里培养了能够飞檐走壁无所不能的几万名将帅。导出了这种传说的地方就是东岗的训练场地即高丽堡子。

1937 年 5 月初，东岗军政训练临近结束时，我们在密营里创刊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内部机关报《曙光》。报头洋溢着我们民族要在曙光照耀的解放了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的热切的愿望，洋溢着朝鲜共产主义者誓将早日迎来解放的曙光的坚定决心。

我们发行了《曙光》创刊号之后，为了挺进祖国，很快就辞别了东岗密营。

三　警卫队员

我的一生中，有一段漫长的岁月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抗日战争打了十五年，抗美大战打了三年，合起来近二十年时光，都在枪林弹雨中流逝。

然而，不知是奇迹还是天幸，其间我连一次伤也没有受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游击队十分注重以身作则。凡是艰苦吃力的工作，都由指挥员抢先做。指挥员都以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为荣。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保护战友，成了人民革命军指挥员，政治工作者的良好风气和道德准则。我也为发扬这种风气，遵守这种道德，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从险境中救出战友，奋不顾身地跳入枪林弹雨中，有时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舍生忘死地甘冒风险；端起机枪在第一线同敌人展开火力战，也不止一两次。可是很奇怪，每次我都安然无恙。

在克服极端军事民主的斗争时期，游击队指挥部提出了连长一级以上的指挥员应避免带头冲锋的原则。从此，指挥员尽量避免了这种冒险，但是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本色是不变的，一旦遇到危急的关头，指挥员还是挺身而出，抢先去化险为夷。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人为了征服我们，向我们国土倾泻了大量的弹药。例如，窃据我们党领导岗位的朴宪永和李承烨等人，用无线电

把我在某日某时去某地的机密一一告知美国人，美军就派飞机准时到我要去的路上倾泻成批的炸弹。有时候，炸弹甚至落到最高司令部的院子里。尽管这样，我还是依然如故，身体安好。

当我穿着便服奔波在中国东北的吉林、长春、哈尔滨、卡伦等地搞地下活动时，是带着手枪或棍棒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朝鲜革命军队员、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盟员、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少年探险队队员保护了我。人民群众是像对待亲生儿子、亲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帮助我的保护者。人民群众这个保护者，到处都有。无论到哪里，都能碰到数不尽的“蛟河大嫂”（“蛟河大嫂”参见《与世纪同行》第二卷中文版第 109～110 页——译注）。

正如尚钺、张蔚华、陈翰章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对我的安全格外关心。尚钺先生每当公安局的警察来学校时就帮我越墙隐蔽；陈翰章在我被军阀追踪时让我住在他家里，管我的吃、住，保障了我的安全。张蔚华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毅然服毒自尽。对此，我已经作出高度评价，称颂他是国际主义的典范。周保中每当见到我们部队的指挥员时，都一再嘱咐他们要认真做好护卫我安全的工作。

自从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一军二师师长曹国安牺牲以后，在抗日武装部队里慎重地讨论了保护指挥员安全的问题。

王德泰是在举起匣枪率先冲锋时不幸牺牲的。

王军长是中国人，他在延吉县一个朝鲜人的村子里长大，还曾到朝鲜来做过工。他的游击队生活，也是在朝鲜人的村子里迈出第一步

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日本官署的文件里还有说王德泰是朝鲜人的记录。最初，他同崔贤在一个部队里当普通队员。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长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平易近人的军事指挥员。

王德泰和曹国安等主要军政干部的牺牲，在抗日联军所有指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激发了对警卫工作的热烈讨论。不少单位陆续成立了专门负责警卫工作的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我身边的战友们也热烈地讨论了如何组织一支专门队伍来负责保卫司令部安全的问题。起初由他们自己讨论，后来讨论一经成熟，就来找我正式提出建议，要组织一个警卫队。可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因为即使没有专门的警卫队，我们的指战员也都很好地保卫着司令部。

不过，到了 1937 年春天，我自己也不能再拒绝战友们的建议了。自从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建起密营开始活动以来，敌人派大量的密探和破坏分子潜入我们的内部和周围地区。这些特务分子有的藏着匕首或斧子，有的还带着廉价的色情画和毒药。在我们驻密营和远征的时候，敌人都派了刺客。有的特务还混进我们的地下组织，假装积极，获得了信任，被推荐到游击队里来，伺机向我们的司令部下毒手。日本特务机构甚至公布缉捕魏拯民者赏几千元、缉捕全光、陈翰章者赏几千元、缉捕崔贤、安吉、韩仁和者赏多少，企图用这种悬赏搜捕的方法活捉我们有名的指挥员。据有关资料，对我的悬赏金比这还要多。

在敌人不择手段地企图消灭我们司令部的情况下，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了。

我们的指挥员们又吵吵嚷嚷地提出了保卫司令部的问题。连魏拯民也跟他们联合起来。他说：

“你总是不顾及自己，是个大问题。要知道，敌人的矛头都集中指向了金日成同志。你以为敌人把你的身价定得那么高，是无缘无故的吗？应当加速组织警卫部队了。”

我不能不接受他的建议了。大家都要求建立警卫队，唯独我一个人反对，那就只能被看作是固执已见了。

据我的记忆，我们司令部正式建立警卫队，是 1937 年春天的事情。当时，带头主管这项工作的是司令部组织科科长金平。当我叫他建立一个连队一级的警卫队时，他就兴冲冲地开始了组建工作。他一夜之间就确定了人选，甚至定好了警卫连应具备的武器清单。

我看了组织科长提出的警卫连名单，当即表示了反对。要是照这个名单搞，就要从各个连队中把最优秀的骨干都抽出来组成警卫连。在西南岔战斗中表现英勇顽强的金泽环、著名的机枪射手吴白龙，姜兴锡、大力士姜渭龙、女将军金确实，等等，凡是能征善战的战将都列在名单上。如果把他们都编到警卫连里，那么其他连队的骨干力量就被抽调光了。

此外，准备配给警卫连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同小可的。组织科长准备分给警卫连好几挺机枪。如果把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机枪拨给警卫连的话，别的战斗团就不能各有一挺机枪了。

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对组织科长说：

“人也没有选好，武器装备也没有分配好。要是削弱其他连队的

战斗力，还要警卫连干什么？如果基本战斗单位的连队削弱了，团就要削弱；团丧失了战斗力，司令部本身的安全也就如风前灯火嘛。”

“司令官同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综合了军政干部大伙的意见。也就是群众一致的要求，请不要否决。”

金平着重强调着群众二字，想说服我同意。

但是，我否决了他的建议，而把我拟的名单硬交给了他。如果不这样做，就阻止不了指挥员们的纠缠。在我拟的名单里，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新兵。这些新兵里还有尚未打过几发子弹的马鞍山儿童团[6]出身的孩子兵。

这个名单一公布，马上遭到了指挥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鼓动李东伯来说服我。他们以为“烟斗老头”的建议我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知道，他们每当把我不肯接受的建议再三提出来的时候，就把李东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推出来说服我。而“烟斗老头”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代言人的使命。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李东伯一进司令部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将军，谦让也该有个限度啊。把司令部的警卫任务交给那些孩子兵，怎么行啊！那些孩子兵不给您添麻烦，就算万幸哩。要是搞不好，司令部就要给那些孩子当保姆喽。我看，干脆，打消了这个念头才好。”

我对“烟斗老头”说：

“用一年兵组成警卫队的主要力量，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很快就会过惯战斗生活的。上次‘冬季大讨伐’时，我们的新队员打得多好啊！他们初次过游击队的生活，适应得又多么快呀！这次再经过抚松远征，那些新队员一定会锻炼成为跟老队员一样的强者。我说

要以新队员为主来组建警卫连，为的是要把他们紧紧地带在身边，培养成为机智勇敢的好战士。他们都成长为慓悍的战斗员，司令部就将拥有一支可靠的预备队了，你说这多好啊。不论是谁，就是过不惯游击队生活的人，只要我们好好培养，就能成为强兵。离开培养人的工作，就不能设想革命的胜利。”

我这样解释了一番，“烟斗老头”一言不发地回去了。从这以后，他反过来做为我的代言人，去说服别的指挥员了。指挥员们一看连李东伯都改变态度来支持我的意见，也就不再坚持他们的主张了。

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史上的头一个警卫连，就是经过这样的曲折过程诞生的。警卫连诞生的地方，当时叫做树皮厂子密营。

警卫连有三个排和一个机枪班。司令部的传令兵和炊事队员也都在警卫连过组织生活。第一任连长是李东学。这个外号叫“颇大急”的李东学曾因犯了错误被降职为普通队员。他的错误，不过是他手下的新队员违反了群众工作条例，他因负有没有教育好新队员的责任，被撤了连长职务。如今又恢复原职，当了连长，自然很高兴，干劲特别足。

成立警卫连的那天，李东学向队员发表训话，像放机关枪一样快速地说道：

“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好好保卫司令部。我们的革命前辈，从游击区时候起，就很好地保卫了司令官同志。今天，他们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我们。可是我们的情况怎样呢？都是新队员和孩子兵。我很担心，怕是司令部保卫我们，而不是我们保卫司令部。我要号召你们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让司令部保卫我们，而是

要由我们名副其实地好好保卫司令部！”

“颇大急”的这一席话，给警卫队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也有些队员心里觉得不舒服，认为连长太瞧不起他们了。

其实，“颇大急”的讲话，不能说是言过其实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老实说，最初一段时间，是我们保护了警卫连，这倒是事实。但没过多久，警卫连在既执行保卫司令部的任务，又执行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的任务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他们这些小战士为了不让我们为他们劳神，待人处事都努力学大人的样子。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不把他们当大人对待。有一次，李东学在一个正式场合里说过警卫连里马鞍山儿童团出身的小队员是小鸡。听了这话，警卫连的小战士都非常扫兴。金正德憋着一肚子气，连晚饭都不吃。他是从马鞍山带来的几十名少年儿童中最懂事，行动举止像大人一样老成持重的队员。我看他饭也不吃，闷闷不乐的样子，便问他：

“你怎么连饭都不吃，怄什么气？是不是跟谁吵嘴了？”

“不是的。因为连长同志说我们是小鸡，我们……”金正德没把话说完，脸就涨红了。

听了他天真的回答，我禁不住大声地笑了。

“说你们是小鸡，你们就那么不爱听？那是因为你们都很可爱，才这样叫你们嘛。”

“不光是因为可爱呀。老实讲，说我们是小鸡，也真说对了，我们的确像个小鸡嘛。我们这些小鸡怎能保卫司令部啊？一想，我也很担心。”

这么说，金正德所以闷闷不乐，正如李东学说的，是因为担心他

们完不成保卫司令部的重大任务。

我瞅着金正德，心中说，你真地已经长成大人了。实际上，他已经十七岁了，不能老当小孩子看了。

顺便再谈一点吧。每到就寝的时候，警卫连的小战士真像一群小鸡，都靠到我身旁争着占好地方。他们争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靠在我的两边睡。当时我只有一条毛毯，两个小战士从两边把我挤在中间，睡起来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累赘，而是无可比拟的乐趣。

我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张开两臂喊："小鬼，快来呀!"这么一喊，他们就欢天喜地地跑过来抢好地方。

紧靠着我睡的大都是李五松这样的才十几岁的小战士。我常给李五松这样年纪的小战士以特别优待，但也照顾所有的警卫队员都能在我身旁睡一宿。如果我一时疏忽，弄错了次序，有个小战士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就叽里呱啦地提出抗议。

有一次，金平在夜里来找我，看到警卫队员都争着抢好地方睡，就对我说：

"司令官同志，您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怎能做好警卫工作啊！他们在您面前还这样不讲礼貌，不懂规矩，别说做不好警卫工作，就连别的什么事也都做不来的。应该对他们严一点，多剋他们，打掉他们的孩子习气。"

他很不满意地怒视着小战士们。他本来就坚决反对警卫队吸收儿童团出身的小战士，因此对这些小战士的要求很高，批评也很严厉。

我承认金平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袒护这些小战士，说他们是因

为眷恋着父母兄弟的爱抚才这样，干吗要责备他们呀。

好多人挤在一起盖一条毯子睡觉，我们当时把这叫做“垫圈式的睡觉”。十多个人围一圈，把脚伸在一起，盖一条毛毯睡，那样子就像个垫圈(妇女头顶水罐时放在头上的圆形垫子一译注)。在经常缺少铺盖、野外露宿的游击队生活中，警卫连小战士们发明的这种“垫圈式的睡觉”是很实用的。

解放初期，在惠山一带做地方工作的李五松，有一次找我来汇报工作。当时，我的宿舍就在解放山脚下现在的建党事迹馆院子里。在这个宿舍里，我一度和我的战友们同吃同住，就跟在山上作战时一样。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们一到平壤来就一定来找我，李五松也不例外。这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大家就开始铺被褥。李五松却把他们铺的被褥一股脑儿推在一边，说:“跟将军一起睡，就该来个‘垫圈式的睡觉’嘛。”同屋的北满出身的战友还不知道什么叫“垫圈式的睡觉’。

李五松拽着我的一条胳膊说:“将军，像在白头山时那样，今晚来个‘垫圈式的睡觉’好不好？”

我没有立刻答应他。我心想，要来“垫圈式的睡觉”，就要把这个宿舍里的所有战友都拉到圈里来，可他们会不会喜欢这种打趣呢？

李五松见我有些犹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躺下去，说道:

“来，请躺下吧。腿要弯一点。将军的右边，金策同志睡，再下边是崔贤同志，将军的左边，是我的地方。”

对他这个荒唐的“命令”，连金策也毫无办法，服服帖帖地被拉入了“垫圈”。

话说回来，我爱护警卫连的小战士，但我并没有无原则地溺爱他们。他们一有错，就狠狠地批评他们，也常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来锻炼他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也派他们出去站岗放哨。有时，跟老队员一样，命令他们投入浴血的战场。有人犯了纪律时，就叫他到每个连队去作自我检讨，有时划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圈子，把人关在那里“禁闭”两三个小时，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在这过程中，令人心痛欲裂的事情也碰到过不止一两次。

我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我多么严厉地批评他们，多么苛刻地锻炼他们，他们都不怪我，不怨我。有一次，李五松去执行联络任务，半道上迷了路，误了时间。这是因为他没有按我给他指的路走，擅自改变了路线。我知道他没有按司令部指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但我没有责备他。这个从无先例的做法，反倒使李五松感到难过。

“难道我这样不成器？连受到司令官同志批评的资格都没有吗？司令官同志是不是还把我当小毛孩子看啊？”李五松一直为这种想法苦恼着，后来索性找我来恳求说，别人犯了错误都给处分，我犯了错误为什么不给处分，也给我处分吧。

在充满着真心实意的爱护和信任的地方，就连处分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示。警卫队员受到我们批评或处分，也毫无怨言，甘心接受，这是对毫不搀假的真诚的爱护和信任的报答。

为了警卫队员的成长，我们对他们的学习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平时也好，在密营集中进行军政学习时也好，我都给警卫队员当教师。当时，司令部有很多学习资料，《东亚日报》、《满鲜

日报》、《朝鲜日报》等国内外的报纸，《列宁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大义》、《国家与革命》等书籍以及有助于增长见识的书刊还是够丰富的。我们的警卫队员受到特殊优待，能够随时阅读这些书刊。但有一条，他们读后必须用口头或书面发表自己的读后感。经过这样的过程，警卫连成了人民革命军全军学习的榜样。俗话说，我以情待人，人亦以情待我。我们对警卫队员施以真情，他们也以真情待我们。

警卫队员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军事业务上，都成长得很快。他们出色地执行着保卫司令部的任务。老实说，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多次安全地躲过了危险的关头。

有一次，在安图县的密营，我们被林水山的“特殊部队”包围了。林水山原是我们主力部队的参谋长，后来叛变投敌，当上了专门“讨伐”游击队的“特殊部队”的队长。他在西间岛一带狼奔豕突，到处破坏我们建立的后方密营。那天早晨，我们为了尽快离开密营，比平时提前一点做了早饭。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吃了早饭就动身。但没有人换岗，不得不由我替换了正在站岗的李乙雪。在李乙雪吃饭的时候，我留心察看四周有无可疑的迹象。这天雾气大，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离哨所不远，传来了可疑的声响，是一种干树枝被折断的声音。瞬间，我断定出现了敌人，便立即卧在一棵倒下的朽木下边，举起匣枪开始了射击。随之，从十多米外的地方，敌人的机枪吐出了火舌。

那天早晨，从听到可疑的声响到卧在朽木下开枪，只过了一眨眼的时间。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正在吃饭的姜渭龙和李乙雪担心我的安全，飞速地跑到了我身边。姜渭龙不顾一切地，凭他过人的膂力把

我从朽木下拖出来。与此同时，李乙雪端起轻机枪朝敌人横扫。坦白地说，在那个瞬间，我甚至以为我们的命运就要在此完结了。正因为这样，当外号叫黑熊的姜渭龙气喘吁吁地想把我从朽木下拉出来时，我已下定了决心：他们死，我也要和他们死在一起。

但是，不死鸟一般的警卫队员们，挺身挡着弹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我脱离了险境。当敌人缩小包围圈，步步逼近的时候，李乙雪紧握手榴弹兀地站起来大喊："狗崽子们，愿来就来，拼个你死我活吧，"

他气宇轩昂，声色俱厉，敌人吓得步步后退，姜渭龙趁机帮我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射击圈。

我们撤走以后，林水山把密营里的东西全都抢走了。其中有装了许多文件、照片、小册子和药品的背囊。实在太可惜了。

敌人走后，我回到密营我站过岗的地方一看，只见有合抱粗的一捆胡枝子齐刷刷地拦腰被削掉了，足见"特殊部队"的机枪扫射是十分厉害的。见了这个情景，我对同志们说："要是没有你们，今天我就险些到阴间去了。"

我们的警卫队员忠实保卫自己的司令官的事迹，一直风传到友邻部队的中国人指挥员他们那里，他们很羡慕我们有机智勇敢的传令兵和警卫队员。他们一见到我，都半真半假地要我积德，给他们也派一个好传令兵。有的说，只要是金司令的警卫队员，谁都行，给他送几个会说中国话的队员。无论是杨靖宇还是魏拯民或周保中和曹亚范，都不顾体面地想要我们主力部队的传令兵和警卫队员。

远征抚松后，曹亚范要求我给他挑能当传令兵的朝鲜人。我把我

们的传令兵中我最爱惜的金泽万派给曹亚范，叫他去好好保护曹亚范。在反“民生团”[7]斗争时，曹亚范做了不少使朝鲜人感到怨恨的事情，也严重地妨碍了我个人的活动，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排斥他，拒绝他提出的要求。我们组建新师的时候，他本来是要被派到我们主力部队当政委的，但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能担保他的安全。我们部队里有不少在反“民生团”斗争时受到曹亚范迫害的人，他们都不喜欢曹亚范。我之所以兼任政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金泽万照我的嘱托，很好地保护了曹亚范。曹亚范说金泽万是聪明而又忠实的青年，多次感谢我给他派去了一个优秀的传令兵。

杨靖宇也曾多次要求我给他派些优秀战士。他为了出席第一军和第二军军政干部会议，到南牌子来的时候，我给他派去了好几名我的传令兵，同时，从我们部队中抽调好几百名队员和指挥员，给他编了一个有力的独立旅。

魏拯民也跟杨靖宇和曹亚范一样，很想要我们培养的人带在自己的身边。他是那么恳切地要求给他派几个朝鲜人警卫队员，我只好给他派去了黄正海和白鹤林。此外，金哲浩、全文旭、任银河、金得秀等同志，也曾和魏拯民一起工作过。他们都忠实地帮助和保护了魏拯民。周保中也曾让朝鲜人朴洛权当过他的警卫队长。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的传达长孙明直，也是马鞍山儿童团出身的朝鲜人。

每当听到我们派去的人在抗日联军各部队里为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而忘我奋斗的消息时，我从心里感到满意和高兴。

警卫连的每个队员，都是保护我生命的恩人，都是亲卫战士。除

了上述战友以外，保护过我的战友还很多，是无法计数的。金云信、崔元日、金学松、韩益洙、全文燮、金洪洙、崔仁德、崔金山、赵明善、池凤孙、金凤锡、李鹤松、李斗益、吴在元……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脑海里自然就浮现出过去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第一任警卫连连长李东学，后来升任为团长，1938 年年底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继李东学之后当了警卫连连长的李达京，本来是四师的机枪手，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因为他枪法好，没有人不认得他。他起先是警卫连的政治指导员，不久，李东学被提升为团长，他接任为连长，但没过一个月就牺牲了。接他之后当了警卫连连长的朴寿万也是个很勇敢的人。在双山子战斗时，他为了把敌人向我集中的火力引向别处，带一个机枪手不断地移动着位置打击敌人，后来不幸中弹，不久就牺牲了。

从首任连长李东学到第四任连长吴白龙，警卫连的每一个连长都是我的忠实战友，只要是为了保护我，他们都奋不顾身，履险如夷；只要是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他们都不惜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在为我不惜献出了生命的恩人中，有一个叫李权行的才十几岁的小警卫员。他像对待亲哥哥似地喜欢我、尊敬我。有一年冬天，我们牵着尾追我们的敌人，在雪地中快速行军。那天，天气特别寒冷。但是，尽管我拨开没腰深的积雪行走，却一点也不感到冻脚。我觉得奇怪，便把鞋子脱下来一看，只见鞋底垫了一层揉搓得像棉花一样细软的乌拉草。传令兵们悄声告诉我，这是李权行垫的。

中国人说人参、鹿茸、貂皮是“关东三宝”，而有些人则把抵御严寒、保护两脚不冻的乌拉草列为“关东三宝”之一。在沼泽地上生长

的乌拉草怎么会垫到我的鞋底上来了呢？可能是李权行为了我，行军时每见到乌拉草就搂一两把装在背囊里积下来的。

在长白县十五道沟战斗时，要不是他来保护我，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那天，敌人向我们司令部所在的指挥处集中射击。李权行一再要求把指挥处挪到较安全的地方去，但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站的地方是一眼就能够看到敌我双方的好位置。

突然，敌人的火力开始转向了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权行张开两臂用全身遮住了我。他像一块盾牌一样挡住我的瞬间，敌人的子弹打断了他的腿。他顿时鲜血淋漓，我立即把他抱在怀里察看他的伤口。当时我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状的。

战斗结束后，我跟着担架，边走边安慰李权行："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老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李权行反而安慰我说："司令官同志，我不会死，请不要为我操心……请您多保重，注意健康，等我再回来。"这是他对我的最后一句嘱托，可见当时我的表情是十分悲怆的。他被送到后方医院后，听说给我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没有收到。后来我只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在后方密营养伤时被敌人俘获，关在长白县警察署里，天天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我们司令部的位置，终于牺牲在狱中。

司令部警卫队员中还有一个外号叫"旅行袋"的人。所谓旅行袋，指的是登山用的大背囊。他得这个奇怪的外号，是因为他常背着特大的背囊。他为什么带那么大的背囊，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在临江的一次战斗中才为人们所知道。那一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旅行袋"

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每当敌人的枪弹打到我们胸墙的时候，我怕他受伤，把他拽过来不让他把头露到胸墙外去。可是他每次都敏捷地从我怀里溜出去，看敌人从右边打来，他就紧贴在我的右边保护我，敌人从左边攻打，他就转到我的左边保护我。

战斗结束后，发觉阵地上有棉花烧焦的臭味，于是留心察看了一下战壕，只见“旅行袋”同志的大背囊有两个窟窿，冒着一丝丝青烟。可是“旅行袋”却全然不知，反而大声吵嚷着叫大家看看谁的衣服烧着了。一群队员扑过来把他的背囊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着一层摞一层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堆丝绵，从丝绵里滚出了两颗还烫手的子弹。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老背着背囊围着我打转。说到底，是“旅行袋”同志大背囊里的丝绵救了我。

我问他怎么想出了这样的妙法。他回答说，金正淑同志在给我做棉衣的时候，一面絮丝绵一面说，衣服里絮上丝绵，子弹都打不透。听了这话，他就下定决心，为我做了这一个防弹背囊。

抗日战争时期警卫战士们建树的功绩，是不胜枚举的。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着重指出的是，只凭他们在保卫朝鲜革命的命脉中建树的功绩，也完全值得受到后代人们的赞扬和尊敬。他们为革命的司令部奉献的崇高的同志情义，成了我们今天社会里开出时代之花的忠孝一心的先河。

根据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经验，我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也曾以不到二十岁的革命烈士子女组建过禁卫连，让他们保卫最高司令部。

这个禁卫连的队员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吃了很多苦，经历过许多危险。有一年冬天，为组织联合作战，我曾去过驻在成川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某部，归途上遭到了美军轰炸机编队的袭击。那时，禁卫连的队员们硬让我卧倒在地垄沟里，然后都扑在我身上，筑成了三四重厚的“防弹墙”来保护我。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多次。

1950 年秋，暂时的艰苦的战略性撤退时期，为保卫最高司令部，跟我一道在平壤坚持到最后撤离的也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禁卫连指战员。

势如破竹的南下突然转入撤退，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影响了首都人民的士气。首都人民都仰望着最高司令部，期待着最高司令官对战争的前途问题讲讲话。

我通过广播讲话指出，我们的撤退是暂时的，我们要到处开展游击斗争，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之后，我命禁卫连举行一次列队行进，边唱边走，在市内转一圈。接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禁卫连的指战员们都愣住了。敌人已近在咫尺，大同江东岸已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怎么还泰然自若地叫我们唱着歌行进呢？紧接着，他们都意识到，最高司令官叫我们唱着歌行进，说明战争的胜利已操在我们手里了。于是，他们走到街上开始了英姿焕发的列队行进。

在即将撤退的时候，阴沉沉的首都街道上，突然响起了禁卫连指战员们高唱《保卫祖国之歌》的雄壮的歌声。听到这高吭的歌声，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民都拥到街上来，兴奋地喊道：“是禁卫连，禁卫连！”

后来听说，当时平壤市民看到高歌行进的禁卫连，都心想：“禁卫连跟我们在一起，禁卫连在，最高司令官也肯定在我们的近处！”

等平壤市内的所有机关企业都开始撤退以后，禁卫连才跟我一道撤离了首都。

当年的警卫队员，今天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如今，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已经接替他们，保卫着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新一代接替老一代，新的警卫连、新的禁卫战士在不断地成长。他们究竟有几万、几十万，还有必要数吗？全国的军队，全国的人民，都做为警卫队员、禁卫战士，在忠实地保卫着我们党和我国革命。

四　遍布三千里江山

以白头山麓为起点建立祖国光复会的运动以大火燎原之势很快燃遍了满洲全境和整个三千里江山。

《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字字句句贯穿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给我们民族的魂灵注入了新的活力，光复祖国的热望使整个三千里江山沸腾起来了。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有手工业者、宗教徒、民族资本家，总之全体爱国同胞都汇集到光复祖国的同一条战线上来了。

组建祖国光复会的运动首先在包括长白等西间岛的满洲一些地区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满洲地区，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得到发展，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抗日运动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好。在那里的将近九十万的朝鲜人一个个都如同引火性极强的火药和一触即爆的威力强大的炸弹一般。

反日爱国力量的总汇合这个大课题，对住在满洲地方的人们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在卡伦会议上，我们就曾把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为一项议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以此为起点，朝鲜革命者为组建各阶层抗日力量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呕心沥血，这已是早为世人所知

的事实。住在满洲的人们非常熟悉充满斗争考验的统一战线运动的历史，而且具有一定的经验。在这样的土壤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这颗种子得以很快地萌发成长，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在组建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中，采取了先创造一个示范单位，然后以此为母体向四面八方扩大的方针。首先选择有组织基础和运动经验、群众思想好、革命性强、具有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力量的地方，作为示范单位开展工作。

我们决定，有三名以上会员的，就可组织分会，有三个以上分会的就可组织支会，有三个以上支会的，就可组织区会。由几个区会合起来组成县的祖国光复会组织。

我们在敌人的军队、警察机关和官府里也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那些一面在敌伪机关做事，一面搞地下革命工作的人，当时被称为祖国光复会的特殊会员。这样的特殊会员还打进了日本指导官监视很严密的靖安军中。

另外，我们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作战地区，也组建了祖国光复会组织，并以此为基础，为向毗邻的地区和国内纵深扩大组织，作了积极的努力。

祖国光复会成立后，我们首先在密营召开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会议，吸收全体指战员加入了祖国光复会组织。这一措施是根据部队内全体指战员的一致要求而采取的。他们一致提出：既然司令官被推戴为祖国光复会会长，我们也该成为会员，为统一战线运动出一把力。于是，便把他们一个不落地吸收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并鼓励他们

成为把全民族团结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

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都成了把各党各派和各阶层群众团结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的统一战线运动的旗手。

由于有了这些旗手的积极工作，我们在西间岛一带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很快地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组织。

在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从朝鲜人民革命军武装部队里选拔的政治工作员。他们中的有些人曾作为祖国光复会筹备委员会的一员进行了活动。正是以这些人为火种，在满洲大地燃起了统一战线运动的烈火。

1936 年秋天，祖国光复会就开始在汪清、和龙、珲春、延吉等东满各县扎下了根。在过去属于大荒沟游击区的槟榔沟里，也组织了以农民协会成员为核心的祖国光复会珲春县槟榔沟地区委员会。在当时的《三·一月刊》创刊号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位被派到北间岛的政治工作员在和龙地方革命者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下，在四个中心村完成了组建祖国光复会分会和武装部队的准备工作。由此可见，那里的人民是多么拥护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的。

在南满一带主管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的是曾参加过东岗会议的代表们。他们首先吸收那些抗日联军部队里的朝鲜人指战员参加祖国光复会组织，并以我们统一战线的思想武装了他们。然后，在他们当中选拔一些政治觉悟高，又有宣传能力的人到朝鲜人居住地区去，和那里的革命者携手工作。没多久，便在磐石、桦甸、通化、集安、蒙江、

桓仁、宽甸，辉南等南满的许多城市和农村，组建了祖国光复会组织。

祖国光复会的组织网在北满也扎下了根。

我们在东岗成立祖国光复会后，马上给在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搞党务工作的金京锡送去了《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他在东满时，曾在延吉县三道湾一带做过党务工作。我去三道湾找东满特委书记处时，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他被怀疑为“民生团”分子，因而垂头丧气，抬不起头来。但一听到大荒崴会议的消息，便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我们应周保中的要求，把他送到北满部队去了。金京锡在第五军的朝鲜人指战员中解释和宣传《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并从中选拔骨干分子组建了祖国光复会支部。周保中按照我们的要求，以第五军军长的名义积极推动了这个支部的组建工作。

以此为起点，祖国光复会组织在方正、通河、勃利、汤原、饶河、宁安、密山等北满各县，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在此期间，额穆县反日同盟也改编成了祖国光复会组织。

最先把《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传达到该同盟盟员中去，并引导该同盟改编成祖国光复会组织的人物，是当时和方振声一道带领独立旅在官地附近活动的崔春国。

要谈北满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就不能不谈及金策的辛劳。金策一接到《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就把那纲领一笔一划地刻在木板上，印了好几百部。他亲手印的《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广泛地散发到北满的各抗日联军部队和各县的地方革命组织。金策通过多次会议，扩大了祖

国光复会组织网，并积极采取措施使这些组织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

饶河县三义屯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发表檄文表示支持我们的祖国光复会运动。他们在檄文中号召："诸位！不要忘记祖国，不分男女老幼，不问地方和党派，不要为些小的感情所拘，只要是抗日的同胞，都要团结起来，走向反日联合战线。所有的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武器的出武器，有力的出力，献给争取祖国独立的反日战线。"北满的人们发出的这一号召和我们的呼声是一致的。南满的战友们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

如上所述，满洲的朝鲜人认为，我们提出的统一战线路线是能够最快地实现民族大团结的光明正大的、爱国爱民族的路线。

不管怎么说，组建祖国光复会的重点还是放在两千万同胞生活着的国内。这是符合南湖头会议精神的。南湖头会议特别强调，党的建设、祖国光复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扩大发展，都要以祖国为基本舞台来开展，以祖国人民的力量为主力来进行。

在把祖国光复会组织网扩大到国内腹地的工作中，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他们下工夫培养的西间岛地方的革命骨干分子和在我们直接影响下搞统一战线运动的北部国境地区的先觉们也作出了不小贡献。

由于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宗派分子的错误路线，在国内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

日本帝国主义最怕祖国光复会组织在国内扩大起来。他们为阻止通向国内腹地的统一战线运动的波涛，作了垂死挣扎。首当其冲的是

国境一带的爱国者和爱国人民。凡是被认为与我们的工作线有可能接触的团体和个人、一切赞同我们的思想和路线，从我们的武装斗争中寻求民族复苏之路的爱国人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成了敌人镇压的对象。鸭绿江以南的祖国人民，即使在西间岛的城市和部落发出枪声和军号声，升起冲天的火光，也不能随意去听一听或看一看。因为敌人一见人民革命军攻打对岸的城市或部落，就涌到江边去严禁人们出来看热闹。敌人惟恐人民群众看到他们惨败的狼狈相。可见他们对革命军政治工作员潜入国内，是多么害怕，多么费尽心机地进行防范。

尽管如此，国境一带的人民非常想知道人民革命军的斗争消息，他们常常制造种种借口渡过鸭绿江来，偷偷地到战场上兜一圈，看一看。

据三水、甲山、厚昌地方的人们说，只要人民革命军打败了敌人后一撤走，通过鸭绿江关卡涌向西间岛方面的渡江人数就会陡增好几倍。这一生动的事实证明，祖国人民从我们的武装斗争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

宗派分子也对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他们醉心于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分裂了反日爱国力量；他们教条地坚持不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现成理论，排斥和敌视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有良心的民族资本家。认为革命只能由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特殊人来进行，这就是他们的见解和理论。

当时，群众运动在左倾分子的指挥棒下经受着痛苦，共产主义者们还在暗中摸索的道路上彷徨，要给这样的群众运动打开可以吸收各阶层爱国力量的大门，给共产主义者们照亮光明的前程，其办法就是

加强我们对国内革命的影响，并向国内全境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

我们在国内建设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是按照先从最容易实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治领导的北部国境一带即鸭绿江沿岸开始，逐步向国内腹地扩大组织的方针进行的。我们选定了甲山、三水、丰山地区为主要的工作对象。这个地区在地理上离我们近，而且有很多从国内各地聚集来的形形色色的独立运动者和先觉者，还有许多跟西间岛当地人沾亲带故的人。

对甲山、丰山一带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我们通过权永壁、李悌淳、朴达、朴寅镇进行直接的领导。朴达和我会晤后，和同志们一道把甲山工作委员会改编为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并在其下面组织了几十个带各种名称的组织。这事前面已谈到。

在甲山地方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中，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及其基层组织也出了一份力。

长白县十八道沟珠家洞支会在甲山郡江口里组织祖国光复会支会时，起了很大作用。江口里位于珠家洞对岸。珠家洞支会对一个把午饭盒掖在腰间，每天渡到珠家洞侍弄庄稼的江口里农民给予影响，并争取了他。那个农民回到江口里，组织志同道合的青年们建立了祖国光复会支会。

甲山郡云兴面白岩里支会，也是在长白县祖国光复会的直接帮助下组建的。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甲山郡祖国光复会的基层单位团结了许多林业工人、火田民和宗教徒。

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对位于下岗区对岸的三水地区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祖国光复会光生里支会是在长白县十七道沟王家洞支会青年部负责人(后来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崔景和的影响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成绩最好的地方是丰山。此地很早以前就以反日思想强烈而著称。丰山地区的居民，多半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被剥夺了耕地，为寻找活路从岭南来到北方的火田民和被征到虚川江发电站建设工地的民夫。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推行把日本本土、朝鲜和满洲的全部经济潜力调动起来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作为这个计划的一环他们让新兴财阀野口建设具有几十万千瓦发电能力的虚川江发电站。被拉到这个发电站建设工地的几千名民夫，自然是最易于团结到统一战线里来的巨大力量。何况在丰山一带还住着几百名爱国的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

只要祖国光复会组织网遍布丰山地区，就可以把白头山根据地扩大到盖马高原，还可以为在厚峙岭东边的各地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搭上跳板。只有实现了盖马高原一带的革命化，才能以此为跳板去实现咸镜南道东海岸一带的革命化，并使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烈火燃遍国内各地。这就是我们对丰山一带的战略观点。

自从朝鲜人民革命军出现在白头山地区，丰山地方的先觉们为了同我们取得联系，频繁出入于长白地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参加革命军。

在丰山地区播下祖国光复会火种的朴寅镇、李昌善、李景云等天

道教系统的人物都是从丰山来到长白的爱国者，他们都渴望得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治领导。最先参军的是李昌善。朴寅镇经他介绍与我们见面，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李景云参加我们部队后，作为政治工作员被派到盖马高原一带去了。到丰山地区的李景云深入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工人中去，热情地解释和宣传了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把志同道合的人聚拢在一起，于 1937 年春天组织了祖国光复会丰山支会，之后，同朴寅镇一道以天道教青年党员中的骨干分子组织了生产游击队。

祖国光复会丰山支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几百名天道教徒吸收为会员。在天南面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洪君地区反日劳动会。1937 年夏天，金正淑在桃泉里——新坡地区工作时，被派到丰山地区的祖国光复会会员金裕珍同李昌善一道，组织黄水院堤坝建设工地的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裴上介德支会。

在盖马高原一带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中，丰山地区的工作成绩最佳，这是与经常得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领导有关的。革命军派出了很多小分队或小组到丰山地区帮助了那里的革命组织。我在去新兴地区同国内革命者见面后回去时，顺便到丰山秘密根据地做了天道教徒的工作。

1930 年，新兴地区的煤矿工人暴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祖国光复会基层组织在这一地区也扎下了根。在新兴地区最先开辟工作的，是从长白县桃泉里作为国内工作员被派到那里的祖国光复会会员李孝俊。

在鸭绿江沿岸和盖马高原一带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逐渐向东海岸一带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扩展。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们在开辟东海岸一带的工作中，也显示了非凡的本领。从 1937 年夏天起，他们多次来往于狼林、赴战、新兴、洪原、北青、利原、端川、虚川一带，同李周渊、李镛、朱东焕等国内革命者取得密切联系，进行了祖国光复会的组建工作。

朱东焕为了同我们取得联系，曾频繁地出入于西间岛。后来，他经西间岛王家洞村长的介绍，被吸收到权永壁的工作线里来。权永壁和朱东焕是念龙井大成中学时的同学。朱东焕曾在长白和延吉地方做过很多反日启蒙工作，而且因在国内参加革命运动，在西大门监狱坐牢两年多。权永壁知道了这些情况后，便把在北青、端川地方组建祖国光复会的任务交给了他。

朱东焕来到国内，同北青的赵政哲一道吸收金璟植等人成立了祖国光复会地区委员会，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地区委员会下属的十个分会。

后来，朱东焕回到家乡，和同伴们一道组织了祖国光复会端川支会。他们还在端川邑等地组织了端川支会所属的分会，又组织了北方亲睦会、南方亲睦会之类的亲睦团体，团结了广大群众。

中日战争爆发后，祖国光复会长白县下岗区委员会把很多工作员派进国内。那时，魏仁灿也同别的同志们一道被派到兴南地区去了。他们在军火厂集中的兴南这个工业中心成功地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兴南地区委员会。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潜入元山的政治工作员们把进步的反日青年团体高丽会的成员团结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高丽会一面开展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工作，一面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的斗争，他们还为赶走凶恶的日本人校长，组织了罢课。

由祖国光复会桃泉里支会派遣的地下工作员在洪原地区组建了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其名称是洪原农民组合，在这个组合下面又建了好些支会。

此外，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在利原、赴战、咸兴等许多地方也都扎下了根。

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在东海岸北部各工业中心、农村和渔村也大力开展起来了。

在北部国境地带的各道中，这些地方是较早、较多地刮进了“吉林风”的地方。我们在东满建立游击区进行武装斗争时，这里的人民也曾受到巨大的革命影响。

由于受到抗日武装斗争的直接影响和支持，该地人民从很早就积极投入了反日救国斗争。这个地区的农民组合运动搞得很火热，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目。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咸镜北道地区都是可以较快地实现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的地方。

我们为了在这个地区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派去了很多优秀的政治工作员。对靠近国境的北部市和郡，甚至派去了小分队。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小分队和小组在咸镜北道各处建立了秘密根据地和活动据点，并依靠它领导了组建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和群众运动。

另外，我们把该道各市、郡的反日运动关联者和群众团体领导人带到根据地，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再派回原来的地方去领导统一战线运动，让清津来的人回去领导清津地方的运动，让茂山来的人再回到茂山去领导那里的运动，这样做不仅能保证领导者熟悉那里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有利于解决随着抗日革命的深入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作员的问题。

由于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和爱国战士的积极活动，在咸镜北道地区，从工人比较集中的茂山、清津、渔大津、延社一带和吉州——惠山铁路沿线农民组合力量较强的南部市、郡，开始燃起了祖国光复会运动的烈火，到 1937 年夏天，这里已出现了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

到了 40 年代前半期，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已经发展到了数十个。

在咸镜北道地区，组建祖国光复会组织的运动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地方是延社和茂山地区。那是与下列情况有关系的：30 年代后半期，我们离开西间岛后，主要是在延社、茂山对岸的乌口江流域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同时，为了给国境地带的革命运动注入活力，经常向延杜、茂山地区派去小分队和小组。崔一贤就曾带领小分队去过延社地区，吴日男也曾带领七八人组成的小组去过那里。吴仲洽团长也曾带领由五十多人组成的第四连到那个地区进行活动。每当我们的小组或小分队去延社一趟，那里就新出现一些祖国光复会的支会和分会。

为组建延社地区祖国光复会作出贡献的地下工作员是崔元凤和尹庆焕。崔元凤是延社地区祖国光复会负责人，尹庆焕是延社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这两个人都是我们在长白培养起来的工作员。现在，安葬

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抗日革命战士中，有一位叫崔元日的，崔元凤就是他的哥哥。

崔元凤是个有主见，深谋远虑，革命性强的人。最先发现他有这样的优点，并对他作了高度评价的便是金周贤。金周贤接受先遣队的任务从东岗来到长白，发现了崔元凤，并把他介绍给权永壁和李悌淳。

长白县十八道沟英化洞因援军工作搞得好出了名，又因为出了很多抗日革命战士而著称。在这里担任祖国光复会支会长兼党小组负责人的就是崔元凤。其背后指挥者是金周贤和金世玉。崔元凤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组建了祖国光复会支会和党的小组，建立了生产游击队。金周贤每到十八道沟，就住在崔元凤和金世玉家的后屋，帮助他们开展地下革命组织工作。

崔元凤在游击队家属中，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把他们全部吸收到祖国光复会组织中来了。

1936 年秋天，三终点附近的战斗后，我在密营同崔元凤见了面，当时他带着一群人扛着援军物资来找我们。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聪明、责任心强的人。他中等个儿，体格不是很强壮，但很会带领群众。他一个口令，就能把扛东西的群众集合或分散开。他曾多次给我们送来了军事情报。

1937 年 5 月，我们为了在茂山郡等北部地区促进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把崔元凤派到延社地区去了。崔元凤来到这里后同别的工作员一道，以延面水上游一带的编筏工和放筏工为骨干建立了好几个分会组织。

崔元凤的好帮手尹庆焕，是金一在长白县八道沟佳在水工作时，参

加祖国光复会的。他和金一交情很深，和金成国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他和崔元凤一样，也曾多次扛着援军物资来过我们的密营。我们攻打佳在水后撤走时，尹庆焕便夹在扛东西的人群里，跟我们来了。

敌人一个不漏地掌握给游击队扛过东西的人，并为了从中找到组织线而费尽心机。尹庆焕察觉他被捕的危险迫在眉睫，便带着家属搬到东满，在位于乌口江流域的玉石洞上村也叫新开村的地方安了家。

后来，我们把他派到延社地区，并推荐他做该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据说，有一次，尹庆焕和组织成员一道扛着后勤物资到驻有我们部队的直洞，同那里的人民革命军负责人讨论了关于组建统一领导分布在延社地区的祖国光复会分会的地区委员会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已在国师峰会议上，对延社地区的同志们讲了我的意见。我说，要想进一步发展组建祖国光复会的运动，就必须建立能够统一地领导分散活动的各组织的井然的领导体系。对这个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尹庆焕扛着东西来找我们时，我记得，李东杰(金俊)还没有被敌人逮捕。李东杰在青峰密营犯错误受处分后，到延社、茂山地区当了政治工作员。他同崔元凤取得密切联系，领导了延社地区的革命运动。

我们派有国内工作经验的金正淑到延社地区，做李东杰的后任。

金正淑到延社去时，有武装小组与她同行。她和延社地方的革命者会面后，很快就组建了祖国光复会延社地区委员会。她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时，带回一台缝纫机，说那是延社的各组织献给司令部的礼物，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

崔元凤和参加祖国光复会延社组织的其他爱国者，在茂山地区战斗时，也帮了我们很多忙。

由于李东杰、崔元凤和尹庆焕的牺牲，延社地区组织工作的内幕，很长时间处于无人知晓的秘密之中。70 年代初，开展群众性运动搜集有关我们党革命历史的资料时，这个秘密才揭开，为世人所知晓。

我们为组建祖国光复会作出的努力在西部朝鲜、中部朝鲜和南部朝鲜一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仅对北部朝鲜，而且对西部朝鲜、中部朝鲜、南部朝鲜一带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也予以应有的关注。

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和黄海道地区曾是民族主义势力很强的地方。

西部朝鲜一带，天道教和基督教势力也很强。这些宗教势力并不是单纯地搞宗教信仰活动，也进行了爱国爱民族的活动。三·一人民起义时，朝鲜的三大宗教势力——天道教、基督教和佛教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在西部朝鲜的青年当中，出现了金赫、车光秀、康炳善等许多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我们通过孔荣和康炳善很早就同这个地区取得了联系。我们的工作员曾到因不二农场的佃户斗争出了名的龙川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二农场的佃户斗争，反映了从反日中寻找活路的这个地方的人民坚毅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

新义州，在西部朝鲜一带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37 年 7 月初，在这个城市里成立了祖国光复会新义州支会。8 月，在渭原成立了有贫农和放筏工参加的梨山反日会。地下工作员辗转于鸭绿江中游地区，陆续组建了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康炳善

的亲属都是天道教徒，他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抓住宗教这个系统，干练地开展组织工作，建立了好几个组织。

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在厚昌郡和铁山郡也扎下了根。

为了组建祖国光复会，我们还向阳德、德川、平壤、海州、碧城等地派去了小分队和政治工作员。

在平壤和平安南道一带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中，李周渊、玄俊赫、崔敬旻等人立了很大功。

李周渊从端川转移到平壤，为的是在新的地方更大胆地开展反日运动。平壤正昌橡胶厂职工反日会、平壤粮食加工厂劳动反日会、南浦反日会等，都是李周渊组织起来的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

玄俊赫在大邱蹲监期满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平壤，深入胜湖里水泥厂工人当中，根据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进行了组建祖国光复会支会的工作。

我的堂弟金元柱参加的祖国解放团和江西地区的一心光复会，也都是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

曾在抚松全心全意帮助过我父亲的革命工作的崔敬旻，后来回到祖国，在阳德地区积极地开展了统一战线运动。他甚至深入信奉儒教的人们当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然后把他们吸收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

在平安南道温泉地区也出现了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

在黄海道地方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中，由我们的工作员吸收为自己人的闵德元担当了主角。黄海道一带也有过许多由我们的政治工

作员建立的临时秘密根据地。曾在这些根据地里活动的我们的工作员把闵德元争取过来，并让他参加了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闵德元和黄海道地区的其他爱国者，在道内各地接连组织了好几个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在东海岸中部地区，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是以工人较多的川内地区和以襄阳、高城、文川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川内里水泥厂反日劳动会，不仅规模大，而且因工作开展得好出了名。襄阳的束草救国会和高城的长津反日会都是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

有关南部朝鲜的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的资料，由于国土被分割未能充分发掘，但日本帝国主义警察当局留下的资料中提及的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其数目也很多。

最近，发掘了好几件有关在日本组建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及其活动的资料。据说，冈山、东京、京都、大阪、北海道等地，都有过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然而这些恐怕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拥有二十多万会员的祖国光复会组织步步走向全民抗争，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建树的一个纪念碑。在光复祖国的旗帜下，为民族解放大业组织和动员各阶层广大爱国力量方面，这些组织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在增强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方面的贡献。我国人民通过统一战线运动，切实地树立了这样的思想：朝鲜的解放必须用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必须用人民的武装来对付武装的敌人；朝鲜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必须超越阶级、性别、年龄、党派、宗教的差别，团结一致，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组织联合战线。

人民群众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飞跃，成了推动 30 年代后半期民族解放斗争的强有力的因素。

在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变化方面，应该特别记载的是，他们把手持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战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看作是解放祖国的主力军，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我们，更忠实地接受了我们的领导。从 30 年代后半期开始，人民革命军活动的中心根据地白头山成了整个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轴心。

朝鲜的人民群众对白头山发出的声音，认为都是绝对的真理，不分轻重缓急，都无条件地加以实行，只要是支援白头山的事，就是舍命也心甘。

人民群众对朝鲜革命的领导中心的忠诚，表现在他们对革命军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全国人民都从人力、物力、智力、财力上来支援了我们。

祖国光复会的各级组织大力开展了支援游击队的全民运动。本来，天道教徒献的“诚米”是要送到天道教中央去的，但从 30 年代后半期起，祖国光复会甲山支会便把“诚米”有组织地送到人民革命军那里了。西间岛人民听说人民革命军为粮食问题受苦，就毫不犹豫地拿出为办婚礼、办花甲寿筵或过生日积攒的粮食送给人民革命军。

直到鸭绿江的水丰发电站大坝完工的 1938 年以前，祖国光复会新义州支会的成员是用货船把支援物资送到我们部队活动区域的。支援物资中有布匹、鞋子、咸盐、炸药、雷管、导火线等等，真是无所不有。大坝竣工后，再无法用船送货，他们就把支援物资分别集中到丹

东市的三番通、六番通各地，再用汽车或火车分别送到宽甸、兴京、通化等地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和小组。有一个麻田洞分会的成员买了一艘能装半吨多货物的帆船，白天利用载运客货来挣钱，夜里把组织成员凑起来的援军物资悄悄地运到人民革命军那里。

有的祖国光复会会员甚至在远离白头山千里之外的汉城，弄到点后勤物资也要给革命军送来。

祖国光复会北青组织的成员全朝协，因与北青郡束厚“儿童团事件”有关联而被判刑坐过牢，1937 年后，他根据组织分配，到汉城做地下工作。

他一面为扩大组织开展工作，一面以挑水挣钱来支援游击队。本来，北青人是以挑水挣钱供子弟在汉城读书而出了名的。全朝协没有可以带到汉城读书的孩子，他是为革命挑水挣钱的，他用挑水挣的钱购买布匹、鞋子、白纸、医药品、油墨等援军物资寄到北青，再通过那里的组织转送到我们那里。

有一次，他起早挑着水桶走在坡路上，半道捡了一只女式金手表。

那是一只阔家女人也难得带上的高级手表。他决心找到这只手表的原主，便在坡路挨门挨户地去找了半天。原来，那是一个小铺老板女儿的，是男家作为定婚礼物送给她的。小铺老板拿出比那只表价更多的钱给他作谢礼。他便用那笔钱购买了许多援军物资。经过这件事，他和那个小铺老板家的人们处得亲密无间。老板家受了全朝协的影响，对抗日游击队向往不已，便真心诚意地参加了帮助游击队的工作。他们有时弄到全朝协要求的物资，便直接寄到北青。就是这样，一个平

凡的汉城小市民家也经祖国光复会会员的介绍，参加了援军运动。

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在三千里江山广泛地组织和发动了群众的反日斗争，例如：以怠工、罢工、示威、暴动，佃户斗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式掠夺的斗争；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的斗争；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大陆和战争政策给予打击的斗争，等等。

通过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朝鲜革命者所取得的又一个收获是，通过这个运动，更加牢固地奠定了建设党组织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我们以在祖国光复会各组织中培养起来的骨干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党小组。就是这些小组领导了祖国光复会组织和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诞生，并通过斗争百炼成钢的党组织，正是将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威力强大的劳动群众的政党的基石。

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使朝鲜革命者积累了组建群众团体的丰富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就不可能在解放后极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民主青年同盟、职业同盟、妇女同盟、少年团等各阶层的群众团体。

通过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工作，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我国悠久的民族史上，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爱国爱民族的、强有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白头山为轴心结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它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的雄伟气魄。

组建祖国光复会的整个过程证明，朝鲜人民比起分裂或对立，更喜欢统一与团结，他们是具有非凡意志，能够超越党派和信仰，在一个旗帜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人民。

我国人民在劳动党时代，早已实现了团结的最高形态——全社会的一心团结。现在剩下的课题是，把分割为北、南两部分的国家统一起来。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贯穿于我的一生的永远不变的意志和信念。以五千年悠久历史为荣的我们民族应该而且可以在统一的国家生活，这就是有关民族统一的我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实现北南统一的保证是什么呢？我们拥有民族大团结这个威力强大的武器；还有通过祖国光复会组建工作积累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

我们民族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出色地实现过统一战线，为什么到了今天，就不能实现民族大团结呢？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这是做不到的。

不管在北边，还是在南边或海外，我们一定要实现统一战线。在这弱肉强食的法则所支配的世界，我们的民族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一个民族为完整地活下去而必需的永远的生存方式。民族的活路在于统一战线，民族富强繁荣的道路也在于统一战线。这就是我想要对海内外同胞们说的话。

五　权永壁

权永壁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一提起宣传工作者，一般都认为是能说会道的，而权永壁却不然。他当师部宣传科长的时候，也很少说话，只把要紧的话条理分明地说几句就完了，从不说什么空话，或者罗罗唆唆地重复已说过的话。从他的表情和外表，很难猜出他的心思和情绪。

权永壁最讨厌说谎话夸海口。他言行一致，无论什么事，说干就干，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干到底。这可能就是权永壁为人的特点和他那吸引人的魅力吧。

我们把白头山和西间岛作为主要活动舞台进行斗争的时候，给权永壁委以长白县党委负责人之重任，就是因为我们看中了他的这一长处。

长白县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说明的。长白县党委会是要最先接受并执行我们在白头山密营举行人民革命军党委会提出的路线或紧急任务的中枢性党组织之一。我们提出的路线或任务，大都通过长白县党委会、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和东满党工作委员会传达到西间岛、北间岛和国内去，执行结果也大都通过这一渠道汇总到人民革命军党委会来。

在我们把白头山密营作为活动据点的情况下，必须把西间岛作为又一个跳板，扩大和发展国内和满洲的革命运动；在朝鲜共产党被解

散后尚未建立新型政党的情况下，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必须通过国内党工作委员会、东满党工作委员会和长白县党委会等来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整个抗日革命斗争。这种情况决定了长白县党委会的地位和作用。

30 年代前半期，我们在东满建立起游击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抗日革命的中心是小汪清；到后半期，包括西间岛的白头山根据地成了抗日革命的中心。白头山密营是处在其当中的核，白头山周边国内的广大地区和长白一带就是包着这只核的瓤。长白地方，有很多我们建立的密营。要保护这些密营，就必须把长白地区变成我们的天下，实现当地人民的革命化。

要在长白地区开展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建设，就不可避免地同敌人进行尖锐的斗争。虽然伪满洲国的统治还不够严密，但长白地区的日本谍报机构和日满军警的势力却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我们要挺进国内就必须经过长白地方，敌人要进攻我们也必须经过长白地方。可见，长白地区是敌我双方都很重视的军事战略要冲。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选拔长白县党委负责人的标准定得很高。要承担起长白县党委负责人的重任，就必须具有过人的胆略、鼓动能力、包容能力、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因为领导地下工作，还必须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严谨细致的作风和随机应变的智谋，尤其要具有敏锐而远大的眼光。

在挑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物时，最先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权永壁。金平也推荐了他。

我和权永壁既不是同窗也不是同乡，更不是从游击区时候就在一

起同吃大锅饭、共过患难的人。30年代前半期游击区大发展的时候，我在汪清，权永壁则在延吉。他参加远征蛟河之后，于1936年10月才来到白头山密营加入了主力部队。

他早在中学时期就参加反日运动，后来被指控为“不稳学生”，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从此，就和我们一样，成了职业革命者。我在东满地区时，不是吴仲和就是朴永纯，曾给我讲过权永壁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为权永壁的父亲举行葬礼时所发生的惨事以及权永壁的克制力。

权永壁在他工作的地点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趁着天黑时候赶回家去。他还没来得及换上丧服站到父亲的灵柩前，骑马的宪兵们就冲进来，把全家人都赶出了屋子，然后问权永壁是不是权昌旭。权昌旭是权永壁的原名。权永壁一眼就看出这些宪兵没有一个认得他的，便十分谦恭地回答说，我弟弟昌旭出走已经很久，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此，连父亲去世的讣告都没法告诉他。恰好这时他的哥哥权相旭到丧具房去了，不在家。权永壁趁机出色地扮演了哥哥权相旭的角色。

敌人没有抓到权永壁，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安放着灵柩的房子，直到房子烧成了一堆灰烬，敌人才走掉。

权永壁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的遗体被焚烧的惨状，咬紧嘴唇，以极大的毅力抑制住了难忍的悲愤。他回到工作地点，同志们安慰他，倒酒给他喝，他也没喝。他因为气得咬破了舌头和嘴唇，好几天连粥都吃不成。

在东满的共产主义者中，权永壁成了大家公认的具有惊人克制力的青年战士。人们说，革命者要想战胜敌人，完成大业，起码要具有

权永壁那样的克制力，能够克制一时的冲动和痛苦。但是，对权永壁并不是每个人都表示赞扬的。有的说，权永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后又遭到敌人焚尸的暴行，也不挺身出来反抗，是无法理解的。做为儿子，怎么能这样呢？无论如何，也应当阻止敌人焚尸嘛!而权永壁的支持者们则断然批驳他们说，在那种时候，如果普通人起而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权永壁是个不能在敌人面前暴露身分的人，如果他起而反抗，不是当场被枪杀，就是被抓去坐牢，那不就不能干革命了吗！

据说，权永壁在离家辞别自己的妻子时说：

“我是不能活着回来的。即使能活着回来，也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革命十年后成功呢还是二十年后成功。所以，你就不要等我，自己去找生路吧。你把我当作不在世的人，再嫁给别人，我也不怨你。我只有一件事托你，要把孩子好好养大，等他懂事了，就让他继承我的事业。”

这几句告别的话，也成了人们论是论非的话题。有的说，对妻子的告别话太冷酷无情了；也有的说，这是对妇女的污辱。他们说，他为什么不对妻子说，你要等我，我一定会胜利回来呢？如果是真正爱妻子的人，不正应该这样说吗？难道朝鲜的妇女就不讲节操不讲情义，连为国家的独立走上了革命征途的丈夫都等不了吗？未免太贬低妇女了！

要是把权永壁对妻子说的话再说得直截了当些，也许会引起更大的非难。

但是，我却认为，只有决心为革命捐躯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只有真心热爱和珍惜妻子的人才能做这种嘱托。如果不是决心为革命

坚决斗争到自己的身躯全部烧成灰烬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坦率地说出如此悲壮的告别话的。我从权永壁的话中反而看出了真正的人情味。

从那时经过了好几年，于 1935 年春在腰营沟我头一次见到了权永壁。当时在腰营沟举办了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短期讲习班，参加的人是从东满各地游击队和革命组织中选拔来的，权永壁也是其中之一。

在那狂暴的反“民生团”斗争的动乱中，许许多多爱国青年成了异国孤魂的时候，我见到权永壁，仿佛见到了久别的至交，禁不住无限的高兴。当然，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还谈了话。我记得，作为第一次谈话，算是一场很真诚的交谈。我们甚至还讲到了他同妻子作别时的情景。

“你跟妻子作别的时候，应该说些更温存体贴的话嘛，那样，你妻子就不会那么伤心难过喽。”

我这样表示了惋惜，权永壁却摇着头说道：

“这个痛苦，是早晚一定要到来的，何必瞒着不说呢。”

“那么你现在还以为不能活着回到妻子身边去吗？”

权永壁对这一问话，也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我愿意活着看到祖国的光复，也愿意活着回到家乡去。但是，我觉得我摊不到这种幸运。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我不愿意站到后头去。为了替父亲报仇，也决心站到最前头去。我这个理当站在最前列进行殊死战斗的人，怎么能先想到活命啊！我并不希望那种侥幸。”

他的话里充溢着真情。

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不管是在浴血的战场上还是在艰苦的地下工

作中，他一向站在最激烈最危险的前列进行了忘我的奋斗。在第二团远征蛟河时，权永壁是二团二连的党支部书记。远征队曾多次陷入敌人的包围中经历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危机。每当这时候，权永壁都同吴仲洽等战友一起，设法杀出重围保住了队伍。

偷越敌人号称连一只蚂蚁都通不过的森严的国境警备网，渡过鸭绿江把我的信件传达给朴达的头一个人，也是权永壁。

我们把权永壁作为长白县党委负责人候选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 30 年代前半期他在间岛工作时积累了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的最大优点就是做人的工作很有办法很老练。他很善于团结群众，也很善于统率群众。

黄南笋(黄贞烈)至今还感慨地回忆起权永壁在瓮声砬子成功地做当地长者工作的故事。据说，那位长者性格乖戾，十分顽固，好些工作员想打入瓮声砬子开辟工作，都因为这个老人的顽固，没站住脚，被逐出来了。原因在于工作员们还没有跟当地老乡建立起亲密关系，就急于灌输革命思想。尤其是他们没有做好这位长者的工作。他们说，这位长者是老封建，把他撇在一边，而没有想到把他争取过来。看起来，这位长者跟五家子的“边托洛茨基”[8]一样，是个有主见而又十分固执的老人。

权永壁按自己的方式开始做这位老人的工作。他了解到这位老人对不讲礼貌的人根本不加理睬的脾性，首先照老规矩向这位老人恭恭敬敬地行了见面礼。他走到老人面前，照朝鲜的礼节，郑重其事地跪下来，谦恭地说：“老大爷，我是因家境贫寒，到处卖零工过日子的

人。听说这个村子人心厚道，特来此谋生，祈望大人多加关照和指引。”

老人看他很有礼貌，又有风度，十分惬意地说道：

“你这后生很有礼貌。虽不知是谁家的子孙，但看你很懂得礼节，就知道你是颇有心意的人。我们村子，人心厚道，你就住下来，跟我们一条心，一起过吧。”老人说罢，还赏了他一顿午饭。

在瓮声砬子，争取这位老人，就像攻占一座高地那么不容易。可是权永壁却用一个朝鲜式的跪拜礼，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这座高地。这样，这个村子的革命化也就很快地顺利实现了。

我们把权永壁内定为长白县党委负责人之后，为了让他了解实际，先叫他到长白县各地去转了转。

他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作了实地考察后，回到了密营。

1937 年 2 月，我们和权永壁等地下工作者在横山密营举行会议，组织了长白县党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权永壁正式担任了县委负责人的职务。李悌淳当选为他的副手。会议还通过了扩大所属区党委和党小组的决定。

这一天，我向权永壁强调指出，要扩大工作范围，把党的组织建设和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建设工作扩大到国内腹地去，接着给他提出了给革命军输送志愿入伍的人员、争取敌伪机关的人员并吸收他们加入组织、调动组织成员的力量进行军事侦察等长白县党委应执行的各项任务。

之后，我很快就把他派到了敌后，同时把黄南笋派给他当助手。为了工作的需要，叫他们扮成了一对夫妻。这种伪装，是保证安全的很有效的方法。

黄南笋是位很早就做过地下工作的有经验的同志。她在十五岁时曾在石人沟叫池藏谷的村子里做过地下工作。有一天，她在这个村子里到一家农户去帮忙，看到这家灶房里的一口锅，不禁吃了一惊。这口锅正是她家住在符岩村游击区时用过的那口锅。

“这口游击区的锅怎么跑到这家来了？难道是这家主人跟着‘讨伐队’去，跟敌人要来的？”她一连几天老想着这个事儿，连觉都没睡好。

地下组织了解到这件事，就断定这一家是走狗，主张把这一家轰出去。但是黄南笋没有同意，她开始耐心地努力深入了解真相。她终于了解到，这口锅是敌人的“讨伐队”打进符岩村游击区放火烧杀抢劫的时候，端出来扔到院子里的，当时这家主人被强迫拉着牛车到了符岩村，在一处烧塌的房址上看到这口锅被扔在院子里，就装在车上拉回来了。这样，险些没有被扣上走狗这顶帽子的这一家人，才没有被赶出去，而且很快就加入了反日会，女主人还参加了妇女会。

然而，同黄南笋一起到池藏谷做地下工作的林水山却遭到了失败。

他这个仪表堂堂，有一套理论的人，因为不善于接近群众，未能赢得群众的好感，只受到了食客的待遇。他住在一个反日会员的家里，一天白吃三顿饭，却对房东发号施令，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偶尔外出时，总是倒背着两手，像查究什么似地向村民盘问一连串的问题，使被问的人和旁观的人都感到很不愉快。林水山始终未能在池藏谷群众中站住脚跟，不得不回到了游击区。

以骑在群众头上的特殊人物自居的人，必然成为一个被群众所唾弃的可怜虫。若像水上一滴油一样，不能同群众融合，只在群众的周

围打转的人，是不可能给群众以好感，不可能争取到群众的。

派权永壁和黄南笋去长白县的时候，恰好长白县的许多地下工作者正在密营里。于是，我把权永壁和他们都召集在一起，给权永壁他们交代了要在敌后执行的工作任务。权永壁欣然地接受了任务，但我却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总觉得给他的任务太沉重了。长白地区包括从七道沟到二十五道沟的广大地盘，即使做合法的党务工作，也很难全面照管。加上他在领导长白县党委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深切地关注和参与国内的革命运动。

我至今还记得，在同派往长白县的地下工作者们分别的时候，我们一同吃了地阳溪农民送给我们过年的饴糖。这种饴糖是土豆做的，都凝固了，要敲碎了才能吃。因为当时粮食很困难，不能给他们办一桌盛馔，仅仅能拿出这种饴糖饯别他们。这事至今仍勾起我深切的缅想。

我给权永壁送行时对他说：

“我把长白地区交给你了。只有掌握了长白地区，进而掌握了整个西间岛，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援，革命军才能有自己的人力来源。不然，我们就不能带领大部队越过鸭绿江到国内去作战。我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在今年春天或夏天向祖国进军。从现在起，你就要在敌后做好人民群众的工作。你的任务是，一面做好党的组织建设，一面把人民群众团结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争取人民群众的工作是艰苦的，成败全在于你了。我是相信你的。”

权永壁他们走的那天上午，我们又和敌人打了一仗。因此，他们是在一片忙乱中动身的。

权永壁经过十七道沟大师傅的家和二十道沟李悌淳的家，顺利地打进了由司令部指定为工作据点的十七道沟土器店里。这个十七道沟又名王家洞，是王家沟的一个村子，因中国一家姓王的地主独断专行而得名。此地位于长白县的中心，过了鸭绿江就可以经过好仁、惠山等地深入国内腹地，是个十分有利的地方。

权永壁扮做徐应珍的外甥——在吉惠线铁路工地上做工时被解雇的人，在土器店里落了户。徐应珍最初在延吉念完中学，加入反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后被敌人发觉，才移居西间岛，是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徐应珍、崔景和等十七道沟革命组织的成员，为了保证权永壁在王家洞安全落户，不受敌人监视，给他腾出了一栋房子，分给了他一小块地，还用鸦片贿赂警察署长，替他领到了居住证。从此，权永壁化名为权洙南，黄南笋化名为黄贞烈，住在同志们腾给他们的小房子里，开始了假夫妻生活。后来，权永壁曾回忆说，最初他叫黄南笋的时候，曾多次习惯地冲口说出“同志”二字，闹得非常尴尬而紧张。

带领支军物资工作小组去过十七道沟的金周贤说，王家洞居民已经开始称赞这一家新婚的“小两口”了。那是因为他们一搬到这里来，从头一天起就诚心诚意地帮助左邻右舍，不论什么脏活累活，他们都竭力相助。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权永壁常常到这家那家去串门，只要发现哪家有需要男子汉做的事，他就主动帮助做，劈柴、铡草，扫院子，样样都帮一手。凡是村里有红白事，他都去帮助打糕、杀猪。他剥猪皮、卸四肢、掏内脏，都很熟练，大家赞不绝口地说，都赛过老屠户了。

王家洞的人，一有宰牲口的事，都请权永壁去。

权、黄二人就这样以自己的本事和勤奋撼动了人心。他们力阻别人来帮忙，而自己却以助人为己任。权永壁认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如果给人增加了负担，那就等于他的工作已经失败了。他抱着这种想法，像地道的庄稼把式那样，干活很卖力气，把自家的活都做得干净利落。权永壁他们刚搬来的时候，当地祖国光复会会员们看他们为地下工作很忙，便想帮他们一点忙，准备给他们打些烧柴。权永壁再三推让道：

“乡亲们，非常感谢，但不能这样做。要是大家给我这个普通庄稼人打烧柴，敌人就会马上怀疑我们。所以，大家想帮我，也要忍一忍。这才是真正的帮我忙啊。”

地下组织的同志们想出了另一种办法。他们替权永壁打了烧柴，却不直接送到他家去，而是悄悄地送到他侍弄的大麦地的地头上。权永壁看了，连这个诚意也谢绝了。他自己打烧柴，自己运肥。

权永壁在王家洞工作时从没有早睡晚起过，到别的工作地点去，也从没有一天睡过三四个小时以上。他常背着破旧的行囊到外地去，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他跟妻子不和，另有了外遇。其实，他每月都要跑好几趟从下岗区七道沟到上岗区二十五道沟的几百里路程，长白县有很多村庄，却没有一个是他没有去过的。他这样经常东奔西跑，哪有时间像别人一样睡一次安稳觉呢！

有一次他到密营来汇报工作，我见他两眼布满了血丝，不禁轻声责备他说，应该注意身体，难道干一两年革命就不干了吗，他回答说，每当建立起一个革命组织，心里就美滋滋的，其乐无穷啊。

由于权永壁和他的战友们的积极努力，截止 1937 年初春，长白县的几乎所有中心村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权永壁的下边，处处成立了党小组、祖国光复会的支会和分会，其力量有了迅速的壮大。许多生产游击队也在党组织的保护和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在长白大地上，夜里昂首挺胸，公开活动，驾驭民心的不是伪满洲国的官吏，而是权永壁掌心里的革命者。

权永壁的工作比过去更繁重，更忙碌了。他亲自教育和培养的可靠的工作员，已经有好几个被派到国内去。十七道沟的地下革命组织已成为培养地下工作者的学校。

权永壁还通过半军事组织——生产游击队教育和锻炼了青年。加入生产游击队的青壮年，白天种地，夜里执行保卫地下革命组织的任务，同时做好准备，一旦有事就投入武装斗争。

权永壁经过同已加入革命组织的村长们讨论，以生产游击队员组织了自卫团的夜间巡逻队。从此，生产游击队就以合法的夜间巡逻队的名义，为保护地下组织而不是保护敌人，执行巡逻任务。

在权永壁的直接领导下，生产游击队的许多队员成长起来，成了抗日战士，崔景和就是其中之一。他当了祖国光复会王家洞支会青年部负责人和特殊会员负责人、王家洞党支部组织委员。他的大儿子也加入儿童团组织，成为革命战士。权永壁考虑到崔景和很早就要求参军的志愿，就把他送到了我们的部队。

权永壁是生活清白廉洁、心地善良正直的人，自从担起了地下战线的重任之后，又显示出惊人的智慧。他经常以熟练的伪装术巧妙地

骗过敌人，出色地保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和自己。派组织里的骨干分子打入敌伪机关占据要职，也是他搞的一种伪装术。

他为了给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或祖国光复会组织的村长们创造一个能获得敌人的信任、安全搞支军工作的条件，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封朝鲜人民革命军军需官的信，叫他们把这封信交给警察署。信里写道：限你于某月某日将哪些支军物资送到某地，并警告说，如将此事向警察署告发，就难保村长生命安全。

村长们把信交到警察署去，敌人称赞这些村长都很忠实。唯独王家洞的村长按权永壁的吩咐没有把信交给警察署。他的这一异样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天，半截沟警察署署长把他叫去，大发雷霆说，你私通“共匪”，我们有证据，你快照实供出来，王家洞村长面不改色地回答说：“有证据请拿出来吧。我可是冒着挨革命军枪崩的危险，为署长大人当村长受苦受累，大人却给我扣上‘通匪分子’的帽子，这太冤枉了！”

署长拉开抽屉拿出那封信，说：“你不老实。你要是老实，就该交出这种信嘛：别的村长都交了，就你没交，你还装什么蒜？”

王家洞村长这才从怀里掏出那封信，说道：“我当然也收到了这封恐吓信。革命军哪能单单不胁迫我呢？这就是那封恐吓信。可是我为了你们，有意没有交。你们看了这封信，就得采取什么办法，可是有办法吗？连那些精锐的‘讨伐队’，每次都派几百名去‘讨伐’，也都被打回来了，你说咱这么个小小的警察署能有什么绝招吗？这种信呀，交给了你们，反而叫大人们为难嘛。我说，跟他们革命军呀，互不相

扰，马马虎虎地应付过去，才是上策。这事儿我来对付，署长大人就装不知道，别过问啦。”

这一席话感动了署长。从此以后，那个署长格外信任王家洞村长。

可见，权永壁的计谋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自己也曾做过地下工作，有所体验，在敌占区伪装和保护自己、同志及组织，是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极艰苦的工作。

权永壁出色地执行了这一重任。

1937 年春，在进军国内的前夕，组织了军民联合多路侦察普天堡的工作。长白县的党组织也接受了这项任务。

权永壁比谁都清楚进军国内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决心自己直接去执行侦察任务。他开始加紧准备动身，可是要离家得有个借口。要去侦察，就要离家好些日子，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敌人就会怀疑，甚至会跟踪盯梢。一个庄稼人在农忙季节不种地而离家好几天出去串门，是不合情理的。因此他想了想，又想出了一个谁都不能不相信的妙招。

他叫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到长白县城里的邮局，给他发了一封通知父亲病故的急电。这封电报当天就经过邮递员递到了权永壁的手里。邮递员来到王家洞传递电报时，把这“不幸”的消息声张出去，让老乡和敌人都知道了这事。

村里的老年人拿着赙赠前来慰问，还好心地劝说，父亲去世了，做儿子的为什么还不快去。权永壁趁势说，我是租人家的地种的庄稼人，在这农忙季节，怎么好意思撇下地去奔丧啊，要去也不是去一两

天，得花好多天的时间呢。老人们劝慰他说，再没有比为父亲办丧事更要紧的事了，你还是快去吧，你地里的活我们包了。这样，他不受任何怀疑地去完成了侦察任务，向我汇报了侦察情报。我不忍推却他的恳切要求，准许他参加了普天堡战斗。

当他回到十七道沟的时候，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已经为他做好了能够尽到“居丧人”之礼仪的准备。于是，他作为办了父亲的丧事后回来的儿子，穿上丧服，迎接了来访的吊客。他为了伪装自己，不得不欺瞒那些淳朴善良的老年人，心里该多么难受啊！

权永壁根据司令部提出的基本路线开展地下工作，该呈报上级处理的问题就呈请上级处理，可以自行决定的问题就自行决定；对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全，处理得当。在没有电话、无线电这种现代通信设备，只能用传递字条这样落后的方式同司令部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地下工作者们多半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就地处理问题，这比呈请上级处理的情况多得多。权永壁只有遇到需要由我作结论的有关路线的重大问题才报告司令部，其余大部分问题，都在当地同地下组织的同志们进行讨论后加以处理，然后将其经过和结果汇报给我。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和密营相隔很远，而且我们也不常驻在一个密营里，所以样样事情都要呈请司令部批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权永壁很清楚，因此他决不做给司令部增加负担的事，认为会给司令部增加负担的事，他连提都不提。只有一次，他曾要我给他作结论，这是有关敌人建设集团部落的善后对策问题。当时，敌人在西间岛跟在东满时一样，以“匪民分离”为目的，强迫进行了集团部落的建设。

而长白地方的群众大都不愿意住进集团部落。权永壁的想法也一样。如果让农民都住进集团部落，生活就会更加苦不堪言，地下工作和拥军工作也会遇到莫大的障碍。但也不能因此就硬反对搬入集团部落。因为只要有不搬入集团部落的人家，敌人就一律放火烧掉，谁反抗就打死谁。在敌人这样用暴力强迫迁移的情况下，应当怎么办才好呢？权永壁召开县党委会研究过，但始终没有找出好办法。他把这些情况都向我作了报告。

我对权永壁说，反对建立集团部落是无益的，大家都应搬进集团部落，以免群众遭殃。进了集团部落，我们的工作势必要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要知道，铁丝网阻挡不了江水奔流，城墙挡不住飓风吹刮，我们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息、像风一样有来有往的感情和人民群众支军的洪流，是绝对阻挡不了的。所以，不必担心，都搬进去吧。

权永壁回去后，带头参加了官道巨里集团部落的建设。看到他出工，那些顽固派也跟着出工，盖房子，垒城墙，都很卖力气。按照权永壁的指示，地下组织的成员都装作乖乖地忠实执行敌人的命令。这样，官道巨里集团部落第一个在县警察当局受到了“安民村”的评价。

十七道沟地下组织的成员占据了官道巨里集团部落的全部要职。徐应珍当了自卫团团长，宋泰顺当了自卫团副团长，田南淳当了村长，权永壁当了学校校长。其他集团部落也都跟这里差不多。

权永壁的地下战线，超越长白地区的领域扩展到了包括咸镜南道、咸镜北道和平安北道的国内纵深地方。权永壁不仅在军事活动中立了

大功，而且在实现人民群众意识化的紧张的地下斗争中，也建树了很大的功绩。

1937 年夏，他托通信员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司令官同志，坦率地说，离开部队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当时我认为，我是从第一线上被挤到第二线来的。当时心里的难过，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把人民群众团结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这是争取抗日革命早日胜利的捷径。这话我听了很多，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当司令官同志要跟我握手作别的时候，我却不能轻快地迈出步子。

不过，自从到了新的岗位开展工作以来，我的想法开始有了改变，已经完全摆脱了把地下战线当第二线看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条战线不是第二线，也是第一线。每每看到组织一天比一天扩大，人们的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我就由衷地感到生活的意义，感谢司令官同志叫我做了这一肥沃土壤的主人。”

做实现人民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感到了生活的意义。权永壁的这句话，包含着深邃的真理。可以说，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是革命者时刻不得放松的持久性的工作。不断地推进人民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这正是我国革命的生命之所在、胜利的泉源、永久性的所在。

一个革命者如果回避或忽视这项工作，他的政治生命就会变质，他就不再是革命者了。

权永壁深知这一道理，因此，他倾注全部心血进行了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并且就在机智勇敢地做这项工作的路上被敌人逮捕。

在监狱里，他感到最心疼的是他和同志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有可能全部被破坏。他认为他现在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多拯救被捕的同志，尽一切可能保护革命组织。于是，他决心自己做一个挡箭牌，尽最大的努力来防止革命组织受到血腥的摧残。他先给李悌淳递了一张空字条。所谓空字条，指的是用手指甲写的，而不是用钢笔或铅笔写的字条。字条上写道：

“一切都推给我!”

李悌淳立刻明白了权永壁的意图和决心，当即回了一张字条：“我们是同心同德!”

权永壁明白这个像电报文一样简明的字句意味着什么。

权永壁和李悌淳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因此再也未能交换字条，但这两个战友的心脏却一直跳动在一起。他们同心同德一致为保护革命组织宁死不屈。

权永壁在惠山警察署受审讯的期间，瞧准机会对朴寅镇道正悄声说：“您去过白头山的事和以后的所有事情，只有将军和您我知道，只要您闭口不说，您就不会被扣上什么罪名。”

李悌淳对李柱翼也做了同样的丁宁。

由于权永壁和李悌淳舍生忘死地为挽救同志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朴寅镇和李柱翼等许多人才没有被提到法庭去，在拘留所获释，还有不少人只被判了比预想的轻得多的徒刑，活着看到了祖国的光复。叛徒无法查明的权永壁同长白地区和国内地下组织的直线关系和工作内容，就成了永恒的秘密。因而，这些组织及其成员都安然无恙地生存

下来，继续秘密地开展了工作。而权永壁保住了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自己却同李悌淳、李东杰、池泰环、马东熙等同志一道，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就义之路。

他在从惠山警察署被押往咸兴的火车上，也没有忘记对同志们的关怀。当时他手里有七圆钱，他决心把这仅有的一点钱也都为同志们奉献出来，于是对押送的警察说：

“警官先生，拿这个钱去给我买点水果和饼干吧。你们给我们铐上了手铐嘛，你就该代表日本当局替我们跑跑腿了，不情愿也没办法。”

其他同志也都翻开衣袋拿出钱来，凑成了三十多块钱。

出人意外，那个押送警官乖乖地听话，去买来了水果点心。权永壁接过来均匀地分给了大家。一百多名革命战士，在疾驰的列车上吃着这些水果点心，以无言的眼神和微笑，互相交流着心中的衷情。这是只有共产主义者们才能分享的精神上的宴飨。

看他们都亲如一家人，押送警官们个个目瞪口呆，惊愕不止。有个警官说：

“你们共产主义者都是些怪人，马上就要被判刑了，还这样相濡以沫。你们说说看，难道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是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生活。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建设一个全体人民成为一家人的国家。”

“可是，权永壁先生，当局不会给你建设那种国家的自由。你是要上绞首架的人了。”

“我一人死了，还有我的战友嘛！他们一定会建设起那种理想国家的。”

权永壁在法庭上也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

“我不是罪犯。我们是为了从祖国的疆土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为了让我国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投入了抗日大战的朝鲜的爱国战士，是这个国家的堂堂正正的主人，谁敢审判我们？应当受审判的真正罪犯是你们！你们霸占了别人的国家，任意屠杀别国的人民，任意掳掠别国的财富，你们才是前所未闻的大强盗和杀人犯！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决，把我们誉为民族的保卫者，把你们判为侵略者，埋葬你们!”

正当苏军解放东欧弱小国家，继续向西线长驱直入，东京在美军的轰炸下变成了火海，朝鲜人民革命军在白头山地区和远东的训练基地为迎接解放祖国的大变革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的时候，权永壁在汉城西大门监狱的绞首架上，高呼着革命万岁，从容就义。他留在世上的亲骨肉，不觉之间长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清津街道上拉粪车谋生。

在伟大祖国解放战争爆发的 1950 年夏天，我曾到汉城停留一段时间，领导南半部解放区的工作。我生平第一次到了汉城，想去看的地方不止一两处，但我没有去别的地方，首先去看了西大门监狱。我的亲人和战友中，有不少人跟这个监狱有着刻骨之仇。人民军勇士们一打进汉城，就用坦克冲开这座监狱的大门，放出了全部囚徒。

西大门监狱，这是象征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犯下的滔天大罪的可耻代词。就在这座罪恶昭著的监狱，权永壁、李悌淳、李东杰、池泰环等英勇抗击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民族的优秀儿女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化成了一抔泥土。我的金亨权叔父也死在麻浦监狱中。我过去

在山上作战的时候曾打定主意，国家一解放，就到汉城去找他们的坟墓。可是解放五年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是因为三八线把祖国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我无法找到连墓碑都没有的亲人和战友的坟墓，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血迹斑斑的监狱墙壁和萦洄着他们的气息的监狱屋顶。就是这一点，也多少减轻了我心情的沉重。我站在解放五年来一直没有一个老战友前来吊唁过的这些已故革命战士们的英灵前，情不自禁地淌下了压抑长久的泪水。

权永壁在西大门监狱临刑前曾托付战友们说：

“我只有一个儿子留在世上。若说我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希望我的儿子长大后继承他父亲未竟的事业。”

当我看了监狱走到街上来的时候，权永壁的这一遗嘱像钟声一样震荡着我的脑际。那是只有像权永壁那样度过了光荣一生的革命者才能留下的宝贵的遗嘱。他的话，至今仍不时地在我的脑子里萦绕。

六　不能忽略的事

远征抚松结束后，我率部返回长白地区，驻在新兴村附近，加紧进行挺进祖国的准备。1937 年 5 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传令兵到了离新兴村不远的吉城村。这是我们来到白头山地区的头一年冬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村子。

我们来到长白地区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时同带着支军物资来的人们见面，有时把必要的人员召到中间联络站或其他秘密地点接头，有时还直接到居民点去跟群众接触，了解民心，了解敌人的动向，帮助群众提高革命觉悟。

在长白地区我去过许多村子，头一次去吉城村时还在那里住了三天。这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恬静的小村庄，只三天就认识了全村的人。我们在那里开展了群众政治工作，会见了国内的工作员。

一个扮做猎人潜伏到吉城村来的叫田中的日本密探，也是在那个时候揪出来处决的。这个田中，是在特务机关有系统地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奸巨猾的特务。他生长在朝鲜，能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跟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没有什么差别，还精通朝鲜的风俗和礼节。所以，十九道沟和二十道沟的人们看着他扛着猎枪在长白地方转游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看出他是日本人。识破他真面目的是吉城村的地下组织。

在吉城村时，我住在一位姓张的老人家里。这一家，屋子宽敞，过的日子也比别人好一些。我住在他家时，村里的几位老年人天天到这家来聊天。这些把长烟袋插在后领里来串门的老年人，一聊就聊到深夜，有时讲些故事，有时讲南次郎如何如何，满洲国又怎么怎么样，抒发着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对时局的分析却是很有见地的。看来，被剥夺了国家主权的人民，进步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政治意识。

有一天傍晚，一个剃了光头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农民，跟着老年人来到了这一家。他的容貌、身板，像个出众的摔交手，而他的举止却显得格外淳朴，老实憨厚。男子汉一过三十岁，一般都自卖自夸，自以为天下大事无不通晓。在农村傍晚聊天的时候，嗓门最高的都是三十岁以上的青年；要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提出什么主张，他们往往嗤之以鼻，说那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之见；要是五六十岁的长辈人说些训诫的话，他们也会付之一笑，认为纯粹是封建老顽固。这就是当时血气方刚的三十岁以上青年的一般特点。可是这个青年却蜷缩在老年人的背后，光是听我说话。老人们回答我的问话，介绍村里情况的时候，他也不插一句话。老人们问我，金队长手下总共有多少兵员，听说游击队还有速射炮(即机枪)，是真的吗？估计再过几年日本才能灭亡？金队长的父亲做什么？等等，五花八门，什么问题都问。唯独那个青年人缄口不语，只是听着老人们发问，抿着嘴微笑。当他的视线偶尔同我的目光相碰时，就立刻缩脖子藏到别人的身后去。有时他脸上现出似乎想要问什么的表情，但又不敢问，始终不开口。我甚至

怀疑他是不是哑巴。那个青年的不自然的举止，不知为什么，也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跟老人们了解了过日子的情况，顺便也问了那个青年几句话，但他仍不开口。老人都不安地望着他，其中一位老人索性替那个青年开口说：

“将军，他是扛活的长工。是个举目无亲的老小伙子，名字叫金月容。他只知道自己是南道生人，却不知道故乡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父母是谁。他连自己的年龄也不清楚，只知道大概是三十开外了。确实是个可怜的后生啊。”

大凡丧失了自我的人，都像他这样连自己的意思都不能自由表达。

他自卑得连问话都不敢回答，可见他从来就没受到过人的待遇，是一个饱受歧视的可怜人。

我靠近他的身旁握住他的手一看，一双手简直像一对铁耙子。他手都变成这样，该受了多少苦啊！他背也驼了，身上的衣服更不像样。他老躲在老人的身后，也许是因为衣裳太褴褛，怕见人吧。他虽然连别人的问话都不敢回答，但他居然能到游击队司令官住的地方来串门，可见他还是个有主心骨有所抱负的人，我认为这一点还是令人喜欢的。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他只说了“从小”这两个字。听他的口音，好像是全罗道人。当时，中国东北地方，包括西间岛，从朝鲜全罗道来的人很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量掠夺满洲的土地，提出所谓的“鲜农移满政策”，给好几万名朝鲜农民挂上“集团开拓民”的名目，强迫他们迁移到了中国东北地方。这个青年人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吧。

等人们都散了以后，我问住家的主人张老人说：

“老大爷，那个青年人为什么还没有娶亲？”

“他从小给人扛活，如今过了三十岁还不能成家，孤孤单单地过日子。人可是好得没说的，就是讨不上一个媳妇。没有人愿把闺女许给他嘛。看他孤苦伶仃的样子，怪可怜的。房前头那家的小子，那么小还当上了新郎，受大人待遇呢。”

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朝门外一看，只见有一栋草房，纸糊的窗户当间贴着一块有笔记本大的玻璃，那门前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在踢毽子。一想那么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已经娶了媳妇，我心中不免有怅然若失之感。尽管是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盛行的时代，但是看了这种现象，还是禁不住令人咋舌。

其实，我们部队里也有跟那孩子差不多大的“小新郎”。这是后话。在长白县入伍的游击队员金洪洙就是十来岁结婚的“小新郎”。他跟“小新郎”这个外号很相称，个子也很矮。

三十开外的老小伙子和十来岁的“小新郎”，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面对着这个啼笑皆非的事实，我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和悲伤。老小伙子和“小新郎”，都是时代的受难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处境是差不多的。但我更同情过了三十岁还不能成家的老小伙子。“小新郎”虽是早婚制的牺牲品，但他毕竟还是有妻室、有生活的。

这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眠，那个金月容，一个人的悲惨的前半生总是浮现在眼前，使我无法平静。金月容的过去和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家在苦难深重、荆棘丛生的路上艰苦跋涉的缩影；他那浮萍一般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前半生，就是沦陷的朝鲜用血泪谱写的历史的缩印版。

这天夜里，我心中产生一个念头，要给金月容物色一个配偶。如果不能帮一个人成家，怎能光复被侵占的祖国呢！

我们革命军里当然也有很多误了婚龄的老小伙子。他们是因为参加了不知何时能胜利的长期的武装斗争，才过了婚龄的。游击斗争，是在各种类型的斗争中最艰苦、牺牲最大的斗争。游击队活动频繁、活动半径大，而吃穿住的条件却极端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成家，是普通人难以想象，难以实现的。不少女同志加入武装队伍时所以舍得把孩子交给婆家甚至送给别人做养子养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游击队里也有一些两口子同时入伍作战的，但他们的夫妻生活却是有名无实的。总之，我们在外来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过着很不正常的生活。

除了极少数亲日派和民族叛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体朝鲜民族都无情地推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朝鲜民族固有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都被打碎得七零八落了。人所需要的起码的生存条件、自由、权利和传统的风俗习惯都被践踏无遗。日本帝国主义不希望朝鲜人吃好穿好，不希望朝鲜人过上人的生活。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把朝鲜人变成牛马猪狗。“愚民化”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因生活贫穷，孩子们到了学龄也不能上学；乞丐和流民在街头彷徨；青年男女过了婚龄而不能结婚成家；夫妻不能团聚而在山中受苦……对这一切，对朝鲜人的死活，日本人是无动于衷的。

敌人置若罔闻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则是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因不得已的情况而不能成家的，但金月容这样的老小伙子为什么就不能成家呢？难道国家亡了，青年人就不该成家吗？

我在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的时候，虽还不到二十岁，却干预过几次别人的婚事。其一就是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简单提及过的孙贞道牧师的大女儿孙真实的婚事。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不得不干预孙真实的婚事，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这件事，一度成了吉林市朝鲜侨胞社会中的话题。学校放假时我一回到家，母亲也像我的吉林同学们一样对我说道，自古就有俗话说：做媒做得好，就受三杯敬酒，做得不好，就挨三记耳光。

母亲的这一告诫，我铭记在心里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认为，什么恋爱呀结婚呀，这都是些出自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生活琐事，断定离开了革命、学习和劳动的一切幻想都是私心杂念。他们说，国家被人吞掉，全国百姓都做了亡国奴，还谈什么恋爱，讲什么爱情，这都是邪魔歪道！国家主权尚且未恢复，哪有兴致谈那个酸溜溜的恋爱和小家庭！他们的这种立场观点，虽然不无走极端的一面，但是当时他们看到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为恋爱或家庭问题而受痛苦甚至脱离革命队伍的现象，这种立场观点就变得更加坚定了；尤其是看到不少有家室的同学因之而放弃学习，或被卷入家庭琐事中不能自拔，这种看法一时间在一些人中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正确观点。

但是，并没有因国家亡了，爱情也随之消亡的道理。即使国家亡了，生活还是照常继续，爱情还是照常存在。青年男女到了适当年龄就跟相好的谈情说爱，成立小家庭，生儿育女，等到子孙满堂了，又说“无子女才是好八字”，这就是人生。

我曾见过不少志同道合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为爱情而苦恼而欢悦，为爱情而结合而决裂的事例。金赫在革命斗争中跟承少玉谈过恋爱；柳凤和因为爱李济宇，跟着李济宇投入了革命斗争；申永根在做共青同盟工作中爱上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安信英，跟她结了婚；崔孝一夫妻为了给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添一分力量，带着十几条枪，逃出日本人的武器商店来到孤榆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车光秀曾幻想能遇到一个像小说(牛虻)的女主角琼玛一样的恋人。

爱情不仅没有妨碍革命，反而成了鼓舞和推动革命的力量。崔昌杰是有妻室的人，这已在回忆远征南满时简单提过。他常思念留在柳河的妻子，从这思念中获得力量；承少玉的清秀俊美的容貌，成了使热情充沛的汉子金赫不断地涌出诗篇和音乐的泉源；全京淑在自己的爱人金利甲被关进大连监狱后，为了照料狱中的爱人，毅然离家赶到大连去当了大连纺织厂的织布工，以便能经常给狱中的爱人送衣送食，一直坚持了九年。使一个笃实的基督教徒的女儿全京淑成了天下闻名的烈女的也正是爱情。

这一切事实，使我们的人逐渐改变了对于爱情、结婚和家庭的看法。他们认识到，有妻室的人也完全能够搞好革命斗争；家庭和革命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是产生爱国精神、革命精神的泉源和出发点。这种认识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观。

我在五家子活动时还曾干预过边达焕的婚事。当时，边达焕是五家子农民同盟负责人，他既要种地，又要抽空做革命工作，成天忙来忙去不得空闲。他和他父亲都过着鳏夫的孤独生活。

论年纪，边达焕属于李宽麟他们那一代。这个可以说是属于我父亲一辈人的边达焕，弯腰驼背地蹲在地上，面前放着淘米的木盆，用铁耙子一样粗黑的大手从木盆里的米中一个个地挑出砂粒的样子，或端着木盆或水罐进进出出的样子，总是给人一种凄切之感。听说，现在的青年男子到了三十岁不娶亲也满不在乎，好心的邻居反而替他着急，催促他快结婚，而本人却回答说不用着急，慢慢来呗。听说这已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我们搞青年学生运动的那个时候，青年男子到了三十岁，女子们就把他当半大老头看，根本不把他当小伙子放在眼里。

边达焕是罕见的美男子和好心人，满可以再娶一个姑娘。可是叫人焦急的是他本人根本不想再婚。他本人不想，他父亲就该催促他，可是他父亲边大愚也不加过问。于是由我们挑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给他做了填房。我大胆干预这个婚事，纯粹是出于同情心。

续弦以后，边达焕做农民同盟的工作更加积极，干劲更大了。边大愚等五家子的有声望的人们都称赞吉林青年不但善于闹革命，而且还富有人情味。我们帮助解决了边达焕的家庭问题，结果使革命工作得到了许多好处。可见，结婚决不是与革命毫无关系的。

正因为这样，我对别人的爱情和友情，从没有掉以轻心。我们在汪清地方的游击区时，有一天我带着吴白龙的连队从小汪清朝嘎呀河方面行军。当队伍翻过一道岭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面生的姑娘微低着头朝我们这边走来。她一见是我们，就突然站住，脸上现出微笑，惊喜地望着我们。可是当队伍将要靠近她时，她却低垂着眼睑急匆匆地从队伍旁走了过去。做为一个农村姑娘，容貌和举止算是很清秀而淡

雅。连队在继续行进，只有走在最后的一个队员很快地回头望了她一眼，然后像有什么心事似地低垂着头迈动着脚步。队伍走了一百来米，他又回头望着，他那眼流露着难以形容的忧伤和眷恋。

我叫那个队员走出队伍，轻声问他：

“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深沉？或许是跟那个刚过去的姑娘有什么关系？”

那个队员立即满脸现出喜色，微微地笑着，坦率老实地说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入伍后一次也没见过她。可她连头也不抬，像一股风似地过去了，心里怪不好受的。她要是抬起了头，就能看到我穿上军装的样子嘛。”

他说着，又朝那姑娘消逝的方向张望。我心里油然生起了应当帮助他的想法。于是说：

“那么你现在就去跟她见见面吧。让她看看你穿军装的样子，也跟她说些话，那她该多高兴啊。给你充分的时间，想说的话都说了吧。我们在前面的村里休息，等你回来。”

他的眼睛闪出了泪光，说一声谢谢，就箭也似地飞跑去了。我带队到前面的村子下了休息令。没过三十分钟，那个队员跑回来要向我报告跟未婚妻见面的经过。我说这类事情不用报告，可他还是忍不住兴奋地说道：

“她看我穿上了军装，说我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还说她要像个游击队员的未婚妻，一定把工作做好。我跟她说：‘看见了吧，我是为朝鲜的独立豁出了一身的人，你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未婚妻。你要做一

个革命军人的妻子，就该加入革命组织，好好做革命工作。’我是这么说的。”

自从见了未婚妻以后，他作战更英勇；他的未婚妻也加入了革命组织，工作很积极。可见，爱情是干劲的泉源、创造的动力、使生活绚丽多采的染料。

我在离开吉城村时托付张老人说：

“老大爷，有件难事想托付您。为了金月容，昨天我一夜没睡好觉。希望村里的老大爷们齐心合力，给金月容找个配偶，帮他办办婚事，您看怎么样？”

听了我的话，张老人显得十分不安。他说：

“我们有愧啊，还让将军为这种事儿操心！请将军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他成家立业。”吉城村的老人们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诺言。不多久，祖国光复会的当地组织送来了金月容要办喜事的报告。把女儿许配给金月容的是十八道沟寺洞的金老人。

我们在吉城村为一个老小伙子的婚事操心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二十道沟，甚至传到了十八道沟。金老人风闻到这件事，就来到吉城村跟张老人谈起了他女儿的婚事。他说，是金将军器重的人，我就该把女儿许给他。这样，这件婚事就意外顺利地谈成了。这位金老人真是难得的好人。

他家靠山脚下一小片孬地过活，日子很穷，可他这位老人家表示要把两方的婚礼合在一起由自己包下来。而男方的亲人也力主由他们办，于是婚礼就在吉城村张老人的家里举行了。

我叫后勤副官金海山从战利品中挑最好的布和食品送到吉城村去。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金海山只答应了一声，却站着不肯出去，显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他说：

“将军，他们办婚礼，我们非送贺礼不可吗？”

这可是意外的问话。

“当然应当送。怎么，你不乐意？”

“我们的战友结婚，都是只摆着一碗饭就办了婚礼的。想到这一点，真不想送去。我们有多少只摆着一碗饭就代替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礼，尔后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

我理解金海山的心情。给战友办婚礼的时候，他只能给战友摆上一碗饭，而现在要他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贺礼，他心里自然是不情愿的。

“想到那些事，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海山同志，因为我们只用一碗饭代替了婚礼，难道人民群众也应当这样办婚礼吗？其实，我们的人民群众中这样办婚礼的人也是不少的，对这一点，你不感到憋气吗？当然，用我们密营仓库里的战利品去救济全体朝鲜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决心为解放人民而拿起了枪杆子的我们朝鲜青年，给金月容这一个人办婚礼，难道就不能大方一点吗？”

金海山当天就带着一个队员背着被面、大米、罐头等贺礼走了。他走时，我把我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给他带去了。他回来后，我见他眉开眼笑心满意足的样子，料想他一定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婚礼也办得很满意。他对我没说别的，只说新郎接到那些贺礼激动得放声大哭了，村民都人心厚道。他最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将军，往后，西间岛青年人结婚的贺礼，我们都包了。”

过了些日子，我听跟他同去过的队员说，在那天的婚礼上，金海山给新郎祝酒的时候，哭得很凄惨。后来，我也没有问他哭的理由，因为很明显，一定是迸发了在那种场合里朝鲜人都共同感到的民族之悲哀。

自从听了金海山的汇报以后，我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抽个时间去访问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因为我很想看看他们怎样过日子，也很想亲自为他们的将来祝福。于是，正当为挺进祖国紧张地进行准备的时候，我离开密营，只带传令兵特意去看望了他们。

人的感情真是奇妙不可捉摸。我跟金月容只见过一次面，话也只说过一两句。他根本不愿意说话，不是可以自由交流感情的人，而且表情也很少有变化，是个淳朴无比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心，连我自己也茫然不解。他不是什么有特殊魅力的人，要说有，那也许是他没有沾染天下任何污垢，纯洁无瑕，天真质朴这一点吧。尽管这样，我怎么也克制不住想跟他见一面的渴望。

那天，张老人引我到了他的家。他住的是把别人弃之不用的小库房简单修缮起来的房子。很可惜，新郎上山打柴去了不在家，只有新娘——那位寺洞金老人的女儿高兴地迎接了我。这位新娘虽然算不上是美人，却像大户人家的大儿媳妇一样丰满而朴实厚道。我心想，要是这样性格的女子，是会很快就让丈夫变成另一种性格的人的。

“你决心跟月容同志过一辈子，我们很感谢你。也请你向你的父亲转达我们的问候。”

我这么一说，新娘低头鞠了一躬，回答说：

“要说感谢，该由我们感谢您呐……我一定帮着丈夫，好好过日子。”

“愿你们子孙满堂，白头偕老。”

趁我跟新娘说话的时候，我的同志们已经给她家劈好了柈子，堆得像个小山包。

见过金月容的妻子，不知为什么，我的郁闷的心情顿时轻松开朗起来。我深信他们两口子一定像一对鸳鸯一样，一辈子相亲相爱形影不离。那天的访问，直到我们部队为攻打普天堡攀上坤长德的时候，仍萦绕在我脑际中。

我们成全了一个长工老小伙子的婚事，还为婚礼送了贺礼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西间岛。从此，人民群众对人民革命军的信赖和期望就更大了，运到密营来的支军物资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了。十三道沟城门外的一位老人，连一点一点积攒下来准备给儿子办喜事的稗子米，也叫儿子背着送到了密营。尤其使人赞不绝口的是，背着这些稗子米来的就是两天后就要结婚的那个儿子和他的哥哥。我们百般劝他们背回去，但他们怎么也不听，反而百般恳求我们收下，说要是带回去的话，父亲就要把他们赶出家去。于是，我们再也无法推却他们的诚意了。

名字叫金光云的那个青年，后来怎样办了喜事，我们无从知道。我心想，他们为了准备那点办喜事的米，一定费了不少力气的。我至今仍深深地后悔那天在富厚水台地上送他们回去时，没能送给他们一点什么东西。离开西间岛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金月容。

从打离开吉林后，孙真实也未能再见到。只听说她到美国留学去

了，至于她婚后的生活如何，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心中一直默默地祝愿她幸福。

我一辈子没有忘记过孙真实、边达焕和金月容。

大概是这样吧，自己奉献的爱有多深，对过去的亲朋好友、同志和学生的爱就有多么久远而深厚。

孙真实在美国去世。接到她去世的讣告，我给孙元泰发了唁电。我心想，在她活着的时候，能再见一次面，探探她的病情，该是多么好啊！

金月容本是很健壮的人，一定是长寿的。

七　游击队的阿妈妮

在白头山跟我多年同甘共苦的战友中，有一位被大家称为“阿妈妮”(朝语，指母亲，亦指大娘。此处指大娘——译注)的女游击队员。

她名叫张哲九，是司令部的炊事员。部队里有好几十名女队员，女炊事队员也不少，但被大家称为“阿妈妮”的只有张哲九一个人。

她比我大十多岁，照说是可以称呼她为“大姐”或“同志”的。但是，平时我也叫她“哲九阿妈妮”，而不叫“同志”，甚至年纪比她大得多的“烟斗老头”也老叫她“哲九阿妈妮”，常常引起大家的笑声。

张哲九来司令部做炊事工作，是1936年春在马鞍山烧毁了“民生团”嫌疑档案包之后的事。当时我在检查金洪范交出来的“民生团”嫌疑分子档案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了张哲九的名字。不知是什么缘故，唯独她的档案是用红墨水写的。档案里记录说，张哲九的丈夫原在延吉县做党的工作，后被判定为“民生团”，两年前被枪决；说张哲九在延吉县王隅沟当妇女会会长时，蓄意把军粮埋藏起来，让队员们挨饿，如此这般地搞了破坏活动。这就是记在档案上的“罪状”。

用红墨水写的档案，取了男人名字的中年妇女，仅这两个特点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张哲九的外貌也有些特别。在女队员中，她个子最矮，眉毛特稀，简直像个没有眉毛的人。

她是因为爱自己的丈夫，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因而也爱上了丈夫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她照丈夫的吩咐，撒传单，贴标语，有时跑联络，有时帮助地下工作者隐蔽，也参加秘密会议，还学文化。她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她那么爱戴和信赖的丈夫却被扣上莫须有的“民生团”的帽子给枪决了。她本人也在王隅沟工作地点被捕关进了关押“民生团”的监狱。在她被关押时，曾经到她家里跟她丈夫一起贪婪地吃过热乎乎的稗子米饭和芥菜做的泡菜的“王同志”，竟然揪住她的头发，挥起棍子拷打她。在公审大会上，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都反对判她死刑。张哲九虽然被免了死刑，但没有摘掉“民生团”嫌疑分子的帽子。这是那些亵渎神圣的革命，残害无辜的刽子手们硬扣在她头上的帽子。

我在给人摘掉这顶帽子时，也给张哲九摘掉了这顶帽子，并让她做了司令部的炊事员。自从她当了炊事员后，我们的伙食大有改善。她手艺好，能用速成的方法做泡菜、做大酱。现在的人，若说一两天之内就做好泡菜和大酱吃，恐怕都不会相信。但她把黄豆炒到不至炒糊的程度，然后往热水里一泡，就泡出紫红色的水来，再把食盐放在这水里熬，就能熬出酱油来。把黄豆煮熟了装在坛子里放在有热的地方，它就发酵，生出一层乳白色的霉，再往里放些食盐一煮，就成豆瓣儿酱了。这个酱味，简直跟明太酱一样。

张哲九用这种速成方法做的豆瓣儿酱和三叶芹泡菜，是我们当作节日佳肴一样喜欢的美馔。

她还用玉米胚芽榨油。有一回，传令兵白鹤林患了重病起不来，这个平时连草根树皮都能大口大口吞掉的人，这回连煮烂了的玉米粥都咽不下，说一闻到这味就作呕。张哲九扒开积雪，找出干枯的野菜叶子摘来浸在水里泡去苦味，然后把它煮熟，再用玉米胚芽榨的油炒一炒，就成了一种可口的菜。白鹤林吃了它，胃口才好起来，能吃下东西了。

张哲九是名副其实的游击队“阿妈妮”。当部队出征时，她就把锅巴塞在小队员的裤兜里。不光是崔金山、白鹤林这些年纪小的传令兵，甚至吴仲洽、李东学这样的老队员，在张哲九面前也是无话不说的，饿的时候就跟她喊肚子饿。张哲九最喜爱的队员是年纪最小的“锅巴队长”李五松。她只要看到李五松在厨房附近打转转，就把一把锅巴裹在裙子里跑出去塞给他。李五松就高兴地带着锅巴回去均匀地分给自己的同伴们一起吃。

每当目击到这种情景时，我就心想，对待子女，为什么女人就比男人更亲昵，毫无隔阂？这是因为，喂孩子们吃，给孩子们穿，对孩子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主要是女人。供孩子们吃穿，这是母性的固定任务。因此，“阿妈妮”这个词语的真实意义，就是管吃管穿的最恩惠的保护者。

张哲九忠实地履行了这个保护者的使命，因而成了我们大家最亲密的“阿妈妮”。

在我们沉沉酣睡的深夜，她为了准备我们第二天的早饭，通宵

择菜、推磨、筛米。需要舂米时，尽管是风雪大作的夜晚，也要到外头去舂。

因为她总是在靠近火的地方忙碌，所以她的衣裳也比别人破得快。

有一次在密营里开晚会，张哲九被指名唱歌。战友们都想听她唱首歌，说她做菜手艺高，唱歌也准会很拿手。于是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可是张哲九却霍地站起来，朝林子里跑掉了。她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大家都发了愣。

我站起来替张哲九辩护说：

“哲九阿妈妮不唱歌，请同志们不要误会。她不愿站到大家面前来，我想是因为衣着太寒碜。同志们都看到了，哲九阿妈妮穿的是补钉摞补钉的衣裳，补钉恐怕有十好几处吧。大家想想看，她穿着那样的衣裳要站到大家面前来，她的心情该怎样呢？”

参加晚会的人都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感。张哲九本人后来也坦率地说，她确实是因为穿着太寒碜才跑掉的。

此后，我带小分队出去作战时，趁机为张哲九准备了一套好衣料。

我派一个队员去，让他不管价钱多贵，要挑一套最好的衣料来。那个队员真地买来了适合中年妇女穿的灰色华达呢。懂衣料的几个女队员摸了摸布，都说是好料子，因此我也放了心。

我的亲生母亲在世时，我未能给母亲做一件衣裳。当我在小沙河芦苇丛中的一间简陋的小草房里，辞别卧病的母亲，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时，给母亲留下的一斗小米，也是我的战友们替我准备的。如果说有过我为母亲做的事，那也不过是住在八道沟时给母亲买了一双船

形胶皮鞋而已。而买这双胶皮鞋的钱，实际上也是母亲给我买一双球鞋的，并不是我自己挣的。可见，我的母亲一生一世没有得到过儿子的任何报答。她生前未得到过儿子的酬报，死后也未曾领受过儿子的一滴泪和一撮泥土，孤苦伶仃地被掩埋在小沙河的岸边。

我带着准备送给张哲九阿妈妮的衣料走在路上，心中油然生起了对亲生母亲生前和死后都未能尽孝的内疚感。

当我们打完仗回到密营的时候，发现张哲九突然被金周贤调到后方医院去了。她这个司令部的炊事员，为什么突然被调到寂寥的后方医院去了？谁也不知道。听了这个信，人人都表示很难过。我也禁不住有怅然若失之感。

当时，在我们的部队里，炊事队、缝纫队、医院、兵器厂等后勤单位，都由后勤副官管。因此，管后勤工作的金周贤把炊事队的人调到别的单位去，是很自然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在司令部炊事队里工作勤勤恳恳，为大家所尊敬和爱戴的张哲九，因什么理由被调到后方医院去了。

我问了当时和张哲九一起留在密营里的金正淑，可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

“也许是后方医院指名要她，或者有什么不得已的情况吧。哲九阿妈妮是哭着走的，她是那么难过，连我们都觉得很难为情。”

金正淑叙说着张哲九走时的情景，偷偷地擦拭着眼角。看她流泪，显然是同张哲九的分别给炊事队员们带来了难忍的悲伤。

我也感到惘然若失，心痛难忍。要调她到后方医院去，也该等我

回来嘛，那我不是可以给她做好新衣裳让她穿着再走吗？这样一想，心里很不好受。

使我真正发怒的是金周贤调走张哲九的理由。他说：

“自从发生了小斧头事件以后，我就打定了主意，司令官同志身边的人，只准分配纯而又纯的可靠人。”

这就是他调走张哲九的理由。他从小斧头事件中吸取教训，下定决心做好保卫司令部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为司令部的安全操心，金周贤是堪称模范的。所以，我特别信任他，也特别爱惜他。

1936 年秋，整个西间岛沸腾着参军热潮的时候，我们把新入伍的青年编为几个补充连队，然后派几个教官到黑瞎子沟密营对他们进行了速成训练。就在这些新兵里，混进了一个特务，他身上藏着一把小斧头和一包毒药，企图暗害我。从他的出身成分看，是个淳朴的青年农民，不可能干这种事，可能是被老奸巨猾的敌人所骗，才当上了奸细的。果然，后来了解到，有一天，敌人穿着人民革命军的服装闯进他的家，抢了他为母亲治病卖柴火积攒下来的钱，还抢了他家的口粮和鸡，总之见到什么抢什么，完全跟土匪一样。之后，“宣抚工作班”又派一个特务到他家里来，假惺惺地安慰他，又是进行反共宣传，又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直到他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就这样受骗上当，当上了反革命的走卒，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可是，当时我们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被敌人收买的特务。他来密营时就把小斧头悄悄地藏到了司令部附近的草丛里，因此谁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有一天，我有事到黑瞎子沟密营去，了解到新兵已有好几天只用

干白菜汤熬的稀粥充饥。我心想，虽然他们都是有决心克服艰难困苦的新兵，但离家还没有几个月，还没有适应艰苦的环境，如果事先不好好教育，他们就有可能变得心灰意冷，发生动摇。因此，当天晚上我就把新队员都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

“……你们离开有父母妻子的温暖家庭，身居野外，用干菜叶子充饥，挨饿受冻，心里也许还不大安定吧。但是要知道，为了解放祖国而拿起了枪杆子的青年，要想实现凌云壮志，就要勇于吃苦，善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这样吃苦，将来一旦解放了祖国，就会感到今天吃苦的意义了。我们的目的是，光复祖国，在三千里江山上建立起幸福的人民的国家。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过好日子的人民乐园。工厂和土地都归人民所有，由国家负责，保证人人有吃有穿，人人都受教育，有病治病，要建立这样一个民众第一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到我们国家来看看，都会表示羡慕的。”

在场的新队员中，也有那个被敌人派来的青年。他听了我的话，悔悟到自己受了敌人的骗，险些害了好人，于是决心坦白自首，不管受多么严厉的惩罚。

于是，他把小斧头和一包毒药拿到我们的面前，如实地供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因为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我们宽恕了他。

这件事，大大震惊了我们的指挥员，使他们提高了警惕。他们都从中认真地吸取了教训。有的指挥员表示决心要进一步做好保卫司令部的工作；有的提出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审查新队员的工作，以防止不

良分子、异己分子和坏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有的建议要在整个西间岛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斗争，来肃清敌人的特务、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做到使敌人的密探和特务一个也不敢接近密营。

金周贤想得比这更多更细。他说：

“我想，要保卫好司令部，就必须细查队伍的内部和外部。我们不能断定敌人只在外部，不在我们内部；不能断定外部的敌人跟乔装打扮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或动摇分子没有任何联系。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到再也不能把有历史问题的人留在跟随司令部的单位里了。”

归根结底，他的意思是说，像张哲九那样有“民生团”嫌疑的人没有资格做司令部的炊事员。

我听了禁不住怒气冲天。对一个赤胆忠心为革命奋斗不息的淳朴而善良的人，岂能如此无情无义！一向处事宽怀大度、深谋远虑的金周贤居然犯如此可怕的过失，更使我怒不可遏，我忍不住疾言厉色地对他说：

“你一向为我们的安全操心，我很感谢。不过，今天我必须跟你说几句刺耳的话。对张哲九阿妈妮，你自己也曾多次赞扬她是诚实、肯干、重感情的好同志。可是这回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抛弃对她的这种信任呢？

“她代替了我们大家的母亲和大姐。每天三顿热饭热汤，是谁给我们做的，是张哲九阿妈妮。假如她是坏人，我们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害我们的机会，不有的是吗？我们吃她做的饭不知有几百大碗，可是我们大家都安然无恙。这证明张哲九阿妈妮是毫无可疑之点的好

同志，也证明过去给她扣‘民生团’嫌疑分子的帽子是完全错误的。”

此后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金周贤老实地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冒了一身汗。其实，我也没想到金周贤会做出这种鲁莽的蠢事来。金周贤是革命历史较长的老成持重的军政干部。我们一直同吃一锅饭，休戚与共，经常面对面地讨论工作，心心相印。对我提出的路线和我的意图，他比谁都清楚。这样的人，竟然背离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和情义，那样残酷无情地处理一个人的命运，的确是无法理解的。

我继续批评他的错误，说：

“我们在马鞍山烧毁‘民生团’档案已经有半年多了，人们心中的创伤也都快愈合了。可是你为什么又去戳痛他们快要愈合的伤口？她张哲九，只要下山去找个男人，就能在热炕头上吃热饭，过上舒适的日子，但她没有选择这条路，仍跟我们一起，在这深山里过着艰苦的生活。这是因为她决心干革命，是因为她相信我们。可是你却把她赶出了司令部，把我们对她的信任变成了虚假的东西。你说，难道我们是平时对人装作信任，拉拢他，危险时就毫无顾忌地一脚踢开他的那种卑鄙之流吗？信任，是不能有假的！”

金周贤听了我的一席话，当天就跑到后方医院把张哲九领了回来，第二天就催促缝纫队员为她做了一套新衣服。

尽管这样，张哲九对金周贤还是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只是认真负责地执行他交给的任务，并不接近他。间或在密营的小径或食堂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张哲九也只向金周贤敬个礼，并不说一句话。有事要请示金周贤的时候，她自己不去，而叫别的炊事员去。

张哲九在后方医院呆的几天，跟人的一生相比，只不过是瞬间而已。即使这样，她仍不能忘记这个瞬间，久久抹不掉那留在她心中的阴影。

不信任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力是异常可怕的。一点点的不信任，会造成一辈子的冤恨，十年至交也会毁于一旦。

张哲九回到司令部炊事队来，密营里的空气立刻恢复了往日活跃的氛围，饭菜的味道也马上变了。用同样的整粒玉米熬的粥，也觉得比过去好吃多了。这都是因为张哲九倾其全部心意做出来的缘故。实际上，张哲九并不是什么手艺高强的厨师。

她做工作比过去更加积极热情。只要有合我们口味的东西，她就不辞辛苦，行百里路也要去取来。有一回，我路过十九道沟，在李勋的家里吃过硬叶湿地兔儿伞，是生平头一次吃到这种菜，用它包饭吃，比莴苣好吃。回到密营后闲聊时我提到过此事。张哲九听了，就跑了几十里路，到十九道沟去采来一大包兔儿伞。不久以后，在白头山密营也找到了兔儿伞。

张哲九经常在潮气很大的厨房里工作，睡觉也是蜷着身子睡在发潮的厨房旁边的柴堆或铺着枯叶的地方，因而她的右臂慢慢得了麻痹症，不久又患了热病。真是祸不单行。

为了给她治病，我们把她送到了安图县五道扬岔的山沟里。朴贞淑和白鹤林跟她一道去，给她当“看护兵”。后来，又由金正淑看护她。

他们为照料张哲九吃尽了苦头。我也曾带着传达长池凤孙到五道扬岔去看过她。

过了几十天，张哲九终于治好热病，能站起来了，但右臂的麻痹

症还是没有治好。因此，既不能遂心如意地做炊事工作，也不能自由自在地摆弄枪支。她意识到自己已成了部队的累赘而沉浸在苦闷之中。

她心想，自己应当离开部队，才不会给战友们增加负担。40 年代初，我们把一些不能在部队里工作的老弱病残者送到苏联去的时候，张哲九便志愿报名跟着他们一道走了。

临走时，她把自己戴着的银戒指送给了金正淑，约好要在祖国独立时再见。然而这个约言未能实现。张哲九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听到了金正淑与世长辞的噩耗。金正淑保存的张哲九的银戒指现在陈列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

跟张哲九一起在我们司令部做炊事工作的人里，还有一个名叫连合东的中国人。他做中国菜做得很好。张哲九是忠厚老实的炊事员，连合东则是手艺高强的大师傅。连合东是 1936 年冬到我们部队来的。他入伍后最初一段时间跟张哲九在一起，学会了游击队的烹饪法，而张哲九又跟他学会了一些中国的烹饪法。在这过程中，两个人成了十分亲密的战友。当张哲九被送到苏联去的时候，连合东依依不舍，非常难过。他特意做了一大包中国食品，装在背囊里让张哲九带走。张哲九也十分难过地跟他分了手。

在连合东来我们部队的过程中，发生过一次极为稀有的邂逅。这个邂逅的主角就是在吉林不顾教规喝酒吃猪肉的回教教徒马金斗。他是我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也是八道沟小学时的学友。在八道沟时期的友好中有许多印象很深的人。八道沟警察署署长的儿子黎贤章也是与我有不寻常关系的人。他也在八道沟跟我同过学。他的父亲是经常找

我父亲治病的熟客，每逢佳节，还带礼物到我家来，向我父亲谢恩。

我率部在西间岛一带活动时，经黎贤章的介绍，跟八道沟警察署署长取得过联系，那时候的署长已经不是黎贤章的父亲，而是另一个人。这个署长跟黎贤章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有良知的人。他自从跟我们订立了不同我们作战的君子协定以后，人民群众支援我们的物资，他从不刁难，一律放行。所以，我们在长白县境内攻打过许多地方，唯独八道沟一次也没有攻打过。

马金斗不仅性格特异，而且私生活也与众不同。他早在念中学时就结了婚，而且一下子娶了两个老婆，而这两个老婆又是亲姐妹。起初他只跟这两姐妹中的姐姐谈恋爱，并且订了婚。后来，替姐姐跑腿的妹妹也爱上了马金斗，害起了相思病。于是，这两姐妹的父母就把两个女儿一起都嫁给了他。大财主马金斗，一下子又成了一个多妻的富翁。

我出狱离开吉林后，就与马金斗断了联系，一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也许是命运的恶作剧吧，马金斗竟然变成了跟我枪对枪对打的敌人。我们开到白头山一带作战的头一年冬天，马金斗是盘踞在二道岗的伪满警察“讨伐队”的队长。二道岗是距黑瞎子沟密营最近的敌人的重要“讨伐”据点。那里不仅有伪满警察“讨伐队”的武装，而且还有驻朝日军咸兴七十四联队派来的几百名日军“讨伐队”的兵力。起初，我不知道马金斗就是这支伪满警察“讨伐队”的队长。后来，那年秋天我们攻打二道岗的时候，不记得这是对二道岗的第二次攻打还是第三次攻打，我们的队员搜查逃跑的伪警“讨伐队”队长的家，

发现了手握着一支手枪藏在屋里的队长老婆和厨师，便把他们都带来了。没想到这个队长老婆竟然是马金斗两个老婆当中的那个妹妹。因为马金斗在吉林结婚时，我也受到邀请去参加过他的婚礼，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老婆，那个女人也认出了我。这的确是戏剧性的邂逅。

那个女人说，马金斗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她生了两个儿子，她姐姐生了两个女儿。她还说，她的丈夫每当谈起吉林时候的往事，就念念不忘地提起金成柱先生呐，可先生怎么入了这个“金日成共匪”集团呢？显然，她还不知道当年的金成柱就是眼前的金日成。

我对她说：

“你们说的‘共匪队长’金日成，就是我。我们不是共匪，是为反对朝中两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革命军。要是你丈夫回来，请你转达我的问候吧。你要告诉他，我以过去的友情，作为老同学，真诚地劝告他，往后不要再打毫无胜算的仗，可以悄悄地避开我们。要是被逼得实在没法躲开，不得不来‘讨伐’，就装装样子好啦。我们只打顽抗的伪满军，对那些不顽抗的伪满军，我们是宽大为怀的。我不希望马金斗做日本鬼子的挡箭牌，也不希望他被我们革命军打死。他应该做我们的朋友，而不应该做我们的仇人。”

那个女人说，她的丈夫也知道“金日成共匪团”对伪满军并不随便动刀枪。人民革命军的夜间袭击组在黑瞎子沟奇袭敌军的宿营地时，专打日军的帐篷，不打伪满军的帐篷。日军“讨伐队”的头子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拿伪满军出气，把当时参战的伪满军军官全都枪毙了。马金斗之所以幸免于这场残酷的屠杀，是因为他借口得了感冒，没有参加

这次“讨伐”。通过这件惨事，马金斗可能多少明白了我们的对敌方针。

马金斗的老婆说，金日成部队为什么对伪满军那么宽大，现在才明白了。我们都知道，成柱先生在念书的时候就常常强调朝中友谊，跟中国同学们的关系很好。这些，我的丈夫也常说过。成柱先生这样爱护我们中国人，对伪满军这样宽大为怀，我们感激不尽。我一定说服我的丈夫，叫他再也别跟革命军作对，不要向革命军开枪。我的丈夫要是知道了金日成队长就是当年的金成柱先生，也定会深思熟虑，审慎从事的。

我再三叮咛她要好好说服丈夫，不要做叛国逆贼，遗臭万年。然后，把她和厨师都放了，我们也撤离了二道岗。

那个厨师没有跟马金斗的老婆走，他跑回来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个厨师就是连合东。他说，马金斗的两个老婆，也就是那两个姐妹，为着一个丈夫，常常吵架，闹得很凶，他夹在中间受气，烦得受不了。

他说：

“我从马金斗队长那儿听了许多关于金成柱先生的事儿。现在既然知道了金成柱先生就是金日成将军，我就再也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请让我在将军的部队里作战，在战斗中牺牲吧。”

我答应了他。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当时魏拯民正在横山密营治病，却没有一个炊事员会做中国菜，我和金周贤都很为难，现在有了连合东，就可以了却这一分心事了。

我叫连合东到魏拯民身边去工作了一个时期。魏拯民非常喜欢他，

称赞他是到第一流饭馆去当厨师也毫无逊色的好厨师。

从此一直到 1945 年 9 月，也就是直到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凯旋祖国的时候，他都形影不离地跟我们在一起，做炊事工作。他的确是手艺出众的高级厨师，可以用同一种材料做出好几样色香不同、味美可口的菜。行军时，他总是背着一口大铁锅走，说是用大铁锅做的饭才好吃。

40 年代前半期，驻在苏满边境训练基地的时候，我们和中国同志们一道，跟苏联同志们组成联军，常常在一起进行联合演习。每当这时候，连合东的烹调技术就大显身手，受到广泛赞誉，以致中国甚至苏联方面的指挥员都喜欢到我们部队的野战食堂来吃饭。

有一天，周保中吃了连合东做的中国菜，半真半假地要求我们把连合东给他们，安吉同志开玩笑地回答说，正中下怀，你们要就带去好啦。这个玩笑话被传到连合东的耳朵里去了。连合东却把它当了真，愁眉苦脸的来问我是不是真要把他调到中国部队去。

“说不上将会把你调到哪个部队去，反正要你的人多得很，真伤脑筋。苏联同志也要你嘛。要是苏联同志老纠缠，也许要调到苏联方面去哩。”

我这么一说，他立刻霍地跳起来，说：“不管是中国部队还是苏联部队，我都不去。”然后就执著地盯着我。

他说的是真心话。这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证实。当我们要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时，我把他叫到跟前，先向他道了谢，感谢他十来年一直为我们操劳，吃了很多苦，然后告诉他说，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到周保

中的部队去。周保中已经说好要叫他当团长。

连合东听了我的话，就恳求我一定要把他带到朝鲜去：

“到了今天，我没有金将军就活不下去了。难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就非要活在中国不成吗？什么团长不团长的，我都不要，我只要跟金将军在一块儿，求您答应我吧。日本鬼子的刀枪、满洲的狂风大雪，都没能割断我们的情谊嘛，难道就因为国籍不同，就硬要割断这个情谊吗？”

他的话感动了我。他的话集中地体现了只有在革命的征途上为同志流过泪洒过血、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人才能具有的人生观。正如他说的，在革命队伍里，人不是靠江河大地而是靠人与人的感情过活的。在白头密林和满洲的冰天雪地，把抗日战士们紧紧地团结在一个大家庭里的，也正是感情，是爱。有人的地方如果没有感情，没有爱，山河也必将失去它的美丽。

连合东真诚地恳求我们，执著地要跟我们走，这也是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

其实，我也不愿把他调走。我对他说：“如果你的愿望果真是这样，那你就照你的意见办好啦。其实，我何尝忍心跟你分手啊。我不管什么国籍如何，我只怕你的处境会有些难堪，才这样考虑。你也知道，现在中国正处在内战前夕。我们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已经跟周保中同志约好，把姜健等许多朝鲜军政干部和战士派到中国来。当朝鲜人来帮助中国革命的时候，你一个中国人却不顾本国的革命，到朝鲜去，别人会怎么看待你呢？我想，你自己的心里也不会坦然的。”

连合东最后选择了回中国的道路。临别时他还开玩笑说，中国革

命胜利后他定要到朝鲜去过日子，到那时候要给他挑一个平壤美女做妻子。然而，我们未能满足他的这一心愿，因为后来他作为团长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英勇牺牲了。我听了这一悲痛的消息，后悔我没有把他带到朝鲜来。连合东为建立新中国，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虽然连合东未能到朝鲜来，但远在苏联中亚地方的张哲九却在朝鲜战争以后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她回来不久，白头山时期的老战友们会聚在一起，张哲九给我打电话说：

“将军，当年白头山时期的同志们都聚齐了，您有空能来一下吗？我熬好了整粒的玉米粥，是隔了二十年后熬的，很想请将军也来一碗。我从万里外邦空手回来，能献给将军的只有整粒熬的玉米粥啊。”

我是多么想去啊，但我没有时间。我对她说：

“谢谢您，可是我现在就要到地方去了。跟人民群众约好了的事，是不能失约的，改日再约个时间吧。”。

听说，那天老战友们聚在一起，就像在白头山的时候那样，烧劈柴熬了整粒的玉米粥，吃得很香。

从那以后，每当深深地怀念起白头山时节的时候，我就请张哲九给我熬整粒的玉米粥。张哲九就住在我家对面的矮山岗上。她经常到我家来，我偶尔有空也到她家去。

她回到祖国以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新一代讲老战友们在白头山打仗的故事。

张哲九于 1982 年辞别了人世。她的逝世，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就

像我亲生母亲去世时那样感到无比的悲痛。她生前像老大姐一样尽心尽意地照顾我，她的爱决不亚于亲生母亲的爱。

我们像对待为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革命战士一样，为张哲九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位平凡的妇女，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立了她的半身铜像；电影部门还摄制了以张哲九为原型的故事片《万病草》。当我们给平壤商业大学冠以张哲九的名字时，人民群众都十分高兴。他们都激动地说，以一位平凡的炊事员的名字命名平壤商业大学，这是只有在不分职业贵贱，推崇勤勤恳恳地为人民的吃穿住而尽心竭力的服务人员和无名英雄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看到的。

把平壤商业大学命名为张哲九大学的时候，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后代都成为像张哲九那样忠于革命的人民公仆。

第十七章

朝鲜还活着

时期：1937.5~1937.6

一　普天堡的烈火(一)

对于普天堡战斗，已有很多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作了许多阐述，但对直接组织和指挥了这场战斗的我来说，还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往事和深刻的体验。半个世纪以前的种种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句话，普天堡战斗是一个犹如被迫离散的母亲与子女们重逢的事件。普天堡响起的枪声，使祖国得以同最爱惜她和最忠于她的儿女们见了面。换句话说，普天堡战斗是把亡国的历史导向光复洪流的决定性转机之一。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每当各界人士要求我讲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战斗故事时，我总是给他们讲普天堡战斗。就战斗规模而言，比普天堡战斗大的多得很，打普天堡时我们杀伤的敌人也不多。虽然如此，在介绍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战斗时，我一向把普天堡战斗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对这场战斗比任何一次战斗都特别重视。

对于普天堡战斗，有许多人曾表示很大的兴趣。对敌人所遭到的损失，在战斗过后各家报纸都做过报道，所以无须重新确认，但对进行这次战斗的动机，人人都表示很大的兴趣。如：出于什么意图进行普天堡战斗的，在国境一带，类似普天堡的集镇和村庄有几

十座，为什么单单打普天堡？

我们组织普天堡战斗的目的，从广义上说，在于创造民族再生的转机；从狭义上说，在于把抗日革命斗争推向决定性的阶段，也就是说要带来质的飞跃。

朝鲜的民族史，是血泪斑斑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因此我们民族才开始了抗战。武装斗争，是朝鲜儿女所抱定的抗日意志的表现，是他们选择的抗日手段。我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一面开展武装斗争，一面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同时开展统一战线运动和反帝联合战线运动，积极推进了抗日革命。

在这条道路上，曾有过许多艰难险阻。有的人甚至把朝鲜人提出朝鲜革命的口号开展斗争，看作是犯罪行为，要求我们服从他们党的利益和战略。

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我们一向把朝鲜革命当作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身居异国，我们的心却一直同祖国和祖国同胞在一起。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起，我们在异国他乡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祖国和解放祖国而做的。我们强烈地主张朝鲜共产主义者举起朝鲜革命的旗帜进行斗争，是我们堂堂正正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在南湖头会议上，与其他一系列问题一道，作为重要议题讨论了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朝鲜共产主义者们表明的志向，是要到国内去发出震天动地的枪声。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内腹地，掀起朝鲜革命的高潮。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我们的主要活动舞

台是满洲地方。在建立抗日游击队前后，虽曾多次进入国内，但那还是很有限的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可以说是我们的活动以积蓄力量为主的阶段。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队伍已经壮大，可以组编好几个师了。只要带领这股力量挺进到国内去，就不会有办不成的事。坐镇白头山，向狼林山、冠帽峰、太白山和智异山各派一个师，用这种方式把武装部队派往四方，建立根据地，连续打击敌人，就能使朝鲜半岛变成滚开的一锅粥，带动两千三百万朝鲜同胞奋起参加全民抗战。这么做，就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开辟实现解放祖国宿愿的大路。这是我们在南湖头、东岗和西岗等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反复讨论的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和抗日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937 年春，我们在西岗总结过去几年的武装斗争过程，并提出以大部队进攻国内的作战为当前任务，还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根据这些措施，订出了将革命军武力分三路挺进的具体的军事作战计划。按这个作战计划，崔贤部队从抚松经安图、和龙向豆满江沿岸的北部国境一带挺进；另一支力量则向临江、长白一带挺进；我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则乘敌人向上述两支部队集中攻击的时机，挺进到惠山方面去大闹一场。这次作战的总的目的，在于打击国内的敌人。向临江、长白一带挺进的第二师的任务，也是从背后支援向国内挺进的另两支部队。当时，在我国人民中间出现了对日军的力量估计过高的情况。他们看到日军一口鲸吞满洲，大惊失色，认为世上再没有能够抗击日军的军队了。有的人甚至认为，以日本那样的强国为敌进行独立

战争，等于以卵击石，是荒唐、无谓的行动。

从当时的各种征候来看，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已是洞若观火的事。中日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随着日军气势汹汹地扩大战火，对“无敌皇军”的恐惧心理和过高估计就势必更加严重。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无异于麻痹革命意识的麻药。要使这种麻药失效，就必须打破所谓日军强大的神话。为此必须让人们直接看到，日军尽管强大，但只要我们下决心去打，就能打败它，消灭它。

我们在以北间岛和西间岛为中心展开的历时五年的武装斗争，业已彻底粉碎了日军强大的神话。但是，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消息和大搞反动宣传，我军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如实地广泛传播到国内腹地去。

在这种时候，我们若以大部队挺进国内打一仗，全国江山必将为之而震动沸腾，人民会为有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而欢欣鼓舞，为有实现祖国解放的朝鲜的革命军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正是能够使两千三百万同胞奋起投入光复祖国战线的意志和力量的基础。

这就是贯穿于我们的国内进攻作战计划中的战略意图。

当时，我的思考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要从军事上攻打国内的较大要冲，以震惊全国；其二是，要在全国布下稠密的地下组织网，发动全国人民准备投入抗日战争。这样，解放祖国的决定性时机一到，就把武装斗争和全民起义配合起来，击溃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这是需要付出莫大牺牲的艰巨的战略，但除此而外我们没有别

的出路。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一带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完全服从于这一战略的贯彻。

在向国内挺进的前夕，我最关注的是深入了解祖国的实况。光靠各种刊物，是无法深入地了解国内实际情况的。所以，我同去过国内的工作员多次进行了谈话。有时，我召来在国内活动的地下组织员，听取关于国内情况的汇报。国内情况，不仅从新的统计数字或使人大受冲击的某种事件之中看得出，从一个集市的景况或从路边客店传出来的妇女们的闲言闲语中，也能搜集到从御用报刊的廉价新闻中看不到的重要资料。

在这些资料中，我最重视的是人民的动向。我们所关心的是人民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他们在想什么。

我记得是那年 4 月或 5 月，去过满浦方面的一支武装小组的成员向我汇报时，提到他在山里亲眼目睹的事实：

“我看见几个枯瘦如柴的十岁左右的男孩在松树林里捡枯树枝。我一问他们，他们说，在学校里不觉脱口说出了一句朝鲜话，便挨了一顿毒打，还要罚款，所以到山里来捡枯树枝去换钱。他们都是些才念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武装小组成员还从孩子们那里听说，日本人教员拿木剑打他们的腿肚和脊背，打得身上青一条紫一条的，然后把空水桶扣在他们头上，罚他们在操场跪了很长时间，最后还要罚款。在他们班级，说一句朝鲜话就罚五分钱，说两句要罚一毛钱，犯三次以上就开除。别的学校和班级还未作出这种规定，唯独日本人教员任班主任的他

们班级在强迫学生使用“国语”（指日语——译注）。

日本人对说了朝鲜话的孩子们罚款，这本身是不足为奇的。鲸吞了整个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呢！

我过去曾多次听说朝鲜总督府当局丧心病狂地强迫朝鲜人使用日语。庆尚北道的某一小学，早在 1931 年底就已经强制禁止使用朝鲜语。1937 年春，总督府当局下令朝鲜的各级官府拟公文一律用日文。

所有这一切，在日本的统治下是必然的，不足为奇的。但我还是禁不住怒火中烧。

一个人若被剥夺了语言，就等于变成失去智力的傻子；一个民族若被剥夺了语言，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证明是否同一个民族的诸因素中，首要的因素便是血统的共同性和语言的共同性，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

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说是那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剥夺和抹杀民族语言，如同割掉了该民族全体成员的舌头，阉割其灵魂的惨无人道的行径。被剥夺了领土和国家主权的民族，所剩的只有语言和精神了。

由此看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心想把全体朝鲜人民变成“行尸走肉”。“皇民化”的本质，并不是想把朝鲜人变成跟日本人一样的“一等国民”，让他们吃大米饭，而是要把朝鲜人变为天天早晨“遥拜宫城”，“参拜神社”，诵读“皇国臣民誓辞”的日本国民的奴隶。

剥夺民族语言，这不是只限于某几个人的不幸或牺牲的问题，而是与全体同胞的命运相关的问题，这等于让两千三百万同胞排成一行齐刷刷地一刀砍头的大杀戮。

野蛮残忍、贪得无厌、厚颜无耻是殖民主义者的第一个特点，这已是一个常识。不论国籍和肤色，强占别国的人，都是残暴、狡猾、厚颜无耻之徒。然而，剥夺别国的语言和文字、强迫别国人参拜他们神社的这种极端卑鄙无耻的殖民主义者，还从未见到过。

朝鲜民族的命运，落到了何等地步啊。武装小组队员带来的消息，不禁使我怒火冲天。

“要早日挺进祖国，叫日本鬼子看看我们的厉害。我们要证明：朝鲜民族并没有死，还活着；朝鲜民族绝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朝鲜民族不承认‘内鲜一体’和‘同祖同根’，拒不接受‘皇民化’；朝鲜民族必将手持武器抗战到底，直到打败日本。这件事，要办得越快越好。”

1937 年 5 月初，我又接到了一则令人吃惊的国内消息——《每日申报》的特刊详细报道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头李载裕被捕的消息，那是共有四个版面的大特刊。特刊记载了被警察逮捕六次越狱六次的李载裕，第七次被捕的经过和对他的介绍，这份详报未免有些夸大，说什么李载裕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溃灭的殿军”、共产主义运动“二十年历史的最后一个巨头”，还大加渲染地说他的被捕意味着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

本来，资产阶级的政治一般都是花言巧语的欺骗，给它当侍女的官方报纸，其字里行间必然隐藏着统治阶级的黑心肠。《每日申报》那份特刊也不例外。从其手法可以一眼就看出那是以反共为业的、老奸巨猾的谋士们藏在总督府的密室里，绞尽脑汁策划的一出包藏祸心的闹剧。

李载裕是一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三水人，曾去日本工读，

参加过工运，回国后以汉城为活动舞台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主要领导太平洋劳动组合各级组织的工作，曾来往于咸兴一带领导了各地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运动。

据传，他有胆量，很机智，善于随机应变和伪装，所以每次被捕，每次都逃脱了。报纸下断言说，他再没有逃脱法网的可能，因此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就算收场了。

老实说，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镇压和恶毒宣传，已搅乱了许多人的头脑。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敌人的奸计是相当奏效的。据说，由于多次掀起的大检举旋风，共产党已分裂瓦解；由于李载裕被捕，连所剩无几的个别的共产主义者也都抛弃了活动，因而人们的失望和受挫之感是可以想见的。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大失所望，泄了气。

敌人可算选对了靶子。这个靶子，就是从精神上解除朝鲜民族的武装。只要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论是恐吓或利诱，无所不为。他们一方面拿枪杆威胁说："你要服从还是要死？"另一方面又用花言巧语哄骗说："我们是'同祖同根'，'内鲜一体'，一同去参拜神社嘛。""满洲是一片'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花盛开，日本是樱花芬芳的福地，都在等你们，你们到满洲或日本去发财吧！""南产棉花北产羊，你们都做大日本的臣民，去摆布全亚洲吧！"

朝鲜民族所面临的最可怕的悲剧，就是精神上的崩溃。从日本帝国主义专政机关直至灌了流行歌曲的唱片，一切的一切都在竭力毁灭朝鲜、连根除掉朝鲜民族的灵魂。东方朝鲜已变成了水深火热的活地

狱，黑沉沉的漫漫长夜，月去岁来无尽头。

“若不能摆脱这一被奴役的、屈辱的漫漫长夜的桎梏，我们怎能称得上是朝鲜的大丈夫！要尽早挺进到祖国去，要给在无尽无休的噩梦中受折磨的民族注入生命的汁液！”

这就是在为挺进祖国做准备的日子里，充满在我们指战员头脑中的念头。我们经天上水和小德水，于 5 月中旬来到地阳溪台地，为挺进国内，整编了队伍，开展了各种鼓动工作。同时，为更深入地了解国内情况，把朴达叫来见了面。

朴达带来了惊人的消息：敌人的国境警备兵力从惠山、甲山一带大举北上，向崔贤部队挺进的茂山方面进逼。如果这一情报属实，崔贤部队就难免陷入敌人的包围。当然，这不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没有想到敌人对革命军的行动会有如此迅速的反应。

开过西岗会议之后，崔贤于 1937 年 4 月率部开赴作战地区时，我就告诉他，到了安图要注意李道善部队，这是满洲“讨伐队”中最凶残的部队。

李道善在安图，起初给小沙河的大地主双秉俊当家丁队长。那时候我就多次听说，他生活腐化放荡，对佃户动刀动枪，十分残忍狠毒。他遭到几次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之后，说穷棒子都向着共产党，动不动就袭击村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因此，群众对李道善恨之入骨，怨声载道。

日本鬼子赏识头号走卒李道善的残暴性，任命他为间岛地区警备司令部属下的安图“讨伐队”队长。这支部队由仇恨革命的资产阶级

出身的流氓分子组成。李道善的特点是一盯住对手，就绝不让对手活命。他是敌我公认的神枪手。

崔贤率部沿着险峻的山岭北上，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把敌人牵到了抚松的深山里，然后突然调转方向，转移到了安图地区。他的部队到金仓后遇到了一大难关——他们要过的一道河泛滥了。于是一部分队员架桥，其余就休息。当队员们累得睡着了的时候，李道善部队突然扑上来开了火。双方以金矿的废石堆为界，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在这场枪战中，周树东中弹牺牲。起初，敌人占了主动，采取了攻势。接替周树东指挥部队的崔贤迅速地扭转了不利的局面，转入反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枪战激烈的时候，金矿的工人们叫喊说，李道善逃跑了。看来金矿的工人们认出了李道善。游击队员们追上落荒而逃的敌人，用机枪猛扫，击毙了李道善。崔贤部队一直追了十五里地，歼灭了敌人。

金仓战斗，是一场痛快地给人民解了恨的著名战斗。当时的报纸都大书特书，报道崔贤部队打死了李道善，全歼“讨伐队”的消息。崔贤本来就是出名的战将。

他的部队在挺进茂山地区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令人痛心的牺牲。他们失去了大家称誉为“四师之花”的李京姬。听到她牺牲的消息，人们都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李京姬的一家，是全家人都在革命工作中牺牲的爱国精神很强的家庭。李京姬小时候就失去了哥哥、叔叔和祖母。她的父亲李在泉是游击队员。李京姬为了替惨遭杀害的亲骨肉报仇雪恨，也参加了武装

部队。起初，部队的指挥员都不肯收她，因为她年纪小，而且她要是参军，李氏一家就怕无人传宗接代了。可是，他们拗不过李京姬的纠缠，只好准许她参军了。

战友们都把李京姬叫做“四师之花”，像亲生女儿和亲妹妹那样爱护她，这不仅是因为她长相清秀可爱，而且是因为她做事认真，手脚勤快，心地善良，又擅长歌舞，是部队的骄傲。她参加游击队时，指挥员交给她一支手枪，因为她个子矮，体质弱，背大枪不合适，而李京姬却觉得用手枪打仗不够劲，便要了一支马枪。每当她背着马枪跳舞，战友们都热烈鼓掌叫好，要求她再来一个。

李京姬具有非凡的本领，善于调节部队的空气。假若有的队员发脾气或闷闷不乐，她就若无其事地靠近他，跟他逗乐子，让他绽出笑容来。只要她一唱起歌或跳起舞，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的队员们就都鼓起勇气，爬起来。她还很会做针线活儿和刺绣。她缝的烟荷包，不论谁都当作珍品，向人夸耀。硬撅撅的野菜一到她手里，就变成好吃的菜肴。

每当跟“讨伐队”交锋，李京姬就单独选一个射击位置，用枪瞄准敌人边打边数。有一次，她在战斗中一连击毙了六个敌人，当她装子弹时，有两三个敌人趁机溜掉了。她未能消灭那几个敌人，气得咬着嘴唇哭了。

普天堡战斗以后，曾在三个方面分头活动的部队在地阳溪会师，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崔贤来告诉我李京姬牺牲的情景，还情不自禁地流着泪，泪水打湿了他的手帕。我见这位像猛虎一般英勇慓悍的大丈夫簌簌流泪，痛切地感到李京姬的牺牲是多么令人悲痛的损失！

崔贤说，他把受致命伤的李京姬抱起来时，鲜血顺着他的指缝不住地往下淌。

“……这是祖国的大地吧，我总算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了。希望大家连我的份儿也加上，继续奋斗！”

这就是李京姬在崔贤怀里牺牲时对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以后，李京姬的父亲李在泉到会宁方面进行国内工作，不幸被敌人杀害。这样，父亲和女儿都牺牲在祖国土地上。解放后，我曾托从前跟李京姬在同一个部队战斗的战友们到茂山地区找她的遗骨，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未能找到遗骨。因为她牺牲的地点已经记不大清楚，加上当时在仓皇之中只给她做了平坟。

我们就是这样踏着战友们用鲜血垒起的一个个垫脚石，一步一步地向祖国进军。

崔贤部队挺进到茂山地区红岩一带狠狠打击敌人后，暂时撤到满洲地界隐蔽了一阵，然后突然袭击了白头山东南部的日本人木材所上兴庆水里七号木材场，再闪电般迅速地转移到了枕峰一带。驻在惠山、好仁、新坡等地的特设警备队和军警闻讯立即沿着公路快速地扑向了枕峰。崔贤派通信员来简单报告了他们所处的情况，可他没有请求支援。他派通信员来，并不是为了求援，而是向我通报敌人的动向，让我作战时作参考。崔贤生来就不是向困难低头的人。

毫无疑问，崔贤这个老练的战将是定会尽全力扭转困难局面的。然而，我们不能一味乐观地对待战局的进展。战局的突变，对我们的作战有严重的影响。形势逼我们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既能帮助

崔贤部队摆脱可能被包围的危险，又能保证进军国内作战的顺利。

我把指挥员都召集在一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第四师被敌人包围了。崔贤说他们自己有办法突围，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决心而坐视不顾吗？如果认为他的决心不是完全有把握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暂时推迟进军国内的作战，先增援崔贤部队突围好呢，还是先进军国内，然后去增援好呢？不然的话，把我们主力部队分成两股，同时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作战？要想增援崔贤部队突围，打国内的哪一地点才是最理想的呢？”

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我。因为我提的问题，不论哪一个都很急迫而重要，讨论一开始就变成了激烈的争论。把大家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意见。

其一，是主张先从背后打击北上的敌人，支援崔贤部队突围，然后根据情况抓住适当的机会再发动国内进攻作战。这个意见，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他们说，主力部队先支援崔贤部队突围，是定会成功的，可是我们一发出枪声，北部朝鲜和西间岛一带的敌人就会立刻沿着大路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样，我们主力就会落入敌人的包围了。

其二，是认为崔贤部队战斗力强，他们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突围脱险，因此，主张主力部队不改变既定方针，尽早攻打国境第一线上的惠山。这样，敌人就会大惊失色，慌忙解除对崔贤部队的包围，掉头向发出枪声的地方行动。

这个意见也因为有些漏洞而被否决了。其漏洞是什么？崔贤部队虽说战斗力很强，但他们经过多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也许已丧失了突

围的能力；再说，即使主力部队攻打惠山，朝遥远的茂山地区北上的敌人也不可能解除对崔贤部队的包围，回头向我们主力扑过来。

我提出了把两种意见结合起来的方案：

“我们一定要向国内挺进。这一计划，决不能改变，更不能取消。同时，我们一定要尽快营救崔贤部队。决不能因为重视国内进攻作战，而把处于困境的革命战友撇开不管。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攻打国内的某一地点，一箭双雕，同时达到两个目的。”

一听说要攻打国内的“某一地点”，大家都惊异地望着我。李东学代表大家问，那个某一地点究竟是哪个地方？

我指着地图作了说明：

“我们选择这个地点，要考虑这么几点：这个地点，首先不应离敌人麇集的枕峰太远，相反，要选一个紧靠敌人鼻尖的地点。这样，我们的国内进攻作战才能达到两个目的。最靠近枕峰的要冲，是位于枕峰与惠山中间的普天堡。只有打普天堡，才能使集结在枕峰的敌人大为惊慌，认为有被我们主力部队和崔贤部队反包围的危险，放弃对崔贤部队的包围，从已占的界线撤走。打了普天堡，又能引起国内的强烈震动，其效果决不会次于攻打惠山。因此，能圆满实现国内进攻作战的目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打普天堡。”

我提出这一方案，指挥员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接着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打普天堡，必须做全面的考虑。第一，要打普天堡，数达几百名的部队就必须悄无声息，快如闪电地通过敌人稠密的国境警备网进

入国内，消灭敌人后又要闪电般迅速撤出来，我们能不能打这种闪击战？第二，这次战斗不是单纯的交火，其主要任务是给国内人民增强胜利信心，因此我们必须一面作战，一面开展快速而强有力的政治鼓动工作，这一点能做到吗？第三，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创造一个革命军和地下组织为同一个目的进行联合作战的样板，这个能做到吗？”

可能是因为这三点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指挥员们一时沉默不语，屋里又笼罩了紧张的空气。

这时，权永壁粗重而有分量的话音，打破了寂静：

“司令官同志，我们能做得到，只管下命令吧！”

“有什么保证能做到？”

我深信权永壁不会作出叫人泄气的回答，可我还是这么紧问他一句。

“有，普天堡是祖国的土地嘛！”

我觉得这句回答不是我听他说的，而是我自己喊出来的。权永壁和我的心情怎么会如此一致呢？我想，其他同志也一定在心里作了同样的回答。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啊！

在异国他乡的风雨和酷寒中能连战连胜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给自己以生命和灵魂的亲爱的祖国大地上，还不能战胜敌人吗？

我们聚会虽然时间很短，但讨论了很多问题。可惜，当时的细节都早已湮没在长久的岁月里记不起来了，只有权永壁满有信心的回答“普天堡是祖国的土地嘛！”这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即将进军国内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的心里剧烈地翻腾着被剥夺了无比宝贵的祖国而做了亡国奴的悲愤。

二　普天堡的烈火（二）

我们在长白县十九道沟地阳溪，组编了向国内进军的队伍，并给全体队员都换上了夏季军装。军容整齐的长长的队伍从地阳溪出发了。老实说，我们的装束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好，这么整齐。

我们的这次行军，并不是一般作战时的转移，而是心怀亡国之恨，冒着异国风雨，转战于险峻山峦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为了在祖国大地上打出响亮的一炮而多年流血准备的征途。所以，我们怀着要去探望阔别多年的父母的心情，准备了最好的军装和装备，好让祖国的人民看到革命军威武的军容。

以前的军装，有的是随便缝制的。革命军的军装按例应该是专由缝纫队缝制的，但人手不够的时候，就动员居民地区的妇女来帮忙，所以，有些军装缝制得不合格。有时，着军装的和着便服的混合成为一个队伍，弄得军容很不整齐。

从决心向国内进军以后，我就决定按照司令部设计的式样，给部队全体成员缝制新军装。根据新设计的军装式样，帽子上缀了五角红星帽徽，衣领上还缀了领章。男队员穿的裤子是便于游击活动的略微改造的马裤，女队员则发了百褶裙或裤子。男女队员穿的上衣都和从前一样，是系领扣的制服。

我们决定缝制六百套军装以后，在杨木顶子，把包括缝纫队在内的后勤部门人员派到长白去了。当时在冒着种种危险，艰难地朝抚松远征的情况下，哪里有闲心去考虑军装之类的问题呢？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眼前的一两顿粮食问题，而不是军装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展望到进军祖国的那一天，有预见地布置了赶制几百套军装的工作。

吴仲洽和金周贤为完成赶制六百套军装的任务，着实吃了不少苦。

就吴仲洽率领的后勤工作组从西岗到长白的这一段路上所经历的千辛万苦，许多老抗日战士曾发表了回忆录，为这段经历作了证言，但其全貌还没有完全为世人所知晓。我们北上向抚松行军的时候，还是带着在鲤明水战斗中缴获的粮食出发的，可是吴仲洽所率领的后勤工作组向长白出发的时候，却连一升米也没能带上。队员们饿得难忍，又筋疲力尽，挪不动脚步。只喝几口水来垫垫饥，一两天还可以勉强支撑，但总不能疗饥。他们饿得实在难忍，只好改变方向，向断头山行军。因为他们想到或许可以在那里挖出断头山战斗时埋下的牛头来熬着吃，才这样决定的。

可是到埋下牛头的地点一看，野兽已把它吃个精光，只留下了骨头。吴仲洽他们用骨头熬汤喝，多少恢复了些体力。

饥饿威胁他们，寒冷也来威胁他们。他们穿的衣服，都被刀刃般的冰凌撕得一条一条的，露出了皮肉，简直要冻死了。

假如后勤工作组成员们忘记了眼前进军祖国的大业，就是一瞬间也罢，恐怕他们就会在抚松或长白的某一雪岭倒下去，永远起不来，埋没在积雪里。

据金周贤的报告，吴仲洽他们后勤工作组到达小德水时的模样确实是惨不忍睹的，见到他们的人无不流泪。小德水的群众把这些疲惫不堪的游击队员们领到自己的家里，用剪子剪开徒有其名的破烂衣服，给换了干净衣服。这时他们看到队员们身上净是冻凝的血块，就开始先用食盐水给伤口消毒，把毒气引出来。吴仲洽他们全都受了冻伤。

然而，使人惊愕的是，队员们稍一恢复过来，就马上都坐到缝纫机前面了。小德水的祖国光复会会员们和人民听到这一消息以后，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帮助他们治疗。游击队和人民打成一片，解决了必要的布匹，缝制了六百套军装。

朴永纯后来对我说过，在谈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军队和人民在车厂子所经历的苦难生活时，如果如实地说出来，我们的后代可能会不大相信，所以，有意地把最艰苦的一段略而不讲。看来，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没有直接体验过当年抗日革命时期的困难生活的人们无论怎样发挥想象力，也是很难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不知什么时候，我曾看过一本苏联的军事杂志。他们把苏维埃爱国主义规定为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我认为苏联人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看作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贯穿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性质和活动的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爱国爱民。我们不断地教育抗日游击队所有队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解放者和真诚的保卫者。只要是为祖国，死后化为一把土也在所不辞，这就是贯穿于抗日游击队生活的爱国主义的本质。

5 月底，吴仲洽带着新缝制的六百套军装来到了地阳溪。

我们的部队换上渗透着战友血汗的新军装，军容焕然一新，于 1937 年 6 月初，从十九道沟出发，路经二十道沟、二十一道沟、二十二道沟，到了离口隅水山不远的地方。那时，我们的向导是十九道沟人千凤顺。他说，前面的山岗就是燕巢峰台地，隔着鸭绿江与祖国的坤长德相望。

部队在口隅水山村休息一会儿，登上了燕巢峰台地。6 月 3 日拂晓，我们望见祖国参差不齐的山峰好像高兴地在迎接我们。

那一天，部队在这个台地休息。

金云信等先遣队成员在口隅水坝准备木筏桥。6 月 3 日夜，我们渡过了鸭绿江。

直到全体成员渡江完毕，还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因为敌人在国境线上的警戒稠密而又森严，布下了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线还嫌不足，又布下了第四道警戒网。北部国境地区有三百多个警察署和警察驻在所，只算这里的暴力镇压武装就有几千名，并拥有足够的机动手段。惠山警察署还组建了国境特设警备队，来防备朝鲜人民革命军进攻国内。后来，这一警备队队长大川修一坦率地承认，那是一支以“讨伐”游击队为主要目的的精锐部队。

在国境地区的警察驻在所、派出所建筑周围，挖了堑壕，筑了土墙，设了铁丝网、木栅栏等人工障碍物，形成一个堡垒，必要的地方还设有监视台，挖了交通壕。平安北道警察守备队拥有飞机和用机枪装备起来的两艘汽艇，还设置了探照灯。不用说人，就是老鼠和飞鸟的活动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据说，咸镜北道守备队也配备了一艘汽艇。还有的说，敌人给江岸的所有警察机关都配备机枪、探照灯、望远镜、

钢盔等等。看那气势，大部队进攻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敌人的国境警备再严密，也没能使我们踌躇不前。口隅水坝的流水声掩护了我们渡河。那流水声好似窃窃私语，在述说近代朝鲜民族动乱不定的种种悲哀。

我们毫不迟延地登上了坤长德。坤长德是郁郁苍苍的树林覆盖的平缓的丘陵。部队在这里布置好岗哨以后，宿营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就在坤长德树林里进行战斗准备，准备了布告、传单和檄文，也召开了指挥员会议，还派了侦察。到现场重新核实已掌握的敌情是重要的。于是交给马东熙和金确实到普天堡市街去侦察的任务。他们俩装扮成憨厚朴实的农民夫妻，利用种种借口，闯进各个机关，拉拉扯扯，搜集了情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非常具体，甚至连敌人在那一天夜晚要为调到别处去的山林保护区主任饯行的情报也搜集到了。

我们已通过各种渠道，对普天堡充分地进行了侦察。我们通过权永壁和李悌淳的线，还通过朴达的线，多方面掌握了敌情。

天黑以后，我们从坤长德下来。一到市街，队伍就分成几个单位，占据了各自的位置。

我把指挥所设在市街入口处一棵泥杨树下。从这里到主要攻击目标——警察驻在所的距离不过一百米左右。据说，在进行巷战的情况下指挥所离市街这么近的实例几乎是没有的。可以说，这是普天堡战斗的一个重要特点。指挥员们劝我把指挥所定在离市街稍远一些的地方，但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把指挥所定在每一瞬间都能掌握巷战

过程的地点，自己也要身临战斗的烈火之中，这是我的愿望。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战斗开始前在指挥所附近的一个农家前院，人们下象棋的情景。如果是扮作普通人搞地下活动的时期，我可能同他们搭话，还会给他们当军师出点子。

晚 10 点整，我高举手枪，扣了扳机。

这一枪声代替我们十多年来一直想对祖国同胞说的话语，响彻夜空。这一枪声，就像我们诗人歌颂的那样，是儿女们向祖国母亲献上的见面礼，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叫出来受罚的信号。

以我打响的枪声为号令，到处猛烈响起了捣毁敌机关的射击声。首先集中打击了这一地区警察的巢穴、所有暴力镇压和野蛮罪行的堡垒——警察驻在所。吴白龙的机枪向驻在所窗户无情地吐着火舌。当时我们还根据许多敌人集结在山林保护区的情报，同时向山林保护区进行猛烈的攻击。一瞬间整个市街像闹翻了天一般。传令兵接连不断地到泥杨树旁报告战斗情况。每当他们来，我就强调千万不要伤害人民。

过不久，到处火光冲天。面事务所、邮局、山林保护区、消防队等许多敌统治机关刹那间被火焰吞没。像挂了几个大照明灯的舞台一样，整个市街通亮。

我们的队员在搜索邮局时，发现了铁制保险柜里有很多日本硬币。部队撤退时，队员们把这些硬币扔到街道上了。吴白龙在警察驻在所缴获了一挺刻有敌伪“爱国妇女会”字样的机枪，当时他那高兴的样子，我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

我让金周贤带路，走进了市街中央。

这时，群众从各个院落出来。起初听到枪声，人们都不敢动弹，但后来听到我们的宣传员们喊的口号，都从各个街巷跑出来。诗人赵基天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像夜海一般起伏的人海”，他描绘得很恰当。

群众围着我们欢腾起来了。权永壁对我耳语说，看来要向祖国同胞讲话表示表示问候哩。

我环视了一下云集的人群，刹时犹如星光闪烁一般，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

我把帽子摘下来握在手里，把手举过头顶挥动着，向群众作了贯穿着必胜信念的抗日讲话。最后，我高呼：

“乡亲们，祖国光复的那一天再见吧！”

讲完话，我就离开了火光冲天的面事务所，想到又要同祖国人民离别了，心里感到很痛苦，像用刀剜掉自己身上的一块肉那样感到疼痛。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把自己心脏的一部分留在这个国境小镇。离开这里的心脏和留在这里的心脏，临别，在无声地恸哭着。

部队登上坤长德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没有口令，队伍却散开了，队员们一个个都掬起泥土来往背囊里装。指挥员们也怕落后似地都把祖国的一把泥土珍藏起来。比起国家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说，一把泥土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就是那一把泥土，却代表着三千里江山和她所养育的两千三百万人口。那是像整个祖国一样可爱和宝贵的。

今天我们只攻打了一个小镇就撤走了，但明天我们一定要攻打一百个、一千个城镇；今天我们只带着一把泥土走，而明天我们一定要解放整个国家，高喊独立万岁！

我们一边默默地在心里宣誓，一边渡过了鸭绿江。

普天堡战斗是既没有使用大炮，也没有飞机、坦克参战的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是一场步枪和机枪配合以鼓动演说的普普通通的袭击战。

敌人伤亡不大，我方更没有一个阵亡者。

因为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奇袭，几乎没有抵抗，有些队员甚至感到打得不过瘾。然而，这是一次最大限度地贯彻了游击战原则的战斗，从确定战斗目标、选择时间、出其不意的攻击，到激动人心的鼓动、活泼的宣传活动等，整个过程都衔接得毫厘不爽。

战争或战斗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军事上的意义，而且还取决于政治上的意义。我想，只要是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这一论断的人，是会很容易理解这一道理的。从这一道理上看，我们可以说，我们打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战斗。

普天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以亚洲的帝王自居，在朝鲜和满洲大陆横行霸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场大快人心的战斗。在朝鲜总督府当局曾夸口说治安维持得很好的国内，经人民革命军一击即打垮了一个面的统治机关，这给日本帝国主义者带来了很大的恐惧。可以说，日本人受到了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沉重打击。敌人说“像后脑勺受到了一次强力打击”，“颇有刈草千日，一火成灰之感”等，当时军警们的这些告白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曾经在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9]上控诉日本的罪行，向列强乞求过独立的朝鲜这个弱小国家，拥有给自诩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的革命军和这支革命军像一阵风似地越过日本帝国主义

筑起的“铜墙铁壁”，无情地惩罚了侵略者的事实，在世界范围也当然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通过普天堡战斗，使人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用刀砍成两段，放火烧就像稻草一样燃烧的废物一样的存在。在日月都失去了光芒的祖国大地上，照亮了普天堡夜空的烈火，是预告民族复苏的曙光。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京城日报》等朝鲜的主要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普天堡战斗的消息。

《同盟》通讯、《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日本的新闻报刊以及《满洲日日新闻》、《满洲报》、《台湾日日新报》等中文报纸，也都广泛地报道了这一战斗消息。苏联的塔斯社也报道了这一消息，《真理报》和《红旗》也为报道这一战斗消息提供了大幅版面。在东方殖民地弱小国家的边境响起的枪声，使全世界不禁惊愕和兴奋。这一时期，在苏联发行的杂志《太平洋》上刊登了以《朝鲜北部地区的游击斗争》为标题的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想，苏联的刊物可能是从这时起大力介绍了我们的名字和斗争消息。

世界语杂志《东方狮子》也刊载了介绍普天堡战斗的文章。《东方狮子》的发行宗旨，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性和掠夺性，传播抗日战争消息，宣传东方文化。刊物登载的所有文章，可以在各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一刊物有这样的特点，普天堡战斗消息就广泛地介绍到了这一刊物所发行的许多国家。

普天堡战斗向国内外广泛显示了我国人民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通

过这一次战斗，朝鲜共产主义者充分显示了在自己的整个活动中一贯坚持的彻底的反帝立场和自主立场，同时显示了坚决实践的能力和强大的战斗威力。

通过这一次战斗，我们还显示了主导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真诚的爱国者，是能够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是忘我精神和责任心最强的战士。同时，给朝鲜人民创造了全民投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轴的抗日革命的时机，提供了在国内能够大力推进党组织建设和祖国光复会组织建设的有利条件。

普天堡战斗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不仅给认为朝鲜已完全灭亡的我国人民显示了朝鲜并没有死，朝鲜还活着，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

这一战斗确实给国内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据说，吕运亨[10]听到朝鲜人民革命军攻打了普天堡的消息后，来到了战斗现场。看来，他听到这一战斗消息后，是非常兴奋的。

解放后，在平壤他和我见面的时候说：

“当我听到游击队攻打普天堡的消息的瞬间，我那在日寇统治二十多年来备受欺辱的亡国百姓的悲哀顿时化为乌有。那时，我到普天堡看了后，拍了膝盖，心里想，这下好了，檀君朝鲜[11]还活着，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

据安偶生说，普天堡战斗给金九[12]的冲击也很大。安偶生长期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里做过金九的秘书。据他说，有一天，金九翻看报纸时看到了普天堡战斗消息，十分激动兴奋，情不自禁地推开窗户，

反复高喊，倍达民族（指朝鲜民族——译注）还活着。

据说，那时金九对安偶生说，现在时局险恶，那些所谓搞什么运动的人一见中日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就销声匿迹了；就在这时，金日成率领军队，进攻国内，正面打击了日寇，这是一个多么大快人心的事件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临时政府该支援金日成将军了，在几天之内，要派人到白头山方面去。

这件逸事，是一个说明金九等国内外著名人士以这次普天堡战斗为转机，多么信赖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的好事例。这种空气为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普天堡战斗以后，不少民族主义运动者对我们有了好的印象。他们当时的印象，在解放后也继续保持下来，在为建设新朝鲜而进行合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说，普天堡战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

我在八道沟时期的难忘的朋友金钟恒说，他是在日本东京送报工读的时候，看到《朝日新闻》才知道了普天堡战斗的消息的。

有一天清晨，他到《朝日新闻》社分社领报，主人额外多给他一百份报纸要他去送。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打开报纸一看，才知道报纸上登载了金日成部队攻打普天堡的惊人的新闻。

金钟恒说，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攻打了普天堡的金日成正是八道沟时期的金成柱。

金钟恒身为知识分子，从听到普天堡战斗消息以后，开始感到苦恼。爱国青年们手持武器同日寇进行战斗，可我在日本土地上净做些

什么呢！难道为混碗饭吃而上大学念书是对的吗？他为自己这样的人生感到苦恼。

金钟恒的这种自我反省进一步发展到决心去找游击队的地步。他下了决心，就毫不迟延地离开日本，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一直为寻找抗日游击队而奔波。他回国以后，才知道攻打了普天堡的金日成正是少年时代的金成柱。他说，从那以后，投奔白头山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但是他的参军愿望终究没能实现。我们是在解放后相会的。

正如金钟恒的事例所表明，普天堡战斗使朝鲜有天良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照亮普天堡夜空的火光，是给朝鲜所有有良心的人和爱国志士照亮正确的人生道路的火炬。

三　地阳溪军民联欢大会

普天堡战斗后，走上归途的队伍一进入口隅水沟，队员们就通过指挥员向我建议要休息一天。我记得，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队员们向司令部要求休息的事是没有过先例的，如今提出这种建议，足见他们已经疲劳到何等程度了。事实上，这一向我们的指战员连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在坤长德过了一整天，因为激动兴奋，都没有睡，也没有感到疲倦。可是一打完仗，紧张气氛不知不觉地松懈下来，大家都希望能安静地休息一下。我自己也感到疲劳和睡眠的不足。

口隅水沟的农民见了我们指挥员，也劝我们好好休息。他们说，已经杀了猪，做好了打糕，可不能拒绝老乡们的一片心意。饿着肚子的队员们一听到有打糕和猪肉，都馋得忍不住了。甚至团政委也都插进来说，应当受领口隅水沟群众的诚意。

但是，我不能下令休息。因为越是这种时候，指挥员就越要提高警惕。如果因为越过了国境而松懈下来，就难免大祸临头。国境一带的日军守备队，准是早已接到紧急动员令，正在进行大调动，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支兵力，不知什么时候要向我们扑过来。看过去的事例也很清楚，敌人是一定会追击我们的。

究竟什么时候敌人会出现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呢？粗略地计算了一

下时间，觉得我们不能在口隅水沟停留半小时以上。而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要让几百名队员和运货人在短时间内吃完饭，是不可能的。

我叫人把战利品的一部分分给了村民，并让指战员都包些饭团装在背囊里，同时让帮我们背运东西来的普天堡群众的一部分返回去。然后，带着全体指战员和留下来帮我们运东西的群众上了口隅水山。不知怎的，我有一种预感，总觉得战斗就要在这座山上打响。口隅水山是斜度有六十度的陡峭的石头山，背着东西爬上去实在很费力。爬在前面的人只要不小心蹬下一块石头，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招致可怕的石崩。我叫传令兵白鹤林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滚下石头来。人人都用手托住前面人的脚掌推着他上，自己也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上爬。

到了山顶，也没歇一口气，我就开始部署兵力。根据地形特点，我们决定把投石战配合起来，让全体指战员都处处堆起了大石头，然后才拿出饭团当早饭吃了。这时，我朝山下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一大批敌人，正在从我们来的方向悄悄地朝山上爬。这是大川修一带领的国境特设警备队。大川是队长。敌人居然气焰嚣张地向我们逼近。当敌人距我们有三十米左右时，我发出了射击命令。顿时，高地上喷出了步枪和机枪的火舌，我也开始用步枪瞄着敌人打。

敌人肚子贴着地皮，穿过岩石缝，拼命地往上爬。这时候用枪打，是很难奏效的，于是我命令把石头滚下去。过去在小汪清防御战时在尖山打过一次投石战，这次在口隅水山又打一次投石战，其威力的确很大。

这场战斗，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的战斗力。打普天堡时，因为我们没有给敌人以反抗的空隙，所以战斗是以我们单方面的攻击结束的，

打得不够味。而这次口隅水山战斗则不同，敌人的进攻十分猛烈，是一场很过瘾的战斗。

我们的冲锋号一响，吴白龙像猛虎下山似地跑下山去，首先干掉了敌人的机枪手，夺下了机枪，然后把机枪高高地举起来，朝我挥动了几下。金云信跟一个身子魁梧的敌人格斗，终于缴下了敌人的掷弹筒。

从西边晚一些赶来的伪满军部队，看到我们给日军的打击十分沉重，吓得没敢参战。他们只是蹲在远远的地方观战，胡乱放了几枪。我命令机枪手也朝他们的上空放了几枪。每当伪满军在附近打转的时候，我们就朝他们放空枪，这是我们从间岛时期以来就坚持下来的一贯的做法，因为这是伪满军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就不“讨伐”革命军，朝我们上空放几枪就溜掉了。

这天，阻击队也击退了栗田大尉指挥的惠山守备队的进攻。

从普天堡帮我们背东西来的群众，都清清楚楚地目睹了口隅水山战斗的整个过程和敌人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狼狈相，对人民革命军的威势无不极口赞叹。当时他们所亲身体验的种种事实，后来成了无形的宣传资料。他们看了从普天堡到口隅水山的战斗，再一次确认了人民革命军无往不胜的战斗力，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日军自诩为“天下无敌”，但实际上真正天下无敌的是朝鲜人民革命军，而不是日军。对人民革命军在普天堡战斗和口隅水山战斗中显示的作战本领，日本人高木健夫[13]也表示佩服。

过后，朴达见到我时说，在口隅水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敌人，都失魂落魄，再也不敢出征了。据他说，从口隅水山死里逃生的“讨伐

队”里有一个跟他很熟的朝鲜人警察，是个眼疾手快的人。这个警察对朴达说，在往口隅水山爬的时候他发现了游击队的脚印，便断定山上定有游击队埋伏，于是装作重打裹腿的样子，有意落在了队伍的后头。果不其然，“讨伐队”刚爬到山顶，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和手榴弹炸裂的声音，随之传来了日军的惨叫声，他就立即往山下跑，藏在河边草丛中，直到战斗结束。他还自作聪明地说，是因为他施展了巧计，才没有丢掉性命。

在口隅水山战斗中奇迹般地幸免一死的国境特设警备队队长大川修一，据说前几年还活着，在日本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在晚年写了一篇追述当年吃败仗时的回忆文章。我看了他的文章，才知道他在口隅水山受了重伤，革命军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舌头。他受的这个伤，我觉得是十分奇特的。尽管后来经过长期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他那露着伤口的照片，我也欣赏过。同旧日本的许多军警一样，大川也不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皇道精神”的牺牲品而已。

我们在口隅水山和之后在间三峰取得的战果，巩固了普天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显示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战斗力。国境一带的敌人都在恐惧中战栗。敌人的文件上说他们在口隅水山战斗中消灭了“多数敌人”，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我军根本没有一人阵亡。敌人为了运走他们的尸体，到口隅水山附近各村去强拉民夫，肆无忌惮地抢走了人家的门板和被褥。总之，我们本来是准备到惠山去打的敌人，提前在口隅水山被我们消灭掉了。口隅水山战斗完全实现了我们当初准备通过惠山进攻作战要达到的目的。

口隅水山战斗后，我们同冲出敌人的包围安全返回的崔贤部队会师，其情景十分感人。崔贤的鞋子和衣裳都破烂不堪，但他一见到我，就敞开嗓门大声祝贺我们在普天堡和口隅水山取得的胜利，然后冲口问我：

“这回我们在枕峰附近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可是敌人又突然自行解围，逃跑了。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简单地告诉了他我们为援救崔贤的四师而去打普天堡的经过。

崔贤哈哈大笑道：

“看小子们撤走，我还以为是什么鬼使神差呢，原来是托了将军的福啊!真了不起!”

一提起敌人，他口口声声都叫“小子们”。这是他蔑视日本军警，给他们加上的卑称。

我对崔贤说，我很想见见四师的同志们，要他引我去看看。崔贤却摆出一脸苦相，说现在不是时候，不能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队员都穿戴不整，难看得很。

我把金海山叫来，命他给四师同志们发军装。我们在进军国内的前夕缝制了六百套军装，其中也有崔贤部队的。正如崔贤所说，四师同志们的衣着实在不像样。他们那破烂的衣裳和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的脸，仿佛在叙说着他们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的路程。崔贤换了新装，刮净了脸，才来找我正式汇报了别后的活动情况。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我们在地阳溪还同第一军第二师会合了。第二师也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向四师和二师同志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从侧翼和背后支援了主力部队对国内的进攻。根据西岗会议的决议分三个方向活动的各路

革命军部队，在原定为会合地点的地阳溪台地上会合，畅叙了战斗的友谊。披上了新绿的台地，像过节一样热闹，大家都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战斗的故事。

白头山地区的人民群众更是高兴异常，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革命军在贯彻西岗会议方针的过程中取得的胜利。从朴达的组织系统报来的汇报说，甲山、丰山、三水一带的男女老少都兴高采烈，欢腾不已，说革命军解放他们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

崔贤的汇报中有些异样的是，他们在袭击上兴庆水里第七积木场时，抓来了一个叫河岛的日本人。这个积木场是属于惠山木材所的一个分场，河岛是这个积木场的负责人。四师同志们把他带到地阳溪来，是因为他是个能讲一口流利的朝鲜话、娶了朝鲜老婆的令人感兴趣的人，同时也打算把他作为人质，搞一下经济募捐工作。

崔贤说，为了决定河岛的命运，他跟全光、朴得范等人争吵过，他们老对他施加压力，叫他处决那个河岛。他问我有何想法。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处决是断然不行的：

“因为河岛是日本人，就枪毙他，这是毫无道理的。尽管他作为在乡军人当了积木场的负责人，但如果他对我们的人民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要处决他呢？事关人命，必须慎重处理。”

崔贤表示同感。

那天，我见了河岛。没说几句话，就看出他讲的朝鲜话比我预想的还要流利得多。我问他怕不怕革命军，他说他起初害怕，提心吊胆，现在不怕了。他接着说：

“日本当局说游击队是‘土匪’，可是我跟着游击队过了这些日子，才明白他们的宣传是胡说八道。如果是土匪，一定会抢别人财物的，但我一次也没见过游击队抢掠。游击队只一心一意地为朝鲜的独立奋斗。战士们一连几天饿着肚子，也不到别人的地里去啃青。好不容易弄到点吃的，也是先让给战友吃。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是土匪呢！”

我给崔贤、全光和朴得范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河岛没有犯什么大罪，头脑也清醒；我们应当好好教育他对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然后送他安全地回去才好。

后来，据当地组织的通报，河岛回到积木场后说，“朝鲜游击队不是土匪，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它不是日本军队所能吃掉的弱者。他因此被传到了警察署，但他仍坚持说那都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无形中继续替我们作了宣传。警察当局最后给他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撵他回日本去了。河岛说的关于我们人民革命军的话，当时的朝鲜报纸也作了扼要的介绍。崔贤看了这个报，大声笑着说道：

“河岛吃了我们游击队的饭，他还真地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哩。现在我才明白了将军为什么叫我们放他回去。”

通过这件事，我再一次确信，不应把日本人一律当坏人看，应当根据他们现在的实际表现和思想倾向，慎重处理他们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

部队到达地阳溪的那天，十九道沟的区长李勋前来对我说，他们村里的群众为了热烈祝贺我们在普天堡和口隅水山取得的胜利，表表他们的心意，准备了一些便饭，希望我们去跟他们一起，也就是军民

一起吃一顿饭。听他说话的口气，不像平时那样请我们吃一顿家常便饭，而是要全村动员，大摆宴席来款待我们。我想我们有好几百名游击队员，即使每人吃一碗饭，对十九道沟群众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是不能给群众添这么大麻烦的。于是我劝李勋最好不要这样做。但这个一向乖乖听我话的李勋，却一反常态，耍起牛脾气来，一再恳求说，这是人民群众的一片心意，只能领受，不能推却，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说："将军，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而是十九道沟群众的一片心意呀，请您千万不要推却。要是我被将军撵回去，村里的人们，连老娘们都会骂我是窝囊废，扔石子儿打我的。这个我都能忍受，可是全村的人都将哭声连天，这可怎么办哪？"

听了他这番话，我觉得对区长的邀请实在是情不可却。如果不顾人民群众真诚的心意，就从地阳溪走了，群众该多么难过，游击队员又该觉得多么惋惜呀！

我对李勋说："既然这样，就不要到各家各户去吃顿饭就分手。干脆，把军民都聚在一起，尽情地联欢一下，怎么样？端午节也到了，就在那天以军民联欢大会的名义，在地阳溪台地上，大白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天下人都看看，这样才好。让军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互相鼓舞，交流感情。既要搞娱乐会，也要搞运动会，搞他个震天动地，让大家都撇开一切心事，欢欢喜喜地过好端午节。"

对我的这个建议，四师和二师的指挥员也都欣然赞同。李勋如愿以偿，乐得合不拢嘴。自从游击区解散以来，军民一起，举行联欢，这还是头一次。

定为军民联欢大会地点的德富洞，是李悌淳、金云信、马东熙、金周贤、池泰环、金一等同志开辟的革命村。它位于距县城有几十里地的台地上，是警察和区长都不敢常来的地方，其他敌伪统治机构也都离它很远，最近的派出所在隅勒洞，也离它很远，而且中间全是山路。我们决定德富洞为联欢大会的地点，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情况的。后来，德富洞有很多人加入了游击队。

我和五十多名指战员一起住在祖国光复会支会会长安德勋的家里。过去，李悌淳来到十九道沟最先拉上关系的就是李勋和安德勋。在普天堡战斗前后，我们都在安德勋家住过，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安德勋一家是支援游击队的模范；他弟弟安德洙也是个好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了积极的帮助。

德富洞有个姓宋的亲日倾向很浓的财主，他的人生观是不顾国家兴亡，只顾自己吃好穿好。我们的工作员了解到他家很富有，便把他跟李勋一起叫到安德勋的家里来，动员他们大力支援游击队。工作员之所以把地下组织的成员李勋跟他一起叫来，是另有打算的。只要李勋先答应愿捐多少钱，那个姓宋的地主就不能装聋作哑；再说，工作员对李勋吹胡子瞪眼，就能更有效地掩护他地下工作者的身分。果不其然，李勋一说他愿代表全村老乡捐多少钱，那个姓宋的也不好推辞，跟着答应要捐一百五十元钱。其实，他这是怕有后患，才不得已掏出钱来的。他掏了这一百五十元钱，十分心疼，决心报复，便向在派出所做事的舅子暗示安德勋的家常有游击队工作员来往。李勋得知这一情况，就和工作员商量，设法把安德勋送到了游击队，把他的家属也

都悄悄地送回了朝鲜。如果不采取这一紧急措施，安德勋一家肯定是会遭到灭顶之灾的。不是 1937 年夏天就是秋天，敌人放火烧掉了德富洞整个村庄，说它是“赤化的村子”。

我在安德勋的家同十九道沟的头面人物、二师和四师的指挥员一起商量军民联欢大会的日程，做了具体的安排。村里的青年们造了五十多个压面机。家家户户都和游击队员们团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有唱歌的，有讲故事的，十分和谐热闹。尤其是千凤顺讲的侦察普天堡的故事，不断地引起哄堂大笑。

1937 年 5 月底，千凤顺通过隅勒洞出身的游击队员金云信，接到了我们叫他侦察普天堡敌人的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情况的指令。他通过住在普天堡城里的亲戚，了解到警察驻在所有七名警察和一挺轻机枪，山林保护区有五名日本人，主任不日将被调走，城里住家大约有二百来户。但他觉得不经过自己亲自核实还不能完全相信。于是，他亲自出马来到普天堡城里，先在一个饭馆喝了些酒，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驻在所对面的杂货店，装作酒醉的样子，咕哝着“我兜里有一块钱来着”，并用那老打晃的手翻自己的衣兜。翻了一阵，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喊着“是嘛，这儿有一块钱嘛”，就跟女掌柜的要一盒“马皋”牌香烟。当时，这种香烟五分钱一盒，他交了五块钱，理应找回四块九毛五分钱，可是那个坏心眼的女掌柜以为他醉得分不清五块钱和一块钱的钞票，便扔给了他九毛五分钱。这正合他的意。他大声喊道：“我给了你五块钱，怎么只找我九毛五分钱？得再找我四块钱，”那个女掌柜的还嘴说：“哪来的这么个无赖汉，给了我一块钱硬说给了

五块钱，天下哪有这么耍无赖的，别罗唆，快给我滚出去！”这样，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一个说给了五块钱，一个说只给了一块钱，争执了半天，女掌柜的就吓唬他，说要叫他瞧瞧驻在所的厉害。千凤顺说，那好，到警察大人们那儿去请他们裁决好啦。女掌柜的以为驻在所会偏袒她，便兴冲冲地跟了出来。

他们两个走进驻在所，还继续互相破口大骂，争吵不休，各说各的理。警察们听了也摸不着头绪，只顾瞧热闹，看他们争吵。千凤顺边吵边偷眼核实了共有几个警察、几挺机枪和步枪。他把该探的都探好了，就跟警察说，我给的那张五块钱，是拦腰贴了窄纸条的，请警察大人去看看，要有这张钞票，我就赢了，要是没有，算是这个娘们儿赢了。说罢，就推着值日警察走出了驻在所。

他们到杂货店把装钱的盒子打开一看，的确有一张拦腰贴了纸条的五块钱钞票。可是那女掌柜耍赖硬说那是早晨别的顾客给的。结果，女掌柜的赢了。千凤顺走出店门时对女掌柜的说：“看你这个婆娘，吃人饭，说鬼话，多享福。”他嘴里一边骂她是心眼不正的婆娘，可心里倒很感激她，因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什么借口进驻在所去进行侦察了。

德富洞地下组织的成员听了千凤顺讲的这个故事，都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他们认为自己地下组织的成员为人民革命军在国内作战立了一大功，是值得他们引以自豪的大事。

当全村热热闹闹地准备着联欢大会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令人扫兴的侦察报告——伪满军的混成旅旅长扬言要“讨伐”人民革命军，并已率部从长白出动，正向韩家沟方向移动。于是我们同崔贤一道立即

迎上去，一举消灭了这股敌军。伪军混成旅被我们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其残兵败将更是魂飞魄散，他们自己给这条横七竖八地躺着同僚尸体的路起了个名字叫“狼牙道”。

这场战斗进一步提高了革命军的威信。缴获的战利品中有许多吃的东西，用作了联欢大会的食品。

在天气晴朗的端午节这一天，我们在地阳溪台地上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三支部队聚在一起，宽广的台地上人山人海。祖国光复会会员就有好几百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也派来了代表。为了保密，各村的区长把敌人的爪牙都事先支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联欢大会自始至终在自由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军民不分彼此，都坐在一起联欢。最令人高兴的是许多老大爷和老大娘也来了。会场中间摆满了许多食品，大家围着食品坐下来边吃边谈，十分热闹。群众准备的食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掺了艾草的米糕和掺了山牛蒡的打糕。

我和崔贤在李勋和安德勋的陪同下，同每一位老年人见了面，然后来到青壮年和妇女们面前，跟他们打了招呼，表示感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人民革命军的国内进攻作战。

这天，我们的一些女队员，穿着朝鲜民族服装(袄和裙子)参加了联欢。这些成天穿着军装的女队员，一时穿上民族服装，恢复了家乡时的模样，看上去都像仙女一样。她们跟村里的姑娘们一道荡起了秋千。树林里，人们唱歌跳舞，有的妇女在大盆里盛满水，再扣上葫芦瓢，兴致勃勃地拍打着葫芦瓢给跳舞的人伴奏。

我望着军民打成一片，在地阳溪台地上形成的花海，心中情不自

禁地想道，这些人平时都素不相识，今天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交织着火热的骨肉情谊，这说明了什么呢？敌人说我们孤立无援、势单力薄，实际上，我们是在舍生忘死地给予爱护和支援的人民的海洋上遨游的。地阳溪台地上的军民联欢大会，是人民爱护游击队，游击队保护人民，共同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抗日革命的缩影。

这天，我代表人民革命军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讲话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军民是不能分离的一心一体，因此革命军才能存在，才能百战百胜。除此而外，还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国内进攻作战的情况。

从国内组织派来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

各界人士讲话结束后，从隅勒沟来的一位老人，代表长白县祖国光复会组织向我们赠送了一面锦旗。在普天堡战斗时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的马东熙，受委任代表部队接受了锦旗。锦旗是用红绸缎做的，上面用金黄色的丝线绣上了字。这面不大的锦旗，是新兴村妇女会的会员和朴禄金在土豆窖里做成的，因为密探或军警随时都可能来搜查，所以派人在外头望风，窖里悄悄地一针一线地绣旗。女工作员朴禄金还有刺绣的本事，的确是令人惊疑的。

军民联欢大会最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是我们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多次举行的阅兵式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解放后于 1948 年举行阅兵典礼和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举行阅兵典礼庆祝胜利时，我都曾感慨万端地回忆起地阳溪台地上的阅兵式。

地阳溪军民联欢大会，是一次显示了伟大的军民政治团结的大联欢。

参加这次联欢的群众，在 40 年代前半期当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宣传

他们已经完全消灭了革命军的时候，都没有相信他们的鬼话。这证明地阳溪军民联欢大会给人民群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抗日游击队员也同样怀抱着人民群众绝不会放弃对革命军的爱护与支持的信心，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去找人民群众求得了帮助。

遗憾的是金哲镐等四师的几个队员因为断了口粮，来迟了，没能参加上联欢大会。这使我感到十分惋惜。过了多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过端午节的时候，我和金正淑把他们都请到我家来，一起欢度了佳节。

四　照片和回忆

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头一次拍照的地方，好像就是长白县的地阳溪台地。军民联欢大会即将结束时，好些同志建议要拍照，以纪念三个部队的会师。恰好，四师有一部照相机，于是把各部队的机枪都拿来排列在一起，人们就站在机枪的后面，拍了一张照。大家好像得了什么奖状似的，异常高兴。可是年纪小的队员们，拍了一张合影还不满足，还想照个单人相，又想跟全班一起拍个集体照，也有的想跟另一支部队久别重逢的好朋友合影留念。有些警卫员还因为不能单独跟我照个合影，急得团团转。

但是，那位冷酷的摄影师背起照相机就跑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要求照相的人多，而胶片却很少，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那是很明显的。

年纪小的队员们鼓着嘴巴走了。我何尝不想把摄影师再叫回来呀，只因条件不允许，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小队员们的心情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在那个年纪，谁都喜欢照相嘛。我也不例外。我小时候没照过几张相。在那连玉米粥都常常吃不上的穷人家里，还谈什么照相呢。那时候，万景台一带还没有一个照相馆。要照一张相，就得跑三十里地，到平壤城里的泵德街去。间或也有城内照相馆的人扛着有三

条腿的照相机到城外来的时候，但从不到万景台这样偏僻的村里来，顶多只到七谷转转就回去了。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曾给过我五分钱让我零花。我生平第一次拿到了钱，就径直跑三十里路进了平壤城。繁华的市街，马路两旁的商店和小摊以及市场上各种各样稀奇珍贵的货物，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的景象，使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挑贩的叫卖声，震得耳朵都嗡嗡作响。我不顾这一切，径直向照相馆走去，因为我很想照一张相。然而，要拿五分钱去照相，未免太天真幼稚了。我在收款处看到一些穿戴时髦的少爷小姐数着嘎巴嘎巴作响的纸币，才醒悟到我来的不是地方，便慌忙地跑出了照相馆。想拿五分钱尝尝现代文明的滋味，简直是白日做梦。走出照相馆的时候，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好像整个天下被金钱压塌了的幻觉，觉得我自己也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此以后，我每次到城里去的时候，都有意避开照相馆。

我在吉林的时候，也尽可能不跟照相馆打交道。电影院还偶尔去一次，照相馆却连瞧都没去瞧。吉林毓文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富家子弟，他们常到饭馆、公园或游乐场去吃喝玩乐，挥金如土。他们那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使我大惊失色。我是用母亲辛辛苦苦一分钱一分钱积攒—下来的钱刚够付学费的穷学生，最使我感到为难的时刻，是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拉我去照相馆或饭馆的时候。每当这时候，我就找个借口推却他们的邀请。

有一次，母亲给我寄来钱和一封信。信上说：

“这次给你多寄一点钱，你在生日照一张相给我。每当想你的

时候，能看看你的照片该多好啊。”

我只好照母亲的吩咐做了。听我弟弟哲柱说，母亲一想我，就把我穿过的破旧内衣贴在脸上淌眼泪。母亲是多么想念我这个儿子，竟然除了学费还多寄些钱要我照张相寄回去！我很快就去照了相，寄回抚松去了。当时的照片，就是现在仅存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单身相。把这张照片保存了几十年，当我国革命战迹地考察团到中国东北某地考察时交出这张照片的，是我在抚松时相处很亲密的妇女会会员蔡周善。在敌人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危险，把照片保存几十年之久，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从那以后，也曾有机会照过几张相，但大都遗失，没有多少保存下来的。只有穿着大布衫子同高在龙合影的照片，前几年才被发掘出来，通过我的回忆录与世人见面了。

我在吉林时拍的照片，不知经过什么渠道传了敌人的手里，被他们用来搜捕我。有一次，敌人的密探带着我的照片来到卡伦，问站岗放哨的少年探险队队员见过这个人没有。是这些少年立即通报我们来了密探，我才幸免一场灾难。那个企图害我的密探，被朝鲜革命军队员处决了。从此以后，我长期没有照过相。但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打消了对摄影的喜好。不时遇到的战友相逢、离别或喜庆的日子等，就令人产生想照个相留作永久纪念的欲望。

在我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拍照留作纪念的事情。在游击区的时候，也有过许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可惜，这一切都没有留下照片。这在当时是难免的。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过为将来需要留下什么纪念品或象征性的证据。因为斗争极其艰苦，紧急而重大的课题接连不断地落到我们头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问题。

但是，人处在大海孤岛上也照样过人的生活嘛，难道我们游击队就非过干巴巴枯燥无味的生活不可吗？

我看着年纪小的队员们因不能多照几张相而难过的情景，心中受到很大冲击。首先，四师有照相机，我部却没有，这使我不得不作了自我反省。长年累月生活在深山密林中一心一意干革命的队员们，同别人一样，也都喜欢照相，而且其渴望是那么强烈，这对早就与照相断了关系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天，我回到住处，跟几个指挥员说，年纪小的队员们为了照相，老跟着四师的摄影师帮忙，我看我们也该有个照相机了。我这顺便冲口说出来的话，却收到了惊人的效果。

1937 年夏，我们离开长白县到临江县六道沟密营驻扎的时候，在长白县做地下工作的池泰环有一天来到密营汇报工作，说他带来了一部照相机。听了这意外的好消息，我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他带来的照相机，跟四师的照相机一模一样，是个六寸版三条腿的相机。他还带来一个壮年的摄影师。显然，池泰环一直铭记着我随便说的话。

池泰环是金一在做地方工作时培养并送到部队来的。他跟金一差不多，不苟言笑，踏踏实实，不管什么任务，总像老庄稼把式一样默默地埋头苦干，完成得很出色。金一和池泰环，无论是性格还是言行举止甚至工作作风，都很相像。

池泰环缴获照相机的故事，像惊险小说一样饶有风趣。

他跟另一个游击队员金学哲一起去找十九道沟区长李勋，认真地讨论了如何缴获一部照相机的问题。李勋又跟当地祖国光复会会员们讨论了办法。之后，有一天，李勋来找池泰环，提供一项情报说，敌人为了发放居民证，要进行居民登记，正在准备给居民照相，把一部照相机带到了二十道沟警察支署。要是设法把这部照相机弄出来，既保证了游击队的需要，又能破坏敌人搞居民登记的把戏，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他们在东满实行的集团部落制度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搬到西间岛来，在西间岛开始搞起了户口调查、拍居民证照片的把戏。此外，还搞什么通行(停留)证、购物证等玩艺儿，妄图把老百姓都紧紧地束缚起来。从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人，没有居民证和通行证就不准居住和通行，没有购物证就不许购买粮食、布匹和劳动鞋等物品。如果没有这种证件的人买了这种物品，就给扣上“通匪分子”的帽子，一律抓起来关进监狱。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警戒森严的警察支署院子里的那部照相机弄出来。池泰环和李勋绞尽脑汁讨论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李勋到二十道沟警察支署去，装出一副沮丧的样子，愁眉苦脸地对署长嘟哝道：“什么事都办不成，快急死我了，这个区长也不再当了；那些庄稼人都目不识丁，脑子不开窍，告诉他们到警察署去给他们照相，不知说了多少遍，都说破了我的嘴，可他们就是不信，一见到我这个区长，就像见到了阎王爷似的，怕得瑟瑟发抖，真叫人灰心丧气。”

那个署长只是咋舌，说不出话来。

“那些乡绅老爷也跟着闹别扭。说什么十九道沟百里方圆好几百户人家，你把他们都拉到二十道沟去照相，谁来收秋啊！不收秋，去照相，吃什么，吃照片吗？他们都这样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你说怎么办？我可不管啦！”

李勋说罢，颓然坐在了椅子上。

“你这个区长也真糊涂。你找我来叫苦，叫我怎么办？办法应该由你这个区长想嘛！你说，真的没办法了？”

李勋要的正是署长这最后一句话。他装作绞尽脑汁苦思苦想的样子，憋了一阵，说道：

“这个警察支署，老百姓都怕得不敢来，再说，离十九道沟也确实太远了。我看，十九道沟的李宗述他们家就挺好，他家院子也挺宽敞，是个照相的好地方。干脆，到他家去照相怎么样？”

李宗述是敌人的爪牙。一有警察或官吏到他家去，他都百般献殷勤，招待他们大吃大喝。所以，警察和官吏都巴不得找个什么借口到他家去。那个署长听了李勋的话，立即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妙极了。这样，那部照相机就从警戒森严的二十道沟警察支署搬到了李宗述的院子里，并叫十九道沟的居民到这家来集合。

那个署长带着他的警察也来到了李宗述的家。不消说，李宗述马上为他们摆上了酒席。署长只命一个警察在院子里站岗放哨，自己带着其余警察入席开始大吃大喝。不久，站岗的警察也进屋入了伙。等到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闹闹哄哄的时候，当地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突然打开他们的房门大声喊：“土匪”来抢走了照相机！还战战兢兢地

说，前山后山都叫“土匪”占领了。署长吓得面如土色，却居然抽出手枪，摆起要冲出去的架势——显然是酒性鼓起了蛮劲。李勋阻止他说：

“土匪多得很，你一个人怎能抵得过他们呀。还是保命要紧，死了的宰相还不如一条活狗嘛。”

他接着把署长拖到后院，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入猪圈里，给盖上了一堆烂草。别的警察也都藏匿起来了。

与此同时，游击队员们来到院子里，向前来照相的群众作了鼓动性的演讲，然后扛起照相机，从容不迫、悠然自得地扬长而去了。

参加这次夺取照相机的队员把经过讲得活灵活现，我听着捧腹大笑，都笑出眼泪来了。

日本鬼子的秘密文件《关于对岸匪贼状况的文件》和《惠山事件判决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于小葡萄沟召集一百名居民照相时，一时三十分左右，出现了看来是金日成部队的一伙带手枪的人。他们对摄影师说：‘照相的目的是什么’，‘你是靠照相过日子的，你要是帮助我们，就放你回去，只把照相机交给我们吧。’然后，他们抢走了照相机和一打底片。”

所谓底片，是和今天的照相机使用的胶卷一样的东西，不过旧式照相机用的不是胶卷，而是玻璃底片。

池泰环同金学哲、李勋一道，圆满地实现了我们的这一愿望。

池泰环从敌统区带来的摄影师，名叫韩启三，入伍后游击队里都叫他李仁焕。他四十来岁，身材魁梧，膂力过人，是个适于过游击队生活的人。

我决心学好照相技术，以便必要时亲手给队员们照相。从此，我就单独跟摄影师学照相。李仁焕见我对照相技术很重视很认真，就问我，怎么为这个不足挂齿的事花费宝贵的时间？他教我如何掌握构图的艺术和底片感光的妙法，教的十分亲切热情，认真细致。自从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他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向我吐露了。他的言谈中，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的是关于“蘑菇串”的故事。他说他到了我们的部队，最先找的是“蘑菇串”。我问他什么叫“蘑菇串”？他说，把人的耳朵割下来串在一起就叫“蘑菇串”。敌人大肆宣传说，革命军抓了人就把耳朵割下来，像蘑菇一样串在一起晒干。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专门制造谣言的“宣抚班”，下设许多分科，到处宣传说游击队都是青面獠牙、头上长角的吃人生番。李仁焕说，前不久，他也相信了这种宣传。他说：

“游击队来到李宗述院子里的时候，我吓得盖上照相用的黑布瑟瑟发抖，以为这下定死无疑了，下意识地护住了耳朵。可是真地见了游击队，才知道全都是善良人。”

我了解到他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便劝他回去。可他反而一再求我，说孩子有他的妻子照顾，恳求我把他收下来。看他的决心真诚而坚定，就批准他加入了游击队。他一穿上新的军装，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连我都感到欣慰。

经过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后，我们吸收了许多工人入伍，把他们组织了好几个班，并任命李仁焕做了其中一个班的班长。

李仁焕入伍后照了很多相。他随身带着显像药，随照随洗。他很勇敢，很能作战，大家都喜欢他，爱护他，尊敬他。有一次，他得了

重感冒，躺倒了。大家都悉心照料他，睡觉时脱下棉袄给他盖上。我也把铺盖围在他的头边，坐在他身旁一面看书一面看护他，熬了通宵。

他醒来后握着我的手，淌着泪水说，为我这个不足挂齿的人，何必这样费心，叫我怎么报这个大恩呀！他说，他同我们一起生活，生平第一次受到了人的待遇，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在游击队里，即使用草根树皮充饥，也活得像人一样，昂首挺胸地过日子，这比当日本鬼子的走卒，吃鬼子的米饭要好得多。

有一天，他把照相机架在我的面前，仔细地替我整理着衣着，说道：

“今天您就让我实现我的一项愿望吧：我想给将军照一张单人相。”

他说，要给我照张相，把相片拿到国内去向同胞们进行宣传。我对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照我的相向天下公开，是违背部队纪律的，就等到革命胜利后再尽情地照吧，等解放了，我要请你给我拍头一张单人照。

他听了，眼里淌着泪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笑，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那既哭又笑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小哈尔巴岭会议后，从大部队活动转入小分队活动的时候，我们再次劝他回家去。但他没有回去，仍在部队里继续战斗，后来不幸牺牲了。

现在，我每当照相的时候，就时常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李仁焕正在我的面前端着照相机对着焦距。

李仁焕虽已牺牲了，但他照的相片，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一些，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在临江县五道沟密营照的合影和乌口江方面的女队员们照的相片，就是他拍照和冲洗的。

在五道沟密营的合影，是为纪念到国内工作的金周贤小分队回来而拍的。那天，本来是我要替他们照的，但警卫队员一定要我跟他们一起照，李仁焕也坚持要由他来照，于是我不得不仍戴着伪装用的黑色宽边眼镜跟他们一起合了影。

我和李仁焕照的相，可惜大都被遗失或烧毁了。当时，敌人一拿到我们的照片，就用来指名缉捕我们。我和我的警卫员们保存的照片，在林水山带“讨伐队”来攻打黄沟岭密营时全部遗失了。

过了几十年后，我们听说曾当过伪满洲国高级警察官的日本人加藤丰隆，还保存着当年我们遗失的一部分照片。他说，他原保存着我们的三张照片，其中一张已经遗失，现有两张，并公开了这两张照片。

加藤丰隆在其题为《满洲国警察重要图片及文献资料汇编》的文章中以《神秘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为题，写道：

“……用来缉捕金日成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图片，是作为实物充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极为重要而稀有的……”

他把当年的“讨伐”队员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金日成部队本部全体成员”这几个字样，也排在照片的旁边作了介绍。

这样，真实的历史就以栩栩如生的画面再现到人们的面前来了。这些照片上的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野人一样吓人的“匪贼”，而都是穿着一色的军装，英姿飒爽的革命军指战员，它如实地重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形象。

我们人民革命军的指战员中，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就牺牲的战友，是不可胜数的。

现在的情况则不同。有人牺牲了，就根据他立的功劳给予表彰，还发讣告通知他的家属，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战友牺牲了，也不能发讣告，更不能立一个刻有名字的墓碑。在敌人不时来袭击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战友的遗体匆匆掩埋在雪堆或石头堆里，甚至连这一点都来不及做到的时候，只得用松树枝草草覆盖上。

掩埋牺牲的战友，就是把火红的青春掩埋在荒野的泥土之下，令人心痛欲裂，想抓一把泥土撒下去都觉得像抬一块大岩石一样沉重。曾有多少连一张遗像都没有留在人间就与世长辞的战友啊！

同牺牲的战友作别，固然很难受，同活着的战友生离死别，也是十分难过的。这种时候，若能一起照张相留作纪念，该多好！最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年纪轻轻的女队员牺牲前未能把她们的花容玉貌拍成照片留在人间，当她们洒着鲜血倒下的时候，我们都悲痛难忍，心如刀割，五内如焚。她们留在世上的只有一个背囊，里面只有在一块布上绣上许多无穷花(木槿花)勾出了朝鲜地图的小刺绣品。把这个刺绣品盖在遗体上，再把泥土一把一把撒下去的时候，即便是大男子汉，也无不缠绵悱恻，双手发颤。

岁月无情，它使无数的往事变得支离破碎，稀薄淡漠，在遗忘中泯灭。无论是令人欢悦的事情，还是令人悲痛的事情，日久天长，都将逐渐淡漠，变得遥远而模糊。

然而在我来说，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每一个牺牲的战友。这也许是因为离我远去的人和送他远去的我都情意缱绻，难舍难分的缘故吧。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容貌犹如几百几千张

蓝图，清晰可辨。随着岁月的流逝，照片必然要褪色，记忆也必然要模糊，但唯独他们的容貌，却不知怎么回事，岁月越久，越生动地浮现在眼前，使我心潮翻腾不已。

在建设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时候，有些人建议立一个雄伟的纪念碑，碑上刻下革命烈士的名字。而我却希望把革命烈士们的容貌再现出来，好让抗日英雄们富有个性的面容重现在后世人们的面前。然而，大部分的烈士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所以，只好由我给雕刻家们描述每一个烈士的相貌，让他们把烈士的形相雕刻出来。

看了日本鬼子整理的有关“惠山事件”的资料，那里有好多抗日战士的照片。我记得好像是高尔基说过，穷人的照片只有在他犯了法的时候才能登报。我们的抗日战士也只在被铐上了脚镣时，才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照上一张相。

我们在抗日革命时期的模样之所以能够拍成几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全是因为池泰环弄来了照相机。而池泰环自己却从没有照过相。这个意志坚定，精明强干的地下工作者，是在“惠山事件”时被捕后才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被保存在敌人的档案里。他是被捆绑着照了相的，怒冲冲的脸侧在一边，充满敌意的目光直盯着地面。可见这位自尊心格外强的汉子，当时心中翻腾着多么强烈的仇恨！听说，他被判了死刑，依然泰然自若，还哈哈笑道：“我已经讨回了日本鬼子欠我的血债，现在死而无憾了。”

对我来说，不能成眠的夜晚居多。工作繁忙的时候是这样，尤其是想起那些没有留下一件遗物和一张照片就辞别了人世的烈士时，更是通宵辗转不眠。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随着年岁的增加，我对照相越来越重视了。到了工厂、农村，就跟劳动者和妇女儿童照相，到了部队，就跟人民军军人合影。有一年，曾去过延丰高等中学，花了半天的时间给学生们照了相。

现在，社会制度好，人和职业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谁，只要立了功就能获得荣誉，受到千万人的赞扬；无论到哪里，都能过上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在劳动中产生的歌谣和舞蹈，被搬到节日的广场或联欢节的舞台上去；灯火辉煌的不夜城的马路和公园，幸福的人们川流不息。这一切，半个世纪以前还像遥远的星空一样是缥缈的梦想。抗日战士的大多数没有看到这种世道就牺牲了。如果没有他们洒鲜血、抛头颅开辟了历史前进的道路，岂能期望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和明天！

五　间三峰战斗

军民联欢大会后，我们决定同崔贤部队分手以前一起攻打八盘道的集团部落。八盘道在间三峰附近，那里驻有三百多名伪满军“讨伐队”。

因为按计划进行了国内进攻作战，三支大部队会师后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我们的指战员个个士气高昂，有不少人还提出建议，趁三支大部队聚在一起的机会，再进行一次国内进攻作战，或者攻打像长白县城这样的地方，再显示一下人民革命军的声威。

但是，从军事观点上看，在刚刚打过普天堡的情况下，再返回国内作战，是不合适的。同时，在惠山方面的气氛不同寻常的情况下，也不能马上去攻打长白县城，需要深思熟虑充分准备，不能只凭血性和欲望去打没有把握的仗。攻打的对象，我最后选择了八盘道。

二师的同志给我们提供过八盘道的情报。他们来到我部密营的时候，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八盘道的情况。这以后，我们又在八盘道建立了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里有一个姓刘的，是当过伪满军士兵的人。他自尊心特强，因而遭到了上司的憎恶。他因为不满上司对他的欺压，投诚到我部来当上了班长。他也给我们具体介绍了伪满军营部内的详细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游击队打过敌人麇集的军事要冲之后，常常是立

即以金蝉脱壳的战术远走高飞。但是，我们打过普天堡之后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敌人也很熟悉我们的游击战术，很可能事先采取了对策。实际上，关东军考虑到我们会向抚松方面转移，在那一带的各个路口上都密密麻麻地部署了兵力。我们估计到这一点，没有用金蝉脱壳的战术，而是使用了立即回头蹲在敌人的鼻子下边不走的战术。

我们没有远离国境一带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在那一带帮助当地祖国光复会的工作，同时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掌握国内的情况，以便推动处在上升阶段的国内革命向前发展。因此我们一面缓缓地向八盘道方向移动，一面在所到之处召集工作员和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交给他们新的任务，也教给他们工作方法。

就在这时候，到惠山去搜集情报的李勋给我们送来了一封信。信是桃泉里的老人韩秉乙带来的。信中说，咸兴七十四联队分乘几十辆卡车突然开进了惠山，已在新坡开始横渡鸭绿江，负责带队“讨伐”的是穷凶极恶的朝鲜人军官金锡源。有的资料说，当时指挥咸兴七十四联队来“讨伐”的日军指挥官是名叫金仁旭的朝鲜人。但是，当时由国内和长白地方的地下组织给我们送来的情报都清楚地说明，从咸兴带领“讨伐队”出发的敌将是金锡源。

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肆宣扬，在咸兴火车站搞了一场闹哄哄的出征仪式。金锡源当场写下血书“武运长久”，把它举在头顶宣誓要为日本天皇尽忠。他还大言不惭地扬言要把金日成部队斩尽杀绝。为了虚张声势，不知羞耻地说他得到上级的信任，率部去“讨伐”，是因为他熟知共军的战术，人们不久就会看到七十四联队的

本事，在皇军的威力面前，共军将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败涂地。

金锡源的咸兴七十四联队经过惠山和新坡的时候，日本鬼子都搞了欢送仪式。爪牙们挨家挨户强迫群众去参加仪式；警察、日本官僚等头面人物以及在乡军人，都排列在街道旁唱着歌、挥着膏药旗闹腾了一阵。据说，“讨伐队”在新坡渡口渡江，用可乘三四十人的木船摆渡了整整一天，可见其兵力之大了。

如此详细的情报，都是李勋侦察得来的。他不是侦察员，却居然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确实令人佩服。当初接到侦察敌情的任务后，他决定扮作木材商打入敌人的内部。他叫十九道沟祖国光复会各分会的会长，在几天之内砍伐了好几百棵原木，用它编了木排。他还造了木材商的身分证。李勋曾当过八年的放排工人，有放排经验。他跟地下组织的另一个成员一起驾着木排去惠山。真是天从人愿，在半道上碰巧遇上了崔警部的叔父。崔警部是“惠山事件”时抓了许多爱国者的恶贯满盈的警官，逮捕了朴达的也是他。他的叔父年岁不小，一见到李勋运来了好几百棵原木，就要李勋卖给他几棵。李勋当即白送了他两棵，说崔警部大人的叔父要，怎能要钱呢。那个老头十分得意，还给李勋介绍了惠山城里的一个木材商。他说，那个木材商的女婿也跟他的侄子一起在惠山警察署做事。到了惠山，李勋去跟那个木材商见了面，互通了姓名，然后说，长白地方“土匪”多，很不好过日子，打算卖了木材，赚些钱，搬到惠山来住，希望他多加关照。李勋把自己运来的木材，都减半价让给了那个木材商，然后就住在他家里，也跟他的女婿、姓金的警察通了姓名，还为他们办了一桌酒席。李勋把

木材商和金警察请到饭馆喝酒的那天，那个警察喝了几杯酒，就来了兴致，透露了金锡源部队几日几时到达惠山的秘密。他说，由于普天堡事件，帝国威信扫地，为恢复威信，军部派了金锡源，听说这个人打仗还有一手；金锡源已提出保证，要消灭金日成部队，平定西间岛；结果会如何，只得等着瞧了，不管怎样，要跟金锡源部交火，共军方面非打一场苦战不可。

咸兴七十四联队开进惠山城里的那天，李勋身穿高级西服和夹外衣，扮作风度翩翩的豪绅，夹在欢送队伍里，仔细地查看了“讨伐队”有多少兵员、几门炮和几挺机枪。欢送仪式一结束，就立即渡过鸭绿江，派联络员给我们送来了情报。与此同时，张海友和金正淑派的联络员也带来了更详细的情报。这个联络员说，敌军渡过鸭绿江来到十三道沟，就藏踪匿迹，消失不见了，现在地下组织的成员全都出动寻找敌人的行迹。李勋的情报，和桃泉里、新坡的地下组织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把地方组织送来的情报综合起来看，这次来“讨伐”的敌军，大约有两千多人。

敌人把驻朝日军中最精锐的咸兴七十四联队都调出来进行“讨伐”，说明朝鲜总督的恼怒达到了何等程度。在普天堡战斗及其前后在国境一带遭到打击的敌人，在心理上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当时正是对中国关内的侵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格外注重后方的治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自称“铜墙铁壁”的朝满国境一带的人马被打得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似的，总督自然要怒发冲冠，大发脾气了。

形势证明，我们在西岗制定作战方针的时候，决定在国内进攻作

战结束后，分三路进击的部队重新聚拢，是很有预见性的正确措施。

敌人有两千人，力量比我们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避免同敌人交火的。当敌人的大部队攻上来的时候，我们迅速分散，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是游击战中通用的战术。而这一次，我打破这种惯例，决心正面对抗敌人，决定以大部队对抗大部队。

我们朝八盘道方向走了一程，停止行军，开始选择有利的战场。我直接攀到老马家西边的山上察看了地形，这是四面开阔的间三峰。间三峰，是位于从十三道沟到八道沟的一百乡里广阔大地上的西岗高原北边的三座山峰。从间三峰朝北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林中矗立着四登房山脉的峰峦。此地又名为毛杜德基。南边也是一片超过百里方圆的林海，在这叫做西岗高原的台地上依稀可见八盘道、老局所等村落。间三峰耸立在这原始的茫茫林海之中，像一座岛屿。敌人要想到这边来，就必须经过从十三道沟到西岗城的山弯和山巅，因此间三峰是最有利的战场。

晚上，召集指挥员讨论了作战方案，我强调指出，要主动地灵活运用游击战法，决不要被敌人拖入正规战法。为此，我们就要抢先占领山脊，把敌人诱到峡谷里来。兵力的部署也不要犯教条，要在敌人以为我们会不大注意的地方派重兵把守，战斗中要机智地利用树林，要见机行事，运动迅速灵活。

同四师、二师的指挥员订好了作战方案之后，清晨，我又同权永壁、金在水、郑东哲等我们召集到间三峰来的国内和长白地方政治工作员讨论了革命组织的工作方向和任务。

敌人攻上间三峰来的时候，正是在这天早晨。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四处弥漫着浓雾。从崔贤部队据守的山峰哨所先发出了信号枪声。我立即爬上了山脊上的指挥所。崔贤怕前哨队陷入敌人的包围，立刻带一个连队奔到了正前方。不料，他带的连队，转眼之间就被敌人包围了。

战斗的序幕打得如何，决定部队的战斗士气，因此，无论如何必须扭转当前的局势。我当即命令李东学带警卫连去援救崔贤的连队。日军把伪满军当作挡箭牌调到前头猛攻我们，崔贤连队和李东学连队相互配合内外夹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一阵猛打猛冲，崔贤部队终于突破了包围。

我们扭转了战局，就把敌人赶进峡谷，打了一整天。然而日军却像一群猛兽，十分猖狂。日军的冲锋，的确凶猛，他们跳过同伴的尸体，声嘶力竭地呼叫着，喊杀声不断，一拨接一拨波浪式地往上冲。过去在小汪清防御战斗时看到日军间岛派遣队的冲锋，觉得异常凶残，而这次咸兴七十四联队的冲锋比那次更凶猛。尽管我们用十几挺机枪交叉扫射，形成了密集的火网，敌人仍然黑压压地朝我们冲。这样的冲锋持续了一整天。当然，我们也打得很艰苦。有的地方，敌人甚至冲进了我军阵地，展开了白刃战。这天，雨不停地下，使战场显得更加凄惨。当时我曾想，这个军国主义怎么能把人变成如此野蛮凶残不知死活，像野兽一样呢？

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大肆宣扬的“大和魂”，大量驯养出了视非正义为正义，以恶当善的白痴；像飞蛾扑灯一样扑向枪口白白送死，却把这当作武士道精神，并引以为荣的愚氓；训练出了在别国人民的尸骸

堆上高举酒杯拍照作纪念的刽子手；相信自己死后天照大神会保佑他、天皇会祈祷他冥福、日本国民会永远纪念他的精神残废。日本的军阀和大臣们，把这样送了命的官兵比作一开即谢的“樱花”，吹嘘他们的“皇道精神”。日军的士兵们相信自己死了会为日本帝国的繁荣变成一抔底肥，其实这是极荒唐的幻想。“皇道精神”并没有把日本引向复兴，而是引向了灭亡。

游击队的指战员因为都从这种观点上看待日军，所以不管敌人多么凶顽地冲上来，也都满怀着革命者的自豪感和胜利者的骄傲感藐视敌人。

我们还有效地利用各种情况，狠狠地打击敌人。仗一直打到了傍晚。女队员们唱起了朝鲜民谣“阿里朗”，歌声很快变成了整个队伍的合唱。在激战中引吭高歌，是只有强者才能做到的。在间三峰战斗中响起的“阿里朗”歌声，显示了革命军的精神境界和乐观主义。敌人听了我们的“阿里朗”，心绪会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后来日军俘虏们坦白地说，他们听了我们的歌声，起初感到莫名其妙，接着便感到十分恐惧，最后觉得这个人生太虚无缥缈了；受伤的士兵慨叹着自己的境遇和身世哭了；有些士兵还逃跑了。

敌人尽管伤亡很大，天还下着雨，却直到傍晚仍不停止进攻。我们派人同到八盘道方面去执行侦察任务后回来的朴成哲小分队和筹粮工作组取得联系，命他们打击敌人的背后。金锡源一看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加上天也快黑了，便把二百来个残兵败将集合起来仓皇逃掉了。

间三峰战斗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崔贤的号兵金慈麟急于求成，把掷弹筒竖在大腿上发射，结果闹出了事故，大腿骨被反冲力一

冲，从髋骨脱了臼。崔贤闻声赶来大声呵斥了一通，就端起掷弹筒放了两下，消灭了挤做一团的一股敌人，然后转回身两手把金慈麟的一条腿使劲一拽，再往髋骨一头一推，一下子把脱位的骨头复位了。听说这天金锡源被我军的掷弹筒打伤了，是否属实，就不清楚了。

咸兴七十四联队的“讨伐”，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在间三峰战斗中幸存的日军败兵，有的没有回咸兴，径直逃到别的城市藏匿起来。据有关资料，有个姓界的日军士兵就没有跟着金锡源走，而是逃到清津市，开了个酒店，一直经营到日本投降为止。他觉得在间三峰战斗中没有丢掉性命是天赐的幸运，一有机会就对顾客们讲那次战斗的经过。他说，他虽是日本人，但会讲朝鲜话，因此才捞回了一条命。当时，长官驱赶士兵进攻，说什么变成鬼魂也要爬到山顶上去。界某怕得全身瑟瑟发抖，勉强爬到了山半腰。当日军快爬到山顶的时候，革命军一阵齐射，把日军一下子打死打伤了几十个人。界某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朝山下跑。就在这时，山顶上响起了“朝鲜人快趴下！”的喊声。懂朝鲜话的界某，一听喊声，就下意识地扔掉武器，立即趴在同伴的尸体旁边一动也没动。傍黑时分，游击队来打扫战场，收缴日军丢弃的武器弹药，也没有发现装死的界某，从他身旁走过去了。界某惊魂未定，觉得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一股厌战情绪攫住了他的心。他乘天黑，爬下山，匍匐着躲进了集团部落。

“我这个人，多亏会一点朝鲜话。可以说是朝鲜话救了我的一条命，所以我一直在下工夫学朝鲜话哩。”

这是界某在喝酒时常跟人们说的话。

由于界某的宣传，清津市内和附近一带都广泛流传着有关间三峰战斗的故事和有关我们的传闻。丢弃军职沦为小市民的一个原侵略军士兵的无意的表白，却收到了大长我国人民志气的效果。

间三峰战斗后不久，我们的人到战场附近的村庄办事，顺便详细地了解了敌人遭到惨败的狼狈相。

从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起，敌人在惠山、新坡和间三峰附近的村庄征调担架，牛车、马车和汽车搬运他们的尸体。据当地农民说，战斗结束后，间三峰及其附近的村庄都躺满了日军的尸体。敌人用白布裹了尸体，严禁老百姓靠近。他们害怕吃了败仗的狼狈相为世人所知。在报道间三峰战斗时也弄虚作假，说他们死伤人数寥寥无几。

金锡源为了攻打我们，从新坡横渡鸭绿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而败回去的时候只花了半个多钟头。

他们的死伤者太多，无法把尸体都运走，只把脑袋砍下来装在木箱或麻袋里，运到有汽车的地方，再把那些木箱和麻袋装在搭了黑布篷的汽车上，开过鸭绿江去。那些砍掉了脑袋的尸体就当场火化，火烧尸体的臭烟味弥漫山野，闹得间三峰一带的农民好几天都喘不过气来。

一个农民佯装不知地问一个搬运尸体的日本兵："老总，牛车上装的是什么呀？"那个日本兵煞有介事地回答说："戛保驾"。"戛保驾"是日语"南瓜"的意思。那个农民笑嘻嘻地嘲讽道："戛保驾大丰收喽，是做汤的好材料，请你们多喝吧。"从此，民间就流传开了"南瓜头"的说法。老百姓一看到日军的尸体，就讽刺地说它是"南瓜头"。

金锡源和他的残兵败将没敢经过繁华的惠山，而是悄悄地绕道新

坡和丰山回到了咸兴。他们出动时，咸兴站上搞了一场闹哄哄的欢送仪式，而回来时，咸兴站一片死寂，如丧考妣，凄凄惨惨。到站接他们的只有留守兵营的士兵，他们把头破血流狼狈不堪的伤员藏在队伍的中间，艰难地通过了大街。为了掩饰自己大败亏输的狼狈相，他们不得不演了如此寒酸的一场戏。

咸兴有个武德亭，是日军练击剑的练武场。自从间三峰战斗以后，这个练武场曾有一度没有搞击剑，新坡地方连打更的更鼓声都没有了。

在间三峰的惨败，是日本武士们无法洗雪的奇耻大辱；金锡源的名字就成了这一奇耻大辱的代名词。

普天堡战斗和紧接着进行的间三峰战斗，彻底粉碎了朝鲜总督南次郎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图们会谈”中为完全消灭朝鲜人民革命军而制订的“划时代的战略”。

我们于 1937 年初计划的大部队国内进攻作战就这样胜利结束了。

间三峰战斗，是在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中形成一个高峰的有意义的战斗。这场战斗，同口隅水山战斗一样，巩固了普天堡战斗的胜利。在口隅水山和间三峰上的激烈战斗，使普天堡战斗的胜利放出了更加绚丽的光芒。间三峰战斗和口隅水山战斗，可以说是普天堡战斗的回声。

通过这场战斗，我们彻底打破了日军是“无敌皇军”的神话，再一次向天下显示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威力。间三峰战斗，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白头山地区以后，在创造抗日革命全盛期方面占有显赫地位的重要战斗。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解放后我们的宿敌金锡源又在三八线上同崔贤相遇。崔贤当时在那里指挥警备旅。李承晚把金锡源派到三八线附近来，或许是为了让金锡源挽回他在间三峰吃了败仗的脸面吧。

据起义北上的“国军”士兵们说，金锡源在三八线上驻守时，常常极其下流地谩骂共产主义者。崔贤也一直伺机准备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战争前夕，金锡源突然越过三八线进行大规模的袭击。这导致了松岳山上的激战。他也许是妄图干掉崔贤，或至少要给崔贤一点厉害。崔贤勃然大怒，一举歼灭了入侵三八线以北的“国军”，然后追歼所剩不多的残兵败将，一直追到了开城。他要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追到汉城去捉拿金锡源。

我严命崔贤立即撤回来。对他说，金锡源过去作为日本鬼子的忠实鹰犬，来跟我们交火，而现在，他被美国主子牵着鼻子，弄不好，就会引起同族相残，导致全面战争；金锡源也是朝鲜人，总有一天会悔悟过来。

如今，崔贤、金锡源都已不在世了。代替他们的是没有尝到过亡国之恨的新一代，这些新一代被分割在南北，枪对枪地对峙在军事分界线上。我希望北方和南方的新一代人，早日摧毁把我们的民族分割成两半的人为的壁障，在自主的统一的祖国大地上和睦相处。金锡源在他的晚年也许怀抱过这种愿望吧。

六　带枪的少年

人民革命军在出没白头山地区后掀起的风波中，特别值得记载的又一个事件，是青少年的参军热。每当鸭绿江沿岸的森林或山沟里响起枪声，就有志愿参军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地找到我们密营来。

在要求参军者与日俱增的过程中，有过许多趣事。

有一次，一个蓬头黑脸的少年穿着一条湿漉漉的裤子来找我们。他纠缠着要参军，还说要替他哥哥报仇。他是从上丰德村来的。他说，他的大哥曾在村里指导青少年夜校，后来因为给游击队做过饭，被敌人发觉，便被抓去残杀了；二哥在普天堡战斗前夕参加了将军领导的部队，所以，他也要来参加革命军。这个蓬头少年名叫全文燮。

我跟他开玩笑说，穿着干衣服来的青年人还收不过来呢，像你这样穿着湿衣服来的淘气包还能收啊。全文燮辩解说，他穿湿衣服来，全怪他妈妈，并说明了原委。

当全文燮对妈妈说他要跟着来上丰德村的游击队走时，妈妈不准他去，说他还小，并在他睡着后，把他的裤子放进了水盆里。妈妈想，儿子没有了换穿的裤子，自然就没法去找游击队了。

全文燮心里好着急。因为他参加革命军的问题，是少年会组织已经决定了的。

其实，全文燮早有思想准备，只要能参加革命军，就是光着身子也要一口气跑到白头山去。于是，天还没亮就爬起来，从水盆里捞出湿裤子拧了一把就穿在身上，准备动身。事到如此，他妈妈也只好让他去游击队了。

从这件事可以想见，席卷以鸭绿江沿岸为中心的朝鲜北部国境一带和西间岛广大地区的参军运动，是以多么高的热情开展起来的。从全文燮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不光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青年，连十几岁的少年们也都参加了这个运动。

开初，负责补充队伍工作的指挥员一见来的是那样的少年，就二话不说，通通撵回去了。直到那时，我们队伍里没有一名战士或指挥员认为，十四五岁的少年可以拿起枪杆子在武装队伍里参加战斗。

比谁都喜爱孩子的金平，也一见那样的少年来就摇头。

1937 年夏，部队在地阳溪驻扎的一天，金平来问我，又有二十来个个子还没有步枪高的毛孩子缠着非参军不可，这事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要求我作决定。他说：

“我再三劝他们等长大些再来，可他们根本不听。最后竟提出要见将军……说不见将军就不回去，就这么死气白赖地缠人。”

我去孩子们等候的地方，同他们谈了话。我让他们坐在倒朽木上，一个挨一个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几岁啦，父亲做什么，住在哪个村里。我一问他们话，他们每人都像皮球弹跳似地站起来回答。他们在行动上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努力学大人的样子。他们个个都是由于敌人的“讨伐”失去了父母兄弟或目睹亲人被杀的孩子，他们是为了报仇，

才决心拿起枪杆子的。和孩子们畅谈了一下，觉得这些孩子们的胸怀里好像都有个老成人做主。

世道险恶，孩子们也会早熟，这话一点也不错。眼见的都是不幸，经受的全是苦难生活，弄得朝鲜的孩子们年纪虽小，却看穿了这个世间的内幕。革命，以非凡的力量和速度使人的思想意识激动和觉醒。有一位名人曾指出，革命是造就新事物的学校。这句话里确实包含着深奥的真理。

那些胸怀参军的抱负来到我们宿营地的二十多名少年，个个都是反映了苦难重重的我们民族史的一页的最惨的受难者。我看到这些年幼的孩子们竟自愿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恳求投入连大人都觉吃力的武装斗争，非常感动。

我记得那天同我谈话的孩子们当中，李乙雪、金益显、金铁万和赵明善也在内。如今，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次帅，有的是大将或上将。可是，那时他们曾是站在决定有没有资格拿起枪杆子的检验台上的毛孩子。

要拿这些少年怎么办才好呢？

真使我为难，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哄他们回家去。过革命军生活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如不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修养，那么连彪形大汉都感到难以支撑，甚至也可能变成落后分子。

我用如下的话来劝孩子们：

“我认为，你们要为父母兄弟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决心拿起枪杆子，这是非常好的。那是你们的爱国心的表现。可是，因为你们年纪还小，现在参加革命军是有很多困难的。游击队的大哥、大姐们

所经受的苦，恐怕是你们不能想象的。革命军在严冬里，在冰天雪地的山林里睡觉。有时，要一连好几天淋着雨行军。断了粮，就煮草根树皮或清水充饥，这就是革命军的生活。依我看，你们受不了这种苦，你们还是先回家去，等长大一些再来扛枪，怎么样？”

我说了半天，孩子们只当耳旁风。他们说，有信心忍受一切困苦，大人睡在冰雪里，他们也能睡在冰雪里；大人战斗时他们也会打仗。他们就这么缠着非要加入游击队不可。

那时我最迫切地感受到，我们若是有个军事学校该多好啊！

我想：如能把这些可爱的少年都收在军事学校里给予训练，锻炼他们的身心就好啦。独立军不是也曾在满洲许多地方设了旨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士官学校吗。不过那是在满洲还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霸占的时候。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日本帝国主义军队遍布满洲各地，他们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像独立军那样设立军事学校的空子。我想过，是不是可以在密营设一个培训班，这也不切合当时的情况。当时，世界的所有“晴雨表”都在暗示：日本鬼子为了在中国挑起第二次九·一八事变正在寻觅导火线。我们为应付这一情况，正准备进行大规模机动战。在这种时候，把这些年仅十来岁的少年们收在武装队伍里，等于要人们在艰苦的行军时多背上一个背包。

但是，看问题不能只想到不利的一面，如果那样，就只能叫他们回家去。说句心里话，那些孩子没有一个不合我的心意。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不比大人差。他们说的那些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人挨饿时，他们也能忍受饥饿。

比起那些口谈爱国的忧国志士或口云草露人生，得过且过的背叛革命的叛徒和堕落分子，这些一心要求参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少年们的灵魂有多么高尚，他们是多么热忱的爱国者哟。其实，对这些要求入伍的少年的爱国行动，应该在决定是否吸收他们之前，先给他们献上花束哩。

我很想把这些满腔斗志的少年培养成堂堂的战士。虽然不能马上让他们站到战斗队伍里，如能想个好办法，就可以在一两年间把他们培养成健壮有为的后备军。在一两年内，这些少年如能都成长为不亚于老队员的战斗员，这该是多么大的收获呀！

我想，只要老队员们横下心，少睡点觉，少吃点饭，下些功夫，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强悍的战斗员。我又想，另组织一个少年连，条件允许时就在密营进行训练，部队机动时，就带着他们，通过实战来教育和锻炼他们。也就是说，要组织一个既是军事学校或军政干部培训班，又结合实际进行实战教育的特殊连队。我决心把这些少年收在部队里，便让他们写决心书。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是真的想当游击队员，就在今晚写好决心书，要写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军；参军后打算怎样生活和战斗。是否批准，要看了你们写的决心书后，再作决定。

金平和大部分指挥员一听我这么说，显得很不安。他们说，从马鞍山带来的孩子就不少了，负担挺大，如果连他们也收下来，困难就更大了。

第二天，我看了他们写的决心书，果然都写得挺好。不会写字的

孩子也找别的孩子替他们写了决心书，对此我没有挑剔。因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只是说，大家的决心书都写得挺好，孩子们就雀跃着欢呼起来。

我把连政治指导员以上的指挥员召集到司令部，正式宣布要以从马鞍山来的儿童团员和从西间岛新来的孩子们另组织一个少年连，任命吴日男为连长，女队员全姬为司务长(司务长是和今天的人民军士官长一样的职务)。

吴日男原是直属司令部的机枪排排长。他枪法好，在管理队伍方面也很精明。他具有不同寻常的耐性和斗志。从他在口隅水山战斗中的表现看，确实是一个具有很大耐性的人。在那次战斗中，他中了敌弹，可是他却一声没哼，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部队到了地阳溪，才发现他的军服渗着血，大家都说是受了重伤。脱下他的上衣一看，果然还有一颗子弹嵌在肉里，子弹头刚刚能看出来。可是吴日男还在发笑。

因为没有军医，就让大力士姜渭龙按住他的身子，我用镊子费了好大劲才把子弹拔出来。没用上麻醉药，就那么硬给他做了手术，可是他连哼都没哼一声。拔出子弹后，给抹上了擦枪用的凡士林，然后下令把他送到后方去。吴日男一听，便说：“受那么点伤，大家何必这样啊。敌人马上要追上来的，让机枪排长离开岗位，这成什么话。”他到底没有到后方去。我相信，吴日男的这种斗志一定会给少年战士们以很好的影响。

司务长全姬也很不简单。虽然她的年龄与少年队员差不多，但却很有点骨气，像刚刚熟透了的一粒小金豆。金哲镐很了解全姬的家庭

情况，曾说全姬是在十岁时砸毁爷爷针筒的愣头姑娘。

原来，全姬在十岁时失去了母亲。他的爷爷会扎针，常给村里的人们扎针治病。可是，没能治好儿媳妇的病。年幼的全姬想，没能治好妈妈的病，责任全在爷爷的那个针筒上，于是她便用石头砸毁了那个针筒。爷爷为此大叫大嚷地骂她，她呜呜地哭着说："连妈妈的病都治不好的那个针筒还留着它干什么！"爷爷一听这话，就把她抱在怀里伤心地哭起来了。

第二年，全姬又失去了哥哥。她哥哥是游击队员，有一次他同两个同志一道去敌占区工作，不料三人都被敌人逮捕。敌人把他们拉到局子街后山上处以死刑。三位战士受敌人恶刑，弄得血流骨折，还是愤怒地控诉敌人的罪行，最后高喊"革命万岁！"英勇就义。

年幼的全姬同村里人一道目睹了这一情景。她为哥哥的英勇就义深受感动。敌人向群众狂叫："看吧，反对日本的家伙下场都是这样的。你们还想革命吗？"群众沉默着。突然，年幼的全姬用清脆的声音喊出"革命万岁！"敌人大吃一惊，成群地跑来殴打全姬。后来全姬到了游击区，大人们问她，"那时你怎么喊了万岁呢？"全姬回答说："我很想像哥哥那样死去。既然要死，就要喊革命万岁！"

全姬这句纯朴的告白，表现了她视革命贵于自己生命的气概和胆量。

全姬那种不怕死的、大胆而勇敢的性格一定会成为少年队员的表率。

我相信，全姬和吴日男一样，也是带领和照顾少年连战士的很合适的人选。

我宣布成立少年连后，有不少指挥员对司令部的这种做法感到惊

讶。有不少人在想：那些孩子不会成为我们的拖累吗；我们有可能被他们捆住脚脖子; 那些小鬼是否经受得住连大人都难以经受的考验呢。

我行使司令官的权限组织少年连，是为了尽可能快些满足少年们要求参军的愿望。

首先，少年们对革命所抱的热望和他们要为父母兄弟报仇的决心使我深受感动。我在同那些少年们谈话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如何培育游击队后备军的问题，并且做了这样的打算：以少年组成特殊的军事组织，或许会成为解决培育后备军问题的一个途径。

我回顾过去那些年龄同现在的少年连战士们差不多时参加游击队的曹曰南、李成林、崔金山、金泽万、白鹤林等传令兵走过的道路，相信这些从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孩子们也能像大人一样担当起抗日革命的重任。

我们组编少年连队以后，立即给他们发了军装和武器。武器大都是与他们的个子相称的三八式马枪。他们穿上崭新的军装，扛上了武器，都高兴得欢蹦乱跳。现在一想起当时少年连队的孩子们那个高兴劲儿，仍感到十分惬意。

我们在给吴日男和全姬交代任务时说，带领少年连队暂时在地阳溪台地上进行训练，然后再移到七道沟富厚水密营去进行集训。为了让少年连队在一两个月内熟悉游击队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动作，我亲手拟了一个速成训练大纲交给了吴日男。他看了大纲后说，难度大，恐怕孩子们吃不消，但愿意试一试。

从第二天起，少年连队就在地阳溪台地上开始了训练。当时我正

研究对付中日战争的方针，十分忙碌，但我还是经常抽出时间去指导少年连队的训练。我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还告诉他们，要想早日熟悉军人生活，就要搞好制式训练，要想练好射击本领，练习瞄准时就要把靶子当作敌人的胸口，等等。

在地阳溪训练两个星期后，为了召开会议，我们动身前往小白水密营，命令吴日男把少年连队带到富厚水密营去继续训练。

当真把这些毛孩子排到行军序列里时，又不免有些担心。那次行军是很艰苦的，虽说他们都是些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但还是叫人不放心。

富厚水密营是比较安全的后方密营，是理想的训练基地。这里储藏着足够少年连队吃两三个月的粮食。这是我们事先叫金平在富厚水建立密营时准备好的，这给少年连队的生活帮了大忙。

当我们在富厚水附近六道沟密营指挥对敌后袭击的时候，少年连队正在富厚水密营进行紧张的训练。我在初水滩和小白水开过会后到密营去看他们的训练情况，一眼就看出他们比在地阳溪时大有进步，这证明组建少年连队的设想是很正确的。他们的茁壮成长和飞快的进步，使我感到十分满意。

有一天，全姬来到司令部，没头没脑地悄声对我说："将军，出问题啦。这事该怎么办好啊？"她告诉我少年连里个子最小的一个小鬼每天晚上因为想家哭泣。

我一听说有人哭，心里不禁一惊。游击队员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说小孩子想家，不会有人感到奇怪，可是为此哭起来，就该当别论了。

据全姬说，从连队走过八道沟河以后，那个小鬼就开始忧郁起来。

问他有什么事，他说离家越来越远，心里难受。看样子，在参军时，他可能认为部队只在他们家那一带活动，一看行军路程离家越来越远，心里就忍不住了。

我对全姬说，不打不成才嘛，你要对他管得严一些。全姬真地把那个小鬼叫到面前厉声地批了一通。不想，这一着反而引起了副作用，小鬼顶嘴说，放他回家去。

我把那个小鬼叫到司令部，问他真的想回家吗？他不回答，只是眼睁睁地望着我。我对他说：

“你实在想回家，就回去好啦。可是，从这里到十九道沟恐怕有几百里地，你能走回去吗？”

“照原路回去，能走到的。”

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他不是有意挑剌儿，心里早有打算。

我叫全姬用背囊装了几升少年连备用的米拿来递给他，说：

“那你就回去吧。要走远路，该带点吃的东西，你就把这个带去吧。”

他知道这是连队的备用米，便圆睁着眼睛说：

“不要，我把它带走了，连队吃什么呢？我是一个人，会想法弄到吃的。走到玉米地里，摘一两穗玉米吃也行嘛。”

“那不和小偷一样了吗？让你把这米带走，就是怕你做出那种事。你好歹过了几天游击队生活，就该懂得这点道理。你说对不？带走吧。”

“我不能为了自己，让大家挨饿。”

小鬼说什么也不肯背上那个背囊。

“这些道理你都这么清楚，你怎么就没想到，丢下在山上流血战

斗的同志们，一个人回家去是可耻的行为呢。我本以为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哩。”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小鬼突然哭起来了。

其实，这些孩子从其年龄上来说，还是应该受到父母照顾的时候。

从这里也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民族的苦难的一面。

可是，现在如果让这个小鬼回家去，后果会怎样呢，会不会对其他的少年队员产生影响呢？

我对小鬼提起了他们当初加入游击队时写的决心书，然后开导他说：

“俗话说，大丈夫一言重千金。可你把自己的誓言像路边石子一样抛掉。一个人这样对待自己的诺言行吗？一旦拿起了枪杆子，就该打到底，打败了敌人再回家嘛。那样，父母才会更高兴的……”

小鬼下决心说，再不想回家的事了。

也许就是因为经过这一番波折，在那之后，我对他格外照顾和爱护。我发现他的优点是具有同志友爱的精神。他想的是，尽管自己挨饿，也不能拿走连队的备用米，这是可以同洁白的雪或百合花相比拟的纯洁美丽的同志友爱的精神。

我认为，同志友爱是验证一个革命者的品质的试金石。它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格的核心，所以共产主义者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它又是道德的基础，是共产主义者区别于别的人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如果一个人没有同志友爱，他的人生就会像没有基础的构造物一样倒塌。同志友爱精神强的人，即使有缺点，也有勇气去克服。从那个小鬼身上发现的就是这一点。

整个部队对少年连队员亲如兄弟，经常帮助和照顾他们。每个老队员都包教一个少年队员。这样，少年连队的每个队员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保护者。

最认真、最积极的保护者，还是少年连队的负责人吴日男。他总是为防止少年当中出现落伍者而费心。有一次，我看到他替“小新郎”金洪洙用包脚布包脚，心里很受感动。那时，吴日男对金洪洙说，洪洙，你在娶媳妇这件事上算是我的先生，可是在使包脚布上，要算是我的学生。所以，不用害臊，要虚心学习。可是，等到我娶媳妇的时候，你就得当我的先生啦。于是“小新郎”便把一只脚完全交给吴日男，仔细地瞧着连长给自己包脚的动作。吴日男比别人更细心地照顾金洪洙的生活，是为了不让他一个结了婚的人被别人说他的短处。

女队员们对少年队员特别爱护，为照顾好他们做了极大的努力。她们每个人也都分担照顾两三名少年队员。女队员做事很细致，而且周到，经常教给他们怎样整理背囊里面的东西，怎样做饭，怎样点篝火，怎样使针线，怎样除掉脚板上的水泡，等等。总之，一切日常生活中常要做的事情都耐心地教给他们，对他们关怀备至。

照顾少年们，仅次于连长的积极分子是金云信。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了他负责照顾李乙雪的任务，他一有空就把李乙雪带在身边，教他练习瞄准，这对别的老队员也有很好的影响。多亏有这样的帮助，李乙雪后来成了神枪手。再后，李乙雪加入共产党的时候，金云信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行军时，老队员们也负责带领少年队员，随时教给他们一些行军

的知识。如夜里行军，要紧跟上前面的人，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如有异常现象，要即刻报告指挥员，休息后开拔时连小纸片也不许丢下，等等，这些常识都是老队员在行军时教给他们的。

为了少年连队，我也竭尽了精诚。

每逢渡过水势汹涌的河流时，我总是把少年连队的小鬼们背着过河。“小新郎”金洪洙也曾叫我背着过河。人们逗他说，娶了媳妇的人，还像小孩子似的，多不像话。可是这位天真的小新郎却满不在乎。每当同少年队员一道行军时，我就成了碎嘴人，总是对他们说：“注意，前面有大树”，“有水洼，要跳过去”，“注意，要过河啦”等等。

少年队员们肚里总是感到饿。游击队的饭食当然比不上家里的饭菜。有一次，带着他们从长白向临江行军时，因为缺粮，常熬粥喝。每当喝粥那天，他们总是饿得发慌。炊食队员每次都另给我端粥来，我总是端着碗到少年队员的饭桌上，把粥分给他们一些。

平时很冷静的司务长全姬有一天找我来，哭丧着脸说，求您再不要那么做，老是把粥分给他们，司令官同志的身体怎么受得了。要是总那样，我们也不吃饭了。

我劝慰她说：

“全姬同志，请你不要为我太担心。我饿着点，出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少年队员们就不同嘛。他们那年纪就是咽下石子儿也能消化的，他们还缺点锻炼，干什么都觉得很吃力。老给他们粥喝，该多饿得慌啊。在这种时候，我们不照顾他们，谁来照顾他们啊。”

我为少年连队队员的进步，下了最大功夫的是思想教育工作。我

一有时间，就做他们的讲师。一开始，教那些不识字的孩子认字。少年们对名人传记很感兴趣，我就常给他们介绍名人传。我还给他们讲了我国沦亡的历史。他们当中，还有梦想着像安重根、尹奉吉、李奉昌那样带着手枪或炸弹去干掉日本天皇或朝鲜总督的空想家。我对那样的空想家们说，靠恐怖行动是不能争取国家独立的，要以武装斗争为轴心进行全民抗战才能光复祖国。要想使这样的少年对我们的革命路线有个正确的认识，得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行。

从长白到临江的行军途中，我们进行了几十次战斗。可是，我一次也没让少年连队参加。我只让他们在离得稍远的地方观看老队员们和敌人战斗的情景。有一次，一个少年队员在战场上被流弹打中负伤。那个少年伤痛起来就直喊爸爸。那时，我心想：如果那个孩子的父母看到儿子中弹负了伤，该多么心痛。于是，我对吴日男说，他们是要继承革命事业的宝贝，要爱惜他们，好好照顾他们。我们把少年队员看成金玉一般宝贵，很是爱惜他们。但是，并没有当公子哥儿那样娇惯他们。做错了事，就严加批评，还让他们同老队员一起生活，经受锻炼。

有一天晚上，我巡视宿营地时，发现少年队员们脱鞋睡觉，这是违反纪律的。我们在制定宿营纪律时，有一条规定是禁止战斗员脱鞋睡觉。在时刻都可能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游击队生活中，如果因为不能忍受一时的不方便，脱掉鞋或衣服睡觉，这等于是自杀行为。所以，我们的指战员们在宿营地总是穿着衣服和鞋，抱着枪，枕着背囊睡觉的。为的是一旦有事，能保证行动敏捷。

那天晚上，我狠狠地批评了全姬。我对她说：

“用那小小的人情不可能把少年们培养成好战士。万一就在这个瞬间敌人袭来，那些脱鞋睡觉的少年们该怎么样呢？他们就可能伤了脚或冻了脚。那些孩子的父母把儿女托给了我们。我们就要怀着亲生父母、亲哥、亲姐的心情照料他们。眼下就是有点心疼，不忍心，为了将来，必须按照原则严格要求他们……”

那天晚上我对全姬的批评，使她受了极大的冲击，在过了好几十年后的一天，她对担任我们军队副总参谋长的赵明善说了如下的话：

“你还记得那时因为你的脚，我挨批评的事吗？”

赵明善立刻领会了当年的司务长的话意，感慨万千地说：

“当然记得啦。那时因为我在宿营地脱鞋睡觉，叫你挨了一顿批……那是在革命道路上迈着第一步的少年连时期呀。那时吃了不少苦，可是很令人怀恋哩。”

无论谁对小时经历的苦难和得到的关怀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对那时的回忆就像永不熄灭的灯光温暖地照耀着人生之路。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去，当时十四五岁的少年如今已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可是他们总没有忘记待他们像亲兄弟一样的同志们。

在老队员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我们的少年队员很快地成长起来了。他们开始要求跟老队员一道参加战斗。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新房子战斗。从此他们和老队员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激战。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尽管我们事先多方面地嘱咐，告诉他们上百项注意事项，可一打

起仗来，少年队员们也会干出大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来，让人为他们手捏一把汗，或叫人失笑。平时看来挺沉着的少年，一投入战斗，脑子就发起热来，顾前不顾后，毛手毛脚。有的少年依托隐蔽物开枪觉得不得劲，竟立起半个身子打枪，老队员一发现就抓住他的后领狠狠地给他来个屁股蹲儿。

有一个少年队员不小心，新帽子给篝火烧坏了，只好光着头过了一些日子。他非常想戴帽子，便在和敌人遭遇时，还没把敌人打死就先去抢他的帽子，险些没送命。还有一个少年队员站岗时发现一只獐子，就忍不住放了一枪，弄得整个部队来了个紧急集合。

在艰苦战斗的年月里，少年连队立了不少战功。艰苦卓绝的游击队生活使他们发扬了一般情况下想象不到的非凡的智慧和勇敢精神。

有一次，全文燮、李斗益和金益显三位少年队员，在执行联络任务的途中和伪满军小部队遭遇。敌我同时发现了对方，自己若不抢先下手，就会被敌人包围或全被俘虏。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小战士们趴在草丛里，学着大人的嗓音粗声粗气地喊:“一连向左，二连向右!”一面喊口令，一面瞄准射击。结果敌人没敢开火，逃之夭夭了。小战士们胜利地完成联络任务后回到了部队。

重要的是，他们立了这样的功回来，却不当一回事，没有人表功。因此，部队里没能及时了解到这种情况。连我自己也是在听了吴日男连长的汇报后，才知道了三位少年的壮举。

少年队员们在思想品德上也大有长进，他们都尽力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一切问题，为减轻老队员的负担，从各方面进行努力。

刚成立少年连队的那年秋天，金益显在篝火旁睡觉时烫伤了小腿。

加上他又害了眼病，受了很大苦。因为他眼睛不好使，每当行军时，老队员就扶着他走。金益显虽然小腿疼得厉害，怕我和老队员操心，忍着痛，一点也不表现出来。我很快察觉到他为烫伤受苦，给他送去了药。当我看到他的伤痕时，对他意志之刚强不禁佩服。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少年连队队员们超越了年龄和体力的局限，几乎和老队员一样英勇善战，在武装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日本军警曾说，对经历过少年连队的游击队员提也不要提。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和少年连队出身的游击队作对。

让我再讲一个小小年纪的金成国，在金一的帮助下加入游击队的故事吧。

金一因做地下工作在间三峰山脚一个村子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得到那里的祖国光复会会员金相贤的帮助，做了很多工作。金相贤把金一藏在他家草棚里过了三个月，并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他的工作。这位金相贤是个单身汉。他在妻子死后，因为无法养育三个孩子，都送到别人家当了长工。那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就是金成国。

金一为了帮助这可怜的一家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心介绍金成国参加游击队。有一天，金一去找在地里除草的金成国，把写给我的介绍信递给他，叫他去找我。就这样，少年金成国扔下锄头，穿着土布衣裳来找我，加入了游击队。

金成国从小受苦长大，他眼疾手快，胆大顽强，比别人先学会了射击，先领会了游击队的行动规程。过了几个月，又被选为机枪手吴

白龙的副手。金一对他抱着深厚的感情，经常深切地关怀他。

记得那年我们在松花江边度过严冬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时，金成国是狙击队成员。有一次，他在篝火旁烤脚，因为感到脚烫得慌，便脱下了鞋。不巧，正在这时敌人扑过来了。雪上加霜，机枪手吴白龙又不在场。金成国按着指挥员的命令，急忙跑到冰封的松花江上，架起机枪，进行猛烈射击。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是光着脚投入战场的。

他正全神贯注地进行射击时，感觉似乎有人在后面拖他的脚。他生气地朝后一瞧，出乎意料，是金一撕下内衣在给他包脚。这时，金成国才想起自己是因为来不及穿鞋才光着脚投入战斗的。打退敌人后，金一责备他说，这成什么话，你是想把脚给冻掉怎么着。

战斗结束后，金一回来对我说，金成国扛着机枪跑在冰封的松花江上，在后面一看，他那脚片踩在冰上一步一个咔嚓声。在冰天雪地里，扛着机枪光脚跑在冰上的金成国是不同一般的人，而冒着弹雨追到战场，撕下内衣为年少的机枪手包脚的金一也不是普通的人。如果那时没有金一给他包脚，金成国一定会把脚冻坏，变成一只折了翅膀的鸟。

后来，由我和金一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小分队活动时期的种种故事很好地说明他是多么忠于革命的战士。40 年代前半期是检验每个游击队员的革命性的考验期。在这形势十分严峻的时期，金成国毫不动摇，英勇善战。他多次接受地下工作任务，出入国内。有一次，他一个人潜入罗津市内，由于小小的疏忽被警察盘查。原委是这样的：他走在街上，下雨了，便到商店买了一把伞，谁想那是一把女用阳伞。他是在佳在水山沟饱受苦难和折磨长大的，哪里会辨别雨伞和阳伞呢！

他打着这把阳伞，在街上行走，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因为他的举动看着可疑，过路的警官指着那把伞问他是从哪里偷来的。金成国照实回答说，是从商店买来的。警官又问，为什么买来女用伞。他撒谎说，是邻居的大嫂托他买的。

不管怎么说，警官还是把他拉到警察驻在所去挖根刨底地盘问。金成国真想抓起椅子打翻警官逃出去。可是一想，如果那样做了，他就再也不能在市内进行地下工作，别的工作员来接替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罗津。

抓了金成国的警官出去巡逻的时候，另一个警官又来审讯他。这个警官拉开抽屉，发现了前一个警官从金成国手里没收的好几百块工作费，就起了歹心，便把金成国放了。

第二年夏天，再度去做小分队工作时，又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危险。

他完成任务后回基地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展开了枪击战。他身上多处受伤。因为他藏在山谷草丛里，敌人没有发现他。我派出以任哲为负责人的小组去找他。小组在山谷里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濒死状态的金成国。受了多处重伤的金成国能活到那个时候真是奇迹。据说，他失去知觉前，一直啃着草。

金成国回到训练基地后，我们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把他送到苏联的一个野战医院去了。他在那里住院一年，恢复了健康。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们都诚心诚意照顾了他。特别是，他的专任护士姑娘说他是朝鲜游击队不死的神鹰，给他输了血，不分日夜、不知疲倦地护理了他。

那个护士姑娘是德国人。她的父亲是反法西斯战士，父亲被希特勒匪帮枪杀后，她和母亲一道亡命苏联。姑娘敬重金成国这个东方弱小民族的战士，为他竭尽了精诚。只要是为了治好他的伤，不管什么事她都乐意去做。帮他出入厕所，替他洗脸，给他喂饭。金成国的健康进入恢复期，姑娘为了增进他的食欲，在家里用鸡肉做好可口的饭菜给他送来。

他出院那天，姑娘的母亲来到医院，邀他到她们家去。她们挽留他说，病人出院后去疗养是常理，就在她们家住些日子保养保养再走。金成国接受了她们的好意。

姑娘的母亲是当地美术学校的教员。在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条件下，她养了几十只鸡，还栽培了多年生的辣椒树。她们母女每天都为金成国宰一只鸡做多种多样的饭菜给他吃。一有时间，她们就求金成国给她们讲朝鲜游击队的斗争故事。最使她们感动的是关于十几岁的孩子们投身于革命的暴风雨中的故事。她们对少年们参加游击斗争，感到很神秘。姑娘的母亲说，要把朝鲜的英雄战士画下来介绍到欧洲去，因此常给金成国画肖像。

在金成国养伤的日子里，姑娘通过他了解了朝鲜的现状和历史、朝鲜的革命家和人民。姑娘从认识金成国时开始，对朝鲜产生了感情。

她常说：“我听了关于少年队员的事，就相信你们的国家一定能取胜。你们一定会战胜日本。”

金成国离开苏联回部队的那天，她们母女和苏联医生们一道，把他送出很远很远的地方，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

临别时，她们母女要送给金成国一个存有一大笔钱的存折作纪念。可是金成国推辞了，没有收下。姑娘的母亲说：

“你应该再休养一些日子。可是，我们不想再挽留了，因为我们知道留不住你。拥有你们这样战士的朝鲜革命一定会胜利。”

我听了金成国的汇报，为德国姑娘和她母亲对金成国的国际主义感情，深受感动。后来，我们让金成国带着钱和猪肉去到她们那里，以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感谢。

少年连队是一座极好的思想锻炼的熔炉，是一所宝贵的军事政治学校，这一点从金铁万的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金铁万是“烟斗老头”李东伯在地阳溪一带做小分队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小鬼，后来跟着“烟斗老头”来到游击队加入了少年连队。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禁为难地数落“烟斗老头”说：“你把这么个还没有枪杆子高的小毛孩子带来，叫我怎么办呀？”而李东伯却护着那孩子说：“他哪是小毛孩子啊，已经十七岁了嘛。个子虽小，心里可装着个老头子呢。”

我起初以为金铁万对“烟斗老头”瞒了自己的岁数。在我看来，他只有十二三岁，所以我劝他说，爬不上的树干脆别往上瞧，趁早回去吧。

金铁万却嘻嘻笑着说：“将军，请别小看我，我个子虽小，可样样农活都干过。”他说着还挥起了胳膊，他的胳膊果然筋肉突起，比别的孩子壮实。

他入伍后，样样事情都带头做；少年连队解散后，他到七团当了吴仲洽团长的传令兵，执行任务非常认真负责。吴仲洽牺牲时，他哭

得最伤心。吴白龙继吴仲洽当了团长以后，他为保护吴白龙，特别用心。在小分队活动时期，他一直跟随着吴白龙的小组，经常出没在苏满国境和豆满江一带，机智勇敢地进行了团结反日抗战力量的政治工作和对敌军事要冲的侦察活动。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后来成为军事指挥员的金铁万，在抗美大战中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不仅在第一次南下时打得好，而且在敌后也打得很出色。他指挥的团，在杨口、春川、加平、通川、浦项、青松、军威等江原道和庆尚北道一带方圆一千多里的广阔地区纵横驰骋，从背后接连不断地打击了敌人。当时，敌我双方一进一退，拉锯战打得异常激烈，闹得杨口地方的农民无法收秋，都急得团团转。金铁万解放杨口后，立即召集郡里的干部，从容不迫地先组织了秋收。这样，杨口郡的群众跟金铁万的团一起，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全部收割了地里的庄稼。

我听人说，金铁万一有机会就说，自己能够成长为深受党的信任和爱护的军政干部，全靠领袖的栽培。如果领袖没有吸收他加入少年连队，像亲生父母一样爱护他和培养他，他肯定仍然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山村樵夫或庄稼人。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

那些没有被编入少年连队，但年龄跟他们差不多大就拿起枪杆子在游击队里战斗的小战士们，也都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金炳植是十五岁上在隧道建设工地做工时，只身找到游击队参军的。参军后，他当了文朋尚和崔春国的传令兵，因为他机智敏捷，指挥员们都很喜欢他。

金炳植常被派到敌后去工作，并多次立功。他经常吹着口哨渡过警戒森严的豆满江，他出没于雄基(先锋)、罗津、会宁等朝鲜北部国境城市，就像到邻村串门一样。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国内搜集的敌情资料对我们准备解放祖国的作战给予了很大帮助。祖国解放前夕，金炳植不幸被敌人逮捕。日本刽子手知道了他所做的工作对他们帝国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就像把定时炸弹埋在他们帝国的根底一样，于是判了他死刑。后来，可能考虑到他还未成年，才减为无期徒刑。

金炳植是西大门监狱里年龄最小的“囚犯”。他常被拉出去做杂役，每当这时，他就来往于权永壁、李悌淳、李东杰、池泰环、朴达、徐应珍等人的牢房，给他们做联络。敌人企图使他归顺，施展了拷问、威胁、怀柔等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革命气节坚强的战士。

在抗日革命战士中，参军时年岁最小的是李宗山和李五松。李宗山十一岁加入抗日联军第三军，成了游击队员。

李宗山来找革命军要求如伍时，审查他的是第三军政治主任冯仲云。冯仲云看他年纪太小，就告诉他革命军不能收他，劝他回家去。老实说，十一岁参军过戎马生活，是不合情理的。加上，李宗山个子又小，年龄可以瞒一两岁，个子却是瞒不了的。可是，李宗山简直像个水蛭叮人一样缠着冯仲云不放，终于得到了参军的许可。

入伍后，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他聪明机智，眼疾手快，工作积极，部队的指战员都把他看做亲兄弟，爱护他，关怀他。他在第三军长期做传令兵，有一阵还在金策和朴吉松部队当过传令兵。

记得是 1943 年，金策把李宗山介绍给我，说他是一个可以当副官的好材料。从此以后，李宗山就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至今仍不能忘记的是金策在闲谈时讲到的李宗山出生时的情景。李宗山的家原住在平壤八洞桥，我在彰德学校念书时，他家迁移到满洲去，他母亲在开往沈阳的列车上生下了李宗山。当时他母亲别说给孩子做一个襁褓，就连一块尿布都没有。同车的旅客们把一分、两分钱凑起来送给了他母亲。他母亲用这点钱勉强给他做了一套小裤袄。

解放后，李宗山同孙宗俊等人一起，当了我的副官很多年。他刚被任命为我的副官时，就立即戒了烟，为的是不影响我的健康。一下子戒掉抽了十多年的烟，可不是容易的。

我们在青沟子给第三军派军政干部的时候，其中包括着汪清游击队的班长、吴仲洽的弟弟吴仲善(吴世英)。吴仲善到第三军当营的政治教导员，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右手的食指，每当他抽烟时，都由李宗山替他卷烟，还跑到别的抽烟人那儿去对火。要对火，就要把烟对在别人的烟上抽一两口。这样日久天长，他就不知不觉地上了瘾，成了烟鬼。

他戒烟后，我有时偶尔送他一支烟让他抽，可他从来没有接过我的烟。他这种戒烟的毅力，使我深受感动。

跟我们一道经历了千难万险的少年游击队员中，还有 1936 年春天带领女兵排来到迷魂阵的太炳烈。他是十五六岁时加入朝鲜人民革命军扛起了枪的。他有个外号叫“小辣椒”，意思是说他个头虽小，却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作战英勇而果断，日常生活也很有规律。他入伍

后参加了庙岭战斗、金仓战斗、间三峰战斗、木箕河战斗、大蒲柴河战斗、大沙河—大酱缸战斗、额穆县城战斗等无数次的战斗，立下了不次于老战士的值得自豪的战功。他的百发百中的射击本领，就是在这些立战功的实战中磨练出来的。他同李龙云团长一起打入敦化县一个集团部落，一眨眼之间就消灭了三十多名伪满军的战斗故事，至今仍为抗日革命战士们所津津乐道。因为他是英勇喜战的干将，老战士们也都不敢小看他。

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当过安吉、全东奎、李龙云等军政干部的传令兵。很多军政干部都愿意他来自己手下工作。

他当传令兵时，对保卫指挥员的安全特别关注。每当指挥员要奔向有危险的地方时，他就张开双臂挡住去路，像一阵排炮似地说，将军要求你不要冒险，可你这样做，对吗？全东奎团长在大沙河—大酱缸战斗时牺牲，就是因为没有听他的话，冲进了弹雨之中的缘故。

安吉曾经说过，在一次战斗中幸亏听从了太炳烈拽着他的衣襟要求他不要冒险的话，不然他也肯定会像全东奎一样牺牲了。

小哈尔巴岭会议后参加小分队活动的太炳烈，在汪清县一个树林里突然与敌人的大部队遭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太炳烈受了枪伤，一颗子弹打进他一条腿的骨头缝里，怎么也抠不出来。因为流血过多，他常常昏厥过去。不久，伤口上生满了蛆虫，惨不忍睹。若不及早动手术，就有连肠子和膀胱都会化脓的危险。然而留在密林里担任看护的姓王的队员，别说动手术，连起码的医学常识都不懂。

太炳烈把小刀在石头上磨得雪亮，用它给自己动手术。他把小刀

插入伤口使劲一扭，立刻淌出了浓浓的脓血，接着挖出了烂肉和夹在骨缝里的子弹。多亏他这种冒险，终于使自己摆脱了死亡。

第二年在汪清的工作地点，太炳烈的战友们见了我，还活灵活现地讲述太炳烈自己动手术的经过，都赞叹“他是个硬骨头”。所谓硬骨头，是比喻意志坚强的人。我认为他们对太炳烈的评语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自己为自己的伤口动手术，除了具有非凡的果断和勇气的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我了解到他是个意志坚如钢铁，作战英勇如雄狮，为革命利益奋不顾身，忠心耿耿，坚持原则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他一向坚持原则，对不良现象毫不妥协。他最憎恶的是宗派分子和军阀主义者。正因为他骨头硬，党性强，像金昌凤那样的军阀主义者都不敢对他随便指手画脚。

太炳烈不仅在抗日战争时立了战功，在祖国解放战争中也战功赫赫。战后，他作为我的副官，在我身边忠实地辅佐了我的工作。

俗语说，少时之苦金不换。太炳烈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成长为一个革命家，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拿起了枪杆子。只要从小就参加革命的武装斗争，就能成为一个不怕赴汤蹈火的铁骨铮铮的革命者。

时过半年，少年队员都成长为不亚于老队员的战斗员。他们进步之快确实惊人。他们很快都具备了做一个军人的条件，于是 1937 年底，我们就解散了少年连队，把他们都分配到别的连队去了。从此，他们由预备军人变成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员。

出身于少年连队的游击队员，没有出一个叛变者或落伍者。这证明，他们是多么忠于党和革命、祖国和人民的。当法西斯党徒们在地

球的东边和西边作最后挣扎的时候，也就是祖国解放前夕的艰苦卓绝的年月里，他们一直忠心耿耿地和我一道进行了小分队活动。在建设新朝鲜的日子里，他们有的成了师长，有的成了团长，同革命前辈们一道组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把美国的将军和坦克赶入陷阱沟，打得落花流水。

人民军最初的总参谋长姜健也是在十六岁时参加革命军的。他三十岁时成了总参谋长。1948 年末他曾到苏联去访问。到机场迎接他的苏联大将和元帅等高级军事领导人看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这么年轻，都不禁大吃一惊。

姜健回国后谈这件事时，我笑着说：

“如果我在场，就会告诉他们，你从小就是出名的军人。”

我从组织了少年连队后，就把生理上的年龄和精神上的年龄分开看待了。在这两个年龄当中，我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年龄。在青少年时期，精神上的年龄会在一年里长两三岁，甚至四五岁。

在开拓国家命运方面，青少年教育是又一个天下之大本。少年连队的经验表明，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后备军的工作，着手越早越好，搞得越出色越好。

七　革命情义

西间岛和白头山地区抗日革命斗争的每一项宝贵成果，都是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革命越深入发展，敌人破坏革命的攻势也越猖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中日战争后，尽管被沉重的战争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们还是把现代军事科学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和通过几十年暴力统治与扩张领土练就的法西斯镇压手段全都调动起来，拼命地扼杀我国革命。但是，他们的任何镇压，任何阴谋诡计，都未能阻挡我们的前进。

敌人企图靠实力扼杀我国革命，我们则用灵活的战略战术、靠智慧、靠同志式的团结与革命情义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敌人越疯狂地进行暴力镇压，我们就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敌人越要从思想上瓦解我们，我们就越加强革命队伍在思想意志上的统一和道义上的团结。

道义是人所固有的道德观念。在旧社会，正派的人也重视道义，把它视为做人的根本标志。

但是，旧社会的道德规范，提倡的是这一方束缚那一方，而那一方无条件服从这一方的不平等，它是压制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制动器。旧社会的道德规范，未能提出爱民、为民这样的进步要求。

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破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的人际关系和道

德规范，创立了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并把它作为财富传给了后代。

在抗日游击队中支配上下关系、同志关系、军民关系的，是以爱护与信任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情义。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法律。但是，如果认为用某种法律就能控制人们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尽无休的实践活动，那就错了。法律不是驾驭现今世界的万能武器。人的思维和活动中，有不少法律所不能控制的领域。难道法律能控制爱和友情吗？假若法律机关颁布一项法令，强迫你从今天起爱谁、和谁交朋友、娶谁做妻子，那么，这个世上的人们会怎样接受这项法令呢？单靠法律的力量，是不可能总揽世上万事的。代替法律解决法律所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的，就是情义和道德。

我们是从争取同志开始革命的，并用加强同志式团结、深入群众加强同他们的血肉联系的方法，不断推进革命的。同志爱，不仅现在是，而且过去也是决定我们革命成败的重要生命线。朝鲜共产主义者走过来的几十年的光荣斗争历程，也可以说是同志爱和同志情义的发展史。

我们的队伍不是为投机致富而麇集起来的乌合之众，而是抱着争取祖国的自由与独立的共同志向和目的而凝聚起来的革命者的集体。思想和宗旨的共同性，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那些同床异梦、阳奉阴违的人可以容身之地。

重视同志友爱、同志情义，这是视集体主义为生命的我们队伍的存在方式，同时又是它的本质要求。抗日游击队员们为了得到一支枪、一袋米或一双鞋，也大家动脑子想办法，共同出力气。在这过程中，

他们坚定了“万死不辞，坚决打敌人”的革命信念，创造了“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起”的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伦理，导出了“团结就是胜利”这条真理。

抗日革命，是人类未曾经历过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其艰苦与激烈的程度，是其他任何时代的革命都不能相比的。我们在漫长而曲折的行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比几代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还要多的。

抗日游击队员越是碰到重重的困难，越是面临严酷的考验，就越是高呼着同志式团结的口号，依靠同志友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我们用革命的情义和团结的战略去对抗敌人企图孤立和扼杀我们的战略。

在抗日革命时期的同志情义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情义。自从朝鲜革命的统一团结的中心形成以来直到今天，我们一贯特别注意加强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并为领导者和群众从道德与情义上结合成为浑然一体的关系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所重视的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与古人所提倡的“君臣有义”不同。所谓“君臣有义”，是说君臣之间应当重情义。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一心一体”这句话来表现。领导者为群众服务，群众为领导者尽忠诚，这就是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朝鲜式的共产主义情义。

过去，新一代的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者推举我作统一团结的中心，创造了领导者和战士同心同德为开拓民族的命运而献身奋斗的新的历史。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和抗日革命战士的共产主义情义中成为核

心的，可以说就是对自己的领导者、自己的司令官的忠诚。

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既不知道派系斗争，也不知道争权夺利。他们推举出领导的中心之后，就不再左顾右盼，而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领导者。这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情义的纯洁性之所在。

金赫、车光秀等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和在超越人类想象的艰苦卓绝的抗日革命战争时期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许多多抗日游击队员，都是纯净情义的体现者和高尚道德的创造者。

每当谈起抗日革命战士的情义时，最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金一的面容。金一是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中度过了近五十个春秋的人。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朝鲜的建设、反美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抗日革命时期，金一是以经验丰富而老练的政治干部闻名遐迩的。在间岛，他以安图与和龙为中心广泛开展地下党和反日部队的工作，培养了大批的革命者。在白头山的时候，金一先后打入杜义顺、孙长祥、钱永林等为头领的反日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因为他工作做得好，安图的钱永林甚至下定决心要率部编入我们人民革命军，跟我们一起作战。于是，金一就把钱永林部队带到了抚松，因为他听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抚松去了。可是事不凑巧，他带部队到了抚松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漫江开到了长白县。因为扑了空，反日部队的一些士兵就以为金一骗了他们，开始发生了动摇。加上部队的口粮也断了。这使金一越发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

队长带领队伍一连三天饿着肚子行军，有几个士兵在山里发现了人参圃。到了饿死地步的士兵们，也顾不得看看队长的眼色，就一窝

蜂似地扑上去挖人参吃。这在人民革命军的指挥员金一看来，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立即张开双臂阻止士兵们说，不经主人许可，随便挖人参吃，是侵犯人民利益的不光彩的行为。

饿得快要发疯了的士兵们跑去对钱永林说道："朴德山(金一的原名)是个可疑的人，他起初说金日成部队在抚松，可是抚松没有金日成部队呀。我们已经上了他的大当，难道还要继续跟着他走吗？他这会儿又说什么金将军的部队去了长白县，这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挖人参吃，他都不让，这不是存心叫我们饿死吗？要是继续跟着他走，还不知咱们要遭什么祸呢。干脆，把他干掉，再回安图去吧。"

金一知道，搞不好，反日部队的士兵甚至会杀害他的，但他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说服他们道："你们要杀我就杀吧。不过我有件事求你们。先让我去找人参圃的主人谢罪道歉，等我回来再杀吧。你们千万不要再糟踏人参了。再糟踏了，咱们没钱去赔啊。"

金一这么一说，钱永林深受感动，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让他去找人参圃的主人，并向士兵们宣布，要是再有人挖人参，就当场枪毙。

金一领着人参圃主人回到部队，解开背囊把人参圃主人送的蒸饺子分给了士兵，然后拿出一块大烟交给人参圃主人，说他只有这么一块大烟，请主人权当赔饺子和人参的钱收下。原来，这块大烟是王德泰送给金一在紧急时用的。人参圃主人一再推让，不肯收下。金一再三说服，终于让人参圃主人收下了那块大烟。

人参圃主人感动得把储藏在山里的过冬口粮都送给了部队，还把

钱永林部队一直送到了漫江。到了漫江，有过疑心的士兵们都来找金一，赔罪道歉。

我在红头山密营见了带领反日部队归来的金一，并且把钱永林部队编入了我们的主力部队。

金一生性沉默寡言，遇事容易让人感到有些为难。头一天，我在密营跟他交谈，问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都做过哪些工作。他只回答了一句：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没做多少工作。我反复问他，他的回答仍然没有新的补充。第一次见面，使我觉得他过于沉默，是个不善于言谈的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金一秉性老实正直，从不作假，不为任何风浪所动摇，始终如一地保持他忠心耿耿的本色。他一生一世从不讲任何条件，默默无言地埋头工作。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不仅当做下级对上级应尽的义务，而且当做战士对领袖应恪守的情义。正因为这样，他执行任务始终一丝不苟，从无任何波动。

我至今还记着在马塘沟密营派金一到八团一连当政治指导员时的情景。这个政治指导员的任务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团长钱永林在前一年辉南县城战斗中牺牲，政治委员空缺，还没有物色到适当的人选，所以，一连政治指导员还要临时兼管团政委的工作。连长工作倒很认真，但水平不高。

我把这些情况都讲清楚后，问金一说，你知道你将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吗？他神色严肃地想了一阵，才开口说了一声“明白!”然后又闭口不言了。他接受任务的态度，始终如一，不管任务重还是轻，

总是同样的回答："明白了！"从不多说一句话。

第二天，我想帮助他工作，到一连去了。可是他不在，只有连长。连长说，他一到任就马上到第一排驻地抚松县北岗屯去了。前一天任命金一的时候，我曾顺便提到过第一排没有消息的事，而他却把这件事牢记在心里，一上任就到北岗屯了解第一排的情况去了。

第二天拂晓，金一领着几个年轻人带着很多粮食和武器回到了连队。我一听他回来了，不禁怀疑起我的耳朵来了。从马塘沟到北岗屯足有一百里路。如果金一真地回来了，那就是说他一天一夜来回走了二百多里路。金一顾不得放下背囊，就来找我简短地汇报说：第一排的同志都安然无事，工作做得很好；他们同我们的联系中断，是因为执行联络任务的队员中途迷了路；他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是第一排打敌人缴获的和群众支援的；当地一些青年申请入伍十分恳切，所以没来得及请示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我让金一回宿舍之后，同他带来申请入伍的青年们见了面。在同他们谈话时我才了解到，金一直接指挥第一排袭击了金龙屯的警察派出所和恶霸地主，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粮食。他袭击敌人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肃清恶霸地主和警察，给群众解恨；其二是解决我最担心的口粮问题。当时，我们缺粮，吃了不少苦头。好几百名队员在一个密营里进行几个月的军政学习，只靠后勤人员搞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是不打仗就连一袋米都弄不到的时候。赶在这个节骨眼上，金一意外地弄来了这么多的粮食，整个部队就不愁没粮食吃了。我真说不出多么感谢他。

后来，金龙屯的群众说是要报革命军的恩，一连四五次给马塘沟密营运来了许多支军物资。

每当部队断了粮，总是由金一自告奋勇地带领一些队员去搞粮食。他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也总是扛着米袋回来。缺粮的时候，他自己饿着肚子，或只吃一点整粒的玉米，却不让我饿着，总是千方百计地搞到一些粮食，给我做大米饭吃。金一的背囊比别人的大一倍，经常装着准备急用的粮食。

金一一向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邻居、党和革命的利益。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但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甚至他的手下人要求给他特殊待遇，他都坚决制止。

金一在解放后也和抗日革命时期一样，忠实地帮助和支持我。只要是我希望做和要求做的事，不管多么艰苦，他都埋头去做。他不计较岗位，不计较行业，无论是党务工作还是军队建设或是经济领导工作，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默默无闻地为错综复杂的国家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有一年，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金一要求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到清川江火电厂建设工地去工作。这个火电厂是当时国家集中投资、特别关注的重要建设项目。因此，我在心中一直考虑着谁能担当这项工程的领导工作。可是，当我听了他的建议后，又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了，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如果他还像从前那样奋不顾身地埋头苦干，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金一却执著地要求派

他去，我也就不得已地答应了他。不过我给他提了个条件：到工地去只许当顾问，指点指点，绝不许操劳过度。

金一到了工地，就在工棚里占了一间办公室，每天要爬多次足有七八层楼房高的阶梯，全力以赴地指挥工程建设。直到除夕那一天，他还在工地上工作到深夜，直到一号锅炉点了火，才回到平壤向我汇报工作情况。

金一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去世前三天，还在办公室里工作，在党支部会议上做生活总结，又找一个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干部，嘱咐他要好好辅佐金正日同志。这都是举国皆知的感人事例。

他一辈子衷心拥护我，我也一辈子把他当做亲骨肉，爱护他，关怀他。

他身材魁梧，但因为在山上打游击时饱经风霜，吃苦太多，常常闹病，深受痛苦。医生们为他会诊，断定他的病是胃癌。我听了这吓人的报告，心中万分痛苦，无法忍受，索性打破计划，动身到平安南道温泉地方进行现场指导去了。因为在平壤我待不住，工作做不了，饭也吃不下，心烦意乱，无法平静。

如果金一去世了的话，我身边就没有几个可以跟我做伴聊天的老战友了。诊断金一疾病是不治之症的，不是一两个医生，而是好多个医生。这实在叫人伤心透了。诊断他不是癌症的医生只有一个。我是习惯于多数表决的，但这一天，不知怎的，我总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医生的诊断上。

我让司机刹住疾驰的车子，给外务相打电话，叫他立即邀请苏联

的著名癌症专家。苏联当局接到我外务相的电报，立即派来了我们需要的医生。

苏联医生诊察了金一的病以后说，不像是癌症。他们还把金一带到苏联去请别的著名医生进行了检查，也诊断说不是癌症。那时候，如果我们相信了最初的诊断，切除了金一的胃，那么他肯定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去世的。

从此以后，每当金一闹病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人；现在，跟我一道进行过抗日革命的老战士已经没剩几个了，如果你也没有了，我寂寂一身怎么过呀！我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操劳过度，一定要注意保重。

但是，重病缠身的金一，尽管拄着手杖才能走路，也还是不离开办公室和生产第一线，为了给党和革命多做一点事，竭尽了一切努力。

结果，他真地得了不治之症。

有一次，不知是出于什么念头，他跟我说，等病好了，明年 4 月 15 日要到万景台去坐一次惯性列车。听了他这话，不由得我心都凉了。他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居然把心里话都抖搂出来，是不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会太久了？

果不其然，那年除夕，金一未能出来观看少年儿童的新年演出。夜里，我到他家去看他，对躺在床上的金一说：

“每年的新年演出，我都和你一起去看，可是今晚，你不在我身边，我的眼里就老淌出泪来，没法看下去，才来看你。”

当我起身要回去的时候，他从床上下来，一直送我走到门口，反而

再三嘱咐我说:“我请求您，千万不要劳累过度，绝对不要劳累过度啊!”

那天晚上，我怕有害于他的健康，没有跟他碰一杯新年祝酒。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感到于心不安。听说，我离开后，金一也说他很后悔当时没有敬我一杯祝酒。其实，即便我们碰了一杯酒，也是不能治好他的病，不能使我感到轻松的。可是每当想起金一的时候，这一杯酒总是触疼着我痛苦的心。

金一对待金正日同志就像对待我一样，对金正日同志恪守情义也像对我恪守情义一样。他特别敬慕金正日同志，这使我不止一次地深受感动。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后回国的那一天，金一拄着手杖到车站去迎接。我看着他对待自己领导者的这种真诚心意，不禁感到十分佩服。

金正日同志也把金一看做革命前辈，格外尊敬和爱护他。他经常推崇和亲切地关怀金一，说金一副主席是从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起就为我们党的加强、发展和革命的胜利，进行了坚决斗争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的典范。

我把金一当做我的右臂，金正日同志也把他当我的右臂看待。

正因为如此，金一逝世后，表现最悲痛的人就是金正日同志。

抗日革命战士们不仅在对自己的领导者恪守情义方面，而且在对革命同志恪守情义方面，也开创了最崇高的境界。以爱护报答爱护、以信任报答信任、以恩情报答恩情，这就是抗日游击队员们恪守的情义。

黄顺姬和金哲镐之间的友情，可以说是抗日游击队员的同志友爱和共产主义情义的典范。

我每当见到黄顺姬时就想：这么矮小纤弱的女子，在白头山的狂

风暴雪中怎样坚持了十年之久的武装斗争呢？解放后回到平壤，我向国内人士介绍黄顺姬是打了十年游击战的女战士时，有些人还不大相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里，像黄顺姬这样矮小的女战士并不多。她虽然身材矮小，但在革命斗争中，却像一块石英石那样坚强，胆大无畏。人并不是身材魁梧才能干好革命，信守情义的。林水山是身材比黄顺姬大两倍的彪形大汉，但他克服不了困难，背弃了同志们的情义，背叛了革命。而黄顺姬则跟他完全相反，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了祖国解放。只要重情义，信念坚定，普通的家庭妇女也能参加革命；像金今顺那样的小姑娘，也能在断头台上坚守革命气节。黄顺姬虽然身材矮小纤弱，但她将斗争坚持到了革命胜利，这是因为她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恪守情义的崇高精神。

我第一次见到穿一身军装的黄顺姬，是在迷魂阵密营。当时女队员住的是过去山林队士兵住过的营房，房内是个中国式的火炕，炕搭得很高。我坐在炕上朝下一看，有个面生的矮个子姑娘站在过道上直勾勾地望着我，好像有话说又不敢说似的。她就是黄顺姬，是死气白赖地纠缠了一个星期才被批准入伍跟着部队来到迷魂阵的。老实说，当时我以为她是个儿童团员呢。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居然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游击队员。

“你个子这么小，怎么就入了游击队？”

我这么一问，她回答说，她要替被日寇杀害的父亲和在战场上牺牲的姐姐报仇。她的哥哥黄泰云是崔贤部队的连长，在寒葱沟战斗中阵亡。

她刚入伍时，真地成了部队的负担，但是，没过多久，就成了为

大家所热爱的革命军之花。这是因为她性格坚强，做事一丝不苟，明白事理，原则性强，又富有人情味，恪守情义。

金哲镐在世时常常回忆起黄顺姬奋不顾身地把她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往事。那是 1940 年春的一天，崔贤团长交给黄顺姬一项任务，叫她到后方密营去负责照顾伤员和老弱者。于是，黄顺姬就带着人们朝富尔河方向出发了。她们一行多半都是伤员，最大的困难是孕妇金哲镐在半路上突然生了孩子。黄顺姬没有任何接生的准备，既没有尿布，也没有一块可以包婴儿的布头。黄顺姬立刻脱下自己的棉袄包住了新生的小生命。没多久，“讨伐队”发现了他们，一面开枪，一面扑了过来。产妇不知所措地朝战友们望了片刻，就对黄顺姬说，这孩子是怎么也救活不了啦，干脆把他扔了吧。她说是这么说，可还是紧紧地抱着孩子站不起来。黄顺姬猛地把孩子夺过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对着金哲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这样艰苦奋斗，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后代吗？扔掉孩子，保住自己一条命，还值得活着吗？”她说罢就跑到山脊上把孩子藏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一棵矮松下面。产妇金哲镐也拿起枪跟上了黄顺姬。稍后，黄顺姬跑到山脚下提着丢在那儿的一捆东西返回山脊来时，只见金哲镐泪汪汪地呆望着天空，却不见那个新生的小生命。她想问怎么没把孩子抱过来，正要靠近金哲镐时，突然从很近的地方又响起了枪声。她俩只好带着一行人一面还击一面跑，牵着敌人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从这条峡谷跑到那条峡谷，整整周旋了两天，终于甩掉了敌人。

这时候，产妇金哲镐突然昏倒了。黄顺姬拿出小搪瓷盆烧开了水，

来喂金哲镐，可是怎么也张不开她的嘴，只好用汤匙撬开她的牙齿灌了几口开水，才救活了产妇。黄顺姬这才想起了婴儿，忙问金哲镐孩子怎样了？金哲镐回答说放在那个交过火的山上一处松林里。黄顺姬回头就跑，跑了很长一段路，回到那个同“讨伐队”交过火的山上一看，可怜的孩子已经断了气。

金哲镐看到为找孩子来回跑了很长一段路的黄顺姬仍然只穿着一件单衬衫，很抱歉地说，在她离开孩子的时候，明明知道孩子活不了一两个钟头，可就是下不了狠心脱下那件棉袄拿回来。

黄顺姬又冷又饿，浑身直打哆嗦，却安慰金哲镐说：

“大姐，我们大人不穿棉袄有什么不得了的。那孩子还没起个名字就死了，不要让他冻着才对呀。”

金哲镐至死没有忘记黄顺姬对她的友情。她临终前夕，对来看望她的黄顺姬说：

“顺姬，我的生命已经到头了。靠你的帮助，我在富尔河没有死，能够一辈子生活在领袖的怀抱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我真想跟游击队时候那样和你盖一床被子睡呐！”

那天，两个战友就像在迷魂阵密营时那样，盖着一床被子通夜不眠地回忆着游击队时期的往事。

在“艰难的行军”时，有一个在长白县入伍的新队员，夜里在篝火旁睡觉时不慎烧坏了身上的军装。军装被烧得连半个身子都遮不住。从行军第一天起，他就披着这件破烂不堪的衣服，冷得直打哆嗦，吃力地跟着队伍走。大家看着他，都很同情和担心，但都爱

莫能助，因为他们也都只有身上穿的一套衣服。

同志友爱精神特强的李乙雪，不忍心看着那个新队员挨冻，便脱下自己的军装上衣，给那个新队员穿。那个新队员一看就愣住了，说：

“那，你穿什么呀？”

“我呀，在游击队里习惯了，这点儿寒冷算不了什么。”

“不，衣服是我自己不注意才烧坏了的嘛，我还有什么脸穿你的衣服啊！”新队员死不肯接受同志的好意。

李乙雪觉得这个人的牛劲是不易说服的，便用力将他的破军装脱了下来，然后给他穿上了自己的军装。李乙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认为老队员帮助新队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战友们都担心李乙雪很难度过这个冬天，因为他是警卫连里岁数小，体质弱的一个。在满洲地区住过一两年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有多么寒冷。最冷的时候，连头发都会结霜花。结了霜花的头发，用手指一碰，就像冰柱似地容易碎落。在这么严寒的冬天，穿着一件烧得破烂不堪，草草地补了几块补丁的夏装，还能一连几天不停地行军，简直是一个奇迹。然而，李乙雪却从不说冷，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拨开积雪前进。一到宿营地，他总是带头去打柴火，搭帐篷。他把机枪班的事都办完了，等战友们都围着篝火坐好了，才来烤自己的鞋。

李乙雪的这种刚毅性格和对同志的情义，并不是天生的。他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民族的灾难和痛苦，激发了对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心，养成了热爱人民、热爱同志、爱护别人的精神。

南牌子会议以后，李乙雪被调到警卫连机枪班做机枪手的副手，

为保卫司令部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是一辈子手持武器，风里来，雨里去，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保卫了我的警卫队员。

在北大顶子会议上总结“艰难的行军”时，我把李乙雪誉为同志友爱精神的榜样，赞扬了他的高尚品质和同志情义。杂志《铁血》编辑部也在创刊号上介绍了他的模范事迹。

朝鲜人民革命军强大的原因是什么？每当有人这样发问的时候，我就回答说，其原因在于朝鲜人民革命军是以革命情义为基础团结起来的集体。我们的团结如果不是以道德和情义为基础而是纯粹以思想意志的共同性为基础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那么强大的。我们在既没有正规军的支援又没有国家后方的最恶劣的情况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劲敌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因为我们兵力多、武器好。与拥有数百万正规军的敌人相比，我们的武力实在是微不足道，相差悬殊的。我们是因为有以忠诚和情义为基础的思想意志上的团结，才得以战胜了劲敌的。

我认为，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应当学习林春秋对革命的忠诚精神和恪守情义的榜样。他是在很高水平上体现了对党和领袖的情义的革命老战士。

前面已经简单地介绍过，我和林春秋第一次见面，是在 1930 年秋。当时他挂着朝阳川逢春堂药铺主人的牌子，做间岛地区党和共青同盟秘书处的联络员。从那时起，他把自己近六十年的生涯全都献给了革命。“永恒的同行者、忠实的帮助者、出色的进言者”，这一名言，是金正日同志授予知识分子的，我看授给林春秋这样的人是很相称的。

林春秋用自己的学识为朝鲜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自己的学识曾进行过党的建设、军医工作和写作活动。他的人生道路是以这些工作贯穿始终的。他最大的本领，是通过自修学会了医术。说他十八岁时就当了有执照的医生，恐怕有些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靠着医生的招牌，既做过群众启蒙工作，也做过联络工作，还做过培养革命者的工作。他住在八道沟附近的村庄龙水坪的时候，就推荐许多人加入了游击队。我想，从这一事实中就可以了解到他当年行医是什么性质的。

林春秋来到游击区后，革命组织派他当了军医。他当军医时，给许多伤员和群众治好了病。他从十四五岁开始一面种地一面自修，攻读医学。他这样磨练出来的医术，居然有惊人的临床效果。经他看过一两次病的人，都说他是高手。夸赞林春秋的人中，要数崔春国评价最高。崔春国受了重伤时，林春秋给他作过手术。他在同伪满军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打碎了大腿骨。看了他伤势的人都说，不把腿锯掉，就不能救活他。但是，林春秋就没有这样看。他比谁都清楚，如果把一只腿锯掉，崔春国就会变成一个残废，不能继续做游击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知道崔春国是万夫莫当的得力的军事指挥员，是我们最爱惜的虎将。林春秋十分重视这一点。因此，他不锯腿，而是用刀子稍微豁开伤口，再用镊子取出被子弹打碎的骨头片。一年后，崔春国就能迈开大步走动了。虽然受伤的腿有点瘸，但行军、指挥作战，都没问题。林春秋大胆果决的手术，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果。

第一次北满远征结束后，我到了在三道湾能芝营的东满党委秘书

处时，也得到了林春秋的很大帮助。他十分关心我的健康，每天送给我疗效好的草药和补品，为我尽了最大的诚意。崔贤、吴振宇、曹亚范、曹道彦也经他治疗，医好了伤。

从1937年秋到1938年秋的整整一年里，林春秋依次走遍金川县，临江县和蒙江县龙泉镇广大森林里的人民革命军各个密营，医治了许多伤病员。他经常出诊，每次都得走几十里路。现在，医生出诊或去做卫生宣传，都有救护车、小轿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军医们可没有享受过这种清福，出诊时不遇到敌人的“讨伐”，就算万幸了。

有一次，林春秋碰到敌人的“讨伐”，险些丧命。黄沟岭战斗后，他把崔贤送给他的战利品——一套棉衣捆在背囊后面，朝山上爬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机枪扫射。等敌人撤走以后，他把背囊解开一看，真吓人，里面竟有七颗机枪子弹。若是没把棉衣捆在背囊后面，他是肯定送了命的。

抗日战争时期，林春秋还作为党务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人的工作、组织工作、写作活动，他都做过，对军民教育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多次接触，我看出林春秋具有政治工作者的素质。实际上，他曾在延吉地区当过群众团体的干部，具有领导和教育群众的经验。因此，我们把军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交给了他。从此，他担任过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委员、警卫团党委书记，还负责做过东满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东满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初期，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我

们的期望。因此，南牌子会议后，我们任命林春秋做了东满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工作委员会的使命是：在间岛地区以扩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方法，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加强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牢固地奠定建党基础。东满党工作委员会的使命与长白县党委会和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差不多。它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间岛和咸镜北道一带。游击根据地解散后，间岛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东满党工作委员会领导。

林春秋同我讨论之后，把许多政治工作员派到茂山、延社一带和东满地区，扩大了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小哈尔巴岭会议后，在汪清、延吉、敦化、珲春、安图、和龙等地开展小分队活动时，主要由东满党工作委员会组建的革命组织从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解放后，林春秋运用抗日革命时期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为建党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初期，他任平安南道党委第二书记，后来任江原道党委委员长。他在江原道任职时，分界线一带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解放初期，我们让抗日革命战士尽可能少担任高级职务，大部分高级职务都让给了国内人士和曾在海外参加过革命运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同我们一道经受过武装斗争考验的人中缺乏得力的人才，而是因为要实行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才采取了这种措施。但是，在当时北半部只有五个道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让林春秋担任了江原道党委委员长的职务。这是因为我们很重视他的党务工作经验。

在林春秋的活动中，特别值得回忆的是他的写作活动。他为后代写了很多书，其中有《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等不少具有国宝价值的著述。他开始写作是在当了《三·一月刊》的名誉记者之后。他写

的文章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内部刊物上登过好几篇。他在《三·一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千疮百孔的日本经济》，被评为优秀作品。他在战斗、行军、医疗等繁忙而艰苦的环境中，每天挤出时间记录了我们的活动情况。没有纸张的时候，就是把桦树皮刮下来当纸，也没有间断写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斗争日记。林春秋曾多次说过，这个日记在他写《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这部书时成了第一手材料。

魏拯民在世时曾多次建议林春秋编写一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历史。他强调说，“党务工作、军医工作、名誉记者的工作，当然都很重要，但是，你更重大的使命是写朝鲜游击队的活动史。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即使别人都在白刃格斗中牺牲了，你可是一定要活下来完成这一使命，一定要把自己司令官的业绩和自己军队的历史传给后代。”

林春秋当了警卫团党委书记后，长期跟魏拯民在一起，一面帮助他工作，一面给他治病。因此，魏拯民非常喜欢他，要求他经常跟自己在一起。林春秋对保证我和魏拯民的联系、巩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两国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我第一次读到林春秋的著述《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是五十年代的末期。当时，我们有些人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事大主义的残余。因为没有做好革命传统教育，几乎没有向人民群众和青少年介绍我们的武装斗争历史。我们的不少干部能背诵《苏联共产党简史》，谈论《火星报》如何如何，布哈林如何如何，但一问到在南湖头开过什么会议，就作不出满意的回答。在这样的时候，《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这部书问世，第一次给人民群众勾画出了抗日革命的轮廓，

成了研究抗日革命历史必不可少的著作。

林春秋写这部书，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而是抱着崇高的目的，为了对所有参加抗日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人民尽到自己的情义和义务，为了让后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千秋万代的财富——革命传统。

林春秋撰写了以金正淑、金哲柱的革命活动为题材的回忆录等有关我们党革命传统的许多书籍和教育材料。他对数不胜数的史料进行考证和整理，完成了史料的体系化，为编纂我们党的历史立下了丰功伟绩。他还创作了以青年共产主义者为原型的多集长篇小说《青年先锋》。

我们党称誉林春秋是我们开创并引向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光荣革命历史的权威的见证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十分贴切的。老实说，林春秋是个即使不参加艰苦的抗日革命，只凭自己的医术也能挣钱吃饭的人。但是他毅然投身于革命，经受过几十几百次生死关头的考验，从没有倒退过一步，从没有背弃过对领袖和同志的情义。

他被关在龙井监狱的时候，坚持了即使自己牺牲，革命还是必定胜利的信念；抱着宁可牺牲自己，也一定要保护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决心，挺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然而背叛革命的败类们却认为，自己死了，革命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不惜出卖了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这就是真革命者和假革命者的根本区别。

解放后，我又通过许多事实进一步认识了林春秋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为了筹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他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到中国东北去的时候，我嘱托他到了东满要尽可能把抗日革命烈士的子女都找

出来，送回祖国。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国内战争，林春秋为支援前线，建立政权机关，奠定教育事业的基础，做各阶层人士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但他还是一个不漏地调查和掌握了抗日烈士子女的下落，找到后送回了祖国。他为了寻找符岩洞时期的老朋友和革命战友金正淑的弟兄，甚至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同时，在召集干部开会的时候，告诉人们祖国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号召大家寻找烈士子女。他为了找到更多的烈士子女，还亲自出马，风尘仆仆地走遍了散布在间岛地区的各个村庄。当衣衫褴褛的孩子们看了寻人启事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把他们一把搂在怀里，亲着他们的脸，对他们说，你是某某的儿子，你是某某的女儿，你们知道金日成将军多么焦急地寻找你们吗？他这样费尽心血找到了几十名烈士子女的时候，禁不住高兴地给我打来了电报：将军，即将带领首批烈士子女回国。电文虽然很短，但我从中感觉到了林春秋因为恪守了对革命战友的情义而感到的激动和喜悦。

林春秋找到大批的烈士子女和烈属送回了祖国。当时入了学院的孩子们，如今有的成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的任道党委第一书记，有的做了人民军将领，都工作得很好。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林春秋有一度在地方上做工作。听说，当时林春秋每当为参加保健省召集的会议来平壤住几天的时候，一到晚上就上牡丹峰去，把一条白布铺在抗日老战士们的陵墓旁睡觉，根本不去住城里的旅馆。那个时候，金策、安吉、崔春国、金正淑等人的坟墓都在牡丹峰。在野外，而且是在前后左右都是战友坟墓的丘岗上，

只铺一条白布露宿，是绝对睡不好的。但是，他一到平壤，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上牡丹峰，把铺位定在战友们的墓旁。然后——正如他后来讲的那样——就躺在墓旁，对着墓中的战友娓娓而谈：“你们呐，在这祖国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为什么都躺在这儿睡呀？将军现在肩负着朝鲜的命运，日夜奋战，有多么辛苦，你们知道吗？”

那是决定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时候，所以市民中没有多少人知道抗日战士们的英魂安息在牡丹峰葳蕤的草木丛中，也没有人知道有个彪形大汉间或来这里跟这些英魂睡在一起，大清早才悄悄地从牡丹峰走下来。

我听了这事以后，觉得林春秋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革命战士。

这就是我想说的抗日游击队式的情义。称颂人间的爱和情义的美谈，在世界上是不胜枚举的。但是，我从未听说过比抗日战士们创造的情义更崇高、更真诚、更完美的情义。

林春秋常常自称自己是金正日同志的老年弟子，自觉地努力接受金正日同志的指导。金正日同志也真心爱戴和尊敬林春秋，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林春秋。他常说，林春秋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他健康长寿。金正日同志对林春秋的这种真诚的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现了领导者对老革命者的崇高情义。这是在白头山上形成的抗日游击队式的情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恪守革命的情义和气节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尽管是极个别的，也出现过落伍分子和变节分子。

我们的游击队员听到那些曾经口口声声高喊革命口号的人，在敌

人面前丧失了革命气节的消息，都十分气愤。当昨天还高唱《国际歌》，大谈革命胜利的人突然叛变，沦为敌人的走狗时，我们的指战员们所感到的痛苦和心中产生的挫折感，还能用语言来表达吗？但是，出一两个叛徒，绝不能使多年苦功付之东流。我们用加强队伍在思想意志上的统一和道德情义上的团结，来回答了敌人的白色恐怖。我们胜利的道路只有这一条。

第十八章

在中日战争的烈火中

一　应付新的形势

二　金周贤

三　在组织农民的日子里

四　独立旅时期的崔春国

五　九月号召书

六　经历“惠山事件”有感

时期：1937.7~1937.11

一　应付新的形势

我们听到发生卢沟桥事变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在间三峰战斗后，也就是 1937 年 7 月中旬。我们很早就预见到九·一八事变还会招来新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霸占将扩大为对幅员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整个领土的全面进攻。但是，当真的听到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爆发了中日战争的消息时，心中禁不住激愤。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就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不消说，讨论的中心是：这场战争对世界形势和朝鲜革命的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如何利用新的形势，使之有利于我国革命。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个卢沟桥。谁也没有想到，深夜在这座桥上响起的枪声，会成为一曲血洗中国大地近三千日之久，把世界卷进大战旋涡中的前奏。把 1939 年 9 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这是一般公认的看法；但是，把比它早两年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火点的看法，也不是没有的。

中日战争同九·一八事变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推行的亚洲政策的产物。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满洲的时候，世界的公正舆论就已经暗示，日本不久就会向中国关内进攻。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

东三省之后，就倾其全力进行侵略中国关内的准备。

1933 年 1 月日军攻占山海关、侵入华北、打热河占承德、在秦皇岛登陆、进兵冀东等，都是在日军制造满洲事变后的几年间发生的，是为其侵略中国关内做准备的重要一环。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反而不顾人民的坚决反对，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把长城以北广大地区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将华北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监视和控制之下。这种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战争狂热病。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华北的亲日势力开展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所谓“独立”的这一卖国运动，制造出了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步步升级的方法完全掌握了满洲全境和华北的命脉后，于 1936 年初提出以严格取缔排日运动，实现中国、满洲、日本的经济合作，共同反共等为要点的“对华外交方针”，露骨地加紧准备对中国关内的侵略。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成为怂恿和鼓励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新战争准备的外部因素。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屈辱的对日态度和卖国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任意扩大对中国关内的侵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关内的侵略越来越加速，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蒋介石却仍然对内围剿红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对外推行屈服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坚持对日妥协的路线。蒋介石卑躬屈膝的对日妥协政策，从结果来看，默许了日本对中国关内的侵略，导致

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这一重大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围绕着争夺中国而使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1937 年美国出现的新的经济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帝国主义列强为摆脱危机拼命开辟新的市场。争夺市场的争斗，激化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利权的倾轧和对立。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在同欧美列强的较量中，能够取得优势的途径是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他们估计，只有进行这场战争，日本才能独霸中国，驱逐美英势力，成为亚洲的盟主。

对此，美英采取了两面派态度。他们一方面企图限制日本的疯狂侵略，另一方面却又怂恿日本牺牲中国的利益去进行侵略，同时还唆使日本反苏。美英企图用这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了基本国策：继续推行扩军备战政策，确保在东亚大陆的优势，同时向南洋扩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政策的同时，伺机向东南亚扩张的战略方案。

近卫内阁巧妙地利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干涉”政策，乘中国内部尚未完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以有一个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为借口，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搜索宛平县城的无理要求。这引发了冲突。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一抵抗，日军就占领卢沟桥，包围了北京。

卢沟桥事变本来是个小小的偶发性冲突，是完全可以通过双方交

涉来解决的。但是，近卫内阁却在为挑起战争寻求借口的军方压力下，7 月 11 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把在日本的一些师团派往中国。他们在口头上说什么不扩大军事冲突，实际上却把这个小小事件作为借口扩大了中日战争。8 月 13 日，日军又对上海发起了进攻。这样，卢沟桥响起的枪声终于扩大成为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

中日战争的爆发，向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必须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制定主动的、积极的战略策略。

听到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我一连几天在琢磨，这场战争将如何发展，对我国革命将发生什么影响；对此，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等。

中日战争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就能了结的局部战争，也不是像满洲事变那样可以在几个月内速战速决的战争。这场战争本身就包含着变为持久战的因素，具有扩大成地区战争，甚至扩大成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除中日交战双方外，第三国介入的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的。

可以肯定的是，日苏冲突已不可避免。从历史上看，朝鲜和满洲一直是俄日的主要角逐场。这就是本世纪初俄日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苏联成立后，由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野心，苏日间仍然尖锐对峙。中日战争前夕，苏联和日本围绕着阿穆尔河两个岛的所有权问题尖锐对立，孕育着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双方在莫斯科经过交涉，纠纷暂时得到解决，但在那以后日本仍在日满共同防御的名目下，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对待苏联。

世界大多数舆论暗示苏日间这一纠纷将会酿成大规模战争，这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日本在占领满洲后，一直抱着侵略中国关内，进而侵占蒙古和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这已不是秘密。但日本好像认为同苏联进行全面战争还为时尚早，他们也暗暗害怕苏联日益壮大的国力和国防力量。日本在同中国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如果又同苏联进行战争，那就没有比这更危险、更愚蠢的了。日本还不具有同时和两个大国进行战争的国力。

我们的不少指战员认为，战争越扩大，对我国革命越不利。

我迫切地感到，必须尽快制定出针对中日战争爆发的战略方针，在明确的目标下进行斗争。1937 年 7 月中旬在白头山密营召开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指挥员会议和同年 8 月初在长白县初水滩召开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就是确定这个方略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为主动地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加强抗日武装斗争，把整个朝鲜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的战略方针。马东熙、李悌淳等在白头山地区和国内进行活动的政治工作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了在白头山密营召开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针对中日战争，建设好革命的主体力量，加强敌后搅扰战，加速全民抗战准备。作为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我们提出要在白头山西南一带和国内建立更多的地下组织，派朝鲜人民革命军政工小组在狼林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国内各地组织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同时，还讨论了了解新坡和长白县下岗区一带的党组织建设、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建设、群众政

治工作和支援游击队等工作的情况，并推广其经验的措施。

那时候，日本以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三大海军国之一自居。列强也这样看待日本。但是，我们认为日本早晚要陷入到可怕的陷阱里去。

我们深信，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开始时趁中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抗日力量暂时占了优势，但终究是要灭亡的。同时，非正义战争总是要伴随内部矛盾的。在国内战争势力和反战势力之间的矛盾、争夺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阻碍日本进行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也陷于孤立。它虽然在欧洲有德国、意大利那样的盟国，但他们得不到这些盟国的实际帮助。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中日战争，挺进南方，那就必然招致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和对立的激化。

为无止境的掠夺别国财富和扩张欲发了疯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满洲还没来得及消化，又贪婪地发动战争企图侵吞全中国，这等于猫碰上了牛头，无法担保日本不会患消化不良症。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完备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机构。他们炮制出各种法西斯反动法令，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从 1913 年开始施行的“军机保护法”也根据战时环境修改得更反动。他们叫嚷什么“作为战时兵站基地的朝鲜的特殊使命”啦，又是什么“朝鲜在执行大陆政策方面承担的任务”啦等等，使一切都服从于他们推行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掠夺，不止在经济领域。敌人还残酷地掠夺了人力资源。他们征集青壮年驱赶到战场，还把大量的劳力强

征到军工厂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工地。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空前强化了对我国人民的法西斯镇压和经济掠夺，把我们民族推入了忍无可忍的境地。

我们认为，虽然有这种不利条件，但只要灵活地利用中日战争造成的复杂形势，就能转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我在初水滩军政干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从这样的角度评价和应付形势。白头山会议主要从组织建设角度讨论了加强朝鲜革命的主体的任务，而初水滩会议则以同抗日联军部队协同作战问题为中心，主要从军事角度讨论了贯彻敌后搅扰战方针的任务。

我在这次会议上也强调说，要在豆满江、鸭绿江沿岸等广大地区加强敌后搅扰战，向国内派更多的小分队和政治工作员，以继续扩大和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

我们决定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敌后搅扰战。一方面倚傍狼林山脉建立密营网，在国内各地组织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用这种方法奠定全民抗战的军事基础，并通过国内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另一方面用开展游击战的方法阻止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关内进攻，破坏他们的战略部署。

在初水滩会议上，根据新制定的战略方针，部分地改编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根据实情划分了各部队的活动地区；还讨论了向国内派遣武装小组和政工小组的问题。

敌人在挑起了中日战争后，严密注视着我们的动向。他们不知怎么知道的，日本军警头子们说我们制定了新的活动方针，改编了部队，

划分了活动地区，决定在 8 月 29 日即国耻日到来之际攻打满洲的一些主要城市，并全面向国内进攻。他们为此慌忙采取对应措施。我们后来知道，这些事实都详细地记录在敌人的秘密文件里。

初水滩会议后，在重新挺进长白、临江县境之前，我为了讨论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进行联合作战和搅扰敌后的问题，会见了魏拯民。当时他正在漫江上游桦皮河畔的东漫江密营休养。

那天，陪我们一行到东漫江密营的是连队政治指导员朱在日。他对东漫江一带的地形很熟悉。朱在日是江原道人，小时迁居和龙地方，后来在渔郎村参加了游击队。游击区解散时，原住和龙的六户人家搬到初水滩来了，朱在日一家是其中之一。他原在反日部队工作，1937 年 3 月偕同其妻来找我们司令部。那时，我们派他到反日部队出身的中国人士兵较多的连队去任政治指导员。因为他中国话讲得好，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也很熟悉。后来他当了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后又升为团政委。朱在日把我们安全地带到了目的地。

魏拯民说，目前在中日战争正在扩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问题是，朝中两国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搞好合作。

“我们对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的协助寄予很大的期望。你们至今无私地诚心诚意支援了中国革命。我每当听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词的时候，首先就想到朝鲜同志。我想，至今我们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的日日夜夜，将永远留在我们两国史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金司令，今天中华民族也要经受朝鲜民族所经受的考验了。在这考验的时刻，我们深信朝鲜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

我们的一边。”魏拯民说得非常恳切。

他身负第二军政委、南满省委书记的重任，是一位善于开诚布公谈话的坦率人。

正如在纠正反“民生团”极左错误的斗争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魏拯民比谁都更理解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苦衷和痛楚，并做出了真诚的努力。他同情朝鲜人民，从各方面帮助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我一向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敬意。他也始终如一地以特殊的友爱和亲密感情对待我。

魏拯民一贯高度评价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这天魏拯民详细地给我谈了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对日作战方针。其中特别引入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爱国人士要实现新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只有全中华民族实行抗战，才是生路！号召全国“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并于 7 月 15 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并积极加以推进，这并不是第一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满洲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关内。但蒋介石的国民党却只顾反对共产党，“围剿”工农红军，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反而调动庞大的军事力量对工农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

的“围剿”，企图消灭在瑞金的中央苏维埃。国民党敌视共产党甚于敌视外来敌人。

在那时，中国共产党也没能把主力投入抗日，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同国民党作战。

外敌来犯时，本应该停止内战，把国民的力量集中起来进行抗战。但是，中国在未能终止被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内战纷争的情况下，进入了 30 年代中期。

后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抗日第一的新战略。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上抗日”的口号下，进行了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其后，他们进行“东征抗日”，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努力，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更加深化，中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在庐山进行的周恩来同蒋介石的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

魏拯民说，庐山谈判时，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华北和朝鲜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问题。我以满意的心情听了他的这段话。因为它意味着，中共中央正确地评价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所占的地位，对由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寄予很大期望，并热切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协助。

1937 年初，登在苏联的国际政治刊物《太平洋》上的致全中国救国会成员的信中，毛泽东举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活动，作为证明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斗争——抗日主张是可以实现的生动实例。他写道，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几年的斗争中共消灭了十万名以上的敌有生力量，使敌人受到数亿元的损失，从而牵制和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关内的进攻。对东北抗日游击队的这一评价，也包括着对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业绩的评价。

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吞全中国先于侵吞西伯利亚的情况下，搅扰敌后的重担，应该由东满和南满的抗日游击队比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更多地承担起来，对这一点，魏拯民和我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那天，魏拯民在同我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说，孔宪永的部下以南京政府密使身分经由苏联前来要求会见第二军领导干部，并问我要不要见他。南京政府的密使来满洲，这说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从各方面谋求同东北抗日力量的合作。

孔宪永在他当王德林的救国军副司令的时候就和我们相处得很亲密。当年他在和我们一起建立人民革命军方面，也曾做出了一定贡献。他收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的通知，同部分人员一起到苏联后进了关。他在关内的活动是值得注目的。他同李杜、王德林一起同南京政府取得联系，同张学良的旧东北军也建立了关系，对满洲的抗日斗争予以深切的关注。他被任命为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后，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下，常常组织对东北地区抗日运动的支援。孔宪永以南京政府名义给我们派来了密使，这说明他依然对满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予以很大的关注。

密使也和孔宪永一样曾参加过东满的反日斗争。密使强调把关内

的斗争和东北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说，在关内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所属部队，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日武装部队的活动是不是也应该纳入南京政府总的作战构想之中。

我们举出关内情况和东北情况的具体差异和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相对独立性，对他提出的方案表示了疑义。

南京政府密使承认我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便撤回了他的建议，但他着重强调说，不要忘记关内和东北地区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互相取得密切的联系，互相支持和合作。

我们答应说，为支援关内的斗争，我们将在东北三省和朝鲜从背后沉重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密使说，他经过苏联的时候同该国有关人员商量过中日战争中的伤员治疗问题，他们许诺予以协助，如果有伤病员，可以经约定的通道把他们送去。我们已有把老弱者送到苏联去的先例，而且有我们自己的渠道，但还是谢了密使的好意，说今后那条通道也将利用。

通过同魏拯民的谈话，我确认在有关中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我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坚定了敌后搅扰战必将取得巨大成果的信心。

同魏拯民分手后，我们在长白、临江县境的一个平缓的山脊上开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大会。

我还记得离会议场所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像竖井似的天然地洞。一个爱玩的人把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洞，好一会儿才传来了扑通的声音。

在那么高的山脊上的岩石缝里还有这样的洞，确实使人感到很神秘。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朝鲜人民革命军有关中日战争的战略任务，指战员们表示了要执行这一任务的决心。这个会议开得就像今天的誓师大会。我想，不妨说这次会议是执行白头山密营和初水滩会议决议的誓师大会。

对于这个大会，革命历史专家和著书人写了很多，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老战士们也多次回叙过，所以，我就不再多谈了。

白头山会议、初水滩会议和指战员大会都宣明了我们应付中日战争的政治、军事对策，这就是这些会议的意义所在。

我们从中日战争初期就一面巩固国内进攻作战的胜利，一面果敢地开展了敌后搅扰战。

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就进行了长白县十九道沟马顺沟附近的战斗和长白县十三道沟西岗城袭击战，还进行了龙川里刘哥洞附近的战斗等多次战斗。

当时，民族革命党机关报《前途》，把我们的敌后搅扰战称为“确实是朝中两国民族伟大联合战线的先声”。

那时候，崔贤的部队也为了打击敌人的背后，离开长白转战临江、通化、柳河、蒙江等地，不断取得了战果。安吉和朴长春也同姜健部队联合起来，大快人心地打击了敌人。金策、许亨植等进行的海伦远征和挺进到沈阳铁路沿线的南满部队的活动，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我们的武装小分队和政工小组则进入国内腹地，在各地束缚了敌人的手脚。朝中共产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开展的政治、军事活动和猛烈的

敌后搅扰战，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举侵吞中国的梦想，由于中国人民在华北与上海一线开展的斗争和朝鲜人民革命军与中国东北地区抗日联军积极开展的敌后搅扰战，而遭到了彻底破产。

曾大肆宣扬“对华一击论”“短期终战论”的日本，被迫转入了持久战，我们的敌后搅扰战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针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我们在临江县新台子密营总结了敌后搅扰战，讨论了在朝鲜国内搅扰敌后和破坏敌人军事运输特别是武器弹药运输的问题。这个时期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是辉南县城战斗。

辉南县城是交通发达的平原城市，攻克它很不容易。不远处有吉海线铁路经过，辉南附近又有多处敌“讨伐队”据点，因此，即使攻城成功，如果不能及时撤离，就有可能遭到敌增援部队的追击。我们明知进攻辉南县城从各方面都不利，仍派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第七团和新编的李东学、崔春国的警卫团与四师的一部投入了这次战斗。这是因为辉南县城是最适合于进行敌后搅扰战的打击目标。辉南县城不仅是敌“讨伐队”的主要据点之一，而且也是临近各县伪满军部队的后勤基地。城内有两个大军需仓库。

抗日联军部队和反日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我军出其不意地攻进城内，缴获敌军需仓库里的大量布匹、棉花和粮食后主动撤退了。随后，我军部队又沉重地打击了从海龙、磐石、蒙江等方面来援的日军和伪满军增援部队。在这次战斗以前，我们的主力部队进行的抚松——西岗伏击战，也是在敌后搅扰战中很有意义

的一次战斗。在进行敌后搅扰战的日子里，我们失去了李达京、金永焕、全哲山等亲密战友。

金永焕原在汪清做共青工作，后来参加了游击队。我们在游击区的时候曾派他到延吉游击队去当了政治指导员。1937 年 12 月，他在延吉地区壮烈牺牲。

全哲山是珲春游击队出身。在老黑山战斗时，我们初次和他见了面。后来，他被任命为汪清四连政治指导员。吴振宇对他很熟悉。全哲山于 1937 年 9 月在额穆阵亡。

这个时期，我们还失去了在南满任祖国光复会代表的李东光。他是得力的政治干部，又是勇敢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牺牲后，杨靖宇给我谈了一些有关他的事迹。

敌人进行南满“讨伐”作战时，李东光听到通化中心县委遭到破坏的报告，要经由敌“讨伐队”司令部所在地孤山子前往柳河方面。他乔装成卖药的，只带两个警卫员大白天就走进了大批敌人来来往往的孤山子。

大街小巷都贴有对李东光的通缉令。通缉令上写道：

“南满特委、共匪头目李东光，年三十许，大个子、半卷发、眼睛特大。

“告发或捉拿此人者，予以厚奖，窝藏者处以极刑。”

李东光泰然自若地站在贴有通缉令的布告牌前把它看完，才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孤山子。

李东光、李达京、金泽环、金永焕、全哲山的一生，是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和为人民忘我服务的光辉的一生，是用自己的热血把迈出了敌后搅扰战步伐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意志和精神谱写在史册上的典范。

可以说，我一生的总的志向不是防御，而是进攻。我踏上革命道路以来，一直运用了进攻战术。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但我从没有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或发生动摇，也从没有绕过它或回避它。不论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是以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斗争去战胜它。

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主要运用了迎击战术，这并不是由于我个人的兴趣或性格，而是复杂和充满考验的我国革命提出的要求。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震撼世界的复杂政局的旋涡中，如果我们乞灵于防御、后退或迂回的作战方法，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的。

因此，我现在仍认为当时我们面对逆境主动出击，把它转化为顺境的革命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二　金周贤

金周贤，是我国人民所熟知的抗日游击队最出色的后勤工作者。他不仅是能干的后勤工作者，而且还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加入游击队以前，长期做过地下工作。

我在抗日游击队成立前就认识金周贤。1931 年我们在兴隆村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金周贤在大沙河的一个叫高登厂的村子里做地下工作，负责领导农民协会和反日同盟的工作。最先把他介绍给我的是小沙河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金正龙。我同金周贤交谈时看出，他是个很谦逊而坦率的人。

有一天，我听金正龙说，金周贤正准备把独立军出身的人都赶出反日同盟组织。于是我特意去看他，了解到他是听了胸襟狭隘的人诋毁独立军的一面之辞，而把独立军出身的人一律当斗争对象看待的。我豁出时间给他说明了统一战线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了他对具有反日爱国思想的独立军出身的人所持的看法是错误的。

第二天，金周贤就登门拜访那些原打算轰出去的独立军出身的乡绅，向他们谢罪道歉。那些乡绅都称赞金周贤是有识之士。

从此以后，金周贤一遇到什么难事，就找我来商量。我也有时候到他家去看他。我俩虽然年龄相差八岁，但毫无隔阂成了至交。1931

年时，我还不是游击队长，但金周贤一直很虚心地接受我的意见。他的谦虚的品质，使我爱上了他，他也很喜欢我。我做的事，我说的话，他全都赞成和支持。

然而，他家里的人却都说他是任谁的话都不听的犟脾气。我听了他结婚后分家的经过，也觉得这个评语不是妄加的。

金周贤一家，本来住在咸镜北道明川，后来因穷得过不下去，才搬到了中国东北和龙。从小离开家乡的金周贤，一直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家乡，一念完私塾，就回到祖国在渔大津当了捕鱼工人，在劳动中长成了大人。直到过了娶亲成家的年龄，他也不想回家，老是在外乡做苦工。他哥哥硬把他带到大沙河，跟邻村的一个早已约好的姑娘强行订了婚。因为这个婚姻是未经本人同意，由父母包办的，金周贤根本没见过未来媳妇的面。他也不把父母给他订了婚挂在心上，经常跑到从俄国滨海省回来的邱山学校老师那里去，听人讲俄国革命的道理。他看到家里忙着准备办他的婚事，就毫不隐讳地跟父亲说，他毫无心思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而他的父亲以为这是儿子随便说说的，没有当真。可是到了快要办婚事的时候，新郎金周贤突然不声不响地藏踪匿迹了。父母急得愁容满面，新娘家也乱成了一锅粥。金周贤的哥哥为了找弟弟，丢下家里的活，跑了一冬，找遍了整个间岛，最后找到邱山学校的教师，才知道金周贤已跑到俄罗斯去了。于是又千辛万苦地追到俄罗斯，才把弟弟硬拖回家来。这样，金周贤再也逃脱不了结婚了。他刚回来，家里就急急忙忙给他举行了婚礼。但是，结婚以后，金周贤仍不待在家里专心种地，仍然是往外跑。他父亲想

来想去，决定给儿子盖一栋房子，认为让儿子分家独立过日子，儿子就会为了养活妻子，不再往外跑，安心在家种地了。然而父亲的这一招，反而起到了给儿子的革命热情火上加油的作用。分家以后，金周贤不再受父母的管束了，把群众召集在自己家里，建立革命组织，提高群众的觉悟，愿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在屋里还挖了个地洞，让刚嫁过来的妻子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父亲看了，无可奈何地叹息道：“这孩子的犟脾气，实在没法治！”

听了这个故事，我断定金周贤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不管谁说什么，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心，坚决顽强地去做，毫不动摇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喜欢金周贤的这种性格。

金周贤就是以这种坚忍不拔、不断进取的精神，继我们在安图建立抗日游击队后，于和龙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并成了它的指挥员。

我们在马鞍山新编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一个新师的时候，金周贤听到了消息，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最先来到了马鞍山。我们这两个分别了好几年的人又见面了。正为缺少干部而发愁的时候，他来找我们，使我像见到了贵人一样高兴。

当时，部队里没有能做后勤工作的人，由政治委员金山虎兼管后勤工作。在整编部队时，我任命金周贤做了司令部的后勤副官。从此，金周贤全力以赴地抓后勤工作。看起来他并不显得忙忙碌碌地跑东跑西，也不过分督促或折腾后勤部门的人，可是粮食和被服不断入库，部队的生活大有改善。

在部队开到白头山地区开展活动的时期，金周贤作为能干的后勤

干部，充分地显示了出色的工作能力。

只要他亲自出马，就有背运支军物资的队伍源源不断地拥入密营；只要他决心弄到的，不管是什么，他一定去弄到。

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期间，过年过得像 1937 年元旦那样丰富多采还是少有的。这也是金周贤特意下力筹备的，他说这是来到白头山后的第一个元旦，不能马马虎虎地过。

在普天堡战斗前夕准备的六百套军装、军帽、裹腿、子弹袋、背囊、帐篷以及同等数量的鞋子和大量的粮食，也都由金周贤负责，跟吴仲洽一道准备的。这个被他父亲认为连老婆都养不活的人，在白头山，居然赤手空拳地挑起供给部队几百口人吃穿住的重担，做了大量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我表扬金周贤的劳苦和后勤工作成绩的时候，他回答说，是因为西间岛人民太好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西间岛人民看到金周贤为部队的后勤工作劳累得嘴唇都起了泡，眼睛布满了血丝，都很受感动，群策群力，主动地想方设法积极帮助他的工作。

金周贤到人民群众中去，就做群众的儿子，和群众同呼吸，共甘苦，体恤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到队员中间去，就做他们慈祥的母亲，悉心关怀他们。所以，西间岛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金副官”。

金周贤具有特殊的本领和令人惊异的吸引力，不管关闭得多么严实的心扉，他都能轻易地打开。他说话坦率，待人真诚，作风谦逊，

秉公处事，喷发着真实的人的芳香，吸引着群众的心。不管是做后勤工作还是做政治工作，他都能取得显著的成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

我从金周贤的后勤工作中发现的独特的一点，就是他一向从做人的工作入手，做好每一项工作。例如，我们交给后勤部缝制军装的任务，他不是把司令部的这一指示机械地传达给下级就了事，而是把有关人员都召集在一起，透彻地说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详细交代完成任务的办法。

我很看重他的政治工作能力，凡有艰巨复杂的政治工作任务，也都交给他去完成。为建立白头山根据地选派先遣队的时候，我任命金周贤做了负责人。派这个先遣队的目的，不是单纯地选择一个可建白头山根据地的预备地，开辟部队运动的渠道，侦察国境一带敌情和民情，而是还要发现和培养可以建立反日地下革命组织的政治力量。因此，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同时做好政治工作。

金周贤出色地完成了这项政治工作任务。他带领先遣队到白头山地区建树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予以表扬的。小白水谷、熊山、狮子峰、仙五山、黑瞎子沟、地阳溪、德水沟等白头山地区的密营预备地，都是金周贤的先遣队选择的。金周贤到地阳溪、小德水、新昌洞、官道巨里、宗理院村、坪岗德、上丰德、桃泉里、三水沟等西间岛很多农村，发现了许多能为党组织的建设和统一战线运动作出贡献的人才，也准备了不少补充革命军的后备力量。在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所阐明的我们的革命路线传播到国内和西间

岛广大地区方面，金周贤的先遣队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个先遣队的工作成就，成了保证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跳板。

每遇到艰巨任务就最先想到的金周贤，当时在我们部队所占的地位就是这样重要的。他是我们主力部队十分珍惜的一块瑰宝。他的高度的责任感、优良的政治素质、出众的组织能力和熟练的工作方法，是全体指挥员学习的榜样。一句话，金周贤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干部。

我一直很重视金周贤的功绩，赏识他的工作能力，因此在 1937 年 8 月中旬派小分队到国内去的时候，任命他做了负责人。当时正是中日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正如前面已讲过的，面对着这场战争，我们曾计划在国内积极推进政治军事活动，大肆搅扰敌后，把抗日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实现这一计划，首要的事情就是选拔在政治、军事方面训练有素的能干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作为先遣队派到国内必要的地点去开展工作，实现我们的意图。

在这以前，国内的革命组织通过多种渠道通报我们说，现在有很多人聚在城津、吉州、明川、端川等咸镜北道南部地区和咸镜南道北部海岸地区的山里，急切地等待着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派出的小分队，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找这些爱国青年，组织游击队，进行训练；对其中体质弱，不能参加武装斗争的人，就为他们举办讲习班，把他们培养成为地下革命组织的成员。此外，小分队还要在群众中开展扩大地下组织和武装队伍的群众政治工作和物色人才的工作。我们还把在白头山脉、摩天岭山脉、赴战岭山脉选择可做武装斗争据点的密营预备地的任务交给他们。

因为这些任务很重，我们选拔精明强干的人员组织了小分队。其中有朴寿万、郑日权(瓮小个子)、马东熙、金赫哲等已在政治工作中崭露头角的人。队长是能干的指挥员，队员又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好手，因此我们对这个小分队是很信赖的，对它抱着很大的期望，而且他们自己的决心也大，积极性也很高。我完全相信他们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送走小分队时，我对金周贤只说了这么一句。因为他对我的意图了如指掌，无须多加说明。他有个特点，我说一个，他就能猜到十个。所以，我每次给他交代任务，从不做冗长的说明。老实说，我对金周贤的信任是绝对的。我们一致期望这支小分队少则四五个月，多则五六个月后就能胜利归来。

然而出乎预料，小分队过了一个月多一点就突然回来了。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我看了金周贤的脸色，立即意识到他们的国内工作遭到了失败。他的汇报，使我大吃一惊。小分队没有去到爱国青年聚集的城津，只在甲山一带周旋一阵就回来了。

事情是这样：小分队通过李悌淳的新兴村这条渠道，再同朴达领导的地下组织接头，然后朝惠山方面进发。在路上收到当地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说，日本的金矿老板把从朝鲜掠夺的金锭保管在仲坪矿里，准备运往日本。金周贤当即决定，攻打仲坪矿，夺回金锭。作为后勤干部，职业的本能不知不觉地占了上风。以为只要夺到几块金锭，部队的后勤工作是会大有保证的。于是小分队攻打了仲坪矿，夺到了一些金锭。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敌人听到仲坪矿的枪声，

惊恐万状，立刻出动许多兵力，几十人一队分头搜索追击小分队。金周贤他们撤出矿山爬上了德山洞的后山，但他们陷入了四面被围，无路可逃的境地。金周贤便写一张便条让风刮到了敌阵地上：“你们这些大饭桶，还不知道革命军神出鬼没的本领吗？我们就要跨过鸭绿江了！”

敌人看了这张便条，都拥向了鸭绿江。金周贤趁机带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要继续深入国内腹地却已经不可能了。咸镜南道、咸镜北道的山区以及凡是游击队可能出没的路口，都布满了敌军。金周贤只好决定以后再找机会打入国内完成任务，暂且带队撤回来了。这样，我们准备利用普天堡战斗后人民高昂的斗争热情和青年们的参军热，建立国内抗战武装力量，把武装斗争扩大到东海岸一带的计划，就因为金周贤小分队的荒唐的冒险和严重的自由主义行为，而不得不被暂时搁置下来了。聚在摩天岭指定地点等待小分队的国内爱国青年们，也因为见不到革命军的使者，都大失所望，异常难过地四处走散了。

小分队失败而归的消息，也给游击队员们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大家都心情沉重，他们以为连能干的金周贤都走不到目的地，刚走到入口就被迫撤回来，足见国内的局势十分紧张，敌人警戒异常森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不好，人们就会认为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去，暂时是不可能的。

金周贤的过失，带来了如此严重而无法挽回的后果。

我简直不敢相信金周贤会犯这样的错误。为了几块金锭，把小分队的活动引向了失败，这个错误对实现我们的构想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严重损失。由于金周贤的自由主义，人民革命军扰乱敌后、进军国内

的计划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惋惜，如果当时金周贤径直奔到东海岸一带见到了那些爱国青年，我们的武装斗争历史也许会更加丰满的。当时我的受挫之感和失望是如此之大。我的气愤，可能是超过了一般的限度。可是奇怪得很，我虽然处在异常激怒的情绪之中，但面对着低头等待处分的金周贤，却说不出一句责备或追究责任的话。看来，激怒或失望的情绪达到了极点，大都是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是默默无言地盯视着他。

司令部党委召开会议讨论金周贤所犯的错误。大家都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了他错误的严重性。有的气愤难忍地捶着炕批评他。金周贤受到如此尖锐的批评，恐怕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他像失却了一切的人，无精打采地坐着。

正如那天在司令部党委会上大家正确指出的那样，金周贤之所以犯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耍小聪明，自以为是，看问题浮浅。他没有在战略的高度上看待小分队的任务。所以，一听说有金锭可夺取，就失去了理智，根本没有想过打矿山会招致怎样的后果。正像他承认的，他当时想的是一举两得，连鸡带蛋一窝端。也就是说，既要打矿山夺取金锭，也要找到那些爱国青年组织武装队伍。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心话，没有一句虚假。我们深知金周贤是忠诚坦率、清白廉洁的人。但是，不管动机如何，小分队没有到达目的地，半途而废了，对此，整个队伍都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

我很想宽恕他，但没有说出口。司令官待人不能违背原则，有亲疏之分。如果囿于人情，对他的错误采取迁就敷衍的态度，那是有百

害而无一益的。我能给金周贤的最好的帮助，就是给他提供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机会。

司令部党委会决定撤销金周贤后勤副官的职务。我当然也赞成这一决定。但是，眼望着金周贤受了处分后有气无力地走出司令部的背影，心中禁不住责备起自己来，后悔我事先没有很好地帮助他，使他能避免犯错误。如果在派出小分队的时候，只要我提醒他一句，叫他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径直到国内同志们等待着的地点去，事情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特殊情况，没有想到金周贤这个后勤副官，如果碰到金锭这样的财宝，有可能一时迷住心窍，改变活动路线。

金周贤被撤职后，思想锻炼搞得很好。当时的这种思想锻炼，现在叫革命化。

金周贤被撤职后当了炊事员，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背起了饭锅。在过去被自己领导过的队员们面前，当一名伙夫背着饭锅行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别的人落到这种地步，大都要求调到别的单位去。而金周贤则不然，他当火头军，毫无怨言，一点也不感到不好意思，反而神情愉快，工作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以致旁观的队员们都觉得过意不去。

有一天，我想看看金周贤的生活情况，到八团的食堂去了。只见金周贤满头大汗，忙着侍候队员们吃饭。有一个队员眨眼之间喝光了自己的一碗汤，就用小勺敲打着汤碗，大声喊金周贤：

“喂，炊事员，再来一碗汤！”

这口气显然不是和气的，而是一种瞧不起人的傲慢的口气。可是

金周贤却毫不介意，一边回一声“唉，就来了。”一边盛一大勺汤快步走向那个队员去。

这天晚上，我把那个对待金周贤无礼的队员叫来，告诫他说，不要因为别人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就随便对他发号施令，瞧不起他；对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应该疏远、戒备或加以歧视，而应该更加温暖、真诚地给予帮助。那个队员承认自己错了。

职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会高有时会低；要保持真正的同志关系，就不应看职位，而应看人。无论谁，见邻人有困难，就应更加关怀他，真心帮助他。抗日革命战士们，即使自己的战友犯了错误，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也决不另眼看待，而是从各方面热心帮助他彻底改正错误。

金周贤当炊事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在一次行军的路上看见他身上扛着枪，还背着背囊和大饭锅，走路很吃力，当时我心中不禁感到难过，便走近他的身旁，要他把背囊放下来给我。但他推让说，东西不沉。我拉住他背囊的背带，想把他的背囊拉下来，可他执拗地推开我的手，继续跟着队伍走。这更使我感到难过。我甚至想，他是不是对党委会给他撤职处分的决定心怀不满？我下意识地转脸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两颊上淌着两串泪水。看到他流泪，我的心突然像坠着千斤锤一样感到沉重。这个顽强的铁汉子，为什么流泪呢？

金周贤在个人生活上是个有很大的不幸和悲痛的人。他的妻子做地方工作时遇到敌人的“讨伐”而牺牲，女儿病死，唯一的亲骨肉独生子在金周贤入伍时忍痛送了人。从此，金周贤把自己全部献给了革命。

那天夜里，等队员都睡着了，我到八团宿营地去想看看金周贤。到了伙房，见到了意外的情景：我以为可能躺在卧铺上想心事的金周贤，竟然蹲在河边用丝瓜络擦着铁锅。

我叫他从明天起到军械厂去工作。告诉他军械厂环境好，比较安静，而且也不会有人刺伤他的自尊心，他心里会舒服一些。可是金周贤两眼噙着泪水，回答说，自己受了处分，愿意在司令官身边改正错误，在司令官身边工作，心里才好受。

“白天我看见你偷偷地淌眼泪，以为你受不了炊事队的苦，才想把你调到军械厂去。”我这么说，金周贤握住我的手，笑着说：

“不。我是看到司令官同志为我受处分而痛心，十分感激，也为自己辜负了您的期望犯了错误而感到痛苦，才哭的。在司令部党委会上讨论我的问题时，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怕开除我，把我赶到遥远的地方去。我是死也愿意死在这儿的。我要是被赶出了革命队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把我丢开，让我到炊事队来工作，这是我感激不尽的。”

我听了他的话，领悟到了他深夜到河边擦洗铁锅的心情。

金周贤是不管个人的得失如何，只要能在我的身边工作，就感到心满意足的人。只要跟我在一起，当指挥员也好，当伙夫也好，挨批评受处分也好，只求不脱离革命队伍。这就是金周贤的真心实意。

具有这种品质的人，把组织上给予的处分和同志们提出的批评当作信任和爱护，甘心接受。金周贤作了深刻的反省，认识到自己的过失给革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我原以为我已经成了革命者，现在看来还差得很远呐。哪有我这样不成器的革命者呀！幸亏司令官同志信任我，同志们正确地批评我，帮助我。从此，我要搞好思想锻炼，一定要做一个铁中铮铮的游击队员。”金周贤抱着这样的决心，加倍地努力进行自我改造。

他在当炊事员，背着饭锅行军的日子里，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他受处分的那年 11 月，司令部秘书处刚刚出版我撰写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书，他就最先弄到一本专心阅读。因为他学习太用心，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炊事队的战友们都担心这个他们所爱戴的老后勤副官会累倒，索性把他那本书从他的背囊里抽出来藏到窝棚后边的石头缝里去了。他为了找这本书，好多天愁眉苦脸，甚至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明显地瘦了。这反而急坏了知情的炊事队员，他们趁金周贤不在时，把藏在石头缝里的书取出来又偷偷地装进了他的背囊，然后对金周贤说：“你还是再仔细翻翻你的背囊吧，装在背囊里的书还会自己跑掉吗？”果然，金周贤发现那本书仍在自己的背囊里，说一声“真是活见鬼!”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雀跃起来。

他的思想锻炼，的确很认真。工人阶级出身的老革命家，确实不同一般。他为自我改造而做的努力，达到了令人感动的境地。所以，我今天仍然强调说，干部要想搞好自身的革命化，就应当像金周贤那么做。

金周贤被撤职过了六个月后，我们任命他当了第七团团长。我们没有恢复他原职，而任命他为团长，是因为他老是向往着枪声激烈的战场。

他当团长后，仗打得很好。在长白县佳在水战斗、十二道沟战斗、临江县六道沟战斗、双山子战斗、吴家营战斗、贾家营战斗、新台子

战斗等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于 1938 年展开的春季攻势及以后的多次大小战斗中，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英勇无畏、机智灵活的指挥才能；那年夏天他从新台子到蒙江、柳河、金川等地出色地指挥了从背后打击敌人的战斗。他指挥的第七团，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宣传也做得很好。一到居民区，他就带头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

1938 年 10 月，金周贤在蒙江县南牌子密林同金泽环、金永国一道为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采蜂蜜的时候，遭到敌人“讨伐队”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

他当团长的时候，也像为部队的生活东奔西走的后勤副官一样，一刻也没有放松为战友们解决吃穿住的问题。

他牺牲后，战友们打开了他的背囊，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连一双人人应有的备用鞋子都没有。他的传令兵说他前几天把仅有的一双鞋送给了一个没鞋穿的队员。

我抱着金周贤的空背囊，禁不住淌下了眼泪。他做后勤副官的时候为革命军筹办的粮食、军装、鞋子，如果堆在一起的话，简直可以堆成一座大山。光是他弄来的鞋子，就有几千双，但他的背囊却空空如也，连一双备用的鞋子也送给了别的队员。

他的空背囊，令人浮想联翩，深思革命者的财富和人生观问题。向往幸福是人的本性；世上有许多崇拜黄金的人。以他们的眼光看，金周贤是没有任何财产的无产者。但是我认为金周贤才是真正的巨富，因为他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崇高圣洁的思想和灵魂，是用千万两黄金买不到、换不来的。

三　在组织农民的日子里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做好全民抗战准备。我们逐渐酝酿成熟了这样的构想：预先壮大力量，待时机一到，就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作战配合以全民抗战的方法光复祖国。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没有农民参加的全民抗战，是不可设想的。有些人说，农民不同于工人，缺乏组织性和革命的思想觉悟，所以很难做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的看法却不同。只要有正确的领导，把农民团结在组织里，农民群众也能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一点，我在 1931 年开展秋收斗争时就已体会到了。我们通过亲身体验确信，只要提高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们就能成为巨大的抗战力量。

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代的是凋敝不堪的农业。人家用机器翻耕、播种、收割的时候，我国农民仍用原始的手工劳动侍弄农田，栽培谷物。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封建桎梏，遭受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备受种种蔑视和虐待。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以后，我国农民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了。日本帝国主义施行的《土地调查令》、《产米增殖计划》、《鲜农移满政策》(把朝鲜农民迁移到满洲的政策——译注)等强盗式掠夺政策，使朝鲜的农村和农业凋敝不堪，进一步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我国的初期，发布《土地调查令》，以调查土地为名，从朝鲜农民手里掠夺了几十万町步土地，分别由总督府和“东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简称——译注）、“不二兴业株式会社”等殖民地拓殖会社和日本移民所占用。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极力推行《产米增殖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消除本国的粮食危机，二是向朝鲜农村大量输出资本，以榨取巨额利润。

日本帝国主义发布的《朝鲜民事令》规定：“……佃农即使因不可抗力，而收获受到损失，也不得请求减免佃租。”这等于从法律上禁止朝鲜农民为改善处境而进行斗争，即使到了饿死的地步，也要闭着嘴老老实实地忍受。朝鲜总督府一开始就从制度上保障了日本人农场主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佃农占农民总数的半数以上，看到这点，就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国人民在《民事令》的束缚下，处境是何等的艰难。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强盗式剥削，都是足以使禽兽感到脸红的。“东拓”按地区和农场派驻办事员或管理员，下设农监，严密监督佃农。佃农滞纳佃租、干农活“怠惰”，或有点反对农场主的苗头，就马上取消租佃合同，把土地收回去。

日本农场主甚至还私设拘留所，一有佃农对农场发牢骚或要求生存权利，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关起来。我在彰德学校念书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中原农场的日本人扛着长枪跟在干活的朝鲜农民后头威胁说，谁要是磨磨蹭蹭，就要开枪打死他。气得我那天晚上一夜未能成眠。

日本帝国主义每年把朝鲜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七百万至一千万石大米运往日本本土，而从满洲运来小米和豆饼卖给朝鲜人吃。当朝鲜人看到自己生产的油亮雪白的大米全被日本鬼子抢走，而自己却吃发了霉的小米时，心情该如何呢。

受总督府庇护的朝鲜地主也肆无忌惮地压榨农民的血汗，二地主和高利贷者也不甘落后。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反动的农业政策，加速了朝鲜农村的阶级分化。背井离乡的人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叫做火田民的新阶层。这是阶级分化造成的殖民地特有的可悲现象。在家乡活不下去的农民，只好到深山或荒无人迹的地方去开火田种些庄稼糊口。但种火田也是不得安生的。因为总督府借口“保护山林”、“防止山火”，开展了“驱逐火田民运动”。我在西间岛时就见过因种火田被驱逐的一些农民。在当时，朝鲜农民大量流亡国外是迫不得已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人驱逐到国外去，而从困于人口过剩和粮荒的本土大举向朝鲜移民。他们企图在《产米增殖计划》的第一期 15 年中就把四百万名日本农民迁移到朝鲜。本来，田中义一在 1925 年 9 月曾使“日本宪政研究会”出面发表过“迁移一千万名日本人到朝鲜的计划”。他在当了内阁总理大臣后，新设了拓务省，着手执行这一移民计划。如果日本的一千万名过剩人口都迁移到朝鲜来，那朝鲜该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民族不就被日本人挤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吗！

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农业政策，摧残了我国农民的生活，激化了民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矛盾。

农民群众为争取生存的权利奋起展开了斗争。

三·一人民起义后，在我国开始出现了佃农组合、佃农相助会、农友会、佃农同盟等农民团体。早期的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中，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佃农组合。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我国农民运动的主流是佃农斗争。20年代的佃农斗争，大都是在确保佃权、减租等经济性口号下进行的。主导这些斗争的就是佃农组合。农民组合是解放前我国农民运动最普遍的主导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的经济性口号，同时也提出了反映政治要求的口号。

在我国第一个出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是朝鲜劳动共济会。劳动共济会里设有农民部或佃农部，吸收了大量的佃农，为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早期的农民运动经历了不少的迂回曲折。

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佃农斗争越来越激烈，便出动警察用刀枪肆行镇压，大肆逮捕打先锋的农民运动先进分子。另一方面，他们施展恶毒的阴谋诡计，企图通过“朝鲜农会”所属的御用组合拉拢农民，分裂农民队伍。

早期的农民运动所以出现不少迂回曲折，很大程度上同民族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造成的不良后果有关系。当时组织和指挥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多半都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改良主义者。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混进农民运动领导班子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向淳朴的农民灌输了

“不抵抗运动论”。他们宣传说，佃农和地主不要无谓地争执，而要互相理解，和睦相处。他们说，这样做，佃农和地主的纠纷就会像春风化雪一样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农民运动的领导班子里，还有不少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者。农民运动开始高涨起来，他们为了把农民团体置于自己派别的影响下，进行了激烈的派别斗争。这些视扩张自己派别势力重于农民利益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者的派别斗争，使农民运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农民团体相互之间或在农民团体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反目和对立，许多农民团体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农民们仍继续进行了斗争。

农民以革命的暴力回答了敌人的反革命暴力。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20 年代末龙川不二农场农民的群众性斗争和端川、永兴(金野)地区农民的大规模暴动。龙川不二农场的佃农斗争，是在同到龙川地区活动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系统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下进行的群众性暴力斗争。

赤色工会国际及其下属组织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于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几次提出要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建立赤色劳动组合和赤色农民组合的问题之后，在朝鲜采取了建立革命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的具体措施。

于是，从 30 年代初起在我国新建了赤色农民组合，从前的农民组织也改组为赤色农民组合。冠以“赤色”、“左翼”这些词，是为了区别于改良主义的。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到处泛滥着“赤色”这个词。

赤色农民组合绝大多数集中在朝鲜北部一带。

直到 20 年代，我国半数以上的农民团体还都在朝鲜南部。南部的佃农斗争也比北部开展得广泛。这是因为拥有湖南平原的南部地区农户数比北部地区多得多。但是，到了 30 年代，情况就变了。农民运动的主要战线从南部地区移到了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革命的农民团体的数量和开展斗争的次数，都比南部地区多。农民运动的中心从朝鲜南部移到朝鲜北部的根本原因，在于白头山成了朝鲜革命的策源地，这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又与间岛和苏联相近。

赤色农民组合不仅在朝鲜北部，而且在以三南地区(包括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译注)为中心的朝鲜南部一带也建立起来了。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组织展开的抗日武装斗争，成为赤色农民组合蓬勃发展的有力因素。实际上，抗日武装斗争开始后，在朝鲜北部地区建立起来的农民组织，都是在国内人民同我们取得联系开展反日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自发地建立起来的。当时咸兴地方法院关于明川农民组合事件的公审记录中就载有农民组合的决议，其中有如下一段：

“那次斗争的结果，延吉县的办公室被烧毁，日本领事馆分馆被烧毁，同日军交战，日军退却，群众在金日成总指挥下投入革命斗争。”

这是当时朝鲜北部一带的农民组合在抗日武装斗争的影响下进行活动的一个明显实例。

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民族改良主义者的破坏，赤色农民组合主导的农民运动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点。

左倾机会主义者给农民组合冠以“赤色”帽子后，就高筑围墙，

实行了关门主义。他们把除佃农和贫雇农以外的所有农民都视为敌对阶级或动摇阶层，不许他们靠近农民组合的围墙一步。

爱国的中农和反日情绪强烈的地主要走进赤色农民组合的大门，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据说，当时有些村子，赤色农民组合的成员和未入组合的居民不喝同一口井的水，各有各的井。当时关门主义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赤色农民组合的关门主义，给未入组合的农民的爱国热情泼了冷水，使他们抱着敌意对待农民组合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使农民的子女也分成了组合一边和非组合一边。

赤色农民组合活动的另一个缺点，是“打倒式”的做法。赤色农民组合成员认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得过激些才算有革命性。例如，农民组合上层人物叫他们破除迷信，他们就用石子打碎礼拜堂的玻璃窗，或者推倒礼拜堂屋顶的十字架；破坏国祠堂，践踏供品；甚至从出入礼拜堂的人手里抢夺圣经，在众人面前撕掉。叫他们反对早婚，有些农民组合就袭击骑马去迎亲的新郎，抢他的马，或者把新郎扣起来，破坏婚礼，闹得年纪小的新郎有的魂飞魄散地逃回家，有的吓得哇哇大哭。

农民组合为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虽然做过很多好事，但也在部分活动中采取了粗暴做法，因此，有些人对凡是农民组合做的事，都摇头反对。

我们认为，赤色农民组合的活动中最大的弱点，是它没有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措施。因此，它未能抵御敌人的镇压和宗派分子、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危害。

不少的农民组合一干什么事就暴露组织。他们本应该想到，如果农民组合另有自己专用的井，就会暴露组织及其成员；可是农民组合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敌探即使盘腿坐在屋里，也能通过窗口很快探出谁家去打农民组合的井水。

有些农民组合甚至像今天执政党的外围组织那样，备齐了会员名册和会费收纳簿，这也是有可能暴露组织的原因。敌人每次袭击秘密据点时，都要收缴会员名册。警察利用这些名册，便能一个不漏地查出农民组合成员，一次就逮捕二三百人。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农民组合无视为保密和安全必须严密提防的事项，犯了冒险的自我暴露的毛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同敌人较量。这种自我暴露给敌人提供了全面破坏农民组合的可能性。

农民组合没有建立起农民组织之间互相支援、统一步调的活动体系。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农民组合没有正确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因而我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还不成熟，还有不少弱点。领导农民运动的上层人物，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没有科学的预见和正确的战略策略。

赤色农民组合运动尽管存在着这些弱点和局限性，但还是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坚贞的农民组合领导人和参加组合的许多农民群众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大逮捕，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顽强不屈地进行了反日、反地主斗争。

我们非常重视农民群众在农民组合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农民组合的群众性。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看做全民抗战的主力，是极其正确的。

中日战争的爆发，给我们提供了加速全民抗战准备的可能性。在这一准备过程中，如何使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意识化和组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工人阶级和国内农民群众的革命化，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中必须首先狠抓的生命线。

我认为使农民成为全民抗战主力之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国内已有的农民组织改组为祖国光复会的下属组织。然而，有不少的军政干部却给国内已有的农民组织扣上“左”倾或右倾的帽子，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应该抛弃过去的农民组合，另组织新的农民组合。认为过去的农民团体和农民运动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重建和改组，这是虚无主义的看法。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不仅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要求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宗旨，而且是自行抛弃过去的农民运动打下的基础和所取得的成果，这对团结农民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我的构想是：只要是反日和反帝反封建的，就不问其名称如何和功劳大小，把所有已建立起来的组织都团结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问题在于根据《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的宗旨来如何重建和改组濒于解体的现有的农民组合。

我们在讨论全民抗战准备问题的指挥员会议上，通过了把国内所有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或置于其影响下的方针。这意味着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我们根据这一方针选派了到国内去的政治工作员。

当时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有不少像金永国、安德勋那样在国内进行

过农民组合运动的同志。我们邻近的西间岛也有很多过去在国内进行过独立运动或农民组合运动的人。

我们对国内农民运动的领导，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的。

在保障我们对农民组合运动的领导方面，起了中枢作用的是从我们主力部队中选拔的政治工作员和西间岛地区的祖国光复会组织培育的地下工作员。要了解他们在变革国内农民运动中建立的业绩，只看被派到咸镜北道南部地区的政治工作员的活动情况就足够了。

祖国光复会成立后，我们向这个地区派遣了赵政哲、柳京守、崔景和、赵明植等可靠的政治工作员。这些同志进入国内了解农民组合的骨干分子，选拔其中聪明能干的人派到我们那里，也派到其他各地农民组合去。

城津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的许圣镇，就是经农民组合出身的政治工作员李炳璇的介绍，和我们建立了联系。他应我的召唤来到了西间岛。可是，由于仲坪矿袭击事件造成的后果，他没能见到我。后来，他在甲山通过朴达知道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运动的路线。许圣镇回家乡后，在 1937 年 9 月召开的咸镜北道南部三郡流亡者会议上转达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运动的路线。从此，我们的包括统一战线战略在内的革命路线就在咸镜北道一带广泛传播开了。

政治工作员们深入到国内革命者和农民组合积极分子中去，忘我地进行工作，用我们关于全民抗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武装他们，为把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或置于其影响下，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建设工作。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和坚贞的农民组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农民运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国内的农民组合运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农民群众对抗日游击队的热烈向往。

1936 年秋，在明川举行的妇女亲睦大会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指出：“……十九道沟工农苏维埃成立。金日成组织宣传队，到朝鲜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志们！今后，金日成到朝鲜来是确定无疑的。”同一时期，那个地区农民组合的一份决议中还说：“长白县，在建立苏维埃方面，进行十九道沟战斗，烧毁三千吨木材、营林事务所和日本领事馆，拿获八个走狗，同日军交战，日军退却。上述革命斗争均是在金日成总指挥下进行的。”吉州农民组合的《红色追慕》报在纪念十月革命的特刊上登载了“积极支援金日成部队!”的口号。这些都清楚地证明，赤色农民组合主导的农民运动同过去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民运动相比，政治色彩多么浓厚，又有了多么飞跃的发展。

赤色农民组合等国内革命组织以敬佩的眼光注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这在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领导方面成了有利的条件。

从我们开始对国内革命运动进行领导以来，国内的农民运动在路线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国内的赤色农民组合从过去偏重于阶级斗争一面的方式中摆脱出来，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农民组合的部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农民组合 OO 面临的任务是把群众对日本的不平和不满转化为革命的积极性。”这可以看作是上述情况的反映。

国内坚贞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空前地扩大了农民组合争取对象的范围。看记录了某地先觉者座谈会情况的文件，就知道当时农民运动领导人并不是只把贫农团结在农民组合基层组织里，而是提出了吸收包括中农、富农在内的各阶层积极分子的要求，并付诸于实践。只要能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斗争精神强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阶层，都吸收到组织里来，这成了组建农民组合的普遍要求。这是符合《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的宗旨的。有些赤色农民组合甚至下设小市民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把杂货商、店员、饭馆老板、经纪人、商业资本家、自由劳动者和普通学校(小学——译注)学生也都吸收进来。

国内的部分农民组合采取了连那些有良心的地主也引导他们参加反日斗争的积极措施。有些农民组合在领导反对筑路工程的斗争时，让地主参加了宣传队，还用派遣组织成员打进日寇基层统治机构和自卫团等御用团体，逐渐赤化这些组织的方法，老练地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指出，否认合法斗争可能性的理论是左倾机会主义，并劝告要把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性都充分地利用起来，熟练地结合起来。

不少农民组合在活动中既保持了独立性，又同各地取得一定的联系，从互相通报情况直到斗争方法的选择和斗争目标的确定等各方面都采取了共同步调。

在我们的影响下赤色农民组合运动发生的这种变化，为革命地改组原有农民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同国内同志携起手来，积极开展了革命地改组

农民组合的工作。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的许多地区出现了许多以过去的农民组合为基础的祖国光复会组织，新义州支会等许多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还把影响扩大到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中。不仅如此，当时我们的人以平壤、南浦、铁原、汉城、仁川、大邱、釜山、全州、光州等地的祖国光复会组织为据点，在朝鲜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中还建立了各种名称的革命组织。

我们的工作员和国内同志一面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一面着重进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工作，用依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祖国的自主独立精神武装了农民。

当时农民组织的出版物大量刊登了解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文章。

这种教育工作使农民增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农民组织继续向农民灌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思想，广泛宣传国际国内形势、社会发展规律、朝鲜革命的前途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取得辉煌战果的消息，使农民有了必胜的信心。

被派到九月山和碧城地区的工作员，通过在国内活动的闵德元把碧城地区农民组合改编为革命组织。闵德元接着同碧城地区的骨干分子们一起乘船到仁川地区，积极进行了提高当地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成员思想觉悟的工作。

金正淑也经由丰山地区于 1937 年 7 月中旬到了端川、利原地区。那时，她在丰山郡把拔里见了李仁模，同他认真地研究了以赤色读书会会员为骨干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的问题。

当朝鲜革命军国内工作小组袭击把拔里内中警察驻在所处决外号大马蜂的恶霸警察部长时，李仁模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丰山地区的先觉们组织赤色读书会，开始了反日斗争。李仁模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在 1932 年和 1933 年两次坐牢一年左右。

最近我和李仁模见面时才了解到，他为了同我们取得联系，两次到过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重要作战区二道岗。当南满部队的一个小分队袭击东兴镇的时候，他也曾到过那里。他参军的积极性是这样地强烈。他做出了这样积极的努力，却没能找到组织线，没能见到我们。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如果当时他见到了我们，那么他的人生航路就会完全不同了。

李仁模坐过两次牢，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作为丰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在把拔里分会、黄水院筑坝工地工人突击队、安山厚峙岭生产游击队等组织，积极地进行了活动。

1938 年 9 月下旬，金正淑再次在丰山同李仁模和他在丰山革命委员会里的同志们见面，讨论了扩大和加强组织，灵活开展敌后活动的措施。

李仁模在同金正淑见面后，为了发展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我们在实现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方面选为必要对象之一的汉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在李仁模的活动中最放异彩的。他同朱炳谱一起向汉城共产主义小组转达了我们光复祖国的路线，给汉城的革命运动渗透了我们的影响。

直接向金三龙转达了我们的路线的是朱炳谱。他是李仁模在赤色读书会时期的上级，在龙井念东兴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反日运动。从

1937 年起，他在汉城的某学校念书时，就经常回丰山去同那些在我们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这过程中，他同当时到丰山地区进行活动的金正淑接上了关系，比较正确地领会了我们关于国内革命的路线和战略策略。金正淑同他讨论了在以汉城为中心的朝鲜中部一带吸收国内共产主义者参加我们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问题。

据李仁模回忆，当时金三龙得知我们的统战路线非常高兴。

朱炳谱和李仁模深入到汉城地区的冶金、纺织、纤维、印刷、染色、被服等许多部门的工人中去，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劳动组合，为全民抗战准备打下了基础，同时为实现我们对国内革命组织的领导，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李仁模不仅为国内的革命运动做了很多事，而且为了把祖国光复会组织扩大到日本，也建立了不小的功绩。1940 年夏，他受朱炳谱的指示，带着《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到东京，对由丰山去的工读生们建立的丰友东京工读生亲睦会进行了革命的改组。

如上所述，李仁模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把他造就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念和意志的化身的是祖国光复会组织，是为了在三千里江山各个角落播下这个组织的种子经受了千辛万苦的白头山战士。

金正淑在丰山结束工作之后，又到东海岸的端川地区去了。在端川地区的先觉中，我们特别重视的人物是端川农民组合领导人之一李周渊，他曾参与过新干会，又参与过 1930 年的端川农民暴动。

金正淑由当地祖国光复会会员陪同，首先见了李周渊。由于端川农民暴动坐牢七年的李周渊，当时在一个山中的庙里养病。金正淑亲

切地慰问了在牢里受过苦，又生了病的李周渊，然后向他转达了我们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和全民抗战方针，并向他谈了关于实现农民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加紧准备全民抗战力量的问题。

李周渊说，他过去搞什么运动，都是不分昼夜地奔波，现在回顾起来，那好像是坐在一只坏了罗盘的破船上无目的地漂流在大海上，心里感到空虚。可现在好像坐上了新的船，心里踏实了，发誓要忠于革命。

金正淑做完李周渊的工作后，在利原遮湖附近的海边见了李镛。他是海牙密使事件的主人公、爱国烈士李俊的儿子。他曾因北青农民组合事件被捕，获释后做组织、领导当地反日会的工作。

李俊在海牙自尽后，李镛遵循父亲的“你一定要为国捐躯”的遗训，有段时期投身于独立军运动。可是，他很快就对这个运动失去兴趣。他看出所谓独立军运动只是徒有其名，没有正确的领导，做不成大事。

李镛有段时期还积极地参与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他看到那些运动的领导者像漂在水上的油滴一样脱离群众，专事派别斗争，争权夺利，虚度时光，就摇了头。后来他深入参与的农民组合，争吵也很厉害。一些学马克思留长发赶时髦的运动者占据农民组合的领导地位，随便向农民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李镛看不惯这种现象，有一天当面谴责了一个留长发的上级。对方当即驳斥说，你怎敢这么放肆，仗着你是李俊的儿子吗？李俊到万里之外去洒血呼吁，难道有人赐予了他独立吗？

李镛捶胸痛哭了一场，自己受侮辱倒可以忍受，可是想到父亲的爱国精神受到侮辱，就心痛欲裂。这个痛苦经几年也没有消。

李镛参与过独立军运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农民组合运动，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群众的力量无论有多么大，如果没有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无所作为的。

李镛一面把同志们团结在组织里，一面为同白头山接上关系竭尽了一切努力。

金正淑向李镛转达了我们的构想：在厚峙岭以南一带，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准备全民抗战力量。

李镛遵照我们的意旨，下定了为光复祖国大业献身的决心。他同金正淑分手时说，因为有我，朝鲜的命脉才得以保全，并称我为朝鲜国的正统领。有一次，我看过朝鲜北部地区的革命组织作为宣传教育材料用的一本《金兰之契传》。据了解，这是北青人编写的。北青郡青兴里有个叫松田的地方，松树特别多，风景优美而又清静，自古以来是乡绅们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吟风弄月的游乐场。

反日精神强烈的北青地区的骨干分子们，为了瞒过警察，让乡绅们出面组织了“金兰契”。金兰契，意思是只要同心同德，就坚如金石，香如兰草，象征朋友之间的深厚情义，可以解释为亲密朋友之间的一种组织。北青的骨干分子大都是“金兰契”的成员。“金兰契’的成员们常常让乡绅们带头，聚在松田装作赋诗作乐，实则进行精神修养，进行组织思想工作。在这过程中，有个见闻最广，博学不群，被人们尊为学者的年长会员编写了“金兰之契传”，其中一段用过“正统领”这个词。

李镛在那年 9 月建立了北青地区党小组，并担任其负责人。初期党小组成员是遮湖反日会的骨干分子。李镛发动党小组成员，把遮湖

反日会和附近的农民组合、劳动组合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周围，以厚峙岭以南的东海岸一带为中心组织了全民抗战力量。

同白头山接上关系之后，李周渊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周渊接受了新的任务后，没有按照和妻子约好的日子回家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他把七年如一日尽心尽意照顾了他狱中生活的爱妻留在家乡踏上征途时，心里禁不住产生了对妻子深切怜悯之情。可是，他抑制了私人感情，毅然决然地同找到庙里来的妻子离别了。

从离开那座庙直到祖国解放，他整整八年没有过过温暖的家庭生活，为避开敌人的监视不断地转移地点，和同志们一起为了向工人、农民灌输反日斗争精神，献出了一切智慧和热情。

解放后，李周渊和李镛仍像当年仰望着白头山进行斗争时一样，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做好了工作。

在高举《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旗帜，为统一战线运动和全民抗战做准备而奋斗的国内农民组合领导人中还有个叫李元涉的。他是把农民组合改组为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的吉州地区反日地下组织的负责人。1932 年他在汪清和同志们一起为了解决刚建立的抗日游击队的武器，参加过袭击大坎子公安局的战斗，后来受组织的委任到国内去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他领导的组织成员赴汤蹈火全力支援了革命军。他设法从吉州纸浆厂弄出纸张来，不断地送到白头山。当时东海岸一带的农民组织把支援革命军的各种必需品公然用汽车运到新坡和惠山。

农民组合活动家们还积极地开展了号召农民群众配合我们的武装斗争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鼓动活动。

定平农民组合的成员被关进了狱中也不停地向囚徒们宣传了我们的斗争；明川一带农民组合的积极分子们也同样大力宣传我们，号召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在准备全民抗战的日子里，在国内遵循我们提出的路线，出生入死地进行斗争的爱国烈士，是数以万计的。那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革命者和我们的工作员一道，在全国各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周围。

农民组合进行革命的改组后，我国的农民运动就同抗日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这成了加速农民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全国的农民组织通过贯彻《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斗争，为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加速全民抗战准备，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过程中，国内革命失去了许多农民组合活动家和爱国的组合成员。

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样，在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主轴的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占有显著地位。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法西斯暴政下，为恢复民族主权，为农民的阶级解放，不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的革命先辈。

四　独立旅时期的崔春国

中日战争爆发的 1937 年夏，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主要活动在长白、临江地区，等待在北满的独立旅的到来。

这个独立旅，是以游击队成立初期就和我们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为骨干组建起来的。前已指出，根据 1935 年春腰营沟会议的决定，东满地方的人民革命军各部队开赴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同中国人部队一道积极开展了联合作战。我们也在北满同第五军进行了联合作战。在此期间，我们把汪清团和珲春团的部分人派到金策、崔庸健活动的三江地区。这些人在去找北满战友的路上，补充了力量，把队伍壮大成了大部队。这支独立旅，原订于 1937 年春天返回西间岛。崔春国是这个独立旅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团政治委员。独立旅的朝鲜人，诚心诚意地帮助了北满的中国人部队和中国人民。崔春国在汪清的时候，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反日部队的关系搞得很好，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西岗会议后，我命留在北满的部队返回西间岛。然而，这支我们苦苦等待的独立旅直到打过普天堡战斗，在“七七事变”后才回到了临江地区。

我们见到他们时，都不禁吃了一惊。他们的军装已破烂不堪，脚上的劳动鞋也破得不像样，都用破布包着，用绳子缠着。我抚摸着身

穿破军装的崔春国的脊背，安慰他说，从汪清时起直到今天，你一直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吃了不少苦。

崔春国两眼淌着大颗的泪珠，说他没脸见我，因为不仅来晚了，而且在归途上失掉了崔仁俊连长和朴龙山排长等不少干练的战友。

他们是 5 月初从北满出发的，可见他们在行军途中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他们动身的依兰县到鸭绿江沿岸，距离有近万里。在这遥远的行程中，他们该经受了多少苦难啊！

林春秋十分心疼地说，他丢失了从十七岁起就当珍宝贴身带着的针盒，其中还有两根在给众多的人治病的过程中被磨细了的很珍贵的金针。

他说："这次行军，真是艰苦啊。来这儿看到整齐的帐篷，觉得到了另一个天地，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睡过帐篷了。"

我命后勤副官马上给他们发帐篷，保证他们充分休息，还给他们全体队员发了新军装。

刚吃过晚饭，崔春国等指挥员就来找我。我叫他们好好睡一夜，解除长途跋涉的疲劳。他们却说，好不容易才来到司令官的身边，躺着也睡不着，要我给他们讲讲有关中日战争的形势。他们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浴血行军，什么消息也听不着，连发生了中日战争这件事也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到的。

我给他们讲了形势：

"九·一八事变，以日本占领满洲而结束了，但是七七事变，就不会这样结束。现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战，蒋介石也不能再逃避抗日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倡议，已

建成了同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此，西北地方的红军主力，以朱德为总司令，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起来开展长期的抗战，国力和兵力都有限的日本就很难支撑下去。现在，日军虽然气势汹汹地长驱直入，但他们的膏药旗已罩上了灭亡的凶兆。

“面对着中日战争，我们已经多次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相应的决定。根据会议提出的方针，我们要在敌后积极开展搅扰战，进一步壮大国内革命力量，为全民抗战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敌后搅扰战中，我们要活动的主要战略地区是鸭绿江沿岸一带和南满地区。中日战争的基本战线是北部战线，因此，日军要运送军需物资，就必须经过鸭绿江沿岸一带和南满地区。所以，我们才在鸭绿江沿岸一带活动。你们也将在鸭绿江沿岸或南满地区开展活动。”

独立旅的同志们都因为未能参加普天堡战斗和间三峰战斗，而感到惋惜。

崔春国说，他在北满期间见到了抗日联军队伍里的许多朝鲜人，他们都非常向往白头山。他还详细地讲了他在依兰县城战斗时见到崔庸健的情景。当时，崔庸健抱着崔春国，噙着泪说，你是从金司令那边来的吧，见到你真高兴，就像见到了金司令。听说金司令为了看我和金策，特意来过北满，可是没有见到我们，回白头山去了。我听了，说不出有多么难过。

解放后，崔庸健也常谈起他在依兰县城战斗时同崔春国会见的情景。那场战斗，是崔庸健部队和北满的许多部队同东满的部队联合进行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北满各地分头活动的部队，从二三百里外骑马

赶到依兰县城趁夜袭击了敌人，天亮前又闪电般地撤走了。害怕夜袭的敌人，在兵营周围和土城上处处安上电灯，把黑夜照得通亮。崔春国部队的队员，一人一枪，把电灯都打碎了，敌人被这枪声吓得丧魂失魄，根本没敢应战。

后来，独立旅接到了我们叫他们开到西间岛来的命令，这大大震动了整个队伍。受命开往西间岛的独立旅指战员，高兴得忘了吃饭；而受命留在北满的姜健、朴吉松等指战员则大失所望，愁眉苦脸地连饭都不想吃了。

独立旅的南下行军，经历了千辛万苦。

崔春国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一面派人通知分散在各地的部队，一面让自己带领的队员都换上伪满警察制服，在平原上沿着大路行军。这时，在多次战斗中遭到沉重打击的敌人，声称要“讨伐”游击队，都开进山里搜寻游击队去了，因而平原就空了。崔春国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决定走大路。他们一路上没有经过一场战斗，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顺利地走到了东京城附近。

行军的头一阶段很顺利，但后来各部队逐渐会齐，由旅长方振声指挥队伍了，行军就开始发生了混乱。

据后来林春秋、池炳学、金洪坡、金龙根等参加这次行军的许多人讲，当时旅长方振声和旅党委书记崔春国，在指挥部队方面存在着根本对立的观点，这就成了问题。

自从过了东京城以后，队伍常常同敌人的大部队遭遇。因此，崔春国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把部队分成小分队，分头活动，以避免交火，减

少牺牲。这是符合游击战要求的正确意见。而方振声却不听他的意见，固执地坚持继续大部队行军。他说，队伍一旦分散了就很难重新集结，分散了就会削弱战斗力，在一起才算是个旅，分散了就不成其为旅了。

结果，队伍常常同敌人遭遇，损失不断增加，部队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尽管这样，全体指战员都忍受着难以言状的苦难，一心一意地盼望着早日挺进国内。一个受重伤的小队员，在崔春国的怀里咽气时，留下了要求把他的遗体埋到祖国土地上的遗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个遗愿是根本无法兑现的。崔春国把他的遗体火化了，然后把一撮骨灰用纸包起来装在司务长的背囊里，以便把骨灰掩埋在祖国的大地上。

为了减少战友们的牺牲，崔春国把分散在草地上吃草的一百多匹敌军军马悄悄而神速地赶过来，对方振声说道：

“我们已经暴露了。本应该分头活动，才能销声匿迹，可是你不允许，弄得我们遭到了损失，失去了不少战友。要是继续这么走下去，我们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快速行动，不让敌人包围我们。我们不应该让敌人追打我们，而应该由我们拖着敌人走。要是我们骑马行军，就能掌握主动，随心所欲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找机会还可以消灭他们。如果像现在这样老是被动挨打，我们要全军覆没的！”

方振声仍拒不接受，说骑马行军等于是自杀行为。不管怎样对他说，他就是不听。最后，崔春国只好把意见提到了旅党委会。

旅党委会全体委员都支持崔春国的意见。于是，伤病员和体弱的人都骑上了马，没马骑的人也把武器装备等东西都驮在马背上，轻装行军，速度立刻就大大加快了。

尾追的敌人，正如崔春国所预料的，远远地落在后面，陷入了被崔春国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境地。独立旅走到官地附近，回头消灭了尾追的敌人，然后把军马杀了做了军粮。

前一程，因为骑马行军，大家都缓了一口气。到了敦化—哈尔巴岭铁路沿线，队伍又遇到了困难——敌人已经在这一带布满了。

旅长主张后撤，说除了后撤再没有别的办法。崔春国表示反对，他说，应该继续朝着鸭绿江走，多走一步是一步，决不能走回头路；要是后撤时遇到敌人，就更危险，因为敌人显然已经往我们的后面派了增援部队。旅长大发脾气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继续往前走，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恰好一支伪满军的部队从离他们不远的公路上走过去。崔春国一看，说，跟着伪满军的后头走是个上策。旅长立即睁大了眼睛说，跟着敌人的后头走，这是什么意思？

崔春国解释说："这支伪满军拖着炮，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即使看到我们跟着他们走，也会以为是自己人，不会想到游击队在大白天会跟着他们走。所以，咱们跟着他们走比较安全，一旦通过了铁路，就隐秘地钻到山里去。"

这一回，旅长没有反对。由于采纳了崔春国的建议，部队安全通过了铁路。这以后，部队同敌人大大小小的"讨伐队"打了不少遭遇战。

在漂河附近，与五百多名敌人相遇，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天。在这场战斗中，不少队员丢了背囊，司务长那个装着小队员骨灰的背囊也在这里丢掉了。

眼看着敌人在一步步地缩小包围圈，崔春国再次强烈地主张，要

挽救全旅，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把队伍分成几支小分队，分头突围。而旅长方振声却又固执己见，他说，要是分头突围，也许有一两个连队能得救，但独立旅就不复存在了，难道为了保存自己一个人的命，让大家都分散逃跑吗？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

旅党委又开始认真讨论两个人的意见。崔春国被旅长犹豫不决的态度激怒了，捶着自己的胸脯，禁不住像一迭连声炮似地说：

“在座的人里，难道有只顾保全自己一条命的人吗？我们谁都不怕死！但不能没有走到目的地就白白送死。大家都急切地渴望着早日打回祖国去，如果我们在半路上失掉了他们，就等于我们这些指挥员犯了大罪，我们拿什么去赎这个大罪啊！因为一两个指挥员的愚蠢，而丧失了队员，我们自己也死掉了，那么谁来进行这场抗日大战，谁来进行革命呢？要想保存我们旅的力量，回到西间岛去，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分头行动！”

与会的指挥员差不多都指责和批评旅长坚持大部队行动是冒险主义，有几个指挥员甚至给他下了这样的断语：是披着同志友爱外衣的卑怯分子。后来方振声归顺敌人的事实说明，当时给他下了卑怯分子的断语，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然，方振声并不是自己找上门去归顺的，而是被俘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欺骗才归顺的。但是，不管其经过如何，他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时地流露出有可能投降变节的苗头，而这种苗头可能就是从他信念和意志薄弱、怯懦怕死的灵魂中滋生的吧。显然，当时方振声所顾虑的是，部队一分散，战斗力强的小分队和能干的指挥员一离开他，他自己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而他害怕了。

旅党委在漂河开过会以后，独立旅开始分头行动，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然而方振声很不服气，没有真心接受同志们的忠告，对崔春国更是心怀不满。

方振声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旧东北军军官出身，而且是一手掌握着独立旅指挥权的第一把手。而崔春国则来自社会最底层、连小学教育都未曾受过。他加入游击队后才开始学识字，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成长为一个指挥员。方振声那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评价一个人的优劣，决不能单凭他的学历。方振声开始有所悔悟，是几天后抢渡松花江的时候。那时，分头行动的部队已经重新会齐，恢复了大部队行军。有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队伍走到了那尔轰附近的松花江畔。因为是雨季，河水猛涨，松花江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且水势湍急。部队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渡过去。然而没有船，只有一个可乘五六个人的小舢板。部队只好用这只小舢板过河，因为人多，到天亮还没过完。渡过河去的人和等着渡河的人，都站在两岸焦急不安地盯着像蜗牛一样迟缓的小舢板，不时地抬头望着东方欲晓的天空。

就在这时，出现了敌人。崔春国立即选拔了十几个机智勇敢的队员组成决死队，一面带队迎着敌人上去，一面朝大家喊，他要去把敌人引到别处去，队伍要抓紧过河，然后到柳树河子附近的树林里隐蔽。因为他诱走了敌人，留在岸上的人才得以安全地渡过了河。队伍走到柳树河子附近的树林，等待崔春国的决死队赶回来。第四天，崔春国才带领决死队全体队员赶来了，而且每人还背来了一袋粮食。

这时候，方振声才抱着崔春国，承认了错误，道了歉。

我听着独立旅在北满的活动情况和南下的经过，最感到高兴的是，独立旅的全体指战员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同离开我们时相比，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崔春国是其中的楷模。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是精于游击战术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十分成熟的政治干部。在独立旅到北满活动和从北满南下的过程中，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又有很大提高，达到了纯熟的程度。

他从小给人家扛活，后来去铁路工地做工，加入游击队后，因为聪明机智，很快就学会了射击和制式动作。我赏识他的品德和能力，任命他为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当时他哭丧着脸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的水平都还很低，怎么能去指导别人。他说他有把握的是打日本鬼子和走狗，恳求我继续让他当一名普通战士。我对他说，把你热爱祖国、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播到战士们的心田里去，就能很好地完成政治指导员的任务。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并在头一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要把地面当笔记本，努力学习。"

从此以后，在学习和训练上，他格外努力。他在学国文字母的同时，还开始自学汉字。他急不可耐地学汉字，是有其缘由的。有一天，他来问我"以整化零"是什么意思。我便给他说明"以整化零"每个字的读音和字义，然后说明了这句成语的含义。他听了，自语道："这个汉字可真神透啦，真后悔我没念私塾啊!"

他把一本汉字字典经常装在背囊里，一有空就拿出来学。

前面讲过小汪清防御战一直打了九十多天，打得十分艰苦激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春国一天也没有中断过学汉字。

有一次我到崔春国连队驻地三次岛去，对他说，政治指导员还应当能歌善舞，才能使连队朝气蓬勃，充满乐观精神。从此以后，崔春国天天夜里悄悄地溜到僻静地方去练习跳舞。他练跳舞十分专心，以至被连队炊事员高贤淑发现了，自己还没觉察到。有一天天还没亮，高贤淑起来做饭偶然发现崔春国在练跳舞。高贤淑大吃一惊，急忙跑去找连长，战战兢兢地说，政治指导员好像精神失常了！连长听了捧腹大笑，把腰都笑弯了。这在后来成了三次岛有名的轶事。

崔春国就是这样一个诚实埋头苦干的人，因此，在东满游击区时一有什么艰巨的任务，我就交给他的连队去完成。在同五千多名敌人打了九十多天的激烈的马村战斗中，也是崔春国的第二连起到了骨干作用。为了打击敌人的背后，我带领部分部队离开根据地的时候，总是把保卫根据地的任务交给崔春国，而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正因为我这样信赖他，我外出时就让他代行我的职务，我应当去却不能去的重要场所，也总是由他替我去。这种状况，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就习以为常了。我和崔春国虽是感情很深的至交，却常常不能在一起，原因就在这里。

我望着崔春国成熟的面貌，不禁想起了在抗日大战的风暴中大显身手，发挥着杰出军事才能的许多战友——崔贤、安吉、金策、崔庸健、李学万、许亨植、姜健……

敌人悬赏缉捕的许多抗日名将，除了在黄埔军官学校当过教官的

崔庸健，没有一个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而且都是几年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军人的。就是这些人，现在都已成长起来，成了多么有才干的军事指挥员和出色的政治干部啊！

我望着崔春国那可靠的、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心中想：

“我们已经有了一批能够在一个战略要地独当一面的可靠人才。将来时机一到，就可以给他们每人配备一支队伍，把解放祖国的作战任务交给他们，指派他们或者到咸镜北道去，或者到狼林山脉去，或者到太白山方面去。这些部队一打入国内各地，国内的生产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会响应他们，到处起来进行斗争。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会灭亡，我们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独立旅来到的那天晚上，跟汪清时期到三次岛第二连去的时候一样，我和崔春国一起睡在一个帐篷里。好久没在一起了，这一夜真是感慨万端。我们久别重逢，畅叙幽情，直至天明。那天夜里，崔春国对我说：

“假如我们心里没有要去白头山的念头，也许早在半路上就垮掉了。因为我们都抱定了一定要活着踏上祖国大地的决心，就是陷入了死地也开出了一条活路；有时累得筋疲力尽地倒下了，又鼓起勇气站了起来。我除在汪清作战时去过几次家乡稳城以外，这几年再也没回过祖国。真想闻闻祖国泥土的气味呀！”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情不自禁地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你这样怀念祖国，可我恐怕不能让你很快就回到祖国去了。我不得不把本来准备过一两天再对他说的话都说了。

那时候，东满和南满的抗联部队最感到困难的是缺乏干部。南满

部队因敌人的“讨伐”而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抗联第一军的游击斗争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以致敌人狂妄地宣称“南满共匪已完全肃清，治安确有保证”。要想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其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的南满地方扩大和加强游击斗争，首先需要充实军政干部队伍。尤其是曹国安师长牺牲后，在南满部队采取特别措施搞好指挥员的警卫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军和师的近卫队、骨干队伍的警卫队，当然应当由最能干的军政干部和经过锻炼的战斗员组成。这是所有指挥员一致的看法。魏拯民考虑到这一点，从这年春天起就提出要求，等崔春国的独立旅一回来，就把他们全都拨给他。

我深知南满部队的困难和南满游击斗争的战略意义，也知道魏拯民的苦衷和心愿，因此我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我接着对崔春国说，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实在对不住你。他反而安慰我说：

“革命需要我去，我就该去。请不要难过，我总会有机会在您身边工作的，凯旋祖国的一天也不会远了。”

“你这样想得开，我就谢谢你了。老实说，我是很想把你们这些从汪清时候就跟我在一起的人都留在我身边工作，可是老魏(魏拯民)他的胃口很大，就是要你们。”

魏拯民听到独立旅回来了，第二天就来找我，意味深长地说：

“听了独立旅同志们的话，我受了很大的震动。部队的存亡，还是取决于指挥员呀！指挥员胡涂，部队就要灭亡。方振声没有资格当旅长。我曾打算把警卫团交给他，现在看来不能不取消这个计划了。苏联在国

内战争时曾有不少沙俄军官出身的人起了很大作用，可我们却没有领受到这种好处。我们连一个能指挥警卫团的军政干部都没有，真糟透了。”

他这一番唠叨，隐含着要我从朝鲜人中给他挑选团长和政委的意思。

这天，独立旅开会总结了前一段的战斗历程，高度评价了崔春国灵活地指挥队伍胜利完成任务的功劳，表扬了起模范作用的队员，也对方振声和追随他的指挥员作了批评。在会议结束时，我强调指出了在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时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不打游击战而是打正规战，那就愚蠢得像燕子不是飞在天上而是爬在地上觅食一样了。古时的兵书也指出，知道该战还是不该战的人才是胜利者；置敌于死地，伺机取胜的人才是能征善战者。

“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样的敌人遭遇，一定要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有胜利把握的仗。”

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魏拯民等中国人指战员，因此，我讲话用的是朝语和汉语掺半的。

会后，我们新编了警卫团。团长是我部的警卫连长李东学，政委是崔春国。还决定让林春秋在魏拯民身边负责给他治病。原属独立旅的其他人也都拔给了魏拯民。这样，魏拯民就拥有了一支由精明强干的最优秀的朝鲜人军政干部和英勇善战的战斗员组成的警卫团。

魏拯民如愿以偿，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但是，转到警卫团去的人中却有不少人因为不能和我在一起而闷闷不乐，连林春秋都恳求把他调到国内政治工作组去。

几天后，新编警卫团就要随魏拯民向南满的辉南地方进发了，崔

春国来找我辞行。那是刚过了中秋的月夜，我们坐在司令部帐篷旁边的草地上道别。

“你刚从北满回来，还没缓过一口气，又要到南满去了。我总是这样叫你来不及喘一口气就派到远方去，真过意不去呀。”

“嗨，哪里的话。您这样信得过我，我就更有力量了。”

“听说辉南地方，敌人的警戒很严，你可要加倍小心，绝不能像打稳城渡口派出所那样莽撞冒险啊。”

打稳城渡口派出所的事，指的是 1935 年初崔春国带他的连队过到豆满江对岸袭击长德渡口的战斗。这是我们为很早就开始计划的国内进攻作战进行的一次示范性的战斗。

这个渡口上的派出所，专门搜查渡过豆满江的行人，那几个警察心狠手辣，十分凶残，地下组织的成员带着支军物资从稳城渡江，每次都要两手捏一把汗，有时还被他们没收。因此，稳城地下革命组织要求我们狠狠地惩罚他们一下。于是，我们就把袭击这个派出所的任务交给了崔春国的连队。

黎明，崔春国带几个队员穿过封冻的豆满江，走到派出所附近把队员都部署好，然后独自走进了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警察，完全可以不发一枪就解决战斗。可是他看到那个警察正在踢打一个打杂的小孩子，骂他没有早早生火炉。崔春国立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开枪打死了那个警察。因为发出了枪声，他们不得不匆匆撤了回来，对聚在派出所院子里等着办渡江手续的群众，也来不及作一场鼓动演说。

这虽是一场只打死了一个警察的小仗，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

们纷纷议论，游击队只那么几个人，就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攻打一个国境哨所，说不定往后还要出什么更大的事儿呢。

这天的枪声，是日后对鸭绿江、豆满江沿岸的敌人大力开展扫荡战的信号。

崔春国因为当时没有完成政治工作任务而十分痛心。他说：

“那时候我还幼稚，要是不犯急性病，再慎重些，是完全可以向群众作一次大快人心的鼓动演说的。就是因为莽撞，没有达到主要目的。”

“大胆行动是好的，但作为指挥员，任何时候都要全面考虑，要做到周密细致。现在，你不仅挑起了一个团的重担，而且还担负着保卫军部的重任，做事需要更加慎重了。要记住，无谓的冒险是要不得的。为了光复祖国的大业，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为解放祖国作战的时候，我会把你们无条件地调回来，那时候我将加倍还你们的债，弥补你们没能参加普天堡战斗的缺憾。”

也许是这话起了作用，崔春国跟他去北满时迥然不同，轻松愉快地离我而去了。到了南满，他继续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我在派他去南满的时候曾交给他一项任务，叫他做好独立军的工作，把以桓仁、集安、通化为中心活动在鸭绿江沿岸一带的独立军争取过来。这项任务，他也完成得很好。魏拯民常常给我来信，自豪地告诉我警卫团的活动情况。他派通信员带给我的消息中谈的，崔春国用一封信任意摆布几百名伪满军的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有一天，崔春国带着队伍从敌人的一个军事要地近旁通过时，侦察到那里只有几百名伪满军和伪满警察，便给伪满军的部队长送去了一封信：

“我们不把中国人当敌人看，也不想和中国人为敌。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别想碰我们。现在我们很需要休息，准备到你们富尔河的土城里去歇一阵，警告你们不要妨碍我们。”

崔春国写这封信，是充分考虑到了伪满军不愿同游击队交火的精神状态的。

伪满军立即派联络员答复说，完全接受革命军的要求，只希望给他们提供三十分钟的时间。崔春国答应了。伪满军便利用这三十分钟撤出土城躲到后山去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在城里让游击队进城来休息，日后日军追究起来就没有借口推脱责任了。

崔春国带着警卫团进到城里，一面休息，一面还做了群众政治工作。到了傍晚，躲到后山去的伪满军开始焦躁不安，连连吹起口哨。他们怕日军来，但又不敢叫游击队走，只好吹起口哨，希望游击队理解他们进退维谷的处境。

崔春国发出了出发的命令，还给伪满军的部队长留下了一张纸条：

“我们休息好了，谢谢你。希望你们今后把我们当作朋友，帮助我们。朝中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朝中人民必胜。”

崔春国就是用这种办法摆布伪满军，争取他们走上抗日道路。令人吃惊的是，他给伪满军部队长写的信，大都是他亲手用中文写的。

在 30 年代的后半期，崔春国一直纵横驰骋在南北满广阔大地上，积极支援了抗日联军的中国人游击队。因此，中国人民和革命同志都爱戴他，说他是国际主义战士，赞扬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朝中友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是什么使崔春国成了名震南北满的抗日骁将呢？

抗日革命时期的每个瞬间，等于平时的一个月甚至十年，迅速改变着人们的面貌，使人迅速成长。正如生铁在熔炉里炼成钢一样，过去的睁眼瞎、衣不蔽体的穷光蛋，被人歧视的受气包，在革命这个巨大的熔炉里，锻炼成为战士、英雄、时代的先驱，进而成为改造社会、开创新时代的主人翁。

崔春国就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革命，在斗争中不断锻炼成长起来的。

这里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可以说明崔春国的为人。

祖国解放后，崔春国结婚建立了小家庭，林春秋去看望他们时，开玩笑地问崔春国的夫人，丈夫如意不如意？夫人羞怯地微笑着反问说，她的丈夫真地参加过游击斗争吗？她接着讲了前几天在崔春国的部队开运动会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开运动会那天，军人家属也都被邀请去观看，崔春国的夫人也穿上节日服装去了。晚上回到家里，崔春国一脸不高兴地问他的妻子说：

“难道你真的没有好衣裳穿？在大庭广众之前，你何必穿那么个麻布衣裳？”

妻子一听他说是“麻布衣裳”，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她笑丈夫把夏布当成了麻布。

“那不是麻布衣裳，是夏布做的。夏天穿的衣裳，再没有比夏布衣裳更好的呐。”

“是吗？”

崔春国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还向妻子道了歉。

崔春国的夫人接着对林春秋说，真不知道他那么个老实憨厚的人，是凭什么胆量跟日本鬼子打仗的。

林春秋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你算看对了。崔春国同志确实是个老实憨厚，心慈手软的人。他袭击稳城渡口派出所的时候，看见一个打杂的小孩子被警察打得鼻子出了血，很心疼，他打死警察来不及给那孩子擦掉脸上的血就撤走了。他后来常提起这事，心里很难过。另一方面，你的丈夫又是个无比刚强的人。你好好看看他的左腿，会看到一块伤疤的。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腿骨，是我给他动手术和缝合的，因为没有麻醉剂，只好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做手术，那个疼痛是难以忍受的，但他一声也没喊，硬挺住了。你的丈夫啊，对人民群众和同志，像绵羊一样温顺；对敌人，像老虎一样凶猛；在困难面前，像钢铁一样坚强。这就是你的丈夫。往后要白头偕老嘛，你会明白他是个多么刚毅的人。”

然而，这对前程似锦的夫妻，并没有像林春秋说的那样白头偕老。

1950 年 7 月 30 日，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爆发才一个月多一点，师长崔春国带领第十二步兵师指挥安东解放战役时，在离安东市只有咫尺的地方，不幸身受重伤。参谋长池炳学闻讯赶来时，他正躺在路旁的一辆吉普车上，处在昏迷状态中。池炳学喊了他好几声，他才吃力地睁开眼睛，恳求军医把他的生命再延长五分钟。他在这最后的五分钟里，使出最后的力气，给参谋长具体说明了全歼安东守敌的作战意图。

“我托你，你要替我坚决把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命令执行到底。”这

是崔春国握着池炳学的手留下的遗言。

听到崔春国阵亡的噩耗，我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崔春国微微地跛着左脚走路的样子，根本不能相信他确已牺牲了。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左腿骨被打伤，成了瘸腿。他用这条瘸腿南征北战，不知走了多少万里路。解放后，他负起保安干部训练所分所所长的重任，当学员进行渡河训练时，他和学员一道抢渡大河，当学员进行爬山训练时，他也一起爬越险山峻岭，为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献出了全部心血。

如今在他的家乡——他过去出没无常吓得敌人胆战心惊的豆满江畔的稳城，立有他的铜像，再现了他抗日革命时期身着戎装的英姿。

塑造他铜像的雕刻家们为深入了解他的容貌和性格，曾访问过他的夫人。他们最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你在回忆崔春国同志时，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说不上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要说有，或许可以说他说话不多吧。婚后几年间，他说的话通通合起来也没有一百句。倒不如性格粗犷，打我一记耳光，也许还能留下可回忆的事。”

崔春国的夫人，因为他们的夫妻生活没有留下可资追忆的趣事而深感惋惜。她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见见我的老二吧。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也一样老实。要长得完全一样，就该有点刚毅的性格才好，这一点现在还难说。但我想一定要让他做一个像他爸爸那样的人。”

同结婚初期不同，她现在深知她的丈夫是多么出色的人。

是的，无比柔顺而又无比刚强，这就是抗日骁将崔春国。

五　九月号召书

1937 年 9 月，为了应付中日战争的新局面，我们发出了致全体朝鲜同胞的号召书，并向国内派遣了许多政治工作员。我自己也决心到国内，到工人大量集中的地方去，为准备全民抗战打开突破口。第一个目的地是咸镜南道新兴地区，第二个目的地是丰山地区，随行人员有十几个人。

当时，祖国河山是危险的敌占区，带着为数不多的警卫人员到国内腹地去，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的军政干部多次恳切地劝阻我，不让我到国内去。看到我穿一身西装要走，“烟斗老头”就极力劝阻，他说，敌人警戒森严，司令官怎么可以装扮装扮就到咸兴近处去呢？可是，我没有改变主意。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弥补金周贤小分队国内工作的失败造成的损失。

我严肃地对待九月号召书，把它提出的要求当作对我自己的要求。

当我执意要到国内腹地去的时候，最显得难为情的是金周贤和他的小分队成员。金周贤甚至想，是因为他们小分队误了大事，司令官才要亲自去做国内工作。老实说，我对他们也并不是一点不生气的。

九月号召书因于 9 月发表而得名，在这份号召书里，我们着重提出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其一是启迪我国人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

和朝鲜革命的关系，使他们不失去信心，继续加强反日斗争。

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当中有不少悲观论者。他们看到中日战争越来越激烈，日军的战果不断扩大，就认为朝鲜的独立是不可指望的了。从那年 8 月初起，崔南善、尹致昊、崔麟等所谓的著名人士，陆续在国内外报纸上发表了鼓吹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文章。

这些文章，我也读过。崔南善写道，日本的存在和勃兴是亚洲的机运，是东方之光，并主张东方各民族应以日本为盟主大同团结。

三·一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崔南善，早年曾说，白头山乃是东方万物之最大依支、东方文化之最要核心、东方意识之最高渊源、东方大众之原籍、其活动之主轴，并说东方的一切风云，其气流之动原无不在白头山。他还曾说，无论在何时何地，轻拂额头的是白头山的风，湿润嗓子的是白头山的泉水，耕、种、收、侍弄的是白头山的土。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摇身一变，却说什么日本的存在是亚洲的机运，是东方之光。实在令人惊讶。

崔麟极力说什么要实现“内鲜一体”，发扬“国民的赤诚”。从这个三·一独立运动三十三个发起者之一的人发出的言论来看，确实是背信弃义的卖国言论。

尹致昊主张，朝鲜人和日本人处于风雨同舟的共同命运。

通晓我国近代史的人都熟知旧韩国时代的高官尹致昊。他虽然身居高官大爵，但坚决反对“韩日合并”，并因此而坐过牢。七七事变时，他已年过古稀。很难认为这样一个老人，为了自身的显达或怕死才逢迎日本帝国主义的。听说，祖国解放时他已年逾八旬，觉得无脸见人，

便自尽了。他想以自尽来洗刷自身的耻辱，可见他还是有良心的人。我认为，这样一个人转向日寇，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势力，又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发展的趋向。

我们向新兴地区进发的时候，张海友从三水附近为我们带路，他也很想知道中日战争的前途。我对他说，如果眼光短浅地看中日战争，就有可能感到绝望；但是，中日战争将使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在广阔地区，从而使他们陷入兵力不足、物资不足、补给困难、原料不足的困境中，因此中日战争对我国人民的独立战争，不是带来绝望，而是打开了光明的前程，换句话说，给我们带来了达到目的的绝好机会，我们应该加紧进行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全民抗战的准备。

九月号召书着重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指明准备全民抗战的战略途径。所以，我们在号召书里写进了如下内容：

“中日事变后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毫无疑问，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国。不会有比这更有利的机会，所以，一旦有事我们就必须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在后方建立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作为举行武装暴动和破坏活动的先锋组织，是特别重要而紧急的任务。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要发动自己的成员举行武装暴动，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烧毁和破坏军工厂及其他重要企业……全民抗战时机一到，就要配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彻底打败日军。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实现朝鲜的独立。”

我们在九月号召书中提出了以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为中心更加广泛地准备全民抗战的战略方针。

发出九月号召书以后，我们把进入国内的第一个目的地定为新兴地区，就是因为这一地区跟咸兴、兴南等我国工人最集中的大工业城市邻近。

在位于赴战岭山脉南麓的新兴地区的密林里，已由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建立起好几个密营，作为小分队的活动据点。我们预先约好兴南地区等东海岸各地的政治工作员和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的骨干到其中的一个密营会合。

我们把丰山地区定为第二个目的地，是因为这个地区有水电站建设工地的许多工人和参加了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天道教教徒。

我们要经过新兴到丰山，直线距离就足有八百多里。

我们把油印的九月号召书装在金凤锡的背囊里上了路。见到张海友后，首先给他看了号召书。我们在三水附近的青山岭中腰休息的时候，张海友把号召书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说，号召书着重提出了建立生产游击队和工人突击队的问题，这一条特别合他的心意；还说在元山总罢工时看到，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确实是了不起的。

正如他说的，1929 年的元山总罢工，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和相互协助精神。

发生元山总罢工的第二年，新兴煤矿工人举行了暴动。在那以后，朝鲜各地每年都接连发生工人罢工。但是，这些群众性罢工斗争，几乎都中途受挫，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起草九月号召书的时候，力图从过去工人运动的经验中取长弃短，开辟工人运动的新航路，以便不再重复令人痛心的失败。

我国近代产业劳动的产生，是在 19 世纪末叶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外国资本开始大举侵入我国之后。有些人认为我国近代产业劳动是 18 世纪产生的，但那时候的近代产业可以说还处在萌芽状态。封建朝廷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外国资本像洪水般畅行无阻地涌进来，修筑了港口，敷设了铁路，建立了工厂，开发了矿山，随之，码头工人、矿山工人、铁路工人、土木建筑工人等产业工人的队伍也急剧扩大了。

随着产业劳动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工人团体。19 世纪 90 年代末，已有叫李奎顺的人组织了码头劳动组合，有些人说这是我国第一个工人组合。

早期的工人团体是以结义兄弟或互助契的形式组织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劳动契或组合的形式。“乙巳保护条约”炮制出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近代式劳动组合，如镇南浦劳动组合、平壤新仓里劳动组合、群山的共同劳动组合等。

虽然当时的劳动组合几乎都是在各工厂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但这些劳动组合一出现，就发生了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斗争，这是无疑的。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劳资纠纷。进入 20 年代，出现了“劳动共济会”、“劳动大会”、“劳动联盟会”等全国性的合法工人团体，从此，工人的斗争就从单纯地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争议发展为抗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政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公布“治安维持法”，开始强化对群众性工人团体的镇压，逮捕和监禁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解散工人团体，严禁集会。我国工人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1930 年 9 月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通过了世称《九

月提纲》的决议：《关于朝鲜的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提纲》，强调要按照产业系统组织工会，下面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工人商谈室，使组合有牢固的下属组织。1931 年 10 月，泛太平洋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分析了朝鲜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制定了组织非法的赤色劳动组合的当前任务。

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声援下，从 1931 年起在我国平壤、兴南、元山、清津、汉城、釜山、新义州等工业城市，组织赤色劳动组合的斗争激烈地开展起来了。这些赤色劳动组合对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敌人的残酷镇压，没来得及大发展就落到了被迫停止其存在的地步。当我们带着九月号召书去新兴地区的时候，劳动组合领导人几乎都被捕入狱，还有的或变节或躲起来过隐居生活，实际上，劳动组合已徒有其名了。

经历了不少曲折的我国工人运动的严重教训，也在于革命群众没有正确的领导。

我们冷静地分析了过去的工人运动，认为只有首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尽快重建劳动组合，依靠工人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做好全民抗战的准备。

从这种意义上说，九月号召书的发表，是根据中日战争爆发的新形势，恢复严重衰落的我国劳动组合运动和农民组合运动，并改变路线的一个转机。

我和张海友一起攀登青山岭的时候，一直交谈了关于劳动组合的一些问题。

张海友曾搞过独立运动，走遍朝鲜各地和中国、苏联滨海省一带，饱经了风霜。他对过去在咸兴、兴南地区进行活动的太平洋劳动组合有关人员也知道得很多。他说，赤色工会国际下属的太平洋劳动组合海参崴朝鲜支部负责人叫金镐盘，在他的领导下于 1931 年 2 月首先组织了使咸兴工人联盟赤化的咸兴委员会。

我从张海友那里得知了咸兴地区赤色劳动组合不少干部的名字，其中还有一个叫马场正男的日本工人。张海友说，金镐盘带着太平洋劳动组合海参崴支部提供的劳动组合资金 1200 元，和他的夫人一起在咸兴、平壤、汉城等地进行活动，于 1931 年夏被警察逮捕。还有，不是 1932 年就是 1933 年，太平洋劳动组合下属咸兴地区日本人劳动组合的成员也都被捕。

为了弥补咸兴、兴南地区劳动组合运动出现的空白，补充新的活力，我们早已向这一带派去了朴金俊、金锡渊等一些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政治工作员。但是，他们也未能躲过企图连根拔掉这一地区劳动组合运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朴金俊等好几个劳动组合的领导人留下很多工作，被关进了监狱或拘留所。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从 1937 年春起向兴南地区派去了好几名在西间岛培养的政治工作员。

我们一行登上了青山岭的时候，在新兴地区秘密根据地进行活动的小分队负责人韩初男突然来找我们。

我问他，叫你在密营待命，为什么来了。他说，赴战有野口的别墅，敌人的警戒比往常更严，因为放不下心才赶来的。他一来，我们

就打发张海友回新坡去，由韩初男为我们带路。

走不多远，我们面前出现了碧波荡漾的大湖。韩初男说，那是赴战湖第二号坝，沿左岸走上去就可看见第一号坝，在那个坝近处有警察驻在所，从那儿再往上走三四里路，就是野口的别墅。

日本的新兴财阀野口，为了在朝鲜建立军需工业，垄断电力和化学工业，修建了水电站，在兴南建立了朝鲜氮肥株式会社，还建立了军需工业会社。他还在便于监督在赴战和虚川修建水电站的地方盖了别墅。

只要追溯一下赴战湖的悲惨历史，就可以了解野口怎样残酷地剥削了我们朝鲜人民。

1925 年，野口到赴战高原转了一圈后，致函斋藤总督说，那里水力资源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又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准备在那里修建水电站。斋藤总督看了这封信后鼓励他说，你可以随意雇用廉价劳动力修建水电站，大日本帝国宪法将给予保护，放心干吧。

赴战湖大坝工程于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动工，修引水渠时根本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发生了各种事故，丧命的朝鲜工人竟达三千人之多。大坝工程收尾时，为了尽快蓄水，竟然没有让湖周边的农户迁移就关了水闸，致使六百多农户遭受人为的水灾，走投无路。举行通水典礼那天，鬼子们说要以少女祭水神，才能得到水神保佑，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了把一个朝鲜少女活活投进湖里的野蛮行为。

野口经常说，要把朝鲜工人当牛马看待。在修大坝时，野口使唤朝鲜工人的狠毒劲儿，连一些日本人也责难说：“野口走过的地方连草都长不出来。”

因为野口别墅周围的警戒特别严，我们只好绕过别墅走了好几天才走到了基本目的地新兴的东奥洞密营。途中，我们遇到了避开日本鬼子的耳目躲进山里过日子的二十来个青年，他们躲进山里的原因和经历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在赴战江电站建设工地用石头砸死了作恶多端的监工；有的因偷工程用的炸药被敌人发觉了；有的从咸兴前往兴南的路上捡到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野口榨取我们的膏血来制造化肥”的传单带在身上，被警察搜了出来，于是逃进了山里。

来自高原的叫“崔面长”的大个子青年，自我介绍说，他是“官制共产主义者”，“面长”并不是官职，而是因为他脸长得像萝卜一样长，同伙们给他起的外号，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他诙谐的自称。他曾到汉城去念中学，因为家里供不起学费，中途退学回到了高原，又因为找不到职业，只好闲待在家里。这时附近的一个工厂发生了赤色劳动组合事件。敌人不仅逮捕了有关人员，连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也都抓去了，“崔面长”也是其中的一个。审问时，他照实说，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却说他撒谎，施加严刑拷打，甚至往他的鼻孔里灌辣椒水。他抗不住拷打，做了假招供，说他参加了劳动组合运动。从这时起，特高科警察就开始教他本来不懂的一些共产主义口号和常识，想硬捏造出一个共产主义者。

“你为什么信奉共产主义？把动机说出来。你可能说不知道。共产主义者都说要在世界上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工农政权。难道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搞共产主义的吗？你说！”警察这么一审问，他就回答说：

“是的，是那样。”他这样受了三个月的预审，还真知道了一些共

产主义的道理。他坐了一年牢，出狱时自己觉得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者”了。他出狱后，日寇继续盯他的梢。高原警察署特高科警察制造出来的“共产主义者崔面长”，为了同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接上关系，翻山越岭朝北走，途中遇到了这些同伙，就留在山里了。

“共产主义者崔面长”对我说，聚在这里的青年都有决心打日本鬼子，愿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听了他的话，笑得最厉害的是金平。金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听了这话，也会捧腹大笑的，马克思曾说资本家不仅制造着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商品，而且还制造着将埋葬他们的无产阶级。现在看来，日本帝国主义警察正是制造出了将埋葬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看，如果我们没有到祖国来，难道能了解这些现实吗？祖国的青年都这样抱着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心，奔到山里来到处找我们。

我们散发给这些青年几份九月号召书，并叫他们同赴战岭秘密根据地的小分队取得了联系。

沿着赴战岭山脉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我视察了几个密营，察看了地形，认为这一地区正是可作为将来开展全民抗战的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支山脉还同白头山脉相连。

我们到达松树茂密的东奥洞密营的时候，那里已有先期到达的三十来名政治工作员、革命组织负责人、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骨干分子，他们都是从紧靠赴战岭山脉的东海岸地区来的。

在金在水和金正淑的领导下建立了兴南地区地下组织的魏仁灿，

由金赫哲带路，也来到了。他的身上发出一股鱼腥味。我问哪来的鱼腥味，他说，为了蒙骗敌人，乔装成卖鱼的，背来了一网袋青花鱼。这两个人都是在桃泉里生长的竹马之交。他们少年时热切向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到滨海省去看看，跟金公洙一道，瞒着父母作过冒险的旅行。这三个人的父母和亲戚，思想倾向都很好。

1937 年 6 月，魏仁灿接受桃泉里祖国光复会组织交给的任务打进了兴南地区。紧接着，金公洙等几个工作员被增派到兴南地区。与此同时，许锡先被派到元山，李孝俊被派到新兴煤矿，康炳善被派到昌城，朴于贤在清津同祖国光复会组织取得联系，开始进行工作。

祖国光复会兴南地区委员会是在那年 8 月建立的，可已经吸收了很多工人，工作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其负责人魏仁灿让他母亲开了个工人小吃店，把它用作联络站，随时向金正淑和金在水汇报工作情况。他们到兴南建立第一个组织的经过，是很有教益的。

来自桃泉里的工作员们首先在本宫化工厂建筑工人中扎下了根。这些工人中还有个才十四岁的少年。他干的活儿是把烧红的铁钉抛给在高处做工的铆工。有一天，发生了这个少年突然丧生的惨祸。当时他抛上去的铁钉正巧撞上从上边掉下来的铁片，铁钉掉进了电石桶，霎时电石爆炸，他全身烧伤倒了下去。当工人们拥来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日本监工想把少年的尸体立即送到医院去，为的是捏造事实，说少年是在医院治疗中死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平息工人对厂方未搞安全设施的不满，还可以不给少年的家属发抚恤金。工作员们当即揭露监工的阴险用心，工人们愤怒地骚动起来，监工们吓得没敢动尸体。

安葬了少年后，工人们向厂方施加压力，叫他们给少年的父母发抚恤金。

通过这件事，兴南的工作员们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第一个组织。他们打出“协助契”这个合法招牌开展工作。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有一个中年男子突然找到“协助契”来，自我介绍说，“我是普罗品铁伦!”普罗品铁伦是赤色工会国际的简称。看样子，他好像做过太平洋劳动组合的事。这个自己抬高自己是普罗品铁伦的人说：“我警告你们，要自重些。由于中日战争，近来日本人变得更残暴，不要跟他们对抗。不要出面跟他们要抚恤金什么的。因为你们不谨慎，我这个黑名单上的人要遭殃。”他说完就匆匆地走掉了。

从此，在兴南的工作员们认为劳动组合的人从极左转向了极右，开始对他们存了戒心。

金锡渊是接受了在西湖地区的劳动组合中扩大党组织的任务而被派到国内的。他也愤愤地说，在过去的劳动组合成员中，有很多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吓倒，像日本的“白色劳动组合”和欧洲的工联主义者一样走上了妥协道路。

听张海友说，兴南地区赤色劳动组合在成立初期反日斗争搞得很好。1930 年初，兴南劳动组合在工厂近处搞了保管秘密文件的地下室，积极地开展了活动。组合的成员还在这个地下室印了檄文。一到夜晚，他们就到街上去贴反日标语。当年那些勇敢的赤色劳动组合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对兴南的同志们指出，对太平洋劳动组合的人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是非常不对的，如果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劳动组合的人就不会走工联主义的道路。接着给他们指出了往后的斗争方向。

“……首先我们要在东海岸的城市、农村、渔村、煤矿及其他矿山建立更多的祖国光复会下属组织，把隐蔽起来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的人都找出来，争取在几年内在新兴、兴南、咸兴、元山一带建立一支至少有几万人参加的抗战力量。要以赴战岭山脉为中心建立秘密游击根据地，当前要经常保持几支各有几百人的武装部队。要在工人中建立突击队，在农民中建立生产游击队，使这些组织都成为看不见的秘密组织。

“我们要使九月号召书像地下水那样悄悄地渗透到群众中去。

“抗日革命初期，我们枪支比人数少，而现在，枪支多，人员不够。要用剩余的枪把国内的青年武装起来，到了关键时刻就让他们投入全民抗战……”

当时我强调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这些。

谈完后，第二天我就动身到警察的监视不太严的新兴煤矿去。新兴煤矿的代表李孝俊为我带路。

好几百户不幸的煤矿工人家属挤在破旧不堪的临时窝棚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每年都有几十人因疾病和工伤事故丧命。我把聚到这里来的地下组织成员和劳动组合骨干分子召集到参圃山的秘密地点，向他们解释了九月号召书，指明了当前任务。

当时，煤矿的一个地下组织成员来找我说，他的一个曾当过赤色

劳动组合干部的堂兄，现在化名隐居在这里。原来，他的堂兄是在敌人大肆逮捕劳动组合成员的时候来到新兴的。由于劳动组合对罢工的领导不力，有许多人被捕入狱，其中有些人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了组织的秘密。警察逮捕劳动组合领导人的时候，他的堂兄好不容易逃脱，来到了煤矿，可是他觉得没脸见劳动组合的同志们，不敢露面。

我在离开新兴煤矿之前召见了他。当我要他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时，他爽快地答应说，愿意挺身而出，把惨遭破坏的劳动组合重建起来，一定要贯彻执行九月号召书提出的任务。他完好地保存着劳动组合成员的名单。兴南地区劳动组合的人，他几乎都认识。

我们帮他同兴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心情舒畅地向丰山出发了。我们在红蚁岭密营住了一宿后，径直走到了黄水院大坝建设工地。

在气候恶劣的岭北地方，栉风沐雨修筑大坝的民夫们的惨状，同那些受疾病和苦役折磨的新兴煤矿工人的情况毫无两样。

在丰山，由天道教徒出身的政治工作员“金牙”穿一身高级西服，拄着文明棍，为我们带路。我们经过黄水院大坝建设工地和丰山郡城，在一个火田村僻静的猎人家，和朴寅镇见了面。我们一面在火盆里烧新出的土豆吃，一面谈论祖国的命运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那天晚上，朴寅镇谴责崔鳞，说他是天字第一号卖国奴。

朴寅镇最痛恨的是自称“三大爱国者”的崔鳞、崔南善和李光洙。朴道正之所以特别恨他们，是因为这三个人荒诞无稽地污蔑朝鲜人是未开化的民族。

“凡是看不起本民族的人，没有一个是走正路的。”

朴寅镇说得对。革命是凭自己的信念干的，这个信念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信赖和自豪，然后才是对政治理念的信仰。如果没有对本民族和本国人民的信赖和自豪，那么爱国精神从何而来呢。

那天，我和朴寅镇分手后，走在漆黑的夜路上一直想这个问题。我向丰山地区政治工作员们解释九月号召书的思想的时候，也援引了朴寅镇的话。我着重强调说，除了抱着对我国人民、我国工人阶级的信赖，为开展全民抗战做准备以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秋色正浓的时候，我们带着光复祖国的大纲默默无闻地跋山涉水的祖国之行，并没有枉费工夫。

自从我们去过新兴、丰山地区之后，喜讯频传，赴战、咸兴、兴南、元山、端川、丰山、新兴等国内各地，都迅速壮大了全民抗战的力量；黄水院大坝建设工地成立了工人突击队，接着又建立了厚峙岭生产游击队；工厂和工地上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和民夫集体逃走事件。咸兴——新兴地区的许多工厂和煤矿也成立了工人突击队，怠工、施工作假，爆炸事故等在各地不断发生。在同一个时候，咸兴万岁桥的栏杆上和东兴山九千阁的墙上，贴出了关于九月号召书的宣传品，并开始流传金日成到咸兴大街理过发的传闻，甚至传开了金日成住过日本陆军医院的奇闻。

咸兴、兴南地区的工作员自从接到九月号召书后，更加积极地做劳动组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找出一百多名隐蔽的劳动组合成员，都吸收到祖国光复会组织里来了。兴南地区劳动组合成了工人突击队的源泉。

如果没有发生“惠山事件”，兴南地区地下组织的成员就会做出更大成绩来的。但由于发生了这起事件，魏仁灿、金公洙、金应鼎等同志被捕，关进了咸兴监狱。

在元山、文川、川内里地区，我们地下组织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九月号召书发表的那年秋天，川内里水泥厂地下组织领导了有一千多工人参加的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过去任过副首相的郑一龙本是文川冶炼厂的工人。他曾自豪地说，解放前他们文川冶炼厂有过很多地下组织的成员，他本人也曾在他们的影响下同鬼子工头作过多次斗争，可是当时他还不知道在背后指导他的是地下组织。

解放后，我在平壤作凯旋演说那天，文川冶炼厂炼出了第一炉有色金属。这也是解放前一直在那个冶炼厂进行地下活动的祖国光复会组织发起的爱国行动。

我们的政治工作员和地下组织的成员在监狱里也宣传九月号召书，坚持了斗争。

我们发出的九月号召书的影响确实很大，它在把国内的革命运动同白头山的斗争联系起来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水丰发电站的工人成长起来，后来当了建设相的崔在厦也在生前说过，从 30 年代末起，朝鲜中部以北的大工厂、建设工地的工人几乎都在与白头山有联系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下进行了活动；他本人也跟着同伴多次参加过罢工和怠工。

正如他说的，当时我国工业地区，无论哪里都有祖国光复会的组

织，在这些组织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力地开展起来。这是对挑起中日战争，疯狂镇压和掠夺朝鲜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击。那些放弃反日救国的初衷，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人，无论多么声嘶力竭地宣传反共和亲日，我们的工人阶级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爱国气节。

九月号召书发表后有五六年的某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曹晚植劝告朝鲜青年学生参加学生兵的劝告文。这是曹晚植自己写的呢还是日本鬼子编造的，其内幕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确令人大为惊愕。连曹晚植都转向，那么，在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中还能有谁不转向呢。看来，当时好多人都这样想过。

但是，工人阶级就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响应我们的号召，加紧进行了全民抗战的准备。研究特种武器的兴南地区某秘密军工厂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爆炸事故。据敌人调查，事故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有意的破坏。我们的革命组织成员渗透到号称警戒森严，水泄不通的敌巢穴去，组织了打击敌人的斗争。我们的工人阶级积极贯彻了九月号召书提出的战略方针。

九月号召书，成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适应中日战争爆发这一新形势，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唤醒他们，组织和发动他们来胜利完成光复祖国大业的有力武器。

六　经历“惠山事件”有感

1937 年是抗日革命的全盛期。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随着我们主力部队进入白头山地区跨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代，掀起了空前广泛而深入的新高潮。

正当万事亨通，称心如意之际，朝鲜革命却又遇到了险恶的挑战。

在我们离开白头山地区到抚松、蒙江县一带活动的时候，敌人炮制出世称“惠山事件’的案件，刮起了以暴力镇压我国革命力量的黑旋风。他们疯狂地破坏我们到白头山地区用了一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大肆逮捕忠于我们的领导和路线的革命者。

敌人经数次大举搜捕，逮捕监禁了数以千计的爱国者。光是在狱中被拷打致死的人就不知有多少。

由于这次事件，朝鲜革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下本来进行得一帆风顺的党组织建设工作和祖国光复会组织建设工作，又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我在蒙江县大甲砬子密营听取金平和金在水的汇报时，第一次听到了“惠山事件”的详细情况，真不知该如何形容那时心中的愤怒。自从极左的反“民生团”斗争造成许多无辜的牺牲以来，这是第一次给我带来莫大哀痛的重大损失。

在发生“惠山事件”后，我对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问题想得很多很深。“惠山事件”可以说是检查每个人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意志是否坚定、鉴别真假革命者的一次大考验。信念和意志坚定的人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反之，信念和意志薄弱的人则抛弃革命者的尊严，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

这次事件的初期，经不起敌人的拷问，原原本本地供出了组织内部秘密的叛徒中，有被派到吉惠线和白茂线铁路建设工地的地下工作员。我们是想通过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的工人当中建立革命组织的。可是，他们被抓到警察署挨了几下棍棒，就投降了敌人。他们缺乏宁死也要严守秘密，维护革命利益的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如果他们几个人没有供出秘密，长白一带的革命组织是不会被破坏的。在第一次搜捕时，我们就失去了权永壁、李悌淳、朴寅镇、徐应珍、朴禄金等许多领导骨干和组织成员。

革命的信念和意志是革命者必备的根本品质。没有这种品质的人，不能称之为革命者。

在谈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有的标志时，我们当然重视他所具有的思想和意志如何。这是因为，越是思想和信念坚定的人，他的生活目的就越明确，而且会为达到这一目的做出真诚的努力。

因此，我们在培养革命者时，特别致力于教育所有的人都具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的信念看作是革命者的重要标志，并为培养共产主义的信念倾注巨大努力，是因为在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的解放的旗帜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过程，是

在人类的所有革命中最艰苦而长期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钢铁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就不能把摆脱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束缚和挑战、维护和实现人的自主性的艰巨的革命运动引向最后胜利。

意志是保证信念不改变的强有力的伙伴和保护者。

信念和意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既可能变得更坚强，也可能变得脆弱，甚至发生质变。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发生质变，革命就要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正因为这样，我们把培养共产主义信念的教育看作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基础工作。

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只有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和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才能形成，通过不断的教育和自我修养变得坚定不移，稳如磐石。没有经过这种过程培养起来的信念和意志必然如空中楼阁。在惠山警察署的刑讯室未能坚持革命者信念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是没有在革命的组织生活和实践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的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没有经过暴风雨捶打。他们大都是在抗日革命的全盛期参加游击队，只见过打胜仗的人。在革命乘胜长驱的情况下，是会有思想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乘机混入革命队伍的。

听取了关于“惠山事件”的报告后，我们立即召开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紧急会议，讨论了如何保护面临危机的革命组织，更加有力地开展党的建设和祖国光复会组织建设工作的对策。

敌人在第一次搜捕中，逮捕监禁了长白一带大部分领导骨干，接着进一步扩大搜捕的范围，把魔掌伸向了整个西间岛和鸭绿江南岸的甲山一带。敌人大肆渲染他们的所谓战绩，好像完全掐断了朝鲜革命

的命脉。但是，我们千辛万苦组建的地下组织并没有全部遭到破坏。在长白和甲山一带，有不少人避开敌人的魔爪，躲到别的地方或深山里隐蔽起来。长白县党委和长白县祖国光复会组织的领导班子，因为权永壁、李悌淳、徐应珍、朴寅镇等人的被捕，已处于解体状态，但是，以朴达、金铁亿、李龙述等为中心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领导班子仍在坚持斗争。

我们首先派张曾烈和马东熙到国内去，同隐蔽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领导成员取得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和掌握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并为重建被破坏的组织采取对策。我们总的意图是化险为夷，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的镇压所带来的损失。

马东熙和张曾烈为了寻找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成员，走遍了甲山郡一带的山村。他们到了南兴洞时，由于在产农指导区当文书的金泰善向敌人告密，不幸被捕。

金泰善本是马东熙的同乡好友，他们一起迁到甲山后，仍相处得亲密无间，共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金泰善到长白县的一个讲习所念书，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中途退学时，马东熙从私塾的经费中借出五元钱，替他交了学费。从那以后，马东熙把自己给人家锄地、卖柴火挣的钱和替人代笔的酬金都统统交给他，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念完了讲习所。金泰善在讲习所毕业后，当上了产农指导区的文书。他对张吉富(马东熙的母亲——译注)大娘说:“大娘，我能成为一个知识青年，挣碗饭吃，多亏东熙真心实意的帮助啊。东熙的情谊，别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我死了也忘不了的!”马东熙接受了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领导

成员进行联系的任务来到甲山，把南兴洞金泰善家选做隐身处，就是因为他坚信他们的友情是很牢靠的。然而，金泰善已经变成了敌人的忠实奴仆。当马东熙和张曾烈到他家去求他供几天吃住的时候，他给他们准备了热饭热菜和温暖的床铺，然后向敌人告了密，说他家里来了金日成的两个部下。这个金泰善的确是个可恶的家伙。

马东熙和张曾烈被捕后，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马东熙怎样经受了严刑拷打，怎样保住了秘密，这已经通过抗日战士们的回忆录和文艺作品作了大量的介绍。若问马东熙是什么样的人，连小学生都会回答说他是咬断自己的舌头保住了秘密的人。自己咬断自己的舌头，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是只有宁愿牺牲做忠良，也决不活着当叛徒的人才能做到的。人只要不怕死，什么事都能做到。

马东熙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是源渊于坚定的信念的。这个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任何拷问和威胁都不能摧垮的钢铁意志的表现。马东熙深信，只要自己严守秘密，就能保全组织，即使自己死了，革命也一定会取得胜利。

把马东熙造就成为具有坚定信念的是革命实践。他住在白岩地方时，组织过反日会，还当上教员对火田民的儿女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

他加入人民革命军后，同老队员们一道参加了艰苦的抚松远征，还作为警卫连的文化教员做过提高队员政治、文化水平的工作。在这过程中，他领悟到了这样的真理：人变成了亡国奴，还不如丧家犬；民族生存之路在于斗争；只有闹革命才有活路，不革命，子子孙孙就要永远过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他把这一认识变成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

马东熙从小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品德。他对那些不公正、没有廉耻、违背良心的现象，从来就是毫不妥协的。他一旦看出对方是无耻之徒，就连自己的级任教师，也坚决断绝了关系。他念小学时的级任教师姓赵，是个根本没有教育者的良心，与市侩无异的人。他不是实事求是地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是根据学生跟自己亲不亲，作出很不公正的评定。对送礼多的人家和富豪权贵的子弟，不管实际成绩如何，都给打满分。他为了抬举他偏爱的学生，不惜把别的优秀生的分数减少。他的这种坏作风，直到马东熙快毕业时仍没有改掉。他为了让一个送礼多的权贵的孩子当第一名，故意扣减了各门课都优秀的马东熙的历史课考卷的成绩。马东熙抑制不住气愤，径直去找级任，要他拿出试卷给他看。姓赵的不但没有给他看试卷，反而骂他不懂规矩打了他一巴掌。这激起了马东熙的愤怒，他当即主动宣布退学，并在级任面前把成绩表撕了个粉碎，然后回家去了。

马东熙的父亲马虎龙不忍心让独生子年纪小小的弃学去谋生，他拿出白天买来的一顶学生帽给儿子看，说道："我看你光着头上学，心里过不去，才给你买来了一顶帽子，可你倒要退学，在家种地，这像话吗？当老师的偏心，向着阔人家的孩子，看着权门世家的眼色行事，那是常见的事，你就为这个跟老师闹，能闹出什么名堂？快去给老师赔个不是吧。"可是，马东熙没有去。他父亲要去赔不是，他也不让。

后来，马东熙和那个级任各自走上了敌对的道路。马东熙成了当时社会的反叛者，投入了爱国战线；而那个姓赵的抛开教坛，却走上卖国叛逆之路，当上了警察，后来又成为便衣警察，疯狂搜捕爱国者。

他红着眼睛监视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马东熙。他毫不放松地监视马东熙的一举一动，打定主意，如果抓不住确凿的证据，就是捏造罪名也定要把马东熙拉到刑场上去。

自从马东熙经常出入长白地区受到人民革命军的影响，姓赵的就严密地盯上了他的梢。有一天，马东熙到长白去见游击队代表金周贤，被批准入伍。他回家途中在鸭绿江桥头碰上了正在等他的那个姓赵的便衣警察。姓赵的横眉竖眼地盯着马东熙。马东熙明知桥头的空气异常紧张，仍若无其事地回家去做了上路的准备。他母亲为要去白头山的儿子做了饯行的饭。可是，马东熙还没来得及吃上这碗饭，姓赵的就已经带着警察闯进院子来要抓他。马东熙急忙从后门逃出去，安然地渡过了鸭绿江。

一个老师死心塌地地要逮捕自己的学生，这种世纪末道德沦丧的现象，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造成的违背人伦的风气酿出的悲剧。解放后，张吉富女士每当和我见面时，就常把这件往事当故事讲给我听。

马东熙在口隅水山战斗后，在战场附近碰见了那个姓赵的便衣警察。那个警察是参加对我们部队的“讨伐”，死里逃生保住一条命，正要逃窜的。他一见马东熙，举枪就打。马东熙当场击毙了那个心中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连自己的学生都要下毒手的卑鄙无耻的亲日走狗。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马东熙的为人，也可以了解马东熙的信念是扎根于什么样的土壤的。

马东熙跟在我身边不过一年半左右。他是人人都喜欢的忠实的游击队员，可是他在游击队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大事或趣事。

然而有一件与他有关的往事却是难忘的。当我们结束抚松远征，在东岗密营为进行军事政治学习筹集粮食的时候，马东熙所在的七团三连也天天出去搞粮食。有一天晚上，连长又带人去搞粮食，让冻伤了脚的马东熙和另外几个新队员留在密营磨玉米，准备第二天的早饭。

马东熙按连长的命令开始磨玉米。那天他在雪地上走了一整天，加上饭后的困倦，累得很难受。他抓把雪擦擦脸，提起精神继续磨磨。而另外几个队员却躺下来说，我们累得慌，就是吃不上饭，也要躺一会儿。马东熙只好一个人辛辛苦苦地磨磨，而他们却真地躺在那里什么也没干。等到马东熙一个人磨完玉米，他们才商量该拿什么来酬劳马东熙。我们的新队员当中，有时会碰到像他们这样不懂事理的糊涂人。马东熙觉得他们太不像话，狠狠地批评了他们。

我一回到密营，马东熙最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叹着气说，他们没有一点同志友爱之心，什么都不懂，带着他们这样的人怎么闹革命啊。我见他灰心丧气，便对他说，他们现在还缺乏组织锻炼，往后好好培养，也会成为好战士的。后来，那几个新队员真的成了精明强干、英勇善战的强兵。

马东熙参加游击队不久就成长为优秀的战斗员。对普天堡进行侦察时，他非常认真负责。我高度赞扬他在执行任务中发挥的忘我精神和积极性，在庆祝普天堡战斗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上，让他作为光荣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代表去接受人民代表团赠献的锦旗。

后来的斗争实践证实了马东熙确实是优秀的革命战士，是当之无

愧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全体战士的代表。一句话，可以说他是共产主义者的表率。

司令部的位置，马东熙比谁都清楚。他被捕后因为没有泄漏秘密，我们安然无事。

马东熙牺牲的第二天，马虎龙带着棺材到惠山去装殓了儿子的尸体，从警察署门前走过，碰见了崔警部。

崔警部见是马虎龙，便说：

“老头子，你载着死了的儿子走，感想如何？”

马虎龙对这个残害同胞的屠夫崔警部平时就视如仇敌，这时揩着眼泪愤愤地回答说：

“我的儿子东熙不是因为偷日本鬼子的东西而死的，是在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女儿和儿媳妇也是这样牺牲的。我当父亲的感到骄傲。”

马东熙的父亲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被捕。他在咸兴监狱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丝毫也没有屈服，保持了作为革命战士的父亲、爱国者的节操，和刽子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张曾烈却与马东熙完全相反，挨了几下棍棒，就全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密营和地下组织。马东熙为坚守革命者的气节，咬断了舌头。可是，张曾烈怎么就把对革命的誓言弃如敝屣，走了人人唾骂的背叛之路呢？

若论学历或理论水平、工作能力，他一点也不比马东熙差。若论参加游击队的年限，他倒是马东熙的前辈。张曾烈聪明、随和，刚参加游击队，一般队员就评价他是“当干部的材料”。我们司令部

也把他作为培养对象。他参加游击队后，没有经过一般队员都要经过的磨练阶段，就一跃而成为师部青年科科长。这说明他受到的信任不次于权永壁或金平。在组织长白县党委时，他当选为委员，从这件事也可以充分了解我们对他是多么信任的。一句话，我们给了张曾烈所能给的一切。

他还和我们一道挨饿受冻，一道熬夜工作。他没有为我们所经受的困难感到悲观或失去信心。他默默地同我们一道忍受了艰难困苦。可是，他刚被关进监狱，就乖乖地举起了白旗。他也经受过种种苦难，可就是没能挺住刑讯室里的拷问，像丢弃一张废纸似地抛弃了革命者的尊严和气节。

我在听取关于张曾烈变节过程的报告时，痛心地领悟到一个人的人生现在铁窗外是一样，在铁窗里又是另一样的客观实际。如果说，张曾烈在铁窗外时的世界观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可以说他在铁窗里的世界观就是无异于犹大的了。他堕落成了拿革命的利益换取个人肉体生命的市井之徒。

张曾烈向敌人提供了很多秘密。他把与自己有联系的组织、长白县上岗区和中岗区革命组织的负责人、甚至司令部的位置和他所知道的许多密营的位置，全都告诉了敌人。他把警察带到十九道沟秘密联络站，让敌人逮捕了池泰环和曹开九。

曹开九也和张曾烈一样叛变了。他把警察带到我们缝纫队所在的干巴河子密营，杀害了全体缝纫队员。马东熙的妻子金容金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张曾烈怎么就变成了如此卑鄙无耻的人呢？难道他平时所念叨的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伪装吗？

他常谈论信念，然而他的信念是没有牢固基础的、分文不值的东西。看来，他一见到那吓人的刑具和警官凶狠的眼神，就被大日本帝国的威容镇住，陷入了怀疑主义，不相信抗日革命能够打败大日本帝国，以为抗日革命是一种空想。

那么有牢固基础的信念是什么样的呢？那是对自己所崇尚的理想绝对的信服，为实现这个理想不怕饿死、冻死、打死的坚定决心。换句话说，是对自己事业的正确性、对本阶级本民族力量的确信；是用自己主体的力量克服艰难险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恒心。而张曾烈就是没有这个不怕死的恒心。他本应该有宁可自己被打死，也要保全革命利益的决心，但与此相反，他把革命置之度外，只顾保住自己的一条命。

张曾烈以出卖革命为代价，保住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可是他丧失了无比宝贵的政治生命。我想，人们只记着马东熙，却不记得张曾烈，其理由就在这里。

当我回想起马东熙和张曾烈所走过的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时，就很自然地想到金赫和张小峰。他们也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沿着同一个轨道参加革命的，可是他们的终点站却是一个像南极、一个像北极，截然不同。我想，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也应该从他们两人所具有的信念和意志的本质差别去找。

金赫是重视组织生活和革命实践的人，张小峰理论水平高，头脑清晰，而缺少实际行动，是个很自负的人。饱经沧桑的金赫不怕任何

艰难困苦；而张小峰不爱做受苦的活。一个是不惧赴汤蹈火，满腔热情的硬汉，另一个是雨天走路时怕泥水脏了鞋帮和裤腿，专踩石头走的冷静而心计多的男子。

当我们早在卡伦和孤榆树等地活动时，我的同事们虽然承认金赫是个才子，但都不曾想到他会为革命做出什么大事来。因为他们都有一种成见：一个会写诗作曲的书生，能为革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在那个年代，挎上吉他在街上兜几圈，人们就会把他看做是个戏子，所以，不甚了解金赫的人都这样看待金赫，是不足为奇的。

对张小峰则不然，大家对他都寄予相当大的期望。他虽然后来叛变了，但他原来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他用笔名发表过许多文章。为杂志《布尔什维克》撰文最多的就是张小峰。他是可以和车光秀相提并论的有水平的理论家和鼓动家。他的理论水平，连火曜派的大人物金灿都抵不过，跟他争论起来总是陷于被动，张口结舌。我们在举行卡伦会议时就住在张小峰的家里。

我和我的同志们做梦也没想到，几年后他会在监狱里写转向书，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反过来劝诱我们“归顺”日寇。

综上所述，除了肉体生命，人所具有的另一个生命——政治生命的长短是由有无信念和信念的强弱决定的。信念和意志越坚强，政治生命就越长久。半途抛弃信念的人的政治生命是必然夭折的。

曾当过我们主力部队的参谋长，后来投降敌人的林水山，他的背叛行径比李钟洛、张小峰还要无耻。他居然当上“讨伐队”队长，气焰嚣张地要捕杀曾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敌人叫他当了

密探，后来发现他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一脚踢开了他。从那以后，他当了一个赶牛车卖酒的小贩，这是失去了信念的人应有的可悲下场。

刚解放时，他赶着装酒桶的牛车从安图经三池渊去惠山的路上，同柳京守带领的小组不期而遇。柳京守是按照我的命令，为了消灭隐蔽在白头山附近的日军残兵败将，正开往白头山的。林水山一见是过去在他手下的人，神色尴尬地说，你们也都下山来了？金日成将军还在山上吗？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回来，光你们回来了？那时，柳京守、李斗益和去消灭日军残兵败将的抗日战士都穿着日本军装，所以，林水山还以为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归顺了日军。他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可见他成了一个多么昏庸、不问时事的人。一个人丧失了信念，丧失了气节，就必然要落到这个地步。

当然，同我们一道手持武器走过抗日革命这条艰险道路的人，绝大多数是信念坚定、意志刚强、百折不挠的战士。他们在处境最险恶的时刻也没有摈弃革命者的信念，没有改变解放祖国的决心。我们的战友，我们的战士，在人地两生的异国旷野倒下去殒命的时候，都嘱托后人“要热爱未来!”都高呼“共产主义万古长青!”。只有信念坚定的强者才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放出这样的光彩。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的抗日游击队员就不可能克服满洲的严寒和难忍的饥饿。

在谈论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时，我总是要把柳京守这样的人排在前列。把自己的领袖和领导者的思想化为自己的信念，为坚守这个信念，永生永世径直走认准的一条路，在这方面，柳京守是人人都应效法的榜样。

我头一次看到柳京守是在 1933 年 9 月，刚结束东宁县城战斗的时候。我们打完仗回到小汪清正在休息，崔贤率领延吉游击队队员们来见我。其中有一个年纪小的队员形影不离地跟着崔贤，他就是柳京守。

由于通信员的过失，延吉游击队成了“迟到生”，未能赶上东宁县城战斗，柳京守为此十分扫兴，就拿崔贤出气，大闹了一通。他说：

“连长同志，来到小汪清，难道白白吃人家几顿闲饭就回去吗？不管打哪里，跟着金队长打一仗再走吧。”

从他这一句话，我就看出他是个不同一般的硬骨头。当时，他十八岁，是十六岁加入革命队伍的。

“金队长，那个三孙，别看年纪小，是个好战士，可不好惹啊！”

三孙是柳京守的本名。崔贤的话是对柳京守的总评。只凭这一句话，我就知道崔贤非常喜欢他。

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小队员的短短经历，反映了国家沦亡，日月无光的朝鲜的悲惨景象。柳京守经历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小当了长工，十几岁时参加春荒暴动，被军阀当局逮捕，在龙井监狱受过拷打。间岛地区革命者很多，可是十几岁上就在监狱受过灌水、喷辣椒末这种酷刑的人是不多的。柳京守与张曾烈、李钟洛之流不同，勇敢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下意识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手掌上满是厚厚的趼子，像一块铁板子。

我听了柳京守小时候“拾荒读书”的故事，禁不住对他的深切同情。所谓“拾荒读书”，是指非正规的读书而言的，是在别人念书时在一旁眼看耳听的认字和领会意思的学习方式。他每每到集市上卖了柴

火回来时，就蹲在私立学校教室的窗下，聚精会神地用小棍子往地上写教员写在黑板上的字。他就这样学会了朝文字母和算术九九表。

不久，全校都知道了他这样“拾荒读书”的事，都表示同情。有一位名叫郭灿永(郭池山)的教员深受感动，让柳京守入了学，还替他出学费。说起来，一个卖柴的孩子这样热心读书是罕见的，那个教师让素不相识的孩子入学，并替他出学费，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因为家境太穷，柳京守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地主家当了长工。柳京守的辍学，使郭灿永受了很大刺激，他也辞去教师之职，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开始了革命的启蒙工作。后来，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成了指挥员。

柳京守在当长工时，仍继续受到郭灿永的辅导。郭老师对这个学生的爱护和关心是不同一般的。这样的老师不料给扣上“民生团”这个冤枉的罪名，被拉到了审判台上。左倾排外主义分子毫无理由地撤了他连长的职务，并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当郭灿永被拉到群众审判场的时候，柳京守豁出性命替他作保。他在审判场为自己的恩师作保，是应该受到千万人赞扬的勇敢行为。其实，当时他自己的名字也被记在“民生团”嫌疑分子的名单里。一个“民生团”嫌疑分子为打上“民生团”标签的“被告”作保或表示同情，那是无异于跑到枪口前去送死的自杀行为。但是，柳京守挺身而出，宣布自己作保，证明自己的老师无罪。他这一行动却成了“罪”，被拉到关押“民生团”的监狱去了。柳京守的勇敢行为是一个弟子能为恩师尽到的最崇高的道义。他至死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为尽到弟子的道义做出了一切努力。

他之所以这样忠于道义，是因为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信念坚定的人是重视道德，重视情义的。革命者应该维护正义，憎恨邪恶，坚持真理；革命者要对同志和人民信守道义，就要具有不惜为之献身的决心。这就是柳京守的生活信条。

他断然地指出，左倾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判为“民生团”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的；把忠于革命的人打成“民生团”，任意处刑是犯罪行为。他认为，目前由于极左地进行反“民生团”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混乱，但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会纠正过来。他就是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坚决维护被错判为“民生团”的真诚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柳京守在审判场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自己恩师的勇敢行为，深深地感动了东满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我在大荒崴听到这件事，不禁感慨万端地想起了在小汪清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

我在马村为延吉游击队送行时，对崔贤开玩笑说：

“那个三孙，怎么看都是个招人喜欢的好战士。作为我们这次相逢的纪念，把他交给我好不好？”

崔贤半真半假地回答说：

“现在可不行。别看他打仗有一手，可还是个羽毛未丰的雏儿。我再带他三年，到时候一定交给您，您先等一等吧。”

小哈尔巴岭会议以后，柳京守被调到我身边当连长。自从在小汪清第一次见面后，他一直在崔贤部队当机枪手，有近十年的光景没有见到他，因此没有机会细心照顾他。如果说我为柳京守做过什么，那只是我送了他个“小革命家”的称号。

柳京守把这个称号看做是我对他的表彰，把我当做心中的支柱，决心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

我至今还记着我们胜利结束茂山地区的战斗，向天宝山一带行进时的一件事。

敌人探到我们的行踪，策划把“讨伐”兵力集结到天宝山及其周围，对我人民革命军进行大扫荡。崔贤部队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弱向我们集中的敌人兵力，进行了进攻天宝山市街的战斗。那次巷战打得非常激烈，敌人甚至把他们的女人都拉出来叫她们投掷手榴弹。

崔贤消灭了城里的大部分敌人，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他决心打一场诱敌歼灭战，消灭更多的“讨伐”兵力。他从部队中抽出五十多人组成一个战斗组，派到距天宝山市街约有二十里的树林里布下了埋伏。柳京守参加了这个战斗组。他的小组为了引诱敌人连续奇袭了“讨伐队”宿营地。有的夜里对同一个宿营地奇袭了两次，有一天夜里还夺取了“讨伐队”的作战地图，气得敌人发了疯似地追击他们。那时，柳京守包揽了最危险的重要战斗，整整三天连水都没喝过。对于柳京守在这次战斗中立下的战功，崔贤在解放后还时而谈起，讲得很生动。崔贤部队当时一连翻过七个山岭，不停地打击了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在泥沼地里又杀伤了几百名敌人。

多亏崔贤部队进行了这些战斗，我们主力部队才不受敌人的多大阻力，顺利地到达了天宝山一带。我们没能按计划在这里与崔贤部队会合，而同崔春国部队相会了。那时，崔贤部队隐蔽在离天宝山有几十里的地方，为下一次的诱敌歼灭战做准备。

据崔贤讲，那时第四师的全体游击队员都为没能和我们相会深感惋惜。

柳京守对我们的深厚情义是难以表达的。他的情义有多么高尚而真诚，我在进行小分队活动的时期有更深的感受。

作为革命家的柳京守的人性美，集中地表现在他无条件地坚决执行自己司令官的命令、指示上。他执行司令官的命令，从不说动人的誓言，但他具有一旦应承的事就决不食言的优良品质。

“司令官同志的怀抱就是我们唯一的靠山。只有竭诚拥戴司令官同志，我们才能解放祖国，也才能开拓自己的命运。只要遵循司令官同志的意图去做，我们就一定胜利。”

这就是柳京守始终不渝的信念。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信念，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总是忠诚地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

1941 年早春，我为了领导在满洲各地和国内活动的小分队的工作，带着柳京守的连队离开苏联远东地方的训练基地，来到了白头山一带。那时，柳京守和他的队员帮我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把司令部设在寒葱沟，往各地派出了小组。柳京守也按着我的命令，多次执行了联络任务。他每当离开司令部时，都把发给他们小组的粮食全留给警卫队员，托付他们要保证让将军吃上饭。他还常常组织诱敌战，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别处，以免危及司令部的安全。

司令部在寒葱沟的时候，我曾交给柳京守一项任务，叫他到桦甸县老金厂的联络站去见魏拯民。这是要通过敌人的几十道关卡和禁区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因此，司令部给他配备了十来名队员。但柳京守考虑到司令部的警卫，只带着两个人走了。我给他们三人发了一袋

子米，可是他只带了五六升，其余的悄悄地留给了全文燮。

当柳京守完成任务回来时，寒葱沟满地都是“讨伐队”生起的篝火，曾搭过司令部帐篷的地方也有好几堆篝火。这时，我命令他回来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年纪小的两个队员为我的安危担心，流下了眼泪。说实在的，那天晚上看了变成火海的寒葱沟，谁也不会相信司令部还存在。尽管如此，柳京守仍毫不动摇，沉着地说，时间只剩下 30 分钟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 30 分钟内找到司令部，就要违背司令官同志的命令。

不管情况多么危险，司令官同志一定会等着我们三个人，一定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的。他这样安慰着哭泣的队员，然后，把他们留在山上，自己毫不犹豫地朝着搭过司令部帐篷的地点爬去。他爬了一阵，恰巧遇见了我们留在那里的队员。当时我深信柳京守完成任务回来一定会先找司令部；而柳京守断定，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司令官一定会在原地等待完成任务回来的部下。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丝毫不差，完全一致。

柳京守分毫不差地严守我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态度和坚决执行任务的精神，是出自于深信自己的司令官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丢开队员不管这种坚定信念的，是出自于为了报答司令官信任和爱护的恩情，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痛苦这种真诚情义的。

柳京守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和情义，解放后组建了铁道警备队和坦克部队；在战争的每个阶段，为贯彻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因为这样，我至今每当见到人民武装力量部的领导干部时就说，

要把军人培养成为不管风云如何变幻，环境多么恶劣，都能不屈不挠地把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坚持到底的刚毅的战士和忠良。

历史经验表明，当革命胜利前进，形势有利的时候，队伍内一般不会出现动摇分子和叛徒，但是，当国内外形势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革命道路上出现困难的时候，队伍内就会发生思想上的混乱和动摇，甚至出现投降分子和落伍分子，招致莫大的危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国际大事变，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方面促进了政治上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

九·一八事变以后，坚贞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全面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因而把朝鲜革命引向了新的高潮。而一部分民族运动者和革命觉悟不高的共产主义运动者则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再也不能抵挡它了，于是走向了抛弃斗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内地的事变也是这样。当时我们断定，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必然招致他们分散并消耗自己力量的结果，这将形成有利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局面。当然，我们作这样的分析，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忽视中日战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给我们造成新的困难这一点。我们重视由于中日战争而急剧变化的险恶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主动地努力扭转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局面。对革命者来说，重要的就是这种勇于克服困难的百折不挠的斗志和信念。

然而，在混入抗日运动队伍内部的投机分子和一时的同路人当中，

产生了难以克服的思想混乱。他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内地占领了武汉三镇，就认为大势已去，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扭转这种形势了。这种思想质变的过程，最后酿出了失败主义，从这个温床中产生了不少背弃革命的堕落分子、市侩和叛徒。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后，一方面着手准备太平洋战争，另一方面在满洲连续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讨伐”攻势，企图最终地消灭抗日力量。结果，曾在南满和北满到处蓬勃兴起的抗日部队几乎全被摧垮，在远征热河的旋涡中，连南满的杨靖宇部队也受到莫大损失。由于远征热河的失败，在东北抗日联军的不少部队经历着很大困难的时候，中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投降分子和逃跑分子。

1938 年夏，杨靖宇指挥的第一军再次远征热河，一开始就陷入敌人的重围，其处境之艰险，是难以言状的。当时，敌人一面加强军事攻势，一面竭力进行诱降抗日游击队员的归顺工作。伪满洲国皇帝的“恩赦大诏”宣称，对投降者不加刑罚，给以归顺者的待遇。这诱惑了革命营垒中的堕落分子、怯懦分子和意志薄弱分子。敌人在变本加厉地猖狂“讨伐”抗日武装部队的同时，更加疯狂地进行“匪民分离”活动，企图割断游击队和人民的联系。这样，革命军就落入了无法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境地。抗日联军部队离开他们如同家乡的游击根据地，走上了毫无把握的远征热河之路。他们走到人地生疏的地方，在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援的情况下，不断遭到敌人的“讨伐”，受尽了折磨。

就在这种时候，被称为杨靖宇一只臂膀的南满有名的抗日战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在辽宁省本溪叛变，他枪杀了反对投降的政治

干部，然后带着部队归顺了敌人。这给第一军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指挥干部的活动路径、各部队的番号、密营的位置，所有这些秘密，程斌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对第一军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完全打乱了第一军的西征计划。

程斌当了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的走卒，充当了捕杀杨靖宇的鹰犬。南满著名的抗日猛将杨靖宇就是在同程斌引路的“讨伐队”进行激战时不幸阵亡的。岸谷调到热河省当副省长时，程斌跟着他去，组织了一个叫“热河一心队”的警察“讨伐队”，当上了队长。

程斌、全光之流的例子表明，越是职位高的人叛变，其犯罪行径就越恶劣，其后果就越不堪设想。

开始听到程斌叛变，我们都不肯相信。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投敌。他也不曾闹过地位。那么，他为什么要投降呢？据我的判断，他叛变，是因为他丧失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从七七事变后，日军战果日见扩大，程斌被敌人的这个威势吓破了胆，认为革命前途无望了。于是想到，与其为不知何时才能成功的革命受苦，不如走个人享福的道路，即使被人唾骂为叛贼又有何妨。我想，这就是程斌投敌的思想动机。

程斌虽然是出了名的战将，但看来思想修养很不够。我所说的思想修养，主要是指坚定信念和具有乐观主义精神。一个人如不很好地进行思想锻炼，遇上逆境就会很快地向困难低头。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仍然主张思想第一主义。

日本战败后，程斌的主子岸谷同家属一道自杀了，而程斌却为保住他那肮脏的性命，下手枪杀了许多日本俘虏后，隐瞒历史，参加了

八路军，还爬上了指挥员的地位。但这种幸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程斌虽然披上了爱国者的画皮，但未能长期隐瞒叛徒的真面目。解放后，不记得是哪一年，当程斌撑着雨伞走在下雨的沈阳市一条马路上时，有一个人钻到他的雨伞底下来避雨。原来，这个人也和程斌一样，是披着画皮装好人的叛徒。他很了解程斌的底细。不知是出于什么念头，他们分别到当局去告发对方是叛徒。这样，程斌这个投敌分子的画皮就被揭掉了。人民法院对这个背弃信念，叛变投敌，给革命带来莫大损失的卑鄙龌龊的败类作出了应有的判决。程斌的命运生动地说明了放弃信念，出卖同志的人将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杨靖宇的部队溃灭后，敌人就把“讨伐”的炮火向我们部队集中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拼命地攻打我们。他们声称，只要消灭了金日成部队，满洲和朝鲜的抗日运动就将完蛋。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严重得难以想象的困难。于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斗争的人们当中，也开始出现了怯懦分子和投降分子。就在这个时期，在东北抗日联军里当过指挥员的方振声和朴得范也叛变投降了敌人。

在苏联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时，我们的队伍中也出过逃兵。当时，我们的不少队员存在着对苏联的依赖心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事大主义。一些指挥员没有重视民族自主意识的教育，而片面地强调拥护苏联、重视苏联、苏联第一的思想，结果产生了只要依靠苏联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想法。也就是说，产生了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朝鲜独立就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痛切地领悟到这样一条真理：民族自主意识是决定革命者信念的绝对因素。革命者必须具有这样的观点：革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主地进行，国家的独立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切实树立这种观点的人们当中就没有出现过逃兵或变节分子。但是，看不起自己和本国人民的力量，企图靠大国的帮助改变祖国和民族命运的人们当中，则出现了落伍分子和投降分子。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本国人民的力量，一遇到困难就无一例外地陷入失败主义；陷入失败主义就会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半路打退堂鼓，放弃斗争。这种人看到大国的革命受挫，就认为本国的革命也没有希望了。革命具有国际性质，共产主义者都希望同国际反帝力量加强团结。因此，共产主义者对别国共产主义者的失败表示同情，把他们的悲痛当作自己的悲痛，这自然是对的。大国的革命受挫，对本国的革命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大国的革命一时受挫，就认为小国的革命也随之无望，而扔掉革命的旗帜，那是极大的错误。

革命是具有国际性质的，但它的民族性质更强。革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主义者只要抱着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就能攻占任何险峻的高地而取胜。这是我始终不渝的主张和定论。

据我的体验，凡是把革命看作易如反掌而加入武装队伍的人，没有明确的信念、意志薄弱的人，没有摆脱宗派的劣根性、瞧不起或排斥别人的人以及失败主义者，都毫无例外，一旦内外形势复杂、革命碰到困难，就滑到背叛革命的道路上去。自从林水山等人背叛革命以后，

我经常教育我们的队员，让他们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并且坦率地说：

“……形势险恶，斗争越来越艰苦。虽然大家都一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结出硕果，国家的独立一定会实现，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所以，没有信心跟我们干到底的人，就放心回家去吧。逃跑是卑鄙的，但打了报告后回去，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干了十多年革命，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有人要回家，我们愿意给他送行，也不会把他的半途而废当问题看。因为挺不住，信念不坚定而脱离队伍，这有什么办法呀。愿意走的就走吧。”

我当众这样宣布，但队员中没有一个人离开战友回家去。朝鲜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困难多么严重，都没有失去信心，继续顽强地坚持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完成了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

经过“惠山事件”，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我们及时采取了扭转局面的对策，大力开展了弥补损失的工作。由于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建设党组织和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工作就继续蓬勃地开展起来。

继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之后，今天在各个艰苦的工作岗位上也不断地涌现着在任何逆境中都毫不动摇的强者。金正日时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是信念和意志的强者涌现的土壤。金正日同志给予高度评价、誉为信念和意志的化身的李仁模的事例，给我们说明了多少道理啊！我认为，全国的党员和劳动者响应金正日同志的号召，开展向李仁模学习的运动，是非常好的事情。

20 世纪 90 年代是信念和意志的价值远远超过黄金价值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要求全体人民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意志，要求党和国家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钢铁般坚定的信念，粉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一意孤行的封锁政策和反动的思想攻势，保卫我们的信念和制度，以金刚石般坚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继续奋勇前进。

现在，有不少国家因为背弃了革命先烈付出血的代价捍卫的信念及其创造物——社会主义，民不聊生，罪恶泛滥，道德沦丧。历史是定会要求那些背弃信念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我国之所以成为任何狂风恶浪都撼不动的强国，是因为我们党的信念坚定，我国人民的信念坚强。信念坚定的党是不会变质的，信念坚定的国家是不会崩溃的，信念坚定的人民是不会瓦解的。

我们走过了艰难险阻的行程，今后可能还要走更加艰险的道路。但是，我国人民是毫不畏惧的。只有高唱着信念之歌，坚定不移地向前突飞猛进的人民，才能登上自主时代的最高峰。

注　　释

[1]　图们会谈：1936 年 10 月，朝鲜总督南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中国的图们举行的秘密会谈。会谈中讨论了阻止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国内的“紧急措施”，制定了“三项政策”：加强国境警备，对人民革命军进行大规模“讨伐作战”，设置集团部落以孤立人民革命军，使之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

[2]　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领，独立军指挥员。

1907 年组织猎人建立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开展反日活动，并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9 年在间岛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侵略军。后来在中国黑龙江一带继续进行独立军活动。

[3]　高丽(918～1392)：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王建所建，国号为高丽，以示它是继承朝鲜第一个封建国家高句丽的国家。定都开京(现为开城)。

[4]　高句丽(公元前 277～公元 668)：朝鲜第一个封建国家。

[5]　古朝鲜：公元前 30 世纪初，檀君以平壤为首都建立的朝鲜民族第一个古代国家。国号为朝鲜，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古朝鲜，以区别于 1392 年建立的李朝封建国家朝鲜。

[6]　马鞍山儿童团：抗日革命斗争时期，豆满江沿岸的游击区解散后，儿童团员们决心替牺牲的父母报仇，为找游击队到了中国抚松县马鞍山密营。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却把这些千辛万苦赶来的儿童团员看作是游击队的“累赘”，不仅没有很好地照顾他

们，甚至把孩子们打成“民生团牵连者”加以迫害。

金日成同志得知这一情况，于 1936 年 4 月亲自到马鞍山密营看望儿童团员，严厉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的错误做法，开导他们要好好培育儿童团员，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他离开马鞍山时，把渴望跟随将军走上斗争道路的儿童团员吸收为游击队员。

后来，马鞍山的儿童团员在游击队里都成长为朝鲜的优秀革命战士。

[7] “民生团”：1932 年 2 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间岛地区炮制的反革命特务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民生团”抛出“由朝鲜人实行间岛自治”的骗人口号，表面上装作维护朝鲜民族的利益，实则削弱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陷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离间朝中人民，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由于“民生团”一开始就暴露出反革命真面目，同年 4 月便被解散。此后，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特务和走狗大肆造谣，说有许多“民生团”成员打进了革命队伍。政治上迟钝、又抱有恶劣政治野心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中计，把反“民生团”斗争搞得极左，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这种现象竟持续了好几年。

[8] “边托洛茨基”老头：本名边大愚，民族主义者，开拓五家子的士绅之一，总管村里的大小事务。他绝对不容许与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思潮传入村子。

1930 年，金日成同志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把他改造过来。因他经常爱谈苏联的托洛茨基，人们便戏称他为“边托洛茨基”。

[9] 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即 1907 年 6 月在荷兰的海牙举行的第二次和平会议。当时，以李俊为首的朝鲜代表带着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信赴会，但由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未能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于是，他们便通过在海牙的国际新闻工作者机构的讲坛和当地的报刊，揭露并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呼吁各国支援朝鲜独立。

但是，李俊等朝鲜代表的这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于是，李俊

在会场上剖腹自杀，以此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0] 吕运亨(1886～1947)：京畿道杨平人，朝鲜独立运动者。早年参与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高丽共产党”的活动，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奋斗。曾在汉城历任朝鲜中央日报社社长、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党委员长等职务。解放后，他在平壤受到金日成同志的接见，回汉城后为贯彻自主的政治路线和联共统一方针而斗争，1947 年 7 月 19 日被敌人暗杀。

[11] 檀君朝鲜：檀君是朝鲜民族的始祖，公元前 30 世纪初由他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古代国家——古朝鲜，亦称檀君朝鲜。

[12]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回到汉城反对美国的奴役。

1948 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回汉城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敌人暗杀。

[13] 高木健夫(1905～1981)：日本福井县人。任日本《读卖新闻》等多家报社记者。1972 年以来，任日朝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曾多次访问朝鲜，并根据抗日老战士的回忆、前日本军警宪和官员的回忆、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文件、自己任《读卖新闻》社长春分社社长时采访记录和目睹的事实，撰写并出版了有关金日成主席革命斗争的《在白头山上燃烧》、《金日成凯旋祖国的道路》等著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